絲瓷之路

——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

IV



余太山 李錦繡 主編

商務印書館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http://www.cp.com.cn



絲瓷之路

——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

IV

Viae Sericae

余太山　李錦繡　主編





2014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絲瓷之路. 4，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 / 余太山，李錦繡主編.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ISBN 978－7－100－07042－3

Ⅰ.①絲… Ⅱ.①余… ②李… Ⅲ.①中外關係—國際關係史—古代—文集 Ⅳ.①D829-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2014)第032324號

絲瓷之路Ⅳ
——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
余太山　李錦繡　主編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三河市尚藝印裝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042－3

2014年4月第1版　　　開本 880×1230 1/32
201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11 7/8

定價：50.00圓

本學刊出版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建設項目經費資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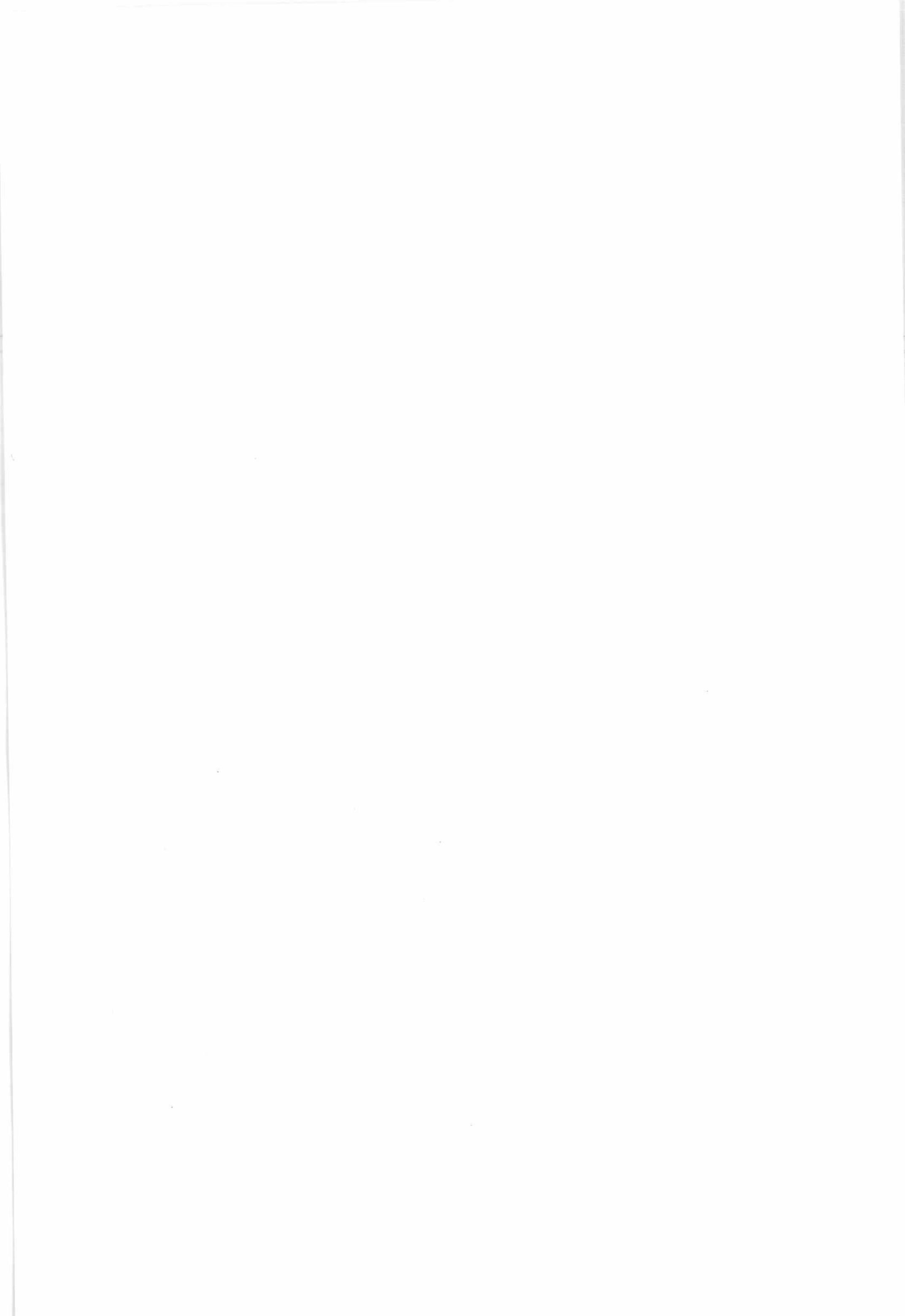
目 錄

內陸歐亞史

地中海和中國關係史

環太平洋史

內陸歐亞史



迦膩色迦的年代

余太山

毫無疑問，有關迦膩色迦年代的主要證據便是貴霜王朝，特別是屬於迦膩色迦本人及其繼承者治期的銘文。

1. 傳世以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紀年的貴霜銘文有 200 多篇。[1] 在可以歸屬 Kaniṣka 的銘文中，與我們的討論有關者有 63 篇。[2] 其中，有王名又有紀年數者 27 篇：

1(170)*, 2(10), 3(13), 3(14), 4(17), 4(18), 5(19), 5(21), 5(23), 5(24), 7(29), 8(30), 9(34), 10(35), 10(36), 11(178)*, 11(179)*, 12(39), 14(40), 16(43), 17(45), 18(180)*, 20(51), 20(182)*, 23(57), 31(187)*, 41(194)*

其餘爲無王名有紀年數者：

3(11), 3(12), 4(15), 4(16), 4(171)*, 5(20), 5(22), 5(25), 5(26),

5(172)*, 6(27), 6(28), 7(173)*, 8(31), 8(32), 9(33), 9(174)*, 9(175)*, 9(176)*, 11(37), 11(177)*, 12(38), 15(41), 16(42), 17(44), 18(46), 18(47), 18(181)*, 19(48), 20(49), 20(50), 20(52), 21(53), 22(54), 22(55), 22(56)

若將兩者合併，則爲：

1 (170)*, 2(10), 3(11), 3(12), 3 (13), 3 (14), 4(15), 4(16), 4 (17), 4(18), 4(171)*,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172)*, 6(27), 6(28), 7(29), 7(173)*, 8(30), 8(31), 8(32), 9(33), 9(34), 9(174)*, 9(175)* 9(176)*, 10(35), 10(36), 11(37), 11(177)*, 11(178)*, 11(179)*, 12(38), 12(39), 14(40), 15(41), 16(42), 16(43), 17(44), 17(45), 18(46), 18(47), 18(180)*, 18(181)*, 19(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182)*, 21(53), 22(54), 22(55), 22(56), 23(57), 31(187)*, 41(194)*

其紀年數且可精簡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1, 41 或 1—12, 14—23, 31, 41。

據此，可以得到以下印象：

A 迦膩色迦可能開創了一個紀元，姑稱之爲“迦膩色迦紀元”。

B 銘文最遲的紀年數是 41 年，似乎迦膩色迦至少在位 41 年。

但 41 年的銘文稱："Kaniṣka，Vājheṣka 之子"。而據臘跋闥柯銘文，Kaniṣka 一世應爲 Vima Kadphises 之子。[3] 因此。這篇年代爲 41 年銘文可能屬於迦膩色迦二世。至於這位迦膩色迦二世之父 Vājheṣka，應該就是下文要提及的 Vāsiṣka。

2. 按照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的紀年數，迦膩色迦之後的貴霜王應爲 Vāsiṣka。在可以歸屬 Vāsiṣka 的銘文中，與我們的討論有關者有 6 篇。[4] 其中，有王名又有紀年數者 3 篇：

22(58), 24(59), 28(62)

其餘爲無王名有紀年數者：

25 (60), 26(61), 28(63)

若將兩者合併則爲：

22(58), 24(59), 25 (60), 26(61), 28(62), 28(63)

其紀年數且可精簡爲：

22, 24—26, 28.

據此，Vāsiṣka 至少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22—28 年在位。但是，這裏的矛盾是第 22—28 年這一時段和上述迦膩色迦的在位年代有所

重疊。這至少有三種可能性：

其一，如果迦膩色迦在位最少 31 年，至少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 22—28 年，則 Vāsiṣka 和迦膩色迦同時在位，亦即兩者一度聯合統治。當然也可能是貴霜王國處於分治狀態。

其二，Vāsiṣka 的在位年代也可能是 24—28 年，蓋指所謂迦膩色迦紀元 22 年的銘文屬於 Vāsiṣka 不是沒有疑問的，由於銘文的王名爲 Vasakushāṇa。[5]

其三，Vāsiṣka 在迦膩色迦紀元百年之後在位，衹是其紀年省去了百位數。換言之，Vāsiṣka 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122—128 年在位。迦膩色迦紀元第 22 年銘文的王名 Vasakushāṇa 則可能是 Vāsiṣka 的另一種拼法。這樣一來，年代爲 41 年銘文所屬迦膩色迦二世就有可能是 Vāsiṣka 的繼承者了。

3. 按照紀年數，Vāsiṣka 之後的貴霜王應該是 Huviṣka。在可以歸屬 Huviṣka 的銘文中，與我們的討論有關者有 63 篇。[6] 其中，有王名又有紀年數者 29 篇：

28(64), 28(65), 28(68), 29(69), 29(70), 31(71), 31(73), 33(76), 33(78), 35(82), 36(83), 38(84), 39(85), 40(87), 45(89), 47(94), 48(108), 48(109), 50(113), 50(114), 50(115), 51(117), 53(120), 58(123), 60(124), 62(126), 4 ≈ 30(189)*, 34(190)*, 51(197)*

其餘爲無王名有紀年數者：

31(72), 32(74), 32(75), 33(77), 35(79), 35(80), 35(81), 40(86),

42(88), 45(90), 46(91), 47(92), 47(93), 47(95), 47(96), 47(97), 47(98), 47 (99/100), 47(101), 47(102), 49(110), 50(111), 50(112), 51(116), 52(118), 52(119), 54(121), 57(122), 62(125), 39(191), 40(192), 40(193), 48(196), 61(198)

若將兩者合併，則爲：

28(64), 28(65), 28(68), 29(69), 29(70), 31(71), 31(72), 31(73), 32(74), 32(75), 33(76), 33(77), 33(78), 34(190)*, 35(79), 35(80), 35(81), 35(82), 36(83), 38(84), 39(85), 39(191), 40(86), 40(87), 40(192), 40(193), 42(88), 45(89), 45(90), 46(91), 47(92), 47(93), 47(94), 47(95), 47(96), 47(97), 47(98), 47 (99/100), 47(101), 47(102), 48(108), 48(109), 48(196), 49(110), 50(111), 50(112), 50(113), 50(114), 50(115), 51(116), 51(117), 51(197)*, 52(118), 52(119), 53(120), 54(121), 57(122), 58(123), 60(124), 61(198) 62(125), 62(126), 4 ≈ 30(189)*

其紀年數且可精簡爲：

28, 29, 31, 32, 33, 34, 35, 36, 38, 39, 40, 42,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7, 58, 60, 61, 62 或 28—29, 31—36, 38—40, 42, 45—54, 57—58, 60—62

據此，Huviṣka 至少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 28—62 年在位。但問

題在於有兩篇屬於迦膩色迦銘文的年代爲 31 年和 41 年。如欲調和這一矛盾，則應假定，迦膩色迦一世統治最遲不超過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的第 28 年，Huviṣka 且於這一年即位。至於年代爲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31 年（No. 187）和第 41 年（No. 194）的銘文則歸諸迦膩色迦二世。這位迦膩色迦二世的在位年代則有兩種可能：

其一，在上述銘文紀年重疊的年代和 Huviṣka 共同統治。

其二，其年代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百年之後：其銘文的紀年省去了百位數。

此外，尚需說明的是屬於 Huviṣka 的年代爲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4 年的銘文（No. 189）。一般認爲：這一紀年數代表 Huviṣka 實際在位年數。也就是說這篇銘文作者並未採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紀年。否則，便是 Huviṣka 二世留下的銘文。Huviṣka 二世即位當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百年之後，4 年相當於 104 年。也就是說，這位君主幾乎是所謂迦膩色迦紀元滿百年之後第一位在位的貴霜王，早於 Vasiṣka。

又如前述，Vasiṣka 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22—28 年在位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蓋屬於 Vasiṣka 的兩篇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28 年的銘文（No. 62 和 63）日期分別爲“冬季（hemanta）第 1 月”和“第 3 月”，而屬於 Huviṣka 的所謂迦膩色迦紀元 28 年的兩篇銘文（No. 64 和 65）日期分別爲 Gurppiya 月（即馬其頓曆的 Gorpiaios 月，相當於 Indian 天文曆的 Proshṣhapada 月）第 1 日和雨季（varshā）第 2 月的第 26 日。換言之，兩者雖然均有年代爲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28 年的銘文，Huviṣka 既在 Vasiṣka 之後，無妨在這一年取代前者登基。

4. 同理，按照紀年數，繼 Huviṣka 之後即位的貴霜王應爲 Vāsudeva。在可以歸屬 Vāsudeva 的銘文中，與我們的討論有關者有 46 篇。[7] 其中，有王名又有紀年數 9 篇：

67/64(127), 74(132), 80(136), 83(139), 84(141), 87(147), 93(153), 98(156), 170(159)

無王名有紀年者：

68(199)*, 70(200)*, 70(201)*, 71(128), 72(129), 74(130), 74 (131), 75(133), 75(133), 76(202)*, 79(134), 80(135), 80(203)*, 80(204)*, 81(137), 81(205)*, 82(138), 82(206)*, 83(140), 83(207)*, 84(142), 85(143), 86(144), 86(145), 87(146), 89(208)*, 89(209)*, 90(148), 91(149), 91(210)*, 92(150), 92(151), 93(152), 95(154), 97(155), 98(157), 122(211)

若將兩者合併，則爲：

67/64(127), 68(199)*, 70(200)*, 70(201)*, 71(128), 72(129), 74(130), 74 (131), 74(132), 75(133), 75(133), 76(202)*, 79(134), 80(135), 80(136), 80(203)*, 80(204)*, 81(137), 81(205)*, 82(138), 82(206)*, 83(139), 83(140), 83(207)*, 84(141), 84(142), 85(143), 86(144), 86(145), 87(146), 87(147), 89(208)*, 89(209)*, 90(148), 91(149), 91(210)*, 92(150), 92(151), 93(152), 93(153), 95(154),

97(155), 98(156), 98(157), 122(211), 170(159)

其紀年數且可精簡爲：

67, 68, 70, 71, 72, 74, 75, 76,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9, 90, 91, 92, 93, 95, 97, 98 或 67—68, 70—72, 74—76, 79—87, 89—93, 95, 97, 98

據此，至少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64/67—98 年 Vāsudeva 在位。年代爲 122 年的銘文不見王名，不屬於 Vāsudeva 也未可知。至於 170 年的銘文則可以歸屬於 Vāsudeva 二世。[8]

5. 除了以上諸銘文外，尚有 3 篇屬於 Vājheska 的銘文。[9] 其中，有王名有紀年數者 1 篇：20（No. 183）*；無王名有紀年數者 2 篇：20（No. 184）*、28（No. 185）*。若將“有王名又有紀年數”者與“無王名有紀年數”者合併，則爲：20（No. 183）、20（No. 184）、28（No. 185），其紀年數且可精簡爲：20、28。據此，可知這位 Vājheska 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 20—28 年在位。

今案：Vājheska 似乎可以和 Vāsiska 勘同。一則名字相類，二則年代重疊。果然，則 Vāsiska 在位應在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百年之後，亦即 20—28 年省去了百位數：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120—128 年。

這樣，根據銘文，我們可以得出迦膩色迦以降貴霜王系如下（按所謂迦膩色迦紀元年份排列）：

Kaniṣka I 1—23

Huviṣka 28—62

Vāsudeva 64/67—98

Huviṣka II [10]4

Vasiṣka [1]20—[1]28

Kaniṣka II [1]31—[1]41

Kaniṣka、Huviṣka 和 Vāsudeva 依次相隨，跨度爲 100 年。然後似乎是一個新的系列：姑且不論 Vāsudeva 二世，Kaniṣka II、Vasiṣka 和 Kaniṣka II 這三者跨度超過了 41 年。這一個半世紀的絕對年代是什麽？便是所謂迦膩色迦的年代問題。

今案：指迦膩色迦開創了一個新的紀元僅僅是一種可能性。迦膩色迦很可能沒有創建新的紀元，而是沿用其父親曾經採用的紀元。

1. 已知迦膩色迦之前的貴霜諸王，丘就卻和閻膏珍，均曾採用元年爲公元前 58 年的所謂超日紀元（Vikrama era）紀年。[10] 閻膏珍的銘文不僅採用過所謂超日紀元，還曾採用元年爲公元前 170 年的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紀年。[11] 既然 Rabatak 銘文明載迦膩色迦係閻膏珍之子，就應該承認：迦膩色迦作爲閻膏珍的繼承者，非常可能繼續沿用其父親，亦即阎膏珍曾經採用的紀元。

2. 迦膩色迦以下貴霜列王沿用同一紀元至少 98 年，也表明貴霜諸王並沒有登基必須改元的意識或習慣。Vāsudeva 一世之後，所謂迦膩色迦紀元很可能又被連續使用了半世紀。[12] 這同樣是貴霜王並不因王位更替而改元的證據。

3. 迦膩色迦之父閻膏珍的年代爲 187 年的 Khalatse 銘文，按所謂超日紀元（元年爲前 58 年）計算，絕對年代爲公元 129 年。而同屬於閻膏珍的年代爲 299 年的 Surkh Kotal 銘文按所謂 Eucratides 紀元（元年爲前 170 年）計算，其絕對年代也是公元 129 年。[13] 既然迦膩色迦是閻膏珍的繼承人，這公元 129 年應該就是迦膩色迦即位年代之上限。

4. 如果迦膩色迦紀元就是所謂超日紀元，按這一紀元紀年的銘文之年數顯然是省去了百位數 2。換言之，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1 年應即所謂超日紀元第 201 年。而如果迦膩色迦紀元就是所謂 Eucratides 紀元，按這一紀元紀年的銘文之年數顯然是省去了百位數 3。換言之，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1 年應即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第 301 年。不言而喻，無論是所謂超日紀元 201 年（公元 143 年）還是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第 301 年（公元 131 年）都未必是迦膩色迦即位之元年，而衹能視爲迦膩色迦即位之年的下限。

5. 迦膩色迦由 Huviṣka 繼承，Huviṣka 又由 Vāsudeva 繼承。屬於 Huviṣka 的銘文最大紀年數是 62，屬於 Vāsudeva 的銘文之最小紀年數是 64，兩者分別爲所謂超日紀元 262 年和 264 年，或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第 362 年和 364 年。因此，Vāsudeva 可能即位於所謂超日紀元 262/264 年（公元 204/206 年）或所謂 Eucratides 紀元 362/364 年（公元 192/194）。

6. 如果迦膩色迦紀元就是所謂超日紀元，Vāsudeva 一世之後貴霜列王的銘文紀年都省去了百位數 3。而如果迦膩色迦紀元就是所謂 Eucratides 紀元，Vāsudeva 一世之後貴霜列王的銘文紀年都省去了百位數 4。換言之，迦膩色迦的創新僅限於沿用舊紀元時省略

其百位數。

要之，迦膩色迦並未新創紀元，所謂迦膩色迦紀元不過是迦膩色迦自其父親繼承的所謂超日紀元或所謂 Eucratides 紀元，迦膩色迦衹是在紀年時省去了百位數 2 或 3。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是公元 143 年或 131 年。這一年未必是迦膩色迦即位之年。既然傳世迦膩色迦的銘文最小紀年數是 1，公元 143 年或 131 年應爲其即位年代之下限。而如前述，其上限應爲公元 129 年，亦即其父閻膏珍銘文最遲的年份。

迦膩色迦即位之年落在公元 129—143 年或 129—131 年之間，這一結論似乎經得起各種資料的檢驗。

一、錢幣

1. 傳世的 Kaniṣka 的錢幣，都屬於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的創建者 Kaniṣka（一世）。錢幣學的證據不支持存在兩個 Kaniṣka。這可能是因爲 Ārā 銘文的 Kaniṣka（二世）沒有發行錢幣。當然，另一種可能性是這位 Kaniṣka（二世）的錢幣還沒有被發現。[14]

2. 儘管 Huviṣka 錢幣的數量很多，類型豐富，但錢幣學的證據不支持兩個 Huviṣka 的存在。或者說，現存錢幣無妨全部歸屬 Huviṣka 一世。[15]

3.Vāsudeva 的錢幣數量不少，類型豐富，出土範圍大。不無理由懷疑這些錢幣並不屬同一位 Vāsudeva，也就是說其中若干也許屬

於另一個 Vāsudeva（二世），甚至可能存在 Vāsudeva 三世。而提及 Vāsu 的錢幣的出現使問題更趨複雜。這一切要得到明確結論尚有待更新證據的發現。[16]

4. 從貝格拉姆（Begrām）到 Bengal 發現了大量錢幣，其中有王名爲 Kaneshko 者，一說可能屬於 Kaniṣka 三世。[17] 而前述提及 Vāsu 的錢幣一說可能屬於 Vāsudeva 三世。[18]

5. 不存在 Vasakushāṇa 的錢幣。[19]

今案：就 Kaniṣka 系列諸王的次序而言，錢幣學的證據和銘文的證據並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遺址

1. 迦膩色迦在時間上和閻膏珍緊密相連，而且確實是後者的繼承者。這一點因坦叉始羅（Taxila）遺址出土的兩者錢幣所處地層的關係而幾乎沒有疑問。[20] 質言之，坦叉始羅遺址的考古學證據對於判定迦膩色迦年代最重要的貢獻在於排除了迦膩色迦年代先於丘就卻、閻膏珍一組貴霜統治者的可能性。

2. 貝格拉姆的考古發掘展示了遺址的三個地層。貝格拉姆 I 的年代早於迦膩色伽，其中可見丘就卻和閻膏珍的錢幣與印度—希臘、印度—斯基泰、印度—帕提亞君主們的錢幣混合在一起。貝格拉姆 II 則包括了迦膩色迦、Huviṣka 以及 Vāsudeva 的錢幣。[21] 這同樣清楚地說明迦膩色迦的年代不可能早於閻膏珍。貝格拉姆 III 則是一

個廢墟，其中出土了 8 枚劣質的 Vāsudeva 的錢幣。

今案：坦叉始羅遺址的發掘排除了若干迦膩色迦年代說成立的可能性，譬如公元前 58 年說等因此無人信從。而依據銘文所推出的迦膩色迦和丘就卻、閻膏珍之間的關係，以及依據銘文紀年列出的迦膩色迦及其繼承人的次序，與貝格拉姆遺址考古發掘的結果也是可以協調的。

三、中國史料

1.《後漢書·西域傳》稱該傳所傳西域事情“皆安帝末班勇所記”。既然傳文未及迦膩色迦，說明迦膩色迦即位應遲於安帝末年（公元 125 年）。又，傳文沒有提及閻膏珍之死，似乎說明閻膏珍可能去位於 125 年之後。

2. 據《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太和三年（公元 229 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也提到朝魏西域諸國中有月氏。又，《魏略·西戎傳》所謂“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似表明在傳文描述的時代，吐火羅斯坦、喀布爾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均役屬貴霜王國。

3. 據《後漢書·西域傳》，“安帝元初中（公元 114—119 年），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另一方面，《大唐西域記》卷一有

載：迦膩色迦時，“河西蕃維，威威送質”。似乎安帝元初中，迦膩色迦已經在位。

今案：既然截止于公元125年《後漢書·西域傳》的資料不載閻膏珍之死，亦未載迦膩色迦事蹟，說明閻膏珍去位和迦膩色迦即位在公元125年之後。又，貴霜人和大月氏人同出一源，“月氏”和“貴霜”客觀上是同名異譯，故授予波調的“大月氏王”與“大貴霜王”無異。無妨認爲Vāsudeva即公元229年遣使曹魏明帝之大月氏王波調。如前所述，Vāsudeva於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64/67—98年（公元207/210—241年或公元195/198—229年）間在位，其人與曹魏明帝（公元227—239年）無疑同時代。既然在《魏略·西戎傳》描述的時代，吐火羅斯坦、喀布爾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均役屬貴霜帝國，其時貴霜王應該是Vāsudeva一世，而不是可能存在的Vāsudeva二世。至於《大唐西域記》所載迦膩色迦之質子並非疏勒之臣磐，有關記載無助於判定迦膩色迦之年代。[22]

四、亞美尼亞史料

據Moses Khoren的《亞美尼亞史》（II, 72）記載，有貴霜統治者Vehsadjan曾響應亞美尼亞王Khosrov號召，一起反抗Artashir。[23]

今案：Vehsadjan可與Vāsudeva勘同，而Artashir無疑即薩珊王Ardashir一世。[24] Vāsudeva既於所謂迦膩色迦紀元64/67—

98 年（所謂超日紀元第 264/267—298 年、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第 364/367—398 年）在位，當與 Ardashīr 一世（224—240 年在位）同時代。

五、波斯、阿拉伯史料

貴霜似乎最先失去對 Bactria 周圍地區的控制，一般認爲這是薩珊進攻的結果。這一事件可能發生在薩珊王朝的創始人 Ardashīr 一世的治期。蓋據 Al-Ṭabarī 的記載：

> 他（Ardashīr）自 Sawād 返回 Iṣṭakhr，且自彼處次第到達 Sijistān、Jurjān、Abarshahr、Marw、Balkh 和 Khwārazm，最遠爲 Khurāsān 的邊陲。此後，他回到 Marw。他殺人如麻，將人頭送往 Anāhīdh 的祆神廟。嗣後，他從 Marw 回到 Fārs，住進了在 Jūr 的營盤。來自貴霜、Ṭūrān 和 Makrān 諸王的使臣均在他面前俯首稱臣。[25]

也可能發生在沙普爾（Shāpūr）一世（公元 240—270 年）時期。蓋沙普爾一世的 Naqsh-i Rustam 銘文聲稱，包括“直抵 Peshawar 的貴霜王國（Kushanshahr）”在內的地區業已臣服，成爲薩珊人的附庸。[26] 換言之，薩珊波斯對貴霜領土的進攻和佔領可能發生在公元 224—270 年間。

今案：波斯、阿拉伯史料與以上推定的迦膩色迦的即位年代以及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的次序並無矛盾。

1. Ardashīr 一世可能進攻貴霜的年代（公元 233—238 年）[27] 正落在曹魏明帝的治期（公元 227—239 年），而稍晚於波調朝魏的年代（229 年），則可知與 Ardashīr 一世發生關係的貴霜統治者有可能是波調。

2. 既然波調可以和 Vāsudeva 一世（已知其銘文最遲的年代是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98 年，亦即所謂超日紀元第 298 年或所謂 Eucratides 紀元第 398 年）勘同，如果其末年正是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98 年，按所謂超日紀元計算，已是公元 241 年，其時 Ardashīr 一世已經去位。因此，如果 Vāsudeva 一世去位是由於受到薩珊打擊，則必定在沙普爾一世治期。貝格拉姆 III 出土的 8 枚 Vāsudeva 的劣質銅幣或者與沙普爾一世的打擊有關。而如果按所謂 Eucratides 紀元計算，時值公元 229 年，則貝格拉姆 III 被毀於 Ardashīr 一世亦未可知。

3. Ardashīr 一世和沙普爾一世的進攻可能重創貴霜，使之臣服，卻未必結束貴霜的統治。

六、印度史料

塞種紀元第 72 年的 Junāgadh 銘文上表明西印度“大州長”（mahākṣatrapa）Rudradāman 在公元 150 年左右佔領了信德、

Sauvira 及 Mālava。而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11 年的 Sui Vihār 銘文表明這一帶當時在貴霜治下。迦膩色迦即位的年代因此被提前 [28]，或因此被推遲。[29]

今案：《後漢書 · 西域傳》稱閻膏珍征服印度後，“置將一人監領之”。“監領”應該是貴霜人統治中亞和印度廣大征服地區的主要手段。置“將”，可能是利用土著，亦即扶植傀儡。[30] 而所謂“大州長”，畢竟不是最高統治者的尊號，也許就是《後漢書 · 西域傳》所謂“將”。完全有理由認爲迦膩色迦採用其父閻膏珍一樣的統治方式。具體而言，作爲貴霜王朝的“大州長”，Rudradāman 承認貴霜的宗主權，但有較大的自治權，可以採用自己的紀元。換言之，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第 11 年（公元 154 年或 142 年）的 Sui Vihār 銘文和塞種紀元第 72 年（公元 150 年）的 Junāgadh 銘文並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七、羅馬方面的證據

錢幣學的研究表明，貴霜錢幣可能拷貝自羅馬錢幣：閻膏珍摹倣了 Trajan，迦膩色迦摹倣了 Hadrian（公元 117—138 年），Huviṣka 則摹倣了 Antonius Pius，諸如此類。[31]

今案：這種類型對比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32]，同一位錢幣學家，以相同的錢幣作依據，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33] 總之，很難將錢幣類型作爲迦膩色迦年代之絕對證據。可以指出的僅僅是，以上推定

的迦膩色迦即位年代，無妨其錢幣之原型取自 Hadrian。

以上考察表明，各種資料與推定迦膩色迦年代最基礎的銘文資料並無抵牾之處。但是，無論任何一種資料或其綜合，均無從據以確定迦膩色迦即位於哪一年。

最後，將貴霜王朝迦膩色迦以下諸王铭文之年代列表如下：

Kushan kings	the so-called Kaniska era	the so-called Vikrama era	the so-called Eucratides era	the Christian Era	
				in the so-called Vikrama era	in the so-called Eucratides era
Kaniṣka I	1—23	201—223	301—323	143—165	131—153
Huviṣka	28—62	228—262	328—362	170—204	158—192
Vāsudeva	64/67—98	264/267—298	364/367—398	206/209—240	194/197—228
Huviṣka II	104	304	404	246	234
Vasiṣka	120—128	320—328	420—428	262—270	250—258
Kaniṣka II	131—141	331—341	431—441	273—283	261—271

■ 注釋

[1] 本文所引貴霜銘文均依據 S. Shrava, *The Dated Kushāṇa Inscriptions*, Pranava Prakashan, New Delhi: 1993。該書對諸銘文的原始出處均有交代，茲不一一。

[2] * 表示銘文文字爲佉盧文，其餘則爲婆羅謎文。括號中數字諸銘文在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中的編號。此外，據 S. Shrava 書，尚有有王名無紀年數者 8 篇（No. 3, 4, 5, 7, 8, 9, 169*, 188*），無王名亦無紀年數者 1 篇（No. 6）。

[3] 參看余太山《新發現的臘跋闥柯銘文和〈後漢書・西域傳〉有關閻膏珍的記載》，

《新疆文物》2003 年第 3・4 輯，第 43-47 頁。

[4] 據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此外，尚有有王名無紀年數者 1 篇（No. 186*）。

[5]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 , p. 53。

[6] * 表示銘文文字爲佉盧文或巴克特里亞文，其餘則爲婆羅謎文。此外尚有有王名無紀年數者 3 篇（No. 66, 67, 195*），無王名亦無紀年數者 5 篇（No. 103, 104, 105, 106, 107）。

[7] 此外，據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尚有有王名無紀年數者 1 篇（No. 158）。

[8]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 , p. 126。

[9] 據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 pp. 148-151。

[10] 參看余太山《貴霜王朝的創始人——丘就卻》,《歐亞學刊》第 10 輯，中華書局 2012 年版，第 51-68 頁；余太山《關於"閻膏珍"》,《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III，商務印書館 2012 年版，第 3-31 頁。

[11] J. Harmatta,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the Kushan Empire."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UNESCO, 1994, pp. 417-440.

[12] J. E. Van Lohuizen-de Leeuw, *The "Scythian" Period*, Leiden: E. J. Brill: 1949, pp. 232-262. 另說 Vāsudeva 之後的貴霜王開創了另一個紀元，見 J. M. Rosenfield, "The Mathura School of Sculpture; Two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Kushan Chronology." In A. 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Leiden: 1968, pp. 259-277. 今案：後說並無確證。

[13] J. Harmatta,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the Kushan Empire."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UNESCO, 1994, pp. 417-440.

[14] 亦有人認爲在今巴基斯坦、和闐、喀什出土的若干 Kaniṣka 錢幣可歸屬 Kaniṣka 二世。見 S. Shrava, *The Kushāṇa Numismatics, Pranava Prakashan*, New Delhi: 1985, pp. 123, 224。

[15]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p. 126。

[16]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pp. 223-224。

[17]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pp. 225-229。

[18]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pp. 229-232。

[19] 注 1 所引 S. Shrava 書，p. 225。

[20] J. Allan, *Cambridge Shorter History of India*, Cambridge, 1934, p. 76.

[21] R. Ghirshman, *Bégram,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s Kouchans*. Le Caire, Imperimerie d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46, pp. 105-108.

[22] 說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 1993 年版，第 491-493 頁。A. K. Narain, "Indo-Europeans in Inner Asia." In D.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1990, pp. 151-176, esp. 164-165, 將兩者勘同，且據以推斷迦膩色迦年代，似未安。

[23] *Moses Khorenats'i 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n the Literary Sources by Robert W. Thom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1978, pp. 218-219.

[24] 注 21 所引 R. Ghirshman 書，p. 155.

[25] C. E. Bosworth, tr.,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Vol. 5: The Sasians, the Byzantines, the Lakhmids, and Yemen (Abu Ja'far Muhammad bin Jarir al Tabari), New York: 1999, pp. 14-16.

[26] R. N. Fry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München: 1984, pp. 371-373, esp. 371.

[27] J. Harmatt, "Minor Bactrian Inscriptio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3 (1965), pp. 149-205.

[28] F. Kielhorn, "Junagadh Rock-Inscription of Rudradaman." *Epigraphia India* 8

(1905-06), pp. 36-49.

[29] B. N. Puri, *India under the Kushāṇas*, Bombay, 1965, pp. 38-39.

[30] 貴霜採用這樣的統治方式可以說是必然的，遊牧部族佔領農耕區以後大抵採用這樣的方式，嚈噠統治中亞的情況可以參證。參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 1986 年版，第 129-142 頁。

[31] R. Göbl, "Roman Patterns for Kush ā na Coins."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22 (1960), 75-95; R. Göbl, "Numismatic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Date of Kaniṣka." In A. 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Leiden: 1968, pp. 103-113.

[32] D. W. MacDowall,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ska." In A. 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ska*. Leiden: 1968, pp. 134-149. D. W. MacDowall,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ṣka." *Afghanistan Quarterly* 24 (1971-72), No. 1, 133-149.

[33] R. Göbl 後來改持“公元 232 年”說，因爲他發現在木鹿鑄造的薩珊沙普爾二世的金幣與貴霜—薩珊系列之初鑄造的 Hormizd 一世貴霜—薩珊錢幣之間存在著聯繫，見 R. Göbl, *System and Chronology of the Coinage of the Kushan Empire, A English Language Companion to the Original German Work*, by Warren A. Schwartz, 1984, pp. 52, 82。

附：迦膩色迦紀元諸說評介

在探討迦膩色迦年代問題、閱讀有關論文的過程中，我寫了一些劄記。這些劄記或長或短，有的還加上了按語。這裏發表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之所以考慮發表這些劄記，是因爲迦膩色迦年代這個問題比較特殊。有關的討論早就越出了迦膩色迦年代本身，甚至越出了貴霜史的範疇，涉及了古代中亞史和印度史的許多方面。可以說，一個多世紀關於迦膩色迦年代的討論極大地推動了古代中亞史和印度史的研究。因此，今日我們探討這個問題，似乎不應將視野局限於迦膩色迦年代本身，而應該盡可能廣泛地關注討論迦膩色迦年代涉及的各種問題。有鑒於此，同時也是爲了使有關迦膩色迦年代討論的內容更加充實，有必要逐一評介重要的年代說。遺憾的是我所見有限，衹能就手頭已有的材料進行這項工作，希望來日有機會繼續。

傳世的貴霜銘文表明，迦膩色迦及其繼承人曾連續使用某一紀元至少 98 年。一些學者認爲這一紀元由迦膩色迦所建，堪稱迦膩色迦

迦紀元；該紀元之元年應即迦膩色迦即位之年。另一些學者則認爲，迦膩色迦及其繼承人採用了一個當時流行的紀元，也就是說該紀元的元年並不等於迦膩色迦即位之年。然而如果僅就迦膩色迦即位年代而言，諸說可大別爲公元前一世紀說、公元一世紀說，公元二世紀說和公元三世紀說四類。

屬於第一類的諸說中，以公元前 58 年說一度影響最大。屬於第二類的諸說中，以公元 78 年說擁有的支持者最多。屬於第三類的諸說中，值得推敲的主要是公元 103 年、110—115 年、128 年、135 年、144 年說，以及最新出現的公元 127 年說等。屬於第四類的則有 248 年說和 278 年說等。

在茲擬簡要評介諸說，諸說所引原始史料和各種論著的出處均見原文，不復加注。

一、公元前諸說

（一）公元前諸說

關於迦膩色迦紀元的絕對年代諸說中，公元前諸說是最早提出來的，可以說形形色色、林林總總。試舉幾種如下：

1. 公元前 312 年或公元前 248 年說

E. Thomas 提出迦膩色迦紀元可能是始於公元前 312 年的塞琉古紀元（Seleucidian era），也可能是始於公元前 248 年的帕提亞紀元（Parthian era）說，衹是有關銘文的紀年分別省去了百位數 3 或

2，實際上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應爲公元前 9 年或公元前 45 年。[1]

2. 公元前 57 年說

A. Cunningham 主張迦膩色迦紀元爲始於公元前 57 年的超日紀元（Vikrama era）。[2] 說者後來又改變看法，指爲塞琉古紀元。不過，有關銘文的紀年數省去了百位數 4，故迦膩色迦即位之年已在公元一世紀。[3]

3. 公元前 50 年說

S. Lévi 認爲迦膩色迦紀元應始於公元前 50 年。[4]

4. 公元前 322 年說

R. D. Banerji 等人主張迦膩色迦紀元應爲始於公元前 322 年的孔雀紀元（Maurya era），當然也省去了紀年的百位數。[5]

5. 公元前 137—前 112 年說

G. Bühler 主公元前 137—前 112 年之間說。[6]

6. 其他諸說

此外，尚有種種關於迦膩色迦紀元來歷的推測，如：J. Marshall 以爲迦膩色迦紀元可能是由 Taxila 銅盤所見 Moga 創建的始於公元前 95 年的紀元。[7] R. D. Banerji 以爲迦膩色迦紀元是 Vonones 創建的始於公元前 100 年的紀元。[8] K. P. Jayaswai 以爲迦膩色迦紀元是一個大約始於公元前 120 年的紀元。[9] E. J. Rapson

以爲迦膩色迦紀元是一個始於公元前 150 年的紀元。[10] W. W. Tarn 以爲迦膩色迦紀元是一個大約始於公元前 155 年的紀元。[11] 等等。

（二）對公元前 58 ／ 57 年說的批評

在公元前諸說中，最有影響的是公元前 58/57 年說。自 A. Cunningham 提出迦膩色迦紀元爲始於公元前 57 年的超日紀元說以後，曾得到 J. F. Fleet [12]、O. Franke [13]、H. Lüders [14]、J. Kennedy [15]、Barnett [16] 等學者的支持。而隨着研究的進展，包括公元前 58/57 年說在內的公元前諸說業已無人信從，有關批評不少，兹介紹三種，以見一斑。

1. H. C. Raychaudhuri 對公元前 58 年說的批評 [17]

自 J. Marshall 在 Taxila 發掘以來，此說不復有人信從。銘文、錢幣以及玄奘的記載（《大唐西域記》卷一）都清楚地表明迦膩色迦的領土包括了乾陀羅，但按之《漢書・西域傳》，公元前一世紀後半葉佔領罽賓（Kāpiśa-Gandhāra）的是陰末赴而不是貴霜。

迦膩色迦的金幣和羅馬的 solidus 的關係表明這位貴霜君主的治期不可能在 Titus（公元 79—81 年在位）和 Trajan（公元 98—117 年在位）之前。

2. D. C. Sircar 對公元前 58 年說的批評 [18]

（1）主公元前 58 年說者或置迦膩色迦組貴霜統治者於丘就卻、閻膏珍之前，這和中國史籍的記載是矛盾的。《後漢書・西域傳》明載，丘就卻是貴霜王朝的創始人，而閻膏珍則是第一個將其領土擴

張到印度內地的貴霜統治者。

（2）幾乎沒有發現丘就卻的金幣，但閻膏珍和迦膩色迦發行了大量金幣。因此，如果置丘就卻於迦膩色迦和閻膏珍之間於理不合。

（3）早期印度的外族統治者，包括丘就卻和閻膏珍，頒行的錢幣是雙語銘文，正面用希臘文，反面用佉盧文。是迦膩色迦進行了貨幣改革——兩面都用希臘文，取代了較早的雙體錢。如果迦膩色迦在丘就卻和閻膏珍之前，則不符合貨幣發展的趨勢。

（4）迦膩色迦錢幣反面出現的神祇形形色色，而丘就卻、閻膏珍錢幣反面出現的神祇並無多樣性。這也表明丘就卻、閻膏珍在位時間早於迦膩色迦。Vasudeva 與後者卻是一脈相承。

（5）Taxila 的發掘也表明迦膩色迦組的貴霜統治者在位年代遲於丘就卻、閻膏珍，蓋前者的錢幣出土的地層較後者爲高。

（6）迦膩色迦金幣的式樣受到羅馬 solidus 的影響，可見他的年代不應早於 Titus（公元 79—81 年在位）。

（7）年代爲 41 年的 Ārā 銘文所見迦膩色迦使用的稱號 Kaïsara（Caesar）也表明迦膩色迦的年代大大遲於 Augustus（死於公元 14 年）。

（8）晚期貴霜錢幣上所見得自薩珊的影響也表明迦膩色迦的即位不可能早到公元前 58 年。

3. B. Kumar 對公元前 58 年說的批評 [19]

Fleet 公元前 58 年說的基本論據之一是玄奘關於迦膩色迦即位於佛涅盤後 400 年的記載。說者認爲佛滅於公元前 483 年，玄奘所謂 400 年不過約數，迦膩色迦其實即位於佛滅後 425 年即公元前 58

年。也就是說，迦膩色迦、Huviṣka 和 Vāsudeva 的治期在丘就卻和閻膏珍之前。

Kennedy 則根據他對古希臘文化的研究定迦膩色迦紀元在公元前一世紀。他也引用了若干中國記載支持其說。

（1）迦膩色迦的錢幣有希臘銘文，因此使用者一定懂希臘語。希臘語作爲一種日常生活用語在公元一世紀末以後不久在 Euphrates 以東（北美索不達米亞除外）地區部分消失，此後不可能單獨存在於旁遮普。因此，迦膩色迦的治期不可能在公元 100 年之後。

（2）迦膩色迦自波斯灣的商人處藉得希臘字母，他草書的商業手稿來源也相同。直到迦膩色迦的時代，安色爾（uncial）字體僅被用於希臘錢銘。迦膩色迦開始亦用安色爾字體，不久就變爲美麗的草體，而他的繼承者僅僅使用這一字體，則是由商業需要決定的。而公元一世紀的兩位 Elam 王恰好也做了迦膩色迦所做的事。因此，他的錢幣必定打鑄於公元前 60 年和公元 40 年之間。

（3）Saṁyuktagāma 載公元五至六世紀時有四國同時統治：北方爲 Yavanas（即喀布爾），南面爲 Śaka（即印度－斯基泰），西面爲 Pahlava（即 Asia 和阿拉科西亞），東面是 Tusharas。因此，當公元前一世紀希臘人統治喀布爾時，在旁遮普和馬土臘必定有一個 Tushara 即貴霜王國。

（4）《後漢書》未提及迦膩色迦，說明其事蹟在公元 25 年和公元前 100 或前 90 年之間。而稱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意指貴霜第二次滅天竺（奪取旁遮普）。

然而，上說皆不可從。

一則，有關迦膩色迦治期去佛滅之年諸書所傳不同，不能以爲

證據。例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和藏文《世親傳》（Vinaya）均作“涅槃後四百年”。漢文《婆藪槃豆法師傳》則作“五百年”。《大唐西域記》（卷二）亦作“五百年”。《洛陽伽藍記》（卷五）作“二百年”，一本作“三百年”。和闐文書作“一百年”。《雜寶藏經》卷七作“七百年”。

二則，貴霜錢銘用希臘文僅能表明貴霜諸王的愛好，不能說明什麼問題。Surkh Kotal 銘文的發現表明，在阿富汗和貴霜帝國西北部確曾流行希臘文。由於該地區希臘人的存在，它必定在公元 100 年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流行。

三則，迦膩色迦使用的希臘文草體範圍太廣，不足以成爲判斷精確年代的依據。

四則，Saṁyuktagāma 的作者並沒有對四個地區作出具體說明，也沒有提到這種形勢存在的時期，因而不足爲憑。

五則，閻膏珍是在天竺被外族如塞種之類征服之後再一次征服印度的，這是“復滅天竺”的真正意義。[20]

六則，Fleet、Franke 輩置迦膩色迦組於 Kadphises 組之前的觀點業已爲考古發掘和錢幣的證據否定。Kadphises II 和迦膩色迦的錢幣在許多處一起出土。兩者的錢幣上有相同的四叉花押，這種花押卻不見於丘就卻的錢幣；閻膏珍和迦膩色迦的錢幣重量一致，正面設計也顯示出有密切的關係。閻膏珍和迦膩色迦的聯繫尤其可以從 Taxila 的發掘看出。

J. Marshall 在 Taxila 地區 Chir 萃堵波建築物中發現的錢幣有 4 個地層：最上層是 Vāsudeva 和後貴霜的錢幣，第二層是 Kaniṣka、

Huviṣka 和 Vāsudeva 的錢幣，第三層是丘就卻和閻膏珍的錢幣，第四層是 Śakas 和 Pahlavas 的錢幣。

在 Sirkap 城發現了同樣的分層現象，這主要就第三、四和最早的一層而言。不過，由於該城在第一和第二階段的建築物建立起來以前被廢棄，一層沒有迦膩色迦、Huviṣka、Vāsudeva 的錢幣，衹有數千枚丘就卻、閻膏珍、塞種、Pahlava 和希臘諸王的錢幣。

以上證據表明閻膏珍和迦膩色迦在時間上是非常接近的，後者直接繼承前者。既然《後漢書・西域傳》稱閻膏珍是丘就卻之子，如果迦膩色迦組在時間上早於丘就卻，則他們的錢幣應與丘就卻在一起發現，而閻膏珍的錢幣不應和迦膩色迦的一起發現，但事實正好相反。

七則，丘就卻幾乎沒有打鑄金幣，但閻膏珍和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有大量的金幣。這也說明丘就卻的治期早於閻膏珍和迦膩色迦。

八則，丘就卻是第一個貴霜王，而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屬於同一王朝，因爲他們在自己的錢幣上都稱“Koshano”。因此，後者必定在丘就卻、閻膏珍之後。

九則，印度早期外族統治者的錢銘使用兩種文字，正面希臘文，反面佉盧文，丘就卻、閻膏珍的錢銘便是如此，而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僅用希臘文。

二、公元一世紀諸說

公元一世紀諸說中最有影響的是公元 78 年說。此外，還有 43 年說 [21]、80 年說 [22]、90 年說 [23] 等等。[24] 本文僅介紹公元 78 年說。

（一）公元 78 年說

最先提出 78 年說的是 J. Fergusson [25]。較早的支持者有 H. Oldenberg [26] 等。當時佔有的資料有限，研究還停留在起步階段。H. Oldenberg 後來改而支援 A. M. Boyer 說。[27] 說者並沒有舉出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78 年的絕對證據，無非是試圖說明公元 78 年說較公元前 58 年說合理而已。但此後，嚮應者日衆，特別是印度學者。[28] 直至 1960 年倫敦召開的迦膩色迦年代專題討論會上，此說仍佔有很大優勢。[29] 以下選擇若干 78 年說評介之。

1. H. C. Raychaudhuri 的公元 78 年說 [30]

說者扼要批判了公元前 58 年說，公元二世紀諸說（125 年說和 144 年說）以及公元 248 年說等，以支持 78 年說。對於公元 78 年說，說者似未作正面論證，祇是反駁了 Jouveau-Dubreuil 對此說提出的若干責難。

（1）如果承認丘就卻公元 50 年在位，又承認迦膩色迦在公元 78 年即位建元，則丘就卻餘下的治期加上閻膏珍的全部治期總共不過 28 年，未免太短。

駁議：丘就卻去位時已八十餘歲，故閻膏珍即位時年紀必定不輕。即使公元 50 年丘就卻在位，由於閻膏珍在位時間不會太長，不能認爲 28 年的時間太短。

今案：駁議未安。丘就卻晚年得子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閻膏珍即位時年紀不輕未必在位時間便短。何況，事實上丘就卻之後，還有兩位貴霜君主。[31]

（2）年代 136 年的 Taxila 銀冊銘文，按所謂 Vikrama 紀元計算，實際年代爲公元 78/79 年。該銘文提到的貴霜君主可能便是丘就卻，卻絕無可能是迦膩色迦。

駁議：年代爲 136 年的 Taxila 銀冊銘文提到的貴霜君主採用稱號之一爲 devaputra。這不是 Kadphises 組貴霜君主，而是迦膩色迦組貴霜君主的特徵。因而這一銘文的發現未必能動搖 78 年說。

今案：此說未安。一則，年代爲 136 年的 Taxila 銀冊銘文上提到的貴霜君主，由於姓名被省略，祇可能是丘就卻。丘就卻是貴霜王朝的創始人，他在位時是獨一無二的貴霜君主，省略姓名不致引起誤解。二則，devaputra 一號即使不見於丘就卻和閻膏珍的其他銘文和錢幣，也不能因此斷定這一稱號與所謂“Kadphises 組”貴霜君主無關。因爲丘就卻完全可能是在佔領 Taxila 以後纔自稱 davaputra（這一稱號後來被迦膩色迦組的貴霜統治所者承襲）。至於閻膏珍不用這一稱號，則完全可以認爲是有關銘文或錢幣迄今尚未發現。何況在迦膩色迦以前，devaputra 一號已見諸 Kuyula Kara Kaphsa 之錢幣。Kuyula Kara Kaphsa 應即丘就卻。即使兩者並非一人，也不能否定前者屬於所謂“Kadphises 組”，也就是說不能否定年代爲 136 年的 Taxila 銀冊銘文提到的貴霜君主屬於所謂“Kadphises 組”。

既然公元78/79年在位的貴霜君主屬於所謂“Kadphises組”，即使不提年代爲184（或187）年的Khalatse銘文，也不能認爲迦膩色迦即位建元於公元78年。更何況，事實上所謂“Kadphises組”和“迦膩色迦組”一脈相承，其稱號之間存在繼承關係不足爲奇。

（3）漢、藏有關文獻資料的研究表明，迦膩色迦於公元二世紀在位。

駁議：公元二世紀在位的迦膩色迦可以認爲是見諸年代爲41年的Ārā銘文的迦膩色迦。按照塞種紀元，他於公元119年在位。《三國志》所載公元230年朝魏的貴霜王波調則可以認爲是Vāsudeva二世。

今案：藏文《于闐國授記》（Li yul luṅ-bstan-pa）[32]以及漢譯佛經有關記載均未涉及迦膩色迦的年代，很難據以作出推斷。但有一點似可肯定，這些資料提到的迦膩色迦是一世的可能性遠遠大於僅留下一篇Ārā銘文的二世，雖然後一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至於《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所見大月氏即貴霜王波調究竟是Vāsudeva一世還是二世亦無直接證據。事蹟大致截止明帝（公元227—239年）的《魏略・西戎傳》稱：“罽賓國（Gandhāra和Taxila）、大夏國（Tukharestan）、高附國（Paropamisadae）、天竺國（印度河流域）皆並屬大月氏。”這似乎表明當時貴霜國力尚屬強盛，因而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朝魏的波調是Vāsudeva二世的可能性不大。說者卻以爲“皆並屬大月氏”一句僅僅表示罽賓等地在名義上承認Vāsudeva二世的宗主權。質言之，《魏略・西戎傳》的這則記載未必表明明帝時貴霜尚能控制上述各地。然而，這種解釋顯然是頗爲勉強的。蓋《魏略・西戎傳》又稱，車離國“在天竺東

南三千餘里……今月氏役稅之”。“車離”應即《後漢書・西域傳》所見“東離”。該國臣服貴霜事既見諸《後漢書・西域傳》，可見其事最早可能發生在閻膏珍時期。《魏略》所謂“今月氏役稅之”應指明帝時的情況。貴霜既然能役稅其東南三千餘里的車離國，對罽賓、大夏等地的統治可見並不是名義上的。質言之，遣使曹魏明帝的貴霜王波調更可能是 Vāsudeva 一世而非二世。

（4）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的銘文和西印度州長用塞種紀元紀年的銘文表示日期的方式不同。

駁議：並非所有用迦膩色迦紀元紀年的銘文表示日期的方式都相同。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的佉盧銘文，表示日期的方式和安息－塞種人的銘文相同；但在他們的婆羅謎銘文中，常常採用古印度的方式。既然不能因此認爲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在他們的佉盧銘文和婆羅謎銘文中使用的不是同一个紀元，也就沒有理由否定他們在西印度的州長們因地制宜地採用第三種方式。

今案：雖然使用同一紀元時可能因各地習俗不同而採用不同的表示日期的方式，但這並不排斥表示日期的方式因所用紀元不同而不同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表示日期的方式未必和採用的紀元完全無關。雖然不能僅僅因爲銘文表示日期的方式不同，斷定西印度塞種州長和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所用紀元不同，但在其他更積極的證據存在的前提下，表示日期方式的不同仍不失爲所用紀元不同的證據。

（5）如果迦膩色迦即位建元於公元 78 年，他應該就是和帝永元二年（公元 90 年）遣副王謝率軍七萬東逾葱嶺進攻班超的月氏王，也就是說他和班超是同時代人。果然如此，則中國史家不應該不提

到他的名字。

駁議：如果與班超同時代的貴霜王是閻膏珍，《後漢書・班超傳》沒有提到他的名字纔真正不可思議，因爲從《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可以得知，當時中國人是知道閻膏珍的。又，據《付法藏因緣經》（卷五），迦膩色迦晚年曾自稱："我征三海，悉已歸化，唯有北海，未來降服。"類似記載亦見諸《雜寶藏經》（卷六）。迦膩色迦未能降服的地區顯然是指葱嶺以東的塔里木盆地。迦膩色迦因未能征服塔里木盆地而遺憾，說明《後漢書・班超傳》所載，和帝永元二年（90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逾葱嶺東進、旋被班超擊退一事發生在迦膩色迦在位時期，派遣副王謝的月氏即貴霜王正是迦膩色迦。由此可見迦膩色迦是班超的同時代人。另一方面，《後漢書・西域傳》記載閻膏珍事蹟時未及遣副王謝一事，亦見公元90年在位者並非閻膏珍。

今案：其說非是。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後漢書》完全沒有提到迦膩色迦。不僅《班超傳》沒有提到，《西域傳》也沒有提到。而如所周知，《後漢書・西域傳》設有貴霜專條，敍述了丘就卻和閻膏珍的主要經歷，而該傳主要依據安帝末（公元125年）班勇所記。果然迦膩色迦即位建元於公元78年，其事蹟不應不見載於該傳。《後漢書・班超傳》沒有提到閻膏珍，是因爲該傳記述之重點是班超與貴霜副王謝之間的戰爭，未必意味着班超不知當時在位的貴霜王名。正因爲派遣副王謝的貴霜王名及其主要事迹已見載於《後漢書・西域傳》，《後漢書・班超傳》纔可以略而不提。同理，閻膏珍指遣其副王謝東犯一事既已詳述於《後漢書・班超傳》，《後漢書・西域傳》自無重復之必要。反之，如果公元90年在位的貴霜君主是迦膩色迦，

其事迹既不見載於《後漢書・西域傳》，在《後漢書・班超傳》中敍述他求婚以及指遣其副王東犯諸事時不提他的名字纔是不可理解的。

2. S. Chattopadhyaya 的公元 78 年説 [33]

年代爲 134 年的 Kalawan 銘文表明公元 76 年時 Taxila 不在貴霜治下，而年代爲 136 年的 Taxila 銀冊銘文表明公元 78/79 年時貴霜已經統治該地。後一篇銘文對貴霜統治者的稱呼爲 maharajasa rajatirajasa devaputrasa Khusanasa。稱號 devaputra 是 Kaniṣka 組貴霜統治者特有的，而不見用於 Kadphise 組。既然 Wima 的統治結束於公元 78 年以前，而 Kaniṣka 在這一年即位建元，這一篇使用 Vikrama 紀元的銘文就不能歸屬於 Kaniṣka。既然使用 Vikrama 紀元表示 Taxila 銀冊銘文不屬於 Kaniṣka 組統治者，而 Devaputra 的使用又表明這篇銘文不屬於 Kadphises 組，就祇能假定這篇銘文是屬於一位既不屬於 Kaniṣka 組，又不屬於 Kadphises 組的貴霜王的。由此可見：

（1）正如 Panjtar 銘文所表明，公元 64 年前貴霜人征服了印度河以西地區。

（2）閻膏珍作爲儲君時可能已征服了 Taxila，他繼承王位後又征服了印度內地，並任命副王統治各地。其治期結束於公元 78 年以前。由於丘就卻死時已八十餘歲，閻膏珍的治期必定很短。

（3）約公元 76 年，貴霜帝國發生了某種麻煩：Taxila 獨立，其地不是在當地土著統治者治下，就是在閻膏珍的一位副王的治下。

（4）公元 78/79 年 Taxila 在一位既不屬於 Kadphises 組，又不屬於 Kaniṣka 組的貴霜統治者治下。這位統治者顯然是閻膏珍

的副王之一，他宣告獨立，但又不敢在記錄上提到自己的名字，也許就是頒發 Soter Megas 錢幣的無名王。在一枚金幣上，錢銘之爲 Basileus Basilion Stoer Megas。據 Taxila 銀冊銘文類推，這位副王在獨立後同樣使用 Soter Megas 這一稱號而不著其名，這表明在公元 79 年閻膏珍可能還活着。否則這位副王可以在記錄上提到自己的名字。

今案：此說未安。即使 Panjtar 銘文 [34] 表明貴霜在公元 64 年征服了印度河以西地區，也不能推論公元 64 年以前貴霜已經統治了 Taxila。所謂閻膏珍爲儲君時已征服 Taxila 云云純屬臆測。正因爲如此，Kalawan 銘文 [35] 沒有提到貴霜也不表明這一年貴霜出現內亂、Taxila 地區得而復失，而至多說明截止公元 64 年貴霜尚未征服 Taxila。年代爲 136 年的 Taxila 銀冊銘文 [36] 則表明貴霜對 Taxila 的征服發生在公元 64 至公元 76 年之間。

年代爲 136 年的 Taxila 銘文不提統治者之名表明當時在位的統治者是丘就卻，因爲他是獨一無二的貴霜君主，不著姓名不至誤解。果如說者所言，該銘文提到的貴霜統治者是一位鬧獨立的副王，就很難解釋這位敢於使用最高級的稱號的前副王，何以不敢印上自己的名字。至於 devaputra 一號，顯然是丘就卻在晚年使用的，不見於以前的貴霜銘文未必表明使用這一稱號的貴霜統治者不屬所謂 Kadphises 組。銘文使用 Vikrama 紀元不僅表示該銘文提及的貴霜統治者不屬所謂 Kaniṣka 組，而且表明 Kaniṣka 不可能即位建元於公元 78 年。既然 Taxila 銀冊銘文表明丘就卻依舊在位，則公元 78 年應爲丘就卻去位年代的上限，這一年也是其子繼位年代的上限。僅僅根據銘文不著王名這一點就斷定該銘文所提到的貴霜統治者就

是錢幣所見 Soter Megas 顯然未安。

閻膏珍的Kalatse銘文表明他去位年代的上限是公元129年。《後漢書・西域傳》沒有提到閻膏珍之死，也暗示公元125年他依舊在位。以往研究者懷疑他如此長的在位時期不無道理，但現在知道閻膏珍之前另有一位貴霜王，這個疑問就不存在了。

3. J. E. Van Lohuizen–de Leeuw 的公元 78 年說 [37]

（1）中國證據

a．據中國正史，丘就卻和閻膏珍的治期不可能超過100年，既然丘就卻即位於公元前一世紀的最後25年之內，迦膩色迦繼閻膏珍即位必定在公元一世紀最後25年之內。

b．明帝遣使印度求法到使臣歸國應在公元61—75年間。時印度無疑在月氏治下，在位者不是迦膩色迦而是閻膏珍，否則佛教徒的文獻不會不提及這位護法之王。

c．《後漢書》所載公元90年班超擊退的月氏副王謝當係迦膩色迦所遣，蓋班超熟知丘就卻和閻膏珍，理應提及貴霜王名。另外，自玄奘《大唐西域記》等記載，可知迦膩色迦有東逾葱嶺未達目的之憾。

（2）銘文的證據：

在老紀元200年（Dewai 銘文）和318年（Loriyan Tangai）之間，沒有發現用這一紀元紀年的銘文，而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的銘文所包涵的時期恰好填補了這一間隙。

（3）錢幣的證據

閻膏珍及其以後的貴霜諸王均打鑄了大量金幣。其重量標準與

羅馬的 aureus（124g）接近。後者是在奧古斯特（Augustus，公元前 27—公元 14 年在位）制定的。閻膏珍及其以後的貴霜諸王採取這一標準打鑄金幣，說明在此期間有羅馬的錢幣湧入。

（4）考古學證據

Marshall 調查的 Taxila 萃堵波和 Sirkap 遺址的層次提供了充分的證據。Marshall 根據風格和材料等判斷建築物的年代，不能沒有疑問。但他把迦膩色迦、Huviṣka 和 Vāsudeva 看作丘就卻和閻膏珍的後裔是可以接受的，因爲還有其他事實支持。

（5）天文學的證據

迦膩色迦紀元第 11 年的 Zeda 銘文建立於 Āṣāḍha 月（頞沙荼 = 夏月）20 日，而 61 年的 Uṇḍ 銘文建立於 Caitra 月（制呾邏 = 春月）8 日。這兩篇銘文還提到建立日期的星宿（nakṣatras），前者是 Uttaraphālgunī（郁多羅頗勒窶拏），後者是 Pūrvāṣādha。若按照 Sūryasiddhānta（日曜悉彈多）計算，將這些日期的起點看作公元 79 年，上述天文學條件就能得到滿足。[38] Uttaraphālgunī 出現在 Āshāṣha 月 20 日，這意味着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79 年。這與迦膩色迦紀元和塞種紀元的第一年相符。

（6）古文書學的證據

佉盧文字體可分爲四個時期：a. 公元前四至前三世紀孔雀王朝時期；b. 公元前二至前一世紀的變體，見於印度希臘諸王的錢幣；c. 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一世紀，塞種時期的變體，見諸 Patika 的 Taxila 銅板和馬土臘州長 Śḍāsa 的獅柱，以及塞種和貴霜諸王的錢幣；d. 公元一至二世紀的草體，以 Gondopharnes 的 Takht-i-Bahi 銘文開始，而在 Vāsiṣka 和 Huviṣka 的銘文上得到充分發展。因此，

迦膩色迦應被置於公元一世紀。而馬土臘州長銘文的字體和迦膩色迦早年銘文的字體驚人的相似表明兩者幾乎不可能相隔一個世紀以上。如果前者被置於公元前一世紀，迦膩色迦即位之年則在公元一世紀。

今案：說者對中國史料的理解是難以接受的。考古發現顯然無助於推斷精確的年代，錢幣和古文書學的證據均無絕對價值。至於所謂天文學證據，Wijk 按照 Siddhāntas 計算，能夠滿足有關條件者不僅有公元 79 年，公元 117 年、公元 128—129 年或公元 134 年也一樣能夠滿足。[39]

此外，說者還提出新的證據[40]：

約公元 180—200 年，Āndhra 派雕塑中突然出現佛像。既然 Amarāvatī 並不存在像馬土臘那樣就佛陀雕塑進行各種嘗試的階段，可見 Āndhra 派佛陀雕像係他處傳入。鑒於馬土臘作爲藝術中心產生的巨大影響，Āndhra 派佛陀雕塑最可能是摹自馬土臘。

有趣的是，即使公元二世紀末最早的 Āndhradeśa 的佛雕，也已具有迦膩色迦紀元第 110 年以降馬土臘佛雕的風格特徵。因此，似難認爲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會落在公元二世紀某時或更遲。這就是說，衹有肯定迦膩色迦紀元之元年在公元一世紀後半葉，確切地說在公元 80 年左右，纔能與藝術史的事實相符。

今案：此說亦有未安。

一則，風格的影響是雙向的，未必馬土臘影響 Amarāvatī。後者亦可能影響前者。因此，公元二世紀末 Āndhradeśa 佛雕具有與迦膩色迦紀元 110 年以降馬土臘佛雕相同之特徵，未必迦膩色迦紀元的 110 年早於公元二世紀末。

二則，Amarāvatī 的佛雕與馬土臘的雕像的風格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其實很難說誰影響誰。Amarāvatī 突然出現佛雕並不能說明它的佛雕一定來自別處，特別是來自馬土臘。另外，Amarāvatī 並沒有一個像馬土臘那樣嘗試各種方式佛雕的階段，也不表明其佛雕一定摹自馬土臘，蓋其他題材的雕塑的成熟自可省去佛雕的嘗試階段。

三則，說者關於某些佛雕銘文的紀年數乃省去了百位數的假定尚未得到最後證實。

4. A. L. Basham 的公元 78 年說 [41]

（1）年代爲公元 41 年的 Ārā 銘文所見迦膩色迦的稱號 Kaisar（Caesar），表明當時羅馬皇帝的聲譽在貴霜朝廷中非常強烈，這一稱號此後再未被貴霜王使用過。因此，不妨推斷，這一稱號被貴霜人採用之時，正值羅馬人對帕提亞作戰取得某次重大勝利。而且在這之後不久，羅馬在東方的勢力日益衰落，在貴霜朝廷的影響減弱。如果定迦膩色迦即位之年爲公元 144 年，則 Kaisar 這一稱號將會在 Commodus 治期被採用，Commodus 是 Marcus Aurelius 的繼承人，他並無特別的治蹟可言。

若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78 年、128 年或 144 年，則 Ārā 銘文的年代爲 119 年、169 年或 185 年。而在公元二世紀，羅馬與帕提亞的大戰有三次。第一次是在 Trajan 治期（公元 113—117 年），第二次是在 Marcus Aurelius 治期（公元 162—165 年），第三次是在 Septimius Severus 治期（公元 195—202 年）。第三次年代太遲，可置勿論。第一次的戰果是非常輝煌的，結果是羅馬征服了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巴比倫。但是，這些地區很快就在 Trajan 的繼位

者 Hadrian 手中丟失。第二次雖然略爲遜色，但其結果是吞併了西北美索不達米亞。因此，採用這一稱號最可能的年代是公元 119 年，亦即 Trajan 時代，而在 Hadrian 時代又放棄。公元 128 年之所以可能性較小，是因爲第二次的戰果既不如第一次輝煌又不如第一次短暫。質言之，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78 年。

今案：此說未安。羅馬對印度的影響並非一事一時。貴霜君主採用 Kaisar 一號，和羅馬與帕提亞關係之變遷並無必然聯繫。

（2）元年爲公元 78 年的紀元曾在公元 130 年以降爲古吉拉特和馬爾瓦的“西部州長們”所採用。同一紀元亦曾被憍賞彌 Kauśāmbī，或 Kosaṃbiya 的 Magha 諸王所採用。而在尼泊爾使用的所謂 Licchavi 紀元其實也是這個元年爲 78 年的紀元。蘇聯考古學家在中亞發現的公元三世紀的文書，似乎也是按照這同一個紀元紀年的。因而，公元 78 年爲元年的這個紀元（後來被稱爲塞種紀元）早期的使用範圍十分巨大。這個範圍的中心在旁遮普的某處或當時稱爲乾陀羅的地區。但按照那些認爲迦膩色迦紀元並不是塞種紀元的學者的看法，並沒有證據表明古代旁遮普和乾陀羅使用過塞種紀元。該紀元的使用範圍自烏賈因經恒河流域、尼泊爾伸展至中亞，而在旁遮普完全不受影響似乎是極不可能的。明顯的結論應該是這個紀元是由一個強大的政權推廣的，這一政權於政治、文化兩方面發揮影響於上述較早使用這個紀元的地區。唯一能做到這一點的是貴霜政權。

今案：說者的意見不無合理性，衹是過於絕對。塞種紀元使用範圍廣大固然有可能是一個強權（譬如貴霜）推廣的結果，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質言之，塞種紀元使用範圍廣大也可能與塞種

人的活動範圍廣大有關。在說者所描述的地域範圍內，無疑遍佈塞種的部落，而由於文化淵源的相同或接近，促使各地的塞人採用了同一個紀元。雖然貴霜人也與塞種有着難分難解的淵源，但貴霜一開始並未採用一個與塞種有關的紀元，因而即使迦膩色迦在公元 78 年即位，也未必創建一個與塞種有關的紀元。而已經站穩腳跟的迦膩色迦政權，不採用業已流行的塞種紀元，另創一個紀元或採用其他紀元的可能性同樣是存在的。

5. P. H. L. Eggermont 的公元 78 年說之一 [42]

說者根據印度宗教文獻，特別是中古耆那教歷史、往世書以及佛教傳說的片斷，得出結論：公元 15 年是塞種入侵印度之年。

既然 Nahapāna 在他的銘文上不採用塞種紀元，便應使用這一元年爲公元 15 年的紀元。在 Kṣaharāta 滅亡之後控制 Mālwā、古吉拉特的 Rudradāman 和 Kārdamaka 家族的州長們纔使用元年爲 78 年的塞種紀元。

Nahapāna 的兩篇年代分別爲 41 和 46 的銘文實際年代應爲公元 56 和公元 61 年。蓋 Nahapāna 和 Andhra 統治者 Gautamīputra Śrī Sātakarṇi 是同時代人，則不妨認爲公元 61 年是 Gautamīputra 第一年。提到 Caṣṭana 和 Rudradāman 的銘文年代爲塞種紀元第 52 年（公元 130 年）。

大州長 Śoḍāsa 的年代爲 72 年的 Āmohinī Tablet 中也許採用了另一個紀元。從馬土臘獅柱銘文可知 Śoḍāsa 無疑就是大州長 Patika 同時代人。雖然馬土臘獅柱銘文沒有年代，但是在年代爲 78 年的 Taxila 銅板銘文中，這同一個 Patika 被稱爲州長 Liaka Kusulaka 之

子，他們都屬於 Kṣaharāta 家族。如果年代爲 78 年的 Taxila 銅板和年代爲 72 年的 Āmohinī Tablet 採用的紀元都是上述以公元 15 年爲元年紀元，則其年代分別爲公元 93 和公元 87 年。

值得注意的是 Taxila 銅板銘文提到的 Liaka Kusulaka 可與見諸迦膩色迦紀元第 11 年 Zeda 銘文的州長 Liaka 勘同。這說明 Zeda 銘文所用迦膩色迦紀元應即塞種紀元。因爲祇有迦膩色迦元年爲公元 78 年，因而銘文年代爲公元 89 年，纔與 Taxila 銘文的年代（公元 93 年）相符合。

另一種可能性是 Āmohinī Tablet 和 Taxila 銅板所採用的紀元都是 Vikrama 紀元（公元前 58 年）。這兩者的年代分別是公元 15 和公元 21 年。既然公元 15 年是塞種入侵印度之年，則 Maga 應是入侵者的領袖，而 Kṣaharāta 家族在印度佔優勢始於這次入侵。

今案：其說未安。且不說說者所依據的僅僅是宗教傳說，據以得出的結論可靠性不高，即使我們相信公元 15 年是塞種入侵印度之年，仍不可能據以證明迦膩色迦紀元便是 78 年的塞種紀元，蓋與其他已知事實相牴牾。

事實上，年代爲 78 年的 Taxila 銅板銘文早於馬土臘獅柱銘文，後者又早於年代爲 72 年的 Āmohinī Tablet。[43] 因此，Taxila 銅板和 Āmohinī Tablet 採用的紀元絕不是同一個。迦膩色迦不可能是塞種紀元的創始人。

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必定比公元 78 年晚得多，甚至晚於年代爲 199 年的馬土臘銘文。塞钟在馬土臘至少存在至公元 15 年。最早提到 Maharayasa Guṣaṇasa 的是年代爲 122 年（即公元 65 年）的 Panjtar 銘文，這表明塞種在馬土臘的統治結束於此後不久。幸存的

塞種最可能逃往古吉拉特，奠定了西部州長政權的基礎，於是開始了公元 78 年的塞種紀元。[44]

因此，可以認爲 Āmohinī Tablet 的紀元是公元前 58 年的超日紀元，其實際年份爲公元 14/15 年，而 Taxila 銅板銘文所見 Liaka 與 Zeda 銘文所見 Liaka 並不是同一個人。質言之，無從證明迦膩色迦紀元是塞種紀元。

6. P. H. L. Eggermont 的公元 78 年說之二 [45]

佛涅槃前 40 年預言佛法會持續 500 年，這意味着佛法結束於 460 p. B. m.（post Buddham mortuum）。錫蘭的上座部（Theravādins）在他們的年代記 Dīpavaṃsa 和 Mahāvaṃsa 中說，在 460 p. B. m.，僧伽（Saṃgha）中發生了糾紛，爲防止其教衰落，Theras 將佛法寫在書中，而在此之前佛法一直是口頭流傳的。

北印度的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s）非常清楚這一傳說。據云：在迦膩色迦治世，僧伽中諸異議部執不同，以致該王試圖停止糾紛，舉行結集爲三藏作注。

說一切有部指佛滅之年爲公元前 383 年。如果說一切有部和上座部擁有這一共同的傳說，極可能說一切有部認爲佛法沒落於佛滅後 460 年，這一年便是僧伽中發生糾紛並寫定三藏之年。按天文學推算等於公元前 382 年。迦膩色迦結集之年爲 460－382（即公元 78 年），這正是塞種紀元之元年。

由此可見，塞種紀元是真正的佛教徒和印度傳說，其根據是公元前 383 年的說一切有部紀元。按照這一老紀元，460 p. B. m. 相當於公元 78 年。這是歷史的轉捩點，法輪轉動的最初五百年過去，一

個新時期於是開始。

上述研究表明迦膩色迦的歷史與公元 78 年迦濕彌羅說一切有部的結集密切有關。可是這未必意味着迦膩色迦在 78 年即位。這結集也許是在他即位若干年以後舉行的。認爲迦膩色迦要等到 460 p. B. m. 說一切有部需要一個國王來停止宗教的衰落時纔挺身而，出似乎是相當荒唐的。儘管如此，這一看法表面上是唯一合乎邏輯的。因爲此傳說使結集發生在佛滅後 460 年而不是 500 年，這有力地說明迦膩色迦登基在公元 78 年。

蓋據最古老的佛教傳說，佛法將在佛的大無餘涅槃以後 500 年沒落，這意味着指稱同一事件發生於佛涅槃後 460 年乃是第二手的。若按說一切有部，佛陀大無餘涅槃（Mahāpariṇirvāṇa）在公元前 383 年，則佛法的沒落之年應爲公元 118 年（公元 500—382 年）。可是，在公元 78 年迦膩色迦即位，該王對於說一切有部的重要性不亞於阿育王之於古佛教。這使說一切有部不得不修改其教義中的年代說。也就是說，將原來關於佛法沒落將出現在佛滅後 500 年的傳說改爲佛滅後 460 年（佛陀被說成是在他死前 40 年發表了這樣的預言），使之符合迦膩色迦即位之年。迦膩色迦即位之年舉行的第四次結集——迦濕彌羅結集阻止了佛法的沒落，是年成了歷史的轉折點。

今案：其說未安。

一則，佛法沒落於佛滅後 460 年之說見於錫蘭上座部之年代記 Dipavadins 和 Mahavamsa，不見於北印度說一切有部的記述。

二則，北印度說一切有部所述迦濕彌羅結集提及迦膩色迦王即位之年並不作佛滅後 460 年（《大唐西域記》卷三作“第四百年”；《大毘婆沙論》卷二〇〇同 [46]），知說一切有部所傳與錫蘭上座部不

盡相同，不可牽扯到一處。即使說一切有部確有修改舊說之事，亦未必與迦膩色迦即位或結集有關。佛陀畢竟祇是預言佛法沒落於佛滅後 460 年，並未說是年便是佛法轉盛之年。

三則，結集之年代未有定說，佛涅槃之年也是一樣。迦膩色迦即位之年未必就是結集之年。也就是說，即使能證明結集舉行於公元78年，也依然沒有解決迦膩色迦即位年代的問題。迦膩色迦即位、建元以及結集三者未必在同一年。

7. P. H. L. Eggermont 的公元 78 年說之三 [47]

Pompeius Trogus 的 Historiae Philippicae 一書有殘簡稱，“Asiani（成了）Thocari 之王，Saraucae 則被殲滅”（XLII），可證丘就卻登上貴霜王位的時間下限爲公元前 20/ 前 19 年，上限爲公元前 29 年。蓋 Pompeius Trogus 又述：Phraates 四世發動與王位覬覦者 Tiridates 之戰爭，並求庇於斯基泰人，得後者之助，得以回國逐走其對手（XLII）。Phraates 四世回國在公元前 29 年，其對手被逐在公元前 26 年。

Phraates 和 Tiridates 之間的內戰似乎給了丘就卻很好的機會驅逐其他斯基泰部落，確立了貴霜部落之優勢。Phraates 被迫逃往斯基泰在公元前 29 年以前，因而丘就卻戰勝其餘部族之年約爲公元前 25 年。由此可見，祇有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一世紀即公元 78 年，纔符合丘就卻即位和迦膩色迦即位之間的時間間隔。

今案：此說未安。並沒有證據表明 Asiani 便是 Kushans。Asiani 成爲吐火羅之王，與《後漢書・西域傳》所載丘就卻滅其餘四翖侯無從比附。Asiani 成爲吐火羅王以及 Sacarauli 被殲的時間也未必如

說者所指。Trogus 書已散佚，現存僅若干片斷，無從得知 Asiani 成爲吐火羅王一事與 Phraates 四世、Tiridates 之間的鬬爭有無聯繫，不能根據後者發生的時間推斷前者發生的時間。事實上，Asiani 成爲吐火羅王以及 Sacarauli 被殲的時間當在公元前 129 年以前。[48] 既然如此，Trogus 的記載並沒有提供哪怕是間接的有關迦膩色迦於公元 78 年即位的證據。

8. D. D. Kosambi 的公元 78 年說 [49]

Tolstov 關於花剌子模出土遺址的報告有力地支援了 78 年說。但是，錢幣學的證據，正如 MacDowell 和 Göbl 所提供的，表明迦膩色迦即位的年代應在公元二世紀，這與 Barrett 依據圖像和雕塑，以及 Allchin 依據巴基斯坦考古資料得出的結論也是一致的。這是一個矛盾。但是，祇要認爲塞種紀元是一位僅以 Soter Megas 的名義打鑄錢幣的迦膩色迦創建的，而在錢幣上自稱迦膩色迦的貴霜皇帝是迦膩色迦二世，矛盾就解決了。

今案：其說未安。

一則，花剌子模的發掘沒有提供迦膩色迦創始塞種紀元的任何證據。

二則，說者並未列出任何積極的證據說明 Soter Megas 應即迦膩色迦一世。

三則，說者認爲 Soter Megas 作爲一個州長發行的錢幣似乎太多了。但除一篇 Āra 銘文外並沒有留下其他記錄的迦膩色迦二世發行的錢幣似乎也是太多了。事實上，Soter Megas 錢幣並不是一個州長發行的，應是丘就卻和閻膏珍時期各地州長代表中央政

府頒發的。[50]

四則，說者既然不否認錢幣學的證據表明這位迦膩色迦應於公元二世紀即位，又何故忽視銘文學的證據表明與迦膩色迦有關的銘文不可能是公元一世紀的產物？[51]

五則，如果說迦膩色迦一世在錢幣上僅稱 Soter Megas 是因爲他確信每一個人都知道他是誰，那末何故 Soter Megas 這一稱號不見於他的銘文，而在銘文上卻要寫上迦膩色迦這一名字？

此說之所以提出，似乎是爲了擺脫 78 年說的主要困境之一：錢幣學的研究表明，迦膩色迦錢幣的年代不可能早於公元二世紀。[52] 遺憾的是，說者既未能證明 Soter Megas 錢幣的年代晚於閻膏珍，又未能解釋爲何迦膩色迦一世在錢銘上匿名，而在碑銘中並非如此。

9. A. Maricq 的公元 78 年說 [53]

一般認爲烏賈因的大州長 Nahapāna 和 Caṣṭana 均採用元年爲 78 年的塞種紀元。但是，兩者都不可能是塞種紀元的創建者。

首先，Nahapāna 的在位年代爲 41—46 年，較 Caṣṭana 稍前。他和 Caṣṭana 不屬於同一家族。他的家族似乎被稱爲 Kṣaharātas。Kṣaharātas 族州長祇留下兩個名字：Bhūmaka 和 Nahapāna。相傳 Gautamīputra Śrī Yajña Śātakarṇi 征服了以 Nahapāna 爲代表的 Kṣaharātas 族，證據如下：

（1）據若干 Nasik 和 Karli 銘文，Nahapāna 之婿名 Ṛṣabhadatta（Uṣabhadata, Uṣavadata），而 Gautamīputra 曾捐贈一片一度爲 Uṣabhadata 所有的土地。

（2）在 Nasik 的錢窖中，有若干爲 Gautamīputra 重新打鑄的

Nahapāna 的錢幣。

由此可見，Nahapāna 和 Gautamīputra 同時代。後者於其在位第 18 年之前征服 Nahapāna 家族，而其治期至少有 24 年。

Gautamīputra 由其子 Śrī Puḷumāvi Vāsiṣṭhīputra 繼位，後者在位至少 24 年。Śrī Puḷumāvi Vāsiṣṭhīputra 由一個叫 Mādhariputra 的人繼承，後者有一篇年代爲 8 年的銘文。此後是 Caturapana Śātakarṇi Vāsiṣṭhīputra 和 Gautamīputra Śrī Yajña Śātakarṇi，在位至少 13 年和 27 年。

另據 Rudradāman 年代爲 72 年的 Girnar 銘文，Rudradāman 曾兩次打敗 Āndhra 王 Śātakarṇi，但均因考慮到他們親密的家族關係而寬恕了他。而據 Kanheri 銘文，可知所謂親屬關係乃指 Vāsiṣṭhīputra Śrī Śātakarṇi 曾娶 Rudradāman 之女爲妻。

這位 Āndhra 王無疑即 Caturapana Śātakarṇi Vāsiṣṭhīputra。但這樣一來，就不能認爲 Nahapāna 是塞種紀元的創建者，甚至不能認爲他採用了這一紀元。因爲如果 Nahapāna 採用的紀元和 Rudradāman 一樣，均係塞種紀元，則 Nahapāna 至少到塞種紀元第 46 年依然在位。這和 Girnar 銘文的年代之間至少相隔 26 年，而在這 26 年之間必須安排：a. Gautamīputra 戰勝 Nahapāna 和塞種紀元第 46 年之間的間隔。b. Gautamīputra 戰勝之後直至去位的時間，至少 6 年。c. Puḷumāvi 的在位年數。即使不計算（Boyer 所指）繼 Puḷumāvi 之後可能有一個叫 Mādhariputra 的人在位至少 8 年，也已超過 30 年。

一說這位 Āndhra 王應爲 Puḷumāvi。但這是不可能的。a. Puḷumāvi 從未使用過 Śātakarṇi 一名，在屬於他的七篇銘文中，他

始終衹稱 Puḷumāvi。b. 按照 Ptolemy 的記錄，Caṣṭana 和 Puḷumāvi 是同時代人，很難想像後者會娶前者重孫女爲妻。

Caṣṭana 也不可能是塞種紀元的創始人：

（1）唯一一篇屬於他的年代爲 52 的 Andhau 銘文，將他和他的孫子 Rudradāman 並提，措辭含糊，不知是年是 Rudradāman 單獨統治，還是祖孫一起執政。因此從年代角度來看，很難排除 Caṣṭana 開創了一個紀元的可能性。但是，Caṣṭana 和 Gautamīputra 的繼承者 Puḷumāvi 之間，Gautamīputra 和 Nahapāna 之間的同時性，以及 Caṣṭana 在烏賈因接替了 Nahapāna 等都表明：從年代的觀點來看，不可能認爲 Caṣṭana 開創了一個紀元。

（2）Caṣṭana 自稱州長，表明他是一個藩臣（vassal），而且是一個伊朗王（在當時衹可能是貴霜王）的藩臣。而我們知道迦膩色迦是通過州長和大州長來治理他的帝國的。由此可見，Caṣṭana 執政時，塞種紀元已經開始使用。

既然 Nahapāna 和 Caṣṭana 都不可能是塞種紀元的創始人，這就使迦膩色迦是這一紀元創始人之論能自圓其說了。

今案：其說未安。

（1）首先，Nahapāna 採用塞種紀元紀年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被 Rudradāman 征服的 Āndhra 王很可能是 Puḷumāvi。Puḷumāvi 至少在位 24 年，則被 Rudradāman 兩次征服大約發生在他在位的第 20 年。

Nahapāna 既然採用塞種紀元，則不能排除他本人或其父輩創建這一紀元的可能性。Puḷumāvi 和 Caṣṭana 同時代，很可能衹是首尾相銜，其實 Caṣṭana 應與 Gautamīputra 同時代。前者娶後者重

孫女，既無血緣關係，有何不可，蓋政治婚姻無奇不有。再者，娶 Rudradāman 之女者亦未必是 Puḷumāvi 本人，或其異父兄弟（co-uterine brother）。[54] 如一般認爲 Rudradāman 於公元 130—150 年在位，則塞種紀元第 52 年應爲 Caṣṭana 末年，時值 Puḷumāvi 在位第 6 年。

（2）Caṣṭana 或其父輩開創塞種紀元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Nahapāna 或 Caṣṭana 自稱州長或大州長表明他們可能另有宗主，這宗主可能是貴霜王。但是，這並不表明 Nahapāna 或 Caṣṭana 或其父輩不可能創建塞種紀元。

一則，Caṣṭana 既能自鑄造錢幣，並使用 rājan 稱號（與州長並用），表明他有很大的自主權，當然也可能自己建元。Nahapāna 在錢幣上一律稱 rājan。[55]

二則，Caṣṭana 或其父輩很可能建元稱王於前，被貴霜征服後，纔改稱州長或大州長。Caṣṭana 之父 Ysamotika 之名雖僅見於 Caṣṭana 的銘文中，但錢幣和銘文的發現有很大偶然性，Ysamotika 未必不可能是 Caṣṭana 王朝實際上的創建者。

三則，按之年代，Caṣṭana 或 Nahapāna 的宗主應是閻膏珍。閻膏珍的銘文表明他依舊使用老紀元，說明他不是塞種紀元的開創者。Caṣṭana 或 Nahapāna 稱臣於貴霜，不等於他們一定按貴霜的紀元紀年。兩人不同於迦膩色迦的其他州長，他們既能自己鑄幣，也就可能有自己的紀元。

10. B. N. Mukherjee 的公元 78 年說 [56]

據《後漢書・西域傳》，閻膏珍曾征服身毒。“身毒”得名於

Sindhu，其地大致包括今西巴基斯坦（但 Baluchistan 不在其內），白沙瓦以南、印度河以西地區。

Mohenjo Daro 的佛教萃堵波和寺院中至少出土了 1438 枚 Vāsudeva 一世的銅幣。如此大量的錢幣出現在一個宗教建築物而不是一個商業場所不能僅僅用貿易關係來說明，也就是說這些錢幣應在 Mohenjo Daro 地區正常流通。Vāsudeva 一世的銅幣及其倣製品也發現於 Mohenjo Daro 以西僅 20 英里左右的 Jhukar 的一些世俗建築中，這也說明了這位貴霜王錢幣在該地流通。

Mohenjo Daro 無疑是身毒國（Sindhu）的中心。因此，Vāsudeva 一世的銅幣至少曾在身毒的部分地區流通過。雖然一個政權的錢幣在某地正式流通並不表明該政權實際管轄該地區，但既然身毒曾爲貴霜王閻膏珍征服，而且正如迦膩色迦一世的 Sui Vihar 銘文所表明的，貴霜統治至少存在於附近地區諸如 Sui Vihar，則 Vāsudeva 一世的錢幣在身毒流通應該說明他統治過該地區。

因而，貴霜對身毒（Sindhu）的佔領似乎至少從閻膏珍的末年持續到 Vāsudeva 一世的第一年。已知 Vāsudeva 在位的最早年代爲迦膩色迦紀元的第 64 或 67 年。由於並不知道 Huviṣka 在迦膩色迦第 60 年以後是否在位，不能排除 Vāsudeva 就在這一年繼位的可能性。因此，似乎可以肯定，貴霜對身毒的統治至少從閻膏珍末年持續到閻膏珍的直接繼位者即迦膩色迦所建紀元的第 60 年。

另一方面，Rudradāman 一世的 Junāgadh 銘文表明他在塞種紀元第 72 年（即公元 149—150 年）作爲一位獨立的統治者統治着身毒，因此貴霜對身毒的 61 年或更長的統治應結束於公元 149—150 年前後。

又據《後漢書·西域傳》，丘就卻“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稱：“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安息（即帕提亞）佔有高附（Kabul）衹可能在印度希臘人統治該地之後、貴霜人征服該地之前。既然喀布爾河上游至少在公元前一世紀某時屬於帕提亞勢力範圍，而帕提亞人對該地的控制結束於公元前 1 年或這一年之前，則丘就卻破安息、得高附也應該在公元前 1 年或稍前。既然《後漢書·西域傳》載丘就卻取高附僅在攻滅四翖侯、建立貴霜王國之後，他的統治生涯應開始於公元前 1 年前的某時。具體而言，可能是公元前 5 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話。

從丘就卻之子閻膏珍（Vīma Kadphises）征服身毒開始，貴霜人 61 年或更長的時間對身毒的統治必定結束於公元 149—150 年。因此，迦膩色迦紀元的第 60 年應在公元 149—150 年之前，該紀元的元年則不可能落在公元 89—90 年之後。如果考慮到已知 Vāsudeva 一世在位的最早年代是迦膩色迦紀元第 64 年或 67 年，而他可能在這一年之後的若干年內領有身毒，則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應不晚於公元一世紀的 70 年代末或 80 年代初。另一方面，既然帕提亞君主 Gotarzes 二世即位於公元 40—41 年，他的某些錢幣反面的圖案（在祭台前獻祭的王）很可能就是閻膏珍很多錢幣正面圖案設計的原型（在祭台前獻祭的王），則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不可能早於公元 40—41 年。

如所周知，憍賞彌的 Maghas 採用塞種紀元。已知憍賞彌的 Maghas 獨立統治的最早年份是塞種紀元第 81 年（即公元 158/159 年）。如果一篇 Bandhogarh 銘文提到的 Bhīmasena 王是 Magha 家族的一位子孫，該銘文的 51 年（即公元 128/129 年）應爲該家族已

知最早的統治年代。

沒有證據表明 Magha 人創建了塞種紀元，也沒有證據表明該紀元是 Nahapāna 或 Caṣṭana 創建的。另一方面，迦膩色迦治期有一紀元開始使用，而他至少在該紀元的第二年統治着憍賞彌。既然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落在公元 40—41 年和公元 89—90 年之間，那末他在憍賞彌的統治可能與塞種紀元元年（公元78年）不會相去太遠。

再者，憍賞彌的考古發掘表明，該地最高權力是從貴霜過渡到 Magha 家族的。因此，可以斷定 Magha 家族是熟知迦膩色迦紀元的。如果 Magha 人在迦膩色迦治下貴霜領土可能的界限之內或與之相去不遠的一個地區使用另外一個政權的紀元，那末合乎邏輯的結論是他們銘文年代是按照迦膩色迦紀元計算的。既然 Magha 人記錄中所用紀元的元年是公元 78 年，這一年便應該是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

今案：B. N. Mukhejee 說未安。

一則，雖然僅僅根據漢文史料的記載不妨將丘就卻滅四翎侯，自號貴霜王的時間上限定在公元 25 年左右，但如果結合銘文和錢幣的證據，則不能認爲丘就卻在公元前已經領有高附（即 Kabul 河谷）。貝格拉姆（Begrām）出土了大量 Gondphares 的錢幣，但沒有他的繼承者的錢幣。這表明喀布爾河上游地區在 Gondphares 死後不復由其後人統治。[57] 從貝格拉姆錢幣的出土情況來看，繼 Gondphares 之後統治該地的應是丘就卻，而年代爲 103 年的 Takht-i-Bahi 銘文表明 Gondphares 即位於公元 19 年，去位年代的上限爲公元 45 年。因此，丘就卻攻佔喀布爾的年代不可能早於公元 19 年，更可能是在公元 45 年之後。《後漢書·西域傳》所謂“攻安息，取

高附地”，乃指丘就卻攻取由安息人 Gondphares 家族統治的喀布爾河上游地區。丘就卻取高附的年代既不可能在公元之前，則說者以爲丘就卻於公元前 5 年開始其統治生涯的判斷就失去了根據。

二則，《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表明閻膏珍曾征服身毒，Mohenjo Daro 等地佛教和世俗建築中發現的 Vāsudeva 的錢幣表明他也統治過身毒。但是，即使如說者所言，自閻膏珍至 Vāsudeva，貴霜人統治身毒至少 60 年，並未間斷，與 Rudradāman 的統治並不矛盾。蓋後者役屬貴霜（迦膩色迦）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三則，閻膏珍的錢幣摹倣 Gotarzes 二世的錢幣未必說明兩者是同時代的，而年代爲 134 年的 Kalatze 銘文表明閻膏珍的末年不會遲於公元 129 年。這就是說，迦膩色迦即位之年不能早於此年。

四則，即使 Magha 人不是塞種紀元的創建者，Nahapāna 和 Caṣṭana 也不是塞種紀元的創建者，仍不能排除在 Nahapāna 和 Caṣṭana 之前有一塞種統治者創建這一紀元。公元 78 年應是丘就卻去位年代的上限，其時閻膏珍無疑尚未征服身毒。正在這一年，一位塞種酋長創建了塞種紀元。雖然身毒一地不久便爲閻膏珍征服，但當地的塞種人仍有可能繼續使用自己的紀元。Nahapāna 等因臣服於貴霜，不使用王號、帝號，而僅稱州長、大州長，閻膏珍則允許他們擁有某種程度的自治權，包括使用原來的紀元，僅置將“監領”。迦膩色迦繼位之後，很可能摹倣閻膏珍的統治方式，Rudradāman 即迦膩色迦所置之“將”。Magha 人統治憍賞彌最早的年代是公元 128—129 年，時值閻膏珍治期之末，很可能此時身毒一帶的塞種政權勢力日益強盛，乃至憍賞彌的 Magha 人也受其影響開始採用塞種紀元紀年，這也表明 Magha 人很可能一度臣服於身毒

的塞種。後來，雖然憍賞彌落入貴霜的勢力範圍之內，但 Magha 人也有某種自主權，乃至塞種紀元沿用不變，直至獨立。質言之，考古學資料表明憍賞彌的最高權力是從貴霜向 Magha 人過渡的，並不表明 Magha 人一定採用貴霜人的紀元。

11. D. C. Sircar 的公元 78 年說 [58]

塞種、貴霜和笈多的馬土臘銘文資料的古文書學分析，連同其他銘文和錢幣的資料一起表明：貴霜（從迦膩色迦一世到 Vāsudeva）統治馬土臘的一個世紀應該被安排在公元一世紀或二世紀。

馬土臘銘文（塞種、貴霜和笈多）共使用三個不同的紀元：a. Scytho-Parthia 紀元：Śoḍāsa 及其他；b. 迦膩色迦紀元：迦膩色迦組統治者；c. 元年爲公元 319 的笈多紀元。古代印度使用紀元的習慣是外來的。Scytho-Parthia 紀元和迦膩色迦紀元均不例外。

古文書學的證據表明，Śoḍāsa 統治馬土臘在公元前二世紀以後某時。迦膩色迦組貴霜統治者統治馬土臘在 Śoḍāsa 之後，而在笈多人於公元四世紀征服這一地區之前。既然迦膩色迦組統治馬土臘至少一個世紀，其始年便可能落在公元前一世紀、公元一世紀、二世紀或三世紀。從古文書學角度來看，迦膩色迦組貴霜統治者的銘文和公元四世紀後半葉的笈多銘文之間的間隙既不可能大於三個世紀，也不可能短至幾年。也就是說，迦膩色迦即位之年不太可能落在公元前一世紀或公元三世紀。Scytho-Parthia 紀元和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之間應相差一個多世紀：

（1）使用 Scytho-Parthia 紀元的一篇銘文年代是 72 年，而在馬

土臘發現的若干迦膩色迦及其繼任人的銘文的年代數大於 72 年。

(2) Śoḍāsa 之父 Rañjuvula 的早期錢幣銘文用希臘文和佉盧文，但其晚期和 Śoḍāsa 的錢幣銘文均用婆羅謎文，其他較晚的 Mathurā 地區的 Śaka 統治者也用婆羅謎文。由於馬土臘地區處在佉盧文流行範圍之外，這表明 Rañjuvula 是馬土臘最早的 Śaka 統治者，而 Śoḍāsa 在該地的統治並不是由貴霜直接繼承的。迦膩色迦紀元的創建似乎是爲了取代 Scytho-Parthia 人和早期貴霜人使用的紀元。年代爲 122 年的 Panjtar 銘文（使用 Scytho-Parthia 紀元）提到了早期貴霜統治，可見在 Scytho-Parthia 紀元和迦膩色迦紀元之間至少相差 122 年。

印度最早的紀元即 Vikrama 紀元（元年爲公元前 57 年）和塞種紀元（元年爲公元 78 年）正落在 Scytho-Parthia 和貴霜統治西北印度的時代。這兩個外來王朝創建在印度希臘王 Demwtrius 和 Eucratides（前二世紀前半葉）及其繼承者之後，而貴霜王朝迦膩色迦一組統治者（其領土包括馬土臘）必須安排在公元 380 年（即旃陀羅笈多二世的馬土臘銘文的年代）之前很久，蓋據《往世書》的傳說（部分得到銘文和錢幣證據的支持），在馬土臘可能於公元四世紀中被沙摩陀羅笈多（約公元 340—376 年）并入笈多帝國之前安排了七位 Nāgas 統治者。迦膩色迦紀元第 28 年 Vasiṣka 的 Sanchi 銘文又肯定早於塞種酋長 Śrīdharvarman 的 Sanchi 銘文，後者的年代可能是公元 279 年，更早於笈多紀元第 93 年（公元 412 年）的旃陀羅笈多二世的 Sanchi 銘文。

考慮到早期印度土著統治者完全不用紀元，在公元前一世紀和公元三世紀之間統治西北印度的外來統治者使用兩個不同的紀元，

這兩個紀元的元年之間相隔一個世紀又幾十年，而 Vikarama 紀元和塞種紀元的元年相隔 135 年，並且分別落在外來人統治西北印度的公元前一世紀和公元一世紀，就會很自然地認爲 Vikrama 紀元和塞種紀元分別就是見諸銘文的兩個外來紀元 Scythio-Parthia 紀元和迦膩色迦紀元。

今案：說者其實並未證明 Scytho-Parthia 紀元和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相差 135 年。事實上，公元 199 年的 Mathurā 銘文使用的是 Scytho-Parthia 紀元，而如說者所論，這一紀元的元年是公元前 57 年。迦膩色迦自創紀元取代舊紀元，則其元年應在公元二世紀前半葉。又，迦膩色迦即位無疑在閻膏珍之後，後者在位時使用說者所謂 Scytho-Parthia 紀元，其 Khalatse 銘文的年代爲 184 或 187 年，這也表明新老紀元相去不止 135 年。因爲提到的貴霜王名 Vima 正如多數學者承認的，顯然可以和閻膏珍勘同。閻膏珍無疑是早於迦膩色迦的貴霜王。

另外，年代爲 136 年的 Taxila 銘文無疑屬於迦膩色迦以前的貴霜銘文，其紀元應爲 Scytho-Parthia 紀元，實際年份爲公元 78 年（說者以爲該銘文的實際年份是公元 79 年，應屬無名王。據此，則迦膩色迦即位後舊紀元繼續爲貴霜王使用。這是矛盾之一。無論無名王是誰，既然公元 79 年在位，則似難認爲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78 年）。如果公元 78 年爲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則不應有這種現象。應該指出：Taxila 銘文上提到的貴霜“大王、王中之王、天子”，不可能是迦膩色迦，而應該是一位先迦膩色迦貴霜王。因此，銘文的年代 136 不能認爲是迦膩色迦在創建新紀元之前使用舊紀元的例證。而如果結合閻膏珍的 Khalatse 銘文，可見 Taxila 銘文的 136 年也不

可能是這位先迦膩色迦王和迦膩色迦政權交替的一年。

年代爲 103 年的 Takht-i-Bahi 銘文提到了 Gondophares。這篇銘文的紀元，如說者所指，應按 Scytho-Parthia 紀元計算。果然，則直至公元 45 年 Taxial 仍在 Gondophares 治下。這就是說即使認爲 Gondophares 去位於公元 45 年，而且不計其後繼者的治期，第一貴霜（包括丘就卻和閻膏珍兩者）的治期不過 20 年略多一些。丘就卻佔領罽賓（Gandhāra 和 Taxila）尚在佔領高附（Kabul）之後。而丘就卻取高附於“安息”（即 Gondophares 王朝）之手，這似乎衹有在 Gondophares 去世後纔有可能。這實在無法和《後漢書・西域傳》所載丘就卻之高齡以及兩位統治者的功業相協調。丘就卻和閻膏珍的錢幣業已大量發現也說明他們的治期不會太短。

說者以爲西印度塞種統治者 Rudradāman 年代爲 72 年的 Junagarh 銘文表明，在公元 50 年時 Ākara（東馬爾瓦，連同在 Vidiśā 的首都）都是 Rudradāman 的領土。但是 Vāsudeva 的年代爲迦膩色迦紀元第 28 年的 Sanchi（Vidiśā 附近）銘文表明，在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治期貴霜佔領着東馬爾瓦。如果該銘文所用紀元爲 125 年，則 Vasiṣka 與 Rudradāman 同時，這顯然是矛盾的。

其實，Rudradāman 的上述銘文僅僅是宣稱對馬土臘地區的主權，未必實際佔有該地。何況，當時貴霜王是 Rudradāman 宗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至於在沙摩陀羅笈多征服之前，馬土臘地區存在七個 Nāga 統治者也不能作爲迦膩色迦紀元應該提前到公元 78 年的證據。不僅因爲這七個統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往世書》的傳說，具體在位年代不明，而且不能排除這七個統治者事實上是同時或差不多同時存

在的可能性。

12. S. P. Tolstov 的公元 78 年說 [59]

Toprak-kala 遺址花剌子模王宮的檔案室中，出土了四件紀年皮革文書，其中三件的年代清晰可辨，分別爲某一不明紀元的第 207、231 和 232 年。出土資料表明，Toprak-kala 遺址的年代在公元前一世紀末和公元四世紀之間，而宮殿的年代在公元三、四世紀之交。Toprak-kal 宮殿的建築、雕塑和繪畫生動地表明，當時 Khorezm 藝術的發展和同時期的印度藝術有着密切聯繫。

Khorezm 與印度的聯繫在雕塑中表現得最爲明顯。Toprak-kal 宮一處宅第壁間所置武士雕像的人類學特徵完全不同於中亞居民。其像直髮、厚唇、鼻型特殊、身材短小，膚色自淺棕直至深黑，可視爲赤道種的南印度或達羅毗荼型變種。這種類型也見諸公元三、四世紀之交要塞 Kalaly-gyr-I 墓葬的人類學採集品中。

雖然 Khorezm 居民的南印度成分可追溯至公元前十三世紀，正如青銅時代晚期的墓葬 Kokcha- Ⅲ的人類學資料所顯示的那樣，但 Kokcha- Ⅲ所見已是南印度人種與 Khorezm 歐羅巴種的混合型。由於 Khorezm 所見和 Toprak-kala 雕像所示均係純南印度人種，這表明至遲在公元二世紀有一次新的移民浪潮，自南印度波及 Khorezm。這應該是貴霜政府執行軍事移民的結果。

公元一世紀末，Khorezm 成了貴霜帝國的一部分。錢幣學的證據證實了這一點。古代花剌子模的錢幣採集品中，貴霜銅幣佔有重要地位，共有 60 餘枚，其中包括閻膏珍 6 枚，迦膩色迦 8 枚，Huviṣka 9 枚，Vāsudeva 18 枚，餘者無從歸類。在 Toprak-kala

城區及其附近共發現22枚，包括閻膏珍4枚，迦膩色迦3枚和Vāsudeva 6枚。而Vāsudeva的錢幣中可能有一些不是一世而是二世的。

花刺子模出土的貴霜錢幣，除閻膏珍的錢幣外，其餘兩邊都蓋有一個“S”形的戳記，這種戳記也出現在最早的後貴霜花剌子模錢幣上。

結合貴霜以前花剌子模錢幣進行研究，可知這“S”形戳記是花剌子模統治者在花剌子模本地收回對錢幣控制權的最早的表示。這以後出現了純粹花剌子模小銅幣，上面也有這種“S”形戳記。花剌子模發現的銀幣中包括兩枚最早的後貴霜銀幣，其上也有“S”戳記。這被稱爲Artamukh及其妻之錢幣。錢幣學的分析表明這兩枚銀幣的時間是公元三世紀第一個10年。

在Toprak-kala宮出土的兩枚銀幣，蓋有十字形戳記。這種蓋有類似戳記的錢幣大量發現於Toprak-kala城表面及其周圍。其年代應在有“S”形戳記的貴霜錢幣之後，而在“S”形戳記的花剌子模錢幣之前。後者恢復了Siyavushid特有的花押。花剌子模錢幣花押的這一變化說明曾發生過一次政變，一度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十字花押乃屢見於印度錢幣上的“+”字之變種，這表明某種印度傳統的復蘇，時在早期薩珊軍事活動啓動之際，甚或更早——三世紀中葉，在花剌子模一個印度王朝奪取了政權。當時既不可能有外來的征服，衹可能是內部的政變，這政變可能是上述黑膚武士發動的。這一王朝的第一位統治者是Wiramna。從錢幣可知這一王朝至少有三位（可能多達五位）統治者。

據比魯尼（公元973—1048年）記載，公元305年，Afrig建立

了一個新的 Khorezm 紀元。此後，Afrig 將都城自 Toprak-kala 遷往 Fir (Fil)。Toprak-kala 宮被廢棄無疑與這次遷都有關，時在公元四世紀之初。

假定出自 Toprak-kala 宮檔案室文書最遲的年代落在公元四世紀第一個 10 年，這未知紀元的元年應在公元 68 和 78 年之間，因而很可能是印度的塞種紀元。蓋據比魯尼，Afrig 以前的花剌子模王按照自己在位年代紀年，人們已經不再記得有曾使用過 200 年以上的花剌子模土著紀元。這表明文書所用的紀元是一個外來紀元。印度是當時唯一能提供花剌子模一個紀元的地區，因爲 Toprak-kala 城在建成不久就成了貴霜帝國一部分，歷時近百年，深受印度文化之影響。而見用於中印度和南印度銘文的塞種紀元之所以見用於花剌子模——貴霜帝國的邊緣地區，說明該紀元正是貴霜的官方紀元即迦膩色迦紀元。

假定第二貴霜諸王在位時間持續 100 年，則在最後一位貴霜王（Vāsudeva 一世或二世）和 Toprak-kala 宮放棄（相當於用塞種紀元紀年的文書完成之日）之間流通的錢幣材料的時間跨度也爲 100 年或略多。這段時間相當於有花剌子模“S”形戳記的貴霜錢幣在花剌子模流通的延長時期。一部分是所謂 Artamukh 及其妻之治期，一部分是另一位在採集品中由小銅幣代表的統治者的治期，這位統治者在他的錢幣的反面也加蓋一個“S”形花押。而上述政變以及一個新的 Indo-Khorezmian 王朝的建立（這個王朝的統治者打鑄一種有十字形花押和獨特的 Siyavushid 型花押的錢幣）的時間接近於沙普爾（Shapur）的遠征。

Indo-Khorezmian 王朝有三至五位統治者。而在貴霜錢幣流行

和 Afrig 即位之間至少有九位統治者。假定公元 78 年是迦膩色迦元年，第二貴霜諸王在位時間爲 98 年，則 Vāsudeva 二世於公元 176 年去位。考慮到 Toprak-kala 宮出土的 Vāsudeva 錢幣中可能包括二世，則蓋有“S”戳記的貴霜錢幣在花剌子模流通應在公元二世紀後期。

沒有戳記的貴霜錢幣在花剌子模開始流通和沙普爾一世（241 年，這一年或稍後乃印度－花剌子模王朝出現之時）即位之間的時段，相當於花剌子模打鑄有戳記的貴霜錢幣和三位使用“S”形戳記的統治者的治期。換言之，這段時期持續 30—40 年。而 Afrig 以前至少六位王者的治期持續 60—70 年。

如果接受 Ghirshman 的 144 年說，那末貴霜以後花剌子模錢幣反映出來的複雜歷史進程衹能壓縮在半個世紀（即公元三世紀後半）之內，這顯然是不合情理的。

今案：此說未安。

一則，沒有充分的證據說明花剌子模曾經是貴霜帝國的一部分。建築、雕塑、繪畫等藝術風格接受印度同時期藝術風格的影響不足以證明這一點。至遲在公元二世紀末有一批南印度人遷入花剌子模也不足以說明這一點。既然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紀已有同種的南印度人遷入花剌子模，則公元二世紀遷入未必是貴霜軍事移民政策的結果。花剌子模總共出土 60 枚貴霜銅幣似乎也表明該地未曾爲貴霜所并。既然未能證明花剌子模曾是貴霜領土的一部分，即使能證明文書所用紀元爲塞種紀元，也不能認爲塞種紀元就是迦膩色迦紀元。既然印度的建築、雕塑、繪畫藝術可能影響同期的花剌子模，塞種紀元作爲一個印度地區流行的紀元輸入花剌子模也就不足爲奇了。

二則，即使花剌子模曾是貴霜帝國領土的一部分，也未必一直被貴霜人統治至第二貴霜王朝結束。質言之，公元二世紀末第一個在貴霜錢幣上打“S”形戳記的花剌子模統治者未必即位於Vāsudeva一世乃至二世之後。這位統治者完全有可能是Vāsudeva一世甚或Huviṣka的同時代人。既然如此，說者藉以反對144年說的理由便不能成立，依舊有至少一百年的時間來容納通過花剌子模錢幣分析得出的該地擺脫貴霜統治直至Afrig即位這一段頗爲複雜的歷史。

三則，文書的出土有偶然性，因此未必232是Afrig建元以前舊紀元的最大紀年數。揆情度理，Afrig遷都時應該將有用的文書帶走，而棄置在檔案室的多半是因年代久遠而價值跌落的那些文書。雖然Toprak-kala宮的年代在公元三、四世紀之交，但王家檔案室中藏有年代較早的文書不足爲奇。假定文書採用的印度紀元正是說者反對的始於公元144年的迦膩色迦紀元，則232年的實際年份爲公元176年。蓋232年應即迦膩色迦紀元第32年。質言之，文書檔案採用者其實是所謂Vikrama紀元（不過沒有省去百位數2而已），這並不妨礙以上有關花剌子模史年代的安排。

四則，Б. И. Вайнберг[60]認爲：阿姆河下游Toprak-kala墓葬的骨殖罐上的紀年銘文表明，有一個花剌子模紀元至少存在了8個世紀。Toprak-kala的文書，若干刻有花剌子模銘文的銀盃和Toprak-kala骨殖罐都按該紀元紀年。遺憾的是，根據現有資料無法精確地判定該紀元的元年，因而無法確定Toprak-kala城堡的年代。Toprak-kala發現的錢幣也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支援S. Tostov關於該紀元應即78年的塞種紀元的觀點。Toprak-kala的有關材

料衹能使我們相信該紀元始於公元一世紀 40 或 50 年代初，不會遲於公元 54 年。

13. A. K. Wardar 的公元 78 年說 [61]

按照佛教傳說（Sarvāstivādin, Vaibhāṣika），脅尊者（Pārśva）和世友（Vasumitra II）是迦膩色迦贊助的一次佛教結集的領袖人物，Caraka（遮羅迦）是迦膩色迦的宮廷醫師，MātṚceṭa 是一封給一個叫 Kaniṣka 的國王書信的作者。確定以上三人的大致年代有助於迦膩色迦的年代的判斷。

諸經所載佛滅後所謂傳燈系統表明，龍樹（Nāgārjuna，大乘 Mādhyamaka 派的創始人）在脅尊者之後。而據太羅那特（Tāranātha），世友是脅尊者的同時代人，在迦膩色迦去世時依然健在。又據太羅那特，龍樹在其晚年自那爛陀往赴南印度，其學生聖天（Āryadeva）曾使 Māṭṛceṭa 皈依佛教。印度因明學發展史的研究表明 Caraka 和世友的年代均早於龍樹。由此可見，衹要知道龍樹的年代，便能推出其他三人的年代。

史詩和若干其他文學作品均稱龍樹和一位娑多婆訶王（Sātavāhana）同時代，而據太羅那特，龍樹和鄔闍衍那的Ś arvavarman（薩爾瓦跋摩）是同時代人。因此，和龍樹同時代的娑多婆訶王可能是著名的 Prakrit 文學的提倡者和 Sattasaī 的編者 Hāla。

Hāla 在文學作品中也被稱作 Kuntaleśa，而且在《往世書》中另有一位 Kuntala 王。“Kuntala”在晚期的史詩中用作廣義，意指整個德幹，如果有一位娑多婆訶王因征服狹義的 Kuntala 而得稱爲

Kuntala，則此王很可能是 Vāsiṣṭhīputra Puḷumāyi (II)。

若干銘文記載，在 Amarāvatī，在 Puḷumāyi (II) 的治期，萃堵波被圍以欄杆。而據太羅那特，龍樹抵南印度後，曾對萃堵波等佛教建築作諸種改進，諸如修築欄杆等。這也可以證明龍樹所遇娑多婆訶王即 Puḷumāyi (II)（Vāsiṣṭhīputra Puḷumāyi）。

Puḷumāyi 的年代爲公元 128/138—155/166 年。既然世友和龍樹之間（從說一切有部的結集，經迦膩色迦之死，至大乘的 Mādhyamika 學派之創始）至少 50—60 年，而從龍樹到 Māṭṛceṭa 的晚年（某一位迦膩色迦王在位），至多爲 25—30 年，這龍樹在南印度改進佛教建築的年代約爲公元 147 年（公元 128 和 166 年間），而世友和 Māṭṛceṭa 的年代分別爲公元 97 年（公元 78 年和 116 年間）和公元 172 年（公元 153 年和 191 年）。

由此可見，與世友同時代的迦膩色迦一世的年代也應該是公元 97 年（他可能在今後幾年內去世）。而另外一位迦膩色迦的年代應爲公元 172 年。如果考慮到迦膩色迦二世可能在一世死後 18 年即位，則 Māṭṛceṭa 的信應該是寫給迦膩色迦三世的。這就是說，迦膩色迦一世祇可能即位於公元 78 年。

今案：此說之核心在於證明龍樹與娑多婆訶王 Vāsiṣṭhīputra Puḷumāyi 同時代，並依據後者的年代推知前者，然後再從前者推知世友，進而推知與世友同時代的迦膩色迦的年代。但是，說者所舉佛經、往世書以及史詩、文學作品中的有關傳說未必可信 [62]，所謂謬托明王，很難視作考史證據。退一步說，即使說者所列諸傳說皆有史實爲背景，也不能認可在此基礎上作出的有關年代推算。因爲不僅 Puḷumāyi 的年代未必如說者所指，而且從 Puḷumāyi 的年代推

算龍樹的年代，從龍樹的年代上推世友的年代，再從世友的年代推算迦膩色迦的年代，這一過程中每一環節都存在很大誤差。而說者所贊成的公元 78 年和反對的公元 144 年之間衹差六十餘年。

雖然 Puḷumāyi 的統治地區主要是狹義的 Kuntala，也不妨因此認爲他可能被稱爲 Kuntala 王。但據《大唐西域記》卷一〇記載，龍樹在（南）憍薩羅時，該地區在一位娑多婆訶王的治下，這是很值得注意的。既然沒有證據表明 Puḷumāyi 曾統治過南憍薩羅，也就很難認爲龍樹同時代的娑多婆訶王便是 Puḷumāyi。

Puḷumāyi 治期 Amarāvatī 的萃堵波周圍築有欄杆很可能是龍樹後來在 Vajārsana 等地改進佛教建築的先行。質言之，未必係龍樹所築。

既然包括《大唐西域記》在內的佛教諸傳說均未言明於龍樹同時代的娑多婆訶王究竟是何人，則不妨如一般所認可的那樣，指 Yajña Śātakarṇi（約公元 174—203 年），爲龍樹同時代人。[63] 這位國王的錢幣發現於中央邦的 Chandā，這表明他的勢力曾涉及這一地區，而《大唐西域記》的憍薩羅國很可能曾建都於該處。[64]

（二）對公元 78 年說的評論

以下簡單介紹兩種對公元 78 年說的評論。

1. A. H. Dani 說 [65]

古文書學的證據表明，Nahapāna 不可能效忠於迦膩色迦。因爲前者銘文的書風見不到貴霜影響，甚至晚期西部州長的銘文也見不到這種影響。古吉拉特和馬爾瓦依然流行老風格，甚至在整個北印

度已受貴霜風格影響時也是如此。因此，迦膩色迦不可能是塞種紀元的創始人。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必定比公元 78 年晚得多，甚至晚於 199 年的馬土臘銘文。塞種紀元最初僅在西印度流行，僅在後期纔傳播到其他地區，有關的傳說都表明了這一點。

塞種紀元也不可能歸諸閻膏珍，因爲閻膏珍的年代爲 187 年銘文使用的是一個老紀元，而沒有證據表明塞種紀元在閻膏珍的領土上使用過。但是，閻膏珍或另一些早期貴霜統治者可能與塞種紀元的起源問題間接有關。塞種在馬土臘至少存在至公元 15 年，這已由年代爲 72 年的 Śoḍāsa 銘文證明。此後，還有州長 Ghaṭāka。再往後，這個地區的塞種似乎被貴霜人推翻，其年代必定晚於佉盧銘文提到貴霜之時。

最早提到 Maharayasa Guṣaṇasa 的是年代爲 122 年（公元 65 年）的 Panjtar 銘文，這表明塞種在馬土臘的統治結束於此後不久。幸存的塞種最可能逃往古吉拉特，奠定了西部州長政權的基礎，於是開始了元年爲公元 78 年的塞種紀元。

2. A. K. Narain 說 [66]

說者認爲，如果接受 78 年說，就無法安排迦膩色迦之前的貴霜統治者。持 78 年說者，爲了避免困難，祇能試圖將丘就卻生涯的起點提前到公元前 20 年，而如果將丘就卻安置在公元一世紀的第一或第二個 10 年，就祇能試圖壓縮閻膏珍的治期，其根據僅僅是閻膏珍繼承的是一個八十多歲人的王位。但是，這兩種安排都不能解決問題。如果將丘就卻即位之年提前到公元前 20 年，他的年代就會與已

知塞種和 Pahlava 諸王的年代重疊。如果壓縮閻膏珍的治期，則很難理解這位印度征服者留下的大量錢幣。

Philostratus 的《地亞那的 Apollonius 傳》一書中可以找到一個確定的點：儘管 Phraotes 的比定有爭議，但不能否定公元 43 年統治 Taxila 的是一位 Pahlava 王。這和 Taxila 的發掘結果是相符的。衹要假定丘就卻治期的大部分在公元 43 年之後，即使他在位 50 年也不應死於公元 75 年之前。

公元 78 年說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印度史提出的要求，但不能滿足中國史和薩珊史提出的要求。不管波調是 Vāsudeva 一世還是二世，都不能使之與迦膩色迦元年爲公元 78 年說相一致。因爲比公元 230 年一個早 50 年，另一個早 30 年。且如 J. Marshall 所指出，公元 78 年說的一大問題是《後漢書》沒有提到迦膩色迦。同理，薩珊對貴霜的勝利不可能早於公元 223 年，雖然可能略遲一點，但衹要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78 年便無法協調。

指迦膩色迦紀元元年爲公元 78 年的唯一原因，是將迦膩色迦與塞種紀元未知的創始人勘同的誘惑。但奇怪的是，所有與塞種起源有關的傳說均與一個貴霜政治勢力沒有進入的地區聯繫在一起。使用這一紀元的地區顯然有別於貴霜帝國。何況貴霜並非塞種，沒有證據表明迦膩色迦創建了塞種紀元。

如果接受公元 78 年說，則公元 114—119 年時接受臣磐的月氏王便是 Huviṣka，但不僅沒有證據，甚至沒有傳說表明 Huviṣka 與中國新疆有關，在新疆發現的貴霜錢幣中衹有一枚屬於 Huviṣka。

三、公元二世紀諸說

公元二世紀諸說中，公元 144 年說一度最受青睞，尤其在倚重漢文史料的研究者中信從者較多，故在此首先介紹之。

（一）公元 144 年說

1. R. Ghirshman 的公元 144 年說 [67]

這是最早的公元 144 年說，以下是其主要論據：

（1）公元 230 年遣使曹魏的大月氏王波調應即亞美尼亞編年史家 Moses Khoren 的提到的貴霜統治者 Vehsadjan，他與亞美尼亞王 Khosrov 聯盟，和 Ardashir 一世作戰，時在公元 227 年，也就是 Vāsudeva。因此，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143/144 和 154 年之間，因爲迦膩色迦王朝是在公元 241/242 和 252 年之間被沙普爾一世摧毀的。

（2）據泰伯里，Ardashir（公元 226—241）視貴霜爲威脅，征服了巴克特里亞。這一記載，似乎被 Surkh Kotal 的發掘所證實，那裏出土了貴霜諸王——迦膩色迦、Huviṣka 的錢幣，但未發現 Vāsudeva 的。而在沙普爾一世（公元 240—270 年）的 Naqsh-i Rustam 銘文中，沙普爾一世宣稱他的軍隊佔領了“Pskbvr”即貴霜的冬都白沙瓦。可見由迦膩色迦創建的貴霜王朝被沙普爾一世摧毀，取而代之的是承認薩珊宗主權的另一系統的王公們。

貝格拉姆的發掘表明 Vāsudeva 是在公元 241 和 252 年間被沙普

爾一世推翻的。那裏出土的最晚的錢幣是 Vāsudeva 一世的，這些錢幣出自第二層。從 Kobadian IV, Tali-Barzu, Qala-i-Mir 和 Airtam-Termez 的發掘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

（3）迦膩色迦對帕提亞的遠征可能發生在 Vologases 三世治期，這也許起因於帕提亞人試圖收回被貴霜人兼幷的某個省份。

（4）貴霜人都使用省去百位數的 Vikrama 紀元，迦膩色迦即位於 Vikrama 紀元第 201 年即公元 144 年。[68]

今案：與其他公元 144 年說一樣，此說具有內在的合理性。最主要的是，其結論建築在文獻和考古資料相結合的基礎之上。但確指迦膩色迦元年爲公元 144 年則證據顯然不足。貝格拉姆即使被沙普爾一世毀於 242 年，亦不等於這一年便是 Vāsudeva 的末日。更何況，Vāsudeva 的統治未必結束於迦膩色迦紀元 98 年，銘文的發現有其偶然性，事實上也不見得 Vāsudeva 治期每年至少有一篇銘文問世。

其說誘人處還在於堅持迦膩色迦並未另創紀元，仍然沿用 Vikrama 紀元，這和其前任丘就卻、閻膏珍是一致的。但是，其說的弱點也在於此：迦膩色迦即位之年恰好是 Vikrama 紀元第三世紀第一年的可能性極小。由於迄今沒有可以指認爲屬於迦膩色迦的年代爲 Vikrama 紀元 199 年及其以前的銘文，實在難以首肯該王即位之年爲公元 144 年。當然，此說還有待與基本史料，特別是漢文和亞美尼亞文史料協調。

2. A. H. Dani 的公元 144 年說 [69]

古文書學的證據表明，西北次大陸的佉盧銘文可大別爲三組：

第一組是最早的紀年銘文，始自68年的Mansehra銘文，止於191年的Taxila銀瓶銘文。這一組又可細分爲A、B兩組。A組是最早的一組，自68年的Mansehra銘文直到113年，包括Kaldarra銘文，但Takht-i-Bahi銘文不在其內。B組是較晚的一組，年代爲122年以降，其中有若干提到Kuṣaṇa、Khuṣaṇa或Guṣaṇa這一名稱，還包括Takht-i-Bahi銘文。這一組銘文明顯地有別於那些更早的沒有年代的銘文，必定使用同一紀元。

第二組包括迦膩色迦組統治者的銘文，以及跟在這一系列銘文之後的銘文。這一組又可細分爲A、B兩組。A組包括11年的Zeda銘文、18年的Manikiala石銘文、40年的Shakardarra銘文、41年的Ārā銘文以及89年的Mamane Dheri基座銘文。A組刻在石上，刻畫清楚，形式古樸。B組包括11年的Sui Vihar銅板銘文，20年的Kurram casket銘文和51年的Wardak瓶銘。B組刻在金屬上，草體。B組書寫風格與新疆出土的佉盧文一致，雖然可以認出由於書寫工具和材料的改變而引起表面上的不同，但最明顯的事實仍然是書寫技巧的一致，以及新字母的使用所體現的語言方面的某種類似。

在迦膩色迦這一組貴霜統治者的時代，西北次大陸流行着兩種佉盧文書寫風格。(2) A是較老的傳統的繼承；(2) B是從中國西域輸入的風格，這可以從新字母的出現得到證明。這種輸入不是由於迦膩色迦組統治者來自中國西域（因而他們屬於不同於第一貴霜的支系），就是因爲他們在征服該地區後從彼處輸入了抄寫員。後一種可能性較小，因爲這種風格的變化從這種統治者最早的年代就開始出現了。因而，如果古文書學可信，必須認爲：迦膩色迦組統治

者的來臨引起了西北次大陸歷史和文化明確的變化。這一組紀年銘文的年代遲於前一組。

第三組的年代爲303年至399年。其中最重要的是303年的Charsadda銘文、318年的Loriya Tangai銘文、359年的Jamālgarhi銘文、384年的Hashtnagar銘文和399年的Skārah Dherī銘文。所有這些銘文都是私人記錄，僅Skārah Dherī銘文中提到“大王的村長、總督Avakhajhada”，其語言表面環境回到了迦膩色迦統治者以前，在風格上幾乎沒有受到文書的影響。事實上其傳承得自（2）A，而不帶文書的影響。可能是由於這一原因，較早的古文書學家試圖把這一組銘文斷在迦膩色迦之前。但是，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些銘文的字母形式中能見到清楚的發展形式。因此，這第三組銘文的年代一定晚於第二大組（迦膩色迦組）。老風格的恢復和老紀元的使用是一致的。在古文書學上，迦膩色迦組的銘文是闖入者，它來自塔里木盆地，這和迦膩色迦引進一個新紀元表明其權威是完全一致的。這一組的年代正落在200和303年之間——第一組的最晚年代和第三組的最早年代之間。根據這一分析，第一組和第三組所用紀元是同一個紀元。

通過以上的分析，在西北地區衹有一個紀元（不管其起源如何）一直使用到399年，而迦膩色迦組統治者的記錄給予的紀年系統在這個地區是一個闖入者，它至多持續了99年。這一闖入的紀年系列，連同隨之而來的見諸書寫風格的影響一起，被完全從這個地區驅逐了出去。在回答這兩個紀元始於何時這個問題時，必須明白：第一個紀元一直流行至馬土臘，正如99年的馬土臘銘文所證明的。而這一紀元可能也流行於西印度其他地區。

在婆羅謎文書法的發展過程中，馬土臘州長的銘文引進了一種新的風格。最好的例子便是 72 年的 Śoḍāsa 的馬土臘銘文。這篇銘文的書風和 Nahapāna 銘文的相類似，而有別於晚期 Āndhra 統治者的銘文。Nahapāna 的銘文和晚期 Āndhra 的銘文之間的差別並不表明 Nahapāna 的年代早於後者，因爲兩者代表不同的傳統。

古文書學的分析表明，Nahapāna 銘文的書風得自馬土臘州長的銘文，因而年代晚於後者。但 Nahapāna 銘文的年代爲 41 和 46，而 Śoḍāsa 的馬土臘銘文的年代是 72，這表明兩者的紀元並不是同一個。既然 Nahapāna 銘文採用塞種紀元，則其年代爲 119—124 年，Śoḍāsa 的年代在 119 年之前。同樣根據古文書學的分析，Nahapāna 銘文年代早於 199 年的一篇馬土臘銘文，也就是說該銘文的實際年代晚於公元 119 年。由於 72 年的 Śoḍāsa 的馬土臘銘文和 199 年的馬土臘銘文採用的是同一個紀元，則這一紀元的元年不可能早於公元前 80 年，也不可能遲於公元 47 年，不能不認爲這個紀元便是元年爲公元前 57 年的所謂 Vikrama 紀元。

迦膩色迦組統治者的婆羅謎銘文可以分爲兩組：A 組是在馬土臘及其附近發現的。B 組是在東部例如在薩爾那特、室羅伐悉底和憍賞彌附近發現的，特別是 Magha 統治者的銘文。兩組銘文的書風有着顯著的區別。B 組保持着見諸馬土臘州長銘文的風格，雖然也能見到若干新的影響，而 A 組突然引進一種新的書風，這種趨勢令人想起見諸中國西域佉盧文書的書風，這種風格也見諸西北地區佉盧銘文（2）B 組。由此可見，迦膩色迦組貴霜統治在佉盧文和婆羅謎銘文的書風中都引進了一種新的風格。這種貴霜風格顯然晚於 199 年的馬土臘銘文。蓋後者不見這種風格之端倪。因此，如果

老系列始於公元前 57 年，則迦膩色迦組的插入應在 199 年即公元 142 年之後。

他們的年代系列延續至他們在馬土臘統治結束。而且這一年代很可能在薩爾那特被 Aśvaghoṣa 採用，Aśvaghoṣa 的銘文年代爲 40。也可能被憍賞彌的 Magha 諸王採用，他們的銘文紀年在 52 和 139 年之間。這些形式又必須追溯至手稿書法所見的同一種趨勢。這同一風格也見於 14 年的迦膩色迦銘文，它必須追溯至同一趨勢，並被視作一種來自 Kauśāmbī 的地區影響。沒有必要像 Lohuizen 那樣把這篇銘文說成 144 年。沒有證據表明後期貴霜人在馬土臘超過 99 年。Lohuizen 的某些年代省略了第一位數之说不能同意，她的古文書學分析是經不起檢驗的。

Nahapāna 和後期貴霜銘文書法風格的清晰對照，明確地表示塞種政權在古吉拉特和馬爾瓦的擴張並不能歸因於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如果 Nahapāna 效忠於迦膩色迦，那末在 Nahapāna 銘文中應有某些貴霜風格的影響。事實上看不到這種影響，甚至晚期西部州長的銘文的書法也看不到這種影響。甚至在整個北印度已受貴霜風格影響之時，古吉拉特和馬爾瓦依然繼續老風格。因此，迦膩色迦不可能是塞種紀元的創建者。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必定比公元 78 年晚得多，甚至晚於 199 年的馬土臘銘文。馬土臘從公元 78 年進入貴霜人的勢力範圍，先是 Kadphises 組，後來是迦膩色迦組。可是，貴霜在印度較晚的年代無妨他們在中亞較早的歷史，那必須取決於那裏的證據。印度證據是與貴霜的較晚的年代相一致的。接受這一推算廓清了其他不必要的混亂，進一步說明了笈多帝國從俱賞彌的 Magha 統治者那裏學會了他們的書法，而紀元的思想及錢幣的類型

都來自後貴霜。

今案：此說的問題在於

（1）無法證明迦膩色迦組統治者來自中國新疆地區，有別於之前的貴霜統治者。新發現的銘文可以證明他們是一脈相承的。

（2）書風的轉變衹能有助於大致年代的推斷，不可能精確到具體的年份。

（3）儘管說者不承認其銘文省略百位數之說，但衹要指迦膩色迦紀元之元年爲公元 144 年，實際上等於承認迦膩色迦和其前任一樣，還是採用了超日紀元。這不免自相矛盾。

3. P. L. Gupta 的公元 144 年說 [70]

迦膩色迦組貴霜統治的 100 年無疑在孔雀王朝衰落（約公元前 215 年）之後，而在笈多王朝興起（約公元 315 年）之前。

貴霜王國的心臟部分諸多遺址發現的錢幣表明，在馬土臘、俱賞彌、Ayodhyā 和 Ahicchatrā 孔雀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四個邦國，而這四個邦國都有一個長而太平的統治期。因此，貴霜在上述四個地區的統治必定在這四個邦國的統治之後。貴霜很可能促使了這四個邦國的衰落。

在馬土臘及其鄰近地區出土的土著統治者錢幣表明，孔雀王朝衰落後，在馬土臘興起的王國有不下二十位統治者：Gomitra、Sūryamitra、Brahmamitra、Dhruvamitra……有關錢幣學的分析表明，這二十位統治者相繼統治馬土臘，並無中斷。如果假定每位統治者有 18 年的在位時間，他們的治期就有 360 年。Gomitra 錢銘的書法表明它們是這個王國最早的錢幣，其時間接近公元前三世紀末。

如果馬土臘王國興起於公元前 215 年，緊接在孔雀王朝衰落之後，那末這二十位統治者至少統治到公元 145 年，這是貴霜人可能統治馬土臘的最早年代。

在憍賞彌——古代 Vatsa 的都城，發現了一個有迦膩色迦早年紀年銘文的佛像。這些銘文表明了貴霜對該地的統治。憍賞彌出土的錢幣表明，孔雀王朝以後，最早統治該地的是 Mitra 王朝（統治者的名字以 Mitra 結尾）。在出土 Mitra 統治者錢幣的地層中也出土了貴霜的錢幣，但似乎僅出現在最早的地層中。

在憍賞彌發現了不少於 19 位前 Magha 時期的 Mitra 統治者的錢幣。這些統治者是：Vavaghoṣa、Aśvaghoṣa、Paravata、Indradeva、Sudeva……此外，還從銘文中知道另一位 Mitra 統治者 Śivamitra。不妨認爲，這二十位統治者統治憍賞彌 360 年左右。

古文書學的證據表明，Vavaghoṣa 和 Aśvaghoṣa 的錢幣是其中最早的，可以置於公元前三世紀的後期。如果該王朝緊接着孔雀王朝在前 215 年興起，那末這 20 位統治者一直統治到公元 145 年。此後興起的是 Magha 王朝。這表明同時發現 Magha 統治者和貴霜統治者錢幣的地層年代是公元 145 年。

迄今知道的 Magha 統治者共有 11 位：Bhadramagha、Vaiśravaṇa……他們一共統治 198 年。發掘表明，此後是 Gaṇapati Nāga，即沙摩陀羅笈多，在 350 年左右擴張時征服的統治者之一。因此，不妨認爲 Magha 統治者對憍賞彌的統治約開始於公元 152 年。而憍賞彌的貴霜錢幣的年代可大致斷在公元 145—152 年之間。

在 Śrāvastī，和在俱賞彌一樣，發現一尊佛像有迦膩色迦早期的紀年銘文，這似乎表明貴霜對 Kosala 地區的影響。在 Kosala 及其

附近地區發現了若干銅幣的窖藏，其中包括 Ayodhyā 土著統治者以及貴霜的銅幣。在這些窖藏中，總是幾乎沒有 Kosala 錢幣，這表明在 Kosala 土著統治者之後便是貴霜人。

屬於十五位當地統治者的錢幣已在阿逾陀發現，這十五位統治者是 Mūladeva、Vāyudeva、Viśākhadeva、Dhanadeva、Pāthadeva、Śivadatta、Naradatta……

在阿逾陀發現的一篇銘文中提到一個國王 Dhanadeva（很可能就是錢幣所見 Dhanadeva），Phalgudeva 之子。他聲稱從總司令 Puṣyamitra 算起是“第六”，後者是阿逾陀王，進行過二次馬祭。據《大疏》和《摩羅維迦和火友王》，senāpati（總司令）是 Puṣyamitra Śuṅga 的稱號。因此，銘文提到的 Puṣyamitra 無疑是 Puṣyamitra Śuṅga。既然 Dhanadeva 之名並未出現在往世書的 Śuṅgas 表中，似乎他僅僅是該王朝的某一旁支。如果銘文中“第六”一詞意指“第六代”，這可以認爲他在 Dhanadeva 之前五代，他的家族與 Śuṅga 王族有某種關係。據《戒日王傳》，Mūladeva（可能就是錢幣所見 Mūladeva）殺死了 Sumitra（Vasumitra），Agnimitra 之子。所有這一切表明阿逾陀的 Śuṅga 領土是被 Mūladeva 在約公元前 130 年侵佔的。

約公元前 130 年以降，阿逾陀 16 位統治者（包括 Phalgudeva，他的錢幣沒有發現）統治約 188 年，也就是直到公元 158 年左右。貴霜人衹可能在這個年代以後到達喬薩羅。

般遮羅王國及其都城 Ahicchatrā 亦興起於孔雀王朝以後，從其錢幣可以得知至少有 21 位統治者連續不斷地統治。這些統治者是 Rudradāman、Jayagupta……

雖然古文書學的證據似乎表明沒有錢幣早於公元前 200 年，仍不妨假定般遮羅王國興起於公元前 215 年（孔雀帝國衰落之年）稍前。這 21 位統治者統治 378 年，直到公元 163 年左右。

Ahicchatrā 的錢幣出土情況還表明當地統治者之後便是貴霜人。貴霜之後便是公元 350 年被沙摩陀羅笈多征服的 Acyuta。Acyuta 之前是貴霜和仿貴霜錢幣。一般相信貴霜之後仿貴霜錢幣在印度流行約一個世紀。這意味着貴霜開始於公元 350 年以前約 200 年，即公元 150 年左右，這說明貴霜錢幣也許出現在 163 年稍前，即公元 150 年左右。

綜上所述，貴霜進入恒河－耶木那河流域的近似年代，根據馬土臘的資料是公元 145 年，根據憍賞彌的資料是 145—152 年，根據阿逾陀的資料是 158 年，根據 Ahicchatrā 的資料是 150—163 年。這些年代雖不精確，但清楚地表明不可能早於公元二世紀中葉。因而 Ghirshman 的 144 年的結論是可取的。

今案：有關年代的推算大致是可信的，足以證明迦膩色迦的治期開始於公元二世紀上半葉，祇是難以落實爲 144 年。

4. E. G. Pulleyblank 的公元 144 年說 [71]

（1）《後漢書・西域傳》不載迦膩色迦，表明他不可能即位於公元 125 年以前。

（2）《後漢書・西域傳》斥《漢書・西域傳》關於五翎侯記載有誤，以爲高附不在五翎侯數內，直至丘就卻破安息，月氏始得高附。事實上，《漢書・西域傳》關於五翎侯的一段是在《漢書・西域傳》完成之後纔加到“大月氏條”中去的。有關情報乃於公元 74—75 年

得諸班超，時丘就卻尚未一統其餘四翎侯，但已南向擴張其勢力至喀布爾。證據是傳文所載五翎侯的位置不像其餘諸國那樣用去長安的里數表示，而是用去陽關和去都護的距離來表示，同傳類似的里數標誌法也見諸康居五小王和縣度。也有理由認為這兩處是公元一世紀後半加進去的。由此可知迦膩色迦實無可能即位於公元78年。

（3）有關迦膩色迦和于闐關係、該王曾征服中國西陲的傳說，以及羅布淖爾地區在公元三世紀時使用佉盧文作爲官方語言的事實，均爲貴霜勢力曾進入塔里木盆地提供了有力的旁證。尤其是佉盧文（以及使用佉盧文書寫的印度西北俗語）被鄯善地區用來處理行政事務，表明該地區可能確實有一段時期被貴霜佔領。甚至可以設想，在貴霜勢力撤出之後，鄯善王國的行政管理由貴霜職員操縱。與佉盧文書一起出土的漢語文書中提到"支"姓戰士，也說明可能有貴霜軍事人員留在該地區。

斯坦因在和闐發現的貴霜錢幣僅爲迦膩色迦和Huviṣka的銅幣，這也表明和闐曾被貴霜統治過，因爲銅幣在流通過程中遠不如金銀幣方便。

中國史籍對貴霜佔領西域保持沈默，有關的記載也表明公元175年之前貴霜似乎沒有可能佔領塔里木盆地。此後，由於黃巾起義，中國人自顧不暇，以致公元184年以降沒有留下關於西域的記錄。因此，如果貴霜確曾佔領過塔里木盆地，最可能在公元175—202年這一段中國史料對西域事情保持沈默的時期之內。正是在這段時期，有月氏佛教僧侶到達中國的消息第一次見諸記載。

再者，公元184年在甘肅和青海爆發了一次嚴重的小月氏叛亂，直到公元221年纔完全平定。其原因中國史籍並無明確記載。如果

考慮到貴霜勢力可能在這時對塔里木盆地入侵，則這種入侵可能導致其遠親起兵。

已知迦膩色迦最後一個紀年銘文的年代是 41 年，如果迦膩色迦即位於 144 年，則其實際年代爲公元 184 年。如果他在這十年或此後不久去世，則他在一生中的最後幾年（即公元 175 年以後某時）還有時間入侵塔里木盆地。至於于闐在公元 202 年朝漢不妨認爲是通知于闐恢復獨立，這就可以解釋爲何衹有迦膩色迦和 Huviṣka 的銅幣在于闐發現，而沒有 Huviṣka 以後貴霜統治者的錢幣在那裏發現。

(4) 如果接受公元 144 年說，公元 230 年朝魏的波調應該是 Vāsudeva。這和銘文所見 Vāsudeva 的年代是一致的——迦膩色迦紀元的 61—98 年，即公元 204—241 年。再者，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實際存在 Vāsudeva 二世或三世。那些被歸屬於 Vāsudeva 二世或三世的錢幣，很可能衹是 Vāsudeva 錢幣的拙劣仿製品。

要之，將迦膩色迦插入丘就卻和閻膏珍與大貴霜的繼承者之間，將迦膩色迦紀元與已知的元年爲公元前 58 年的 Vikrama 紀元勘同，完成了一個巨大的簡化過程。由此形成的假說不僅毫無困難地適合全部中國證據，而且也是唯一能做到這一點的假說。它似乎也符合錢幣學的和古文書學的證據。

今案：此說多有未安。

(1)《漢書·西域傳》關於五翖侯之記載絕無可能得自班超。質言之，不能以此證明迦膩色迦不可能即位於公元 78 年。說者對《漢書》和《後漢書》關於翖侯記載矛盾之解釋不足取。有關里數標誌的解釋也十分牽強，均不可從。

（2）貴霜僧侶入華時期爲靈帝時期（168—189年）。當時中亞居民，不僅貴霜人，還包括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天竺人，陸續不斷地移居中國境內。他們來華的路綫分海、陸兩道。取海道者經印度航海來到交趾，一些人留居交趾，一些人繼續北上，到達洛陽。由此可見，貴霜僧侶之入華，與貴霜當時是否佔領了塔里木盆地並無直接關係。

（3）年代爲41年的Ārā銘文提到的迦膩色迦，顯然不是迦膩色迦一世。已知屬於迦膩色迦紀年的銘文最晚年代是23年，但他很可能在位27年，因爲已知Huviṣka紀年銘文最早的年代爲28年。迦膩色迦果如說者所言，於公元144年即位，則他的在位時期爲公元144—170年。公元175年之後入侵塔里木盆地云云，無從談起。

（4）迦膩色迦可能在位的時期內，東漢的勢力雖未完全退出塔里木盆地，但已成強弩之末。如果說迦膩色迦確如玄奘所載，曾一度“治兵廣地，至葱嶺東”，以至“河西蕃維，畏威送質”，則應該發生在順帝以後。雖然中國史籍隻字未及貴霜在這段時期對塔里木盆地的佔領，相反有不少文獻和實物的證據表明，漢對西域的統治至少維持到靈帝後期。但是，必須看到，順帝以後，漢對西域的影響日益減弱，而國力正處於上升時期的貴霜，將其勢力伸向塔里木盆地是完全可能的。中國史料對此保持沈默，並不等於事情沒有發生。何況，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國因積威所在，對漢繼續稱臣，同時又役屬貴霜也是完全可能的。所謂“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原是西域綠洲小國一貫的立國之道。有關這一時期的記載十分短缺，默證的作用就顯得薄弱。客觀上，貴霜勢力完全可能在迦膩色迦在位時期一度入侵塔里木盆地。衹有如此假設，纔能解釋佉盧

文書、于闐馬錢和新疆發現的貴霜銅幣等等。

（5）如前所述，公元 144 年說和 Vikrama 紀元的聯繫是該說最有魅力的地方，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裏。指 Vikrama 紀元 301 年爲迦膩色迦即位元年似乎過於巧合。

（二）對公元 144 年說的異見

1. B. Kumar 對公元 144 年說的批評 [72]

（1）Ghirshman 未能使泰伯里的記載和 Kaba-i-Zardusht 銘文相協調——究竟是 Ardashir 一世還是沙普爾一世摧毀了貴霜。

今案：這正是 Ghirshman 說疏漏處。

（2）貝格拉姆和其他貴霜遺址的發掘情況僅表明這些地區是在 Vāsudeva 一世末年被放棄的，並不表明他們是被沙普爾一世摧毀的，也不能證明 Vāsudeva 是在公元 241 年被沙普爾一世趕下臺的。Mashall 根據 Taxila 的發掘情況，力主貴霜王朝是被 Ardashir 一世推翻的；Schlumberger 則在考察 Surkh Kotal 的貴霜神殿後，指出該建築是由 Ardashir 一世在 Huviṣka 治期結束時被毀的。

今案：遺址的證據孤立起來就顯得非常單薄。

（3）沒有證據表明迦膩色迦遠征帕提亞一事發生在 Vologases 治期，而可能是在 Pacorus 在位之時，蓋後者的治期並不太平。

雖然“波調”和 Vehsadjan 無疑是 Vāsudeva 的異譯，且薩珊諸王曾征服了原在貴霜治下的領土。但是，錢幣學的證據也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Vāsudeva 一世死後，貴霜統治者繼續統治了喀布爾河谷很久，發行自己的錢幣，其中若干刻有 Vāsudeva 的名字。既然

Ghirshman 承認 Vāsudeva 二世和三世的存在，就沒有理由認爲沙普爾一世征服白沙瓦意味着是 Vāsudeva 一世、而不是 Vāsudeva 二世統治之結束。因此，公元 230 年遣使曹魏，227 年與 Ardashir 鬬爭的也許是 Vāsudeva 二世而非一世。

今案：波調不可能是 Vāsudeva 二世，說見前文。

（4）銘文紀年省略百位數之說已被不同的學者用來支持不同的年代說，不足憑信。

（5）迦膩色迦紀元 11 年的 Sui Vihāra 銘文清楚地表明當時印度河下游的 Bahawalpur 地區包括在他的領土之中。而如果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144 年，其年代爲公元 155 年。另外，在閻膏珍時期，Gujarat（Saurashtra）已經在貴霜控制之下。而 Rudradāman 的 Junagarh 銘文清楚地表明，他作爲事實上獨立的統治者在公元 150 年統治着 Saurashtra 和 Sauvira，並完全征服了尤德亞人（Yaudheyas）。Sauvira 包括印度河沿河地區，Multan 周圍，而尤德亞人居住在 Bahawalpur 附近的 Rajasthan。如果迦膩色迦在 144 年即位，Rudradāman 是不可能宣稱佔領上述各地的。

今案：其說未諦，說見前文。

（6）Ghirshman 認爲，Rudradāman 應視作貴霜諸王的藩臣，他謙卑的稱號 rājā mahākṣatrapa 說明了這一點。但是 Ghirshman 並沒有解釋爲什麼 Rudradāman 能發行自己的錢幣，使用自己的紀元，而且自傲地宣稱征服了貴霜疆域內各地。Rudradāman 的繼承人使用了同樣謙卑的稱號，但他們無疑擁有主權。顯然迦膩色迦和 Rudradāman 不可能是同時代人。

今案：此說未必然。Rudradāman 使用自己的紀元、發行自己

的錢幣，并不足以否認他與迦膩色迦同時代。這與使用謙卑的稱號並無矛盾之處。

（7）沒有一個著名的紀元之元年始於公元二世紀，但銘文證據表明迦膩色迦確實開創了一個紀元，且由他的繼承者連續使用，祇能是後來“塞種”紀元。

今案：此說未安，說見前文。

（8）Ghirshman 認爲，迦膩色迦紀元 41 年的 Ārā 銘文提到迦膩色迦僅僅表明該銘文用來紀年的紀元是由迦膩色迦創建的，而迦膩色迦本人在當時已經不在人世。這一假說不能成立，因爲銘文所見捐贈者不可能不怕麻煩把完整的皇帝稱號賦予一位去世的王，而且加上一個當時僅此一見的稱號 Kaisar，也不可能提到迦膩色迦父親之名，而不提在位國王的名號。毫無疑義，Ārā 銘文的迦膩色迦是迦膩色迦二世，於公元 119 年統治着貴霜帝國西北部。

今案：Ārā 銘文中的迦膩色迦是迦膩色迦二世，但銘文的絕對年代不是公元 119 年。

（9）據 S. Konow，祇有以公元 128—129 年，而不是公元 144 年爲迦膩色迦即位之年，纔能符合 11 年的 Zeda 銘文和 61 年的 Und 所提供的天文學資料。

今案：此說未安，說見前文。

2. A. K. Narain 對公元 144 年說的批評 [73]

（1）Girshman 的公元 144 年說和中國史籍有關月氏早期活動以及丘就卻崛起的記載無法協調一致，因爲找不到一位統治者填補閻膏珍和迦膩色迦之間一段很長的間隙，有人試圖將 Soter Megas

的錢幣來填補這段空隙，但並不成功。錢幣學的研究表明，Soter Megas 不是和閻膏珍同時代，便是早於閻膏珍，幾乎不可能在閻膏珍之後。如果 Soter Megas 與閻膏珍同時代，則間隙依舊存在；如果早於閻膏珍，那末他不是與丘就卻同時代，就是在丘就卻與閻膏珍之間；由於沒有蹟像表明他介乎丘就卻與閻膏珍之間，Soter Megas 衹能是丘就卻本人，這顯然不利於 Girshman 說成立。

今案：此說未安。由於新銘文的發現，這已經不是問題。[74]

（2）Ghirshman 將貴霜諸王歸入三個王朝並無正當理由，沒有支援這一方案的證據。而 Ghirshman 發表的銀十德拉克瑪，其正面爲閻膏珍之名，反面有迦膩色迦之名；閻膏珍的雕像發現於 Māt，而那裏也有迦膩色迦的雕像；都說明了同樣的問題。至於說 Vāsudeva 屬於一個不同於 Vāsudeva 二世的家族，則與歷史時期中慣用的命名法是相抵觸的。錢幣學的證據清楚地反對任何將貴霜諸王分屬三個王朝的做法。

今案：其說甚是。

（3）貴霜在西部的政權究竟是在 Ardeshir 還是在沙普爾一世時代被摧毀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即使摧毀貴霜西部政權的是沙普爾一世，事實依然是 Kaba-i-Zardusht 銘文並沒有提到導致貴霜併入薩珊的這一次戰爭發生的日期。銘文甚至並沒有提到征服貴霜領土的是沙普爾一世，僅僅說沙普爾一世的領土中包括了貴霜帝國的一部分，這既可能是 Ardeshir，也可能是沙普爾一次征服的結果，這次征服可能發生在公元 223 和 262 年之間。

今案：此說甚是。

（4）貝格拉姆 II 的年代是建築在兩個尚未證實的假說基礎之上

的。其一是貝格拉姆 II 毀於 Vāsudeva 一世時代，因爲據說發現了 8 枚屬於 Vāsudeva 一世的保存很差的錢幣。其二是這次毀滅發生在沙普爾一世即位（公元 241 年）和他向羅馬進軍之間的某時。

這兩個假說被重重困難包圍。據 Ghirshman，貝格拉姆 III 出土了 Vāsudeva 一世以後貴霜諸王的錢幣。在貴霜王國被征服之後，原貴霜王朝的若干成員繼續統治並發行錢幣是難以想像的。他們的錢幣，無論在風格、主題和銘文上都沒有絲毫蹟像表明他們役屬於薩珊。而且最後的 Vāsudeva 和非 Vāsudeva 一世的錢幣被用作所謂貴霜－薩珊錢幣的模型。所謂貴霜－薩珊（Kuṣāṇo-Sassanian）錢幣是在貴霜帝國被征服和并入薩珊以後、由統治原來貴霜領土的新的統治者頒行的。這些統治者均由薩珊王任命，他們有波斯名字和 Kuṣāṇśāh 和 Kuṣāṇaśāhānuśāhī 的稱號。這意味着沙普爾一世或 Ardeshir 摧毀貴霜這一事件一定發生在 Vāsudeva 一世以後至少二代人的時間。Ghirshman 從未發表那 8 枚保存得很差的 Vāsudeva 的錢幣，以致無法作進一步鑒定。考慮到以 Vāsudeva 名義打鑄的錢幣大不相同，進一步鑒定顯然是必要的。再者，很難同意貝格拉姆 II 的火災是沙普爾一世發動的戰爭引起的。Ghirshman 在貝格拉姆 II 或 II 和 III 之間任何一個中間層中都沒有找到沙普爾一世或任何其他薩珊王的錢幣。而在 Begrām III 發現的迦膩色迦三世和 Vāsudeva 二世的錢幣，似乎表明該城繼續由貴霜人統治，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反證。確實有一層薄薄的灰燼將貝格拉姆 II 和貝格拉姆 III 隔開，這表明曾經發生過火災，但沒有足夠的證據推斷這場火災是由戰爭引起的。Ghirshman 有關貝格拉姆發掘記錄中沒有關於戰爭的清楚蹟像。沒有理由認爲 Vāsudeva 以後有一個新的貴霜王朝建

立。同樣，也沒有根據認爲貝格拉姆 III 毀於一場入侵者的佔領引起的火災。火災更可能是其他事件引起的。畢竟貝格拉姆被發掘的衹是一個小區域，且衹找到 8 枚保存得很差的 Vāsudeva 一世的錢幣。

今案：這是實物證據的局限性。

（5）佛教傳說中提到迦膩色迦與安息的戰爭。如果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144 年，他便是 Vologases 二世的同時代人。Vologases 二世治世的早期，使 Arsacid 復興，並在西方戰勝了羅馬，迦膩色迦不可能戰勝 Vologases。

今案：此說未安。一則傳說不可盡信。二則 Vologases 在西方取得之成功未必能在東方複製。

3. A. Maricq 對 Ghirshman144 年說的批判 [75]

據 Ghirshman，貝格拉姆 II 城在某時毀於一場戰火。此後，在廢墟上建立了一個新城（貝格拉姆 III）。在貝格拉姆 II 中，J. Hackin 曾發現一個窖藏，藏品的年代估計從公元一世紀至四世紀。而在與這一窖藏相同的考古層中發現的年代最晚的錢幣是 Vāsudeva 一世的，其年代一般認爲是公元 200—230 年。而薩珊王沙普爾一世的 Naqsh-i Rustam 銘文提到沙普爾一世在對貴霜作戰中征服諸郡的名稱。由此可見，貝格拉姆 II 是沙普爾一世在公元 241 和 250 年間征服的，Vāsudeva 一世的統治於是結束。Vāsudeva 一世最晚的銘文是迦膩色迦紀元的 98 年；因此，這一紀元的元年應在公元 143 年和 152 年之間。而據 Bhandarkar，貴霜人使用迦膩色迦紀元的一個世紀是某一紀元的第三世紀。該紀元一直使用至第 220 年，然後在第四世紀又被使用。如果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落在公元 143 和 152

年之間，且應爲老紀元的 201 年，則老紀元的元年應在公元前 58 年和公元前 49 年之間，老紀元應即所謂 Vikrama 紀元無疑。

但是，沙普爾一世的 Naqsh-i Rustam 銘文並沒有提到他曾發動對貴霜的戰爭，因而指貝格拉姆毀於沙普爾一世之手並無資料依據。

Ghirshman 又認爲，上述銘文所列 Ardashir 一世的顯貴表，表中提到一位 Margiana 王、一位 Carmania 和一位塞種王。這清楚地表明 Ardashir 征服了 Margiana、Carmania 和塞斯坦（郡名表第 17、20 和 21），而沒有征服排列在塞斯坦以後的諸郡，即 Turan、Mukran、Paradan、Sind 和“貴霜人之地”（直到 Paškibur、Kashgar、Sogdiana 和塔什幹的邊境）——郡名表第 22 至 26，Turan 以下均係沙普爾一世所征服。各郡在表上臚列的次序表明了波斯軍隊進軍的路綫，貝格拉姆正在這條路綫上。

但是，同一篇銘文中所見沙普爾一世的顯貴表及家族人員表同樣沒有提到 Turan 以下諸郡，按照 Ghirshman 的邏輯，豈不是也表明 Turan 以下諸郡不是沙普爾一世所征服的？沙普爾一世時代，塞種王是其子 Narses，因而當時塞種王是 Sind、塞斯坦、Turan 之王，而在 Ardashir 時代，塞種王肯定沒有統治 Turan。但是，這一差別未必表明 Turan 是沙普爾一世征服的。至於郡名表所列諸郡的次序，除 Persis 和 Parthia 兩郡列在表首外，其餘大致按照其實際地理位置臚列，亦似乎不能據以指實沙普爾一世進軍貴霜的路綫。

另外，進一步的鑒定表明，J. Hackin 發現的窖藏品實際年代應爲公元 50—75 年，而不是最初估計的公元一世紀至三世紀乃至四世紀。既然全部窖藏品的年代不晚於公元一世紀，就很難認爲這些物品會收藏於公元三世紀。較合理的看法應該是隱藏地點約築成於公

元一世紀末，而貝格拉姆被毀於公元一世紀末而不是三世紀中，其毀滅與沙普爾一世可能發動的戰爭無關。

Ghirshman 在珍寶室的外面找到 8 枚 Vāsudeva 一世的錢幣。但它們被發現的一切細節都不知道，它們究竟是屬於貝格拉姆 II 還是 III 是有疑問的。既然窖藏品的製造年代是公元 50—75 年，加上若干不可知因素，例如製造和發送之間的延誤、旅途花費的時間以及它們在城市毀滅之前留在貝格拉姆的時間等等，將貝格拉姆 II 毀滅的時間定於公元 141 年以後是比較合理的。這就是說，該城毀於 Vāsudeva 一世即位之初，而非即位之末。而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爲公元 78 年。

此外，Ghirshman 認爲，除貝格拉姆外，還有 5 個遺址可以認爲是薩珊進攻貴霜期間被毀的。其中，Surkh Kotal（Baghlān）毀於 Ardashir，其餘則毀於沙普爾一世之手。

（1）撒馬爾罕附近的 Tali Barzu 遺址。Ghirshman 所據乃 Grigoriev 的年代說，但 Grigoriev 的年代說已由 Ternozhkin 作了相當大的修正，Tali Bazu IV 的年代其實屬嚈噠時期，而 Tali Barzu V 的年代爲公元 6—8 世紀。Ghirshman 認爲它們分別與貝格拉姆 I 和 III 相當，非是。

（2）Airtam-Termez。Ghirshman 指出，標誌着該城被棄的地層中發現年代最晚的錢幣是 Vāsudeva 一世的。但據 Masson 的報告，該城自 Vāsudeva 一世以降從未被放棄過，故不應在放棄之列。

（3）Kalai-Mir。

（4）Key-Kobad-Shah（Kobadian）。

1950 和 1953 年對 Kalai-Mir 和 Key-Kobad-Shah 的發掘表明，

前一世紀以降，居民區縮小，可能僅僅是由於居民的遷徙，但不清楚是否是由於一支軍隊引起的破壞。

總之，事實並不如 Ghirshman 所說，有一支薩珊軍隊在沙普爾一世率領下毀滅了以上 4 座城市。

今案：說者對 Ghirshman 的批判不無是處，衹是由於站在公元 78 年說的立場上，看不到 Ghirshman 說的合理內核。結合其他證據，Ardashir 一世在 Vasudeva 一世治期進攻貴霜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三）其他公元二世紀說

除公元 144 年說外，還有其他各種公元二世紀說，擇要介紹如下。

1. J. Harmatt 的公元 135 年說 [76]

薩珊對貴霜的入侵十之八九發生在 Vāsudeva 二世即位之初，確切地說是在老塞種紀元 299 年。這應該就是 Surkh Kotal 銘文沒有完工的原因。薩珊軍隊毀壞了 Surkh Kotal 聖地，打斷了銘文的鐫刻。

Ardaχšahr 對東伊朗的戰爭發生在兩次羅馬戰爭之間，亦即公元 232 年與 238 年之間。而他對 Bactria 的戰爭必定發生在 233 年。結合 Surkh Kotal 未完成銘文，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該銘文的鐫刻始於 Vāsudeva 二世之元年，但這一工作被薩珊波斯的進攻打斷。薩珊軍隊毀壞了 Surkh Kotal 聖地。既然薩珊的入侵發生於 233 年，無疑老塞種紀元的 299 年相當於公元 233 年。於是就有了一個關於老塞種紀元、迦膩色迦紀元以及貴霜統治者絕對年代的堅實基礎。

具體而言，老塞種紀元 299 年始於公元 232 年 10 月終於 233 年 10 月。由此可以推斷迦膩色迦紀元始於公元 134/135 年，而老塞種紀元始於公元前 67/66 年。

據此，Vāsudeva 一世可能死於公元 232 年秋季之前，而 Vāsudeva 二世可能就在這一年即位，自公元 232 年 10 月他再次引進老塞種紀元。這一歷史事件的重構和漢文史料的記載完全一致。

據《魏略》，魏明帝（公元 227—239 年）時，貴霜帝國包括以下地區：Kashmir、Bactria、Kabul 和印度。這清楚地表明，公元 230 年，貴霜帝國並沒有失去 Bactria，也就是說其時 Ardaχšahr 的進攻尚未發生。這則有關貴霜帝國疆域信息的來源，顯然就是貴霜使團。這使團便是《三國志》所載公元 230 年 1 月 5 日，由波調（大月氏王）派遣的使團。“波調”應該就是 Vāsudeva 一世。貴霜統治者此時遣使朝魏很可能與受到 Ardaχšahr 的威脅有關。

貴霜使團被派遣到曹魏表明 Ardaχšahr 對貴霜帝國發動戰爭的年代是公元 233 年。可是，這時的貴霜統治者已經不是 Vāsudeva 一世，而是剛即位的 Vāsudeva 二世了。如果考察一下 Parthia 和薩珊統治者發動戰爭的日期，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情況：他們喜歡乘被入侵的國家王位變動或內部擾亂的時機發動侵略：羅馬帝國被攻擊便是在王位更易之際。很可能 Ardaχšahr 也乘貴霜王位更易之際發動入侵。

今案：此說雖有若干難以落實的地方，但不失爲公元二世紀說的一個有力支柱，儘管涉及的若干具體年代，譬如老塞種紀元之元年等，難以一一指實。

2. F. R. Allchin 的公元二世紀說[77]

說者重新檢查了 Marshall 在 Taxila 有關錢幣的發掘結果，試圖建立錢幣次序和建築時期的對應關係。他分析了 Bhir 土墩、Sirkap 和 Sirsukh 以及 Dharmarajika 萃堵波周圍的發掘成果，得出結論：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在公元二世紀。

據云：Manikyala 大塔中發現被迦膩色迦 18 年石板銘文覆蓋的佛骨盒（relic chamber）是最初入藏的，其年代與萃堵波相同。其中有迦膩色迦和 Huviṣka 的若干銅幣和一枚金幣。這表明它們的入藏時間在迦膩色迦在位的晚期，其時 Huviṣka 作爲嗣子已開始以自己的名義發行錢幣。而在 Ahin Posh 萃堵波中出土 10 枚閻膏珍、6 枚迦膩色迦和 1 枚 Huviṣka 的錢幣。同時入藏的還有 Trajan、Domitian 和 Sabina 的錢幣。由於閻膏珍的錢幣業已磨損，Huviṣka 的一枚是新造的，可見這些錢幣入藏於迦膩色迦在位期間。既然迦膩色迦在位第 18 年時，Huviṣka 已經以自己名義發行錢幣，則不妨認爲這些錢幣入藏於迦膩色迦在位第 18—23 年。既然 Sabina 的金幣打鑄於公元 128—136 年間，則迦膩色迦紀元的 18—23 年相當於公元 128—136 年，加上 Sabina 錢幣流入印度所需 10—25 年，可見迦膩色迦即位之年應落在 115—143 年。這一年不可能早於 105 年，最可能在 130—140 年間。

今案：此說與其他證據不悖，不失爲迦膩色迦元年在公元二世紀的證據。既然所藏 Sabina 金幣流入印度的時間不可能準確，則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144 年左右亦是完全可能的。又，說者因一枚 Augustus 的銀幣與一枚 Azilises 的銀幣同時出土於 Dharmarajika

萃堵波Ⅳ之中，而指二者同時，則不妥，因與其他證據不符。蓋不能排除 Azilises 錢幣直至 Augustus 錢幣流入印度時尚未於流通中絕迹的可能性。

3. R. Göbl 的公元二世紀說 [78]

錢幣學的證據表明，貴霜錢幣多以羅馬帝國錢幣爲原型。其中閻膏珍、迦膩色迦和 Huviṣka 的錢幣分别以 Trajan（公元 98—117 年）、Hadrian（公元 117—138 年）和 Antonius Pius（公元 138—161 年）的錢幣爲原型。考慮到羅馬帝國的錢幣自羅馬或亞歷山大流入印度且成爲原型需要一段時間，以上對應關係表明閻膏珍的在位時間相當於 Trajan 之末，且跨入 Hadrian 時代，迦膩色迦的在位時期大致相當於 Hadrian 之末，且已跨入 Antobius Pius 時代，而 Huviṣka 的在位時間大致相當於 Antonius Pius 之末，並跨入 Marcus（公元 161—180 年）和 Severus（公元 193—211 年）家族早期成員統治時代。由此可見，迦膩色迦的年代應以 J. Marshall 和 R. Ghirshman 所說爲是。

Vāsudeva 二世的錢幣可以與一世的區别開來，他的錢幣領先於薩珊波斯王 Hormizd 二世（公元 302—309 年）。如果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78 年，Vāsudeva 的治期結束於公元 176 年，則 Vāsudeva 二世的錢幣應該屬於從公元 176 年至 Hormizd 二世這 130 年的時期。果然，則錢幣一定在一個以上國王的統治期間流通。這與已經到手的錢幣數量是矛盾的。而如果定迦膩色迦的元年爲公元 144 年，Vāsudeva 一世的治期結束於公元 242 年，則 Vāsudeva 二世的錢幣應屬於公元 242 年至 Hormizd 二世的治期約 60 年的時間内，符合衹有一個貴霜統治

者的情況，且沙普爾一世的對手就會是 Vāsudeva 一世。

今案：錢幣風格雖不能作爲判斷年代的絕對證據，但精確、全面的比較研究無疑有助於迦膩色迦年代的推斷。

4. D. W. MacDowall 的公元 128/129 年說 [79]

說者認爲錢幣學的證據表明迦膩色迦應即位於公元 128/129 年，但並不排除公元 144 年或公元 110 年的可能性。

（1）Taxila 萃堵波 IV 出土一枚公元 11—13 年在 Lugdunum 打鑄的 Augustus 的銀第納爾，同時出土有 1 枚 Dioscuri 類型的 Azilises 銀德拉克瑪。出土情況表明，這兩枚錢幣必定是同時有意入藏的。兩枚錢幣均未磨損。這表明，上述 Azilises 的銀幣不可能流通很久。而由於 Azilises 的銀幣不可能在 Azes 二世中年以後繼續流通（蓋當時銀幣急劇貶值，且被 billon 幣取代），上述 Azilises 銀幣的入藏時間不會晚於公元 20—30 年，也就是說 Azilises 約在公元 11—13 年在位。

今案：其說未安。一則，Azilises 的銀幣未被磨損，未必表明它不可能流通很久，雖然一般說來表明它的入藏時間離開打製時間不久，但並不絕對。換言之，不能排除這枚錢幣甚至完全沒有進入流通的可能性。這枚錢幣和 Augustus 的銀幣同時出土，Augustus 的銀幣打鑄於公元 11—13 年，這僅能表明 Azilises 的這枚銀幣入藏於公元 11—13 年之後，不能表明 Azilises 於公元 11—13 年在位。Azilises 應即《漢書・西域傳》所見烏頭勞，其子即 Azes 二世死於元帝時，其時間不會晚於公元前 33 年。[80] 因此，他的銀幣應打鑄於 Augustus 即位之前。另外，如果承認 Azes 一世即位於公元前 58

年，則 Azilises 亦似乎不可能在公元 11—13 年時依然在位。

（2）Manikyala Court 的佛塔有兩處出土貴霜錢幣：一處有 4 枚銅德拉克瑪，1 枚是閻膏珍的，3 枚是迦膩色迦的。另一處有 8 枚銅幣，能夠作出鑒定的有 6 枚，全係四德拉克瑪：1 枚是 Hermaeus 和丘就卻聯名的，1 枚是閻膏珍的，4 枚是迦膩色迦的。這 8 枚銅幣存放在一個銅壇中，銅壇中有一小銀壇，其中有 7 枚羅馬共和國時期的銀第納爾，均已磨損，表明它們已經流通很久。與這 7 枚銀幣在一起的有一個小金盒，盒中有 4 枚迦膩色迦金第納爾。發掘的情況表明，這些金、銀和銅幣是一次性入藏的。由於沒有發現迦膩色迦的繼承人 Huviṣka 和 Vāsudeva 的錢幣，不妨認爲上述錢幣是在迦膩色迦治世入藏的。考慮到羅馬共和國的銀幣一直流通到羅馬帝國 Trajan 時代，而在 Hadrian 時代（公元 117—138）尚被輸出，則不妨認爲迦膩色迦與 Hadrian 同時代。

今案：這些均可視作公元二世紀說之佐證。

（3）在 Jalalabad 的 Ahin Posh 佛塔共出土 3 枚羅馬金幣（aurei）和 17 枚貴霜第納爾，其中包括 10 枚閻膏珍的、6 枚迦膩色迦的和 1 枚 Huviṣka 的。閻膏珍的已經磨損，迦膩色迦的略新，而 Huviṣka 的錢幣實際上是新鑄的；沒有後貴霜的錢幣。這清楚地表明這些錢幣入藏於 Huviṣka 早期。羅馬金幣是 Domitian、Trajan 和 Hadrian 之妻 Sabina 的。Sabina 的金幣必定打鑄於公元 128 年之後、137 年以前。因此，上述錢幣入藏時間的上限是公元 128 年。考慮到這一枚金幣在輸出前一定流通了一些時間（因爲已經磨損），入藏時間不會遲於公元 160 年。

今案：據此，則公元 160 年應落在 Huviṣka 治期之初，而迦膩

色迦紀元之元年大致在公元二世紀三十年代末。

（4）閻膏珍引進的標準金第納爾的概念無疑受羅馬金幣的啓發。一般說來，它的標準重量和大小可能受其原型影響。過去認爲，閻膏珍的金第納爾的重量標準直接摹倣羅馬金幣，而且必定在 Nero（公元 37—68 年）使這一標準降低之前——否則，這不會符合西方商人的標準。但對大量羅馬和貴霜金幣重量的測定否定了這種看法。貴霜第納爾的重量是 8 克，在整個大貴霜時期一直保持不變，雖然所用黃金的純度有所降低。可是羅馬金幣的重量標準從它採用的時代起一直在有規則地、逐步地降低，但黃金的純度保持不變。Nero 改革的結果之一是重量明顯地減少；但即使在 Nero 改革以前，金幣的標準重量也祇有 7.6 克，而祇有 Augustus 治期（公元前 19—前 12 年）纔重達 8 克，這正是閻膏珍採用的標準。

今案：據此，不能僅按閻膏珍金第納爾的標準重量和羅馬金幣之間的關係來判斷閻膏珍及其他貴霜王的年代。

（5）如所周知，有一組丘就卻銅幣的頭像有羅馬式的桂冠，雖然倣自羅馬錢幣的正面頭像幾乎可以肯定得自 Augustus 或 Tiberius 的頭像，而不是 Gaius、Claudius、Nero 或任何其他羅馬皇帝的頭像。J. Allan 認爲其反面圖案幾乎可以肯定是藉自 Claudius 的錢幣——Constantia 坐在一張顯貴椅上，蓋 Augustus 錢幣反面沒有這樣的圖案。但是，丘就卻銅幣反面圖案與任何一種羅馬錢幣原型其實不太相似，其坐像顯然是東方式的，在顯貴椅上的坐姿也和羅馬或希臘人的坐姿不同。見諸丘就卻銅幣的顯貴椅與印度本地的明顯不同，無疑來自西方。這一圖案在丘就卻錢幣上出現不能作爲判斷年代的依據，因爲在 Azes 二世的一組銅幣的反面已經出現類似的圖

案。丘就卻模仿 Azes 二世錢幣的可能性無法排除。

可是，這些丘就卻銅幣更類似於其羅馬原型。它們的設計和大小相同，甚至其重量也接近於羅馬銀第納爾。丘就卻的 Augustus 頭像銅幣的重量標準不是 Augustus 在位時首次發行的重量標準，而是在 Flavia 時期，羅馬帝國內部依然流通的已經磨損的 Augustus 第納爾的重量標準。也就是說，Augustus 頭像很可能是丘就卻在 Flavia 時期摹倣的，當時 Augustus 和 Tiberius 的第納爾又一次變爲最適合流通的銀幣，因而成爲當時輸出的主要第納爾。

（6）一種巴勒維錢銘的引進：Gondphares 的直接繼承者 Abdagases 的安息型錢幣有巴勒維銘文，這顯然是在摹倣 Volagases 一世（公元 50—78 年）。而 Soter Megas 在 Taxila 發行的錢幣緊跟在 Abdagases 之後，因而其年代一定遲於 Volagases 一世使用巴勒維錢銘的年代（公元 58—70 年）。

（7）漢佉兩體錢的重量標準有二：一爲 15 克，一爲 3.5—4 克，這與迦膩色迦的四德拉克瑪銅幣相一致，和 Huviṣka 早期銅四德拉克瑪的重量標準也相一致。由於迦膩色迦和 Huviṣka 的銅幣業已從和闐出土，這表明貴霜對於于闐的政治影響始於迦膩色迦，結束於 Huviṣka 早期。既然《後漢書・西域傳》稱：西域反叛，與漢絕交直至桓帝延熹二年（公元 159 年）。這 159 年應該落在 Huviṣka 早期。

今案：僅僅據出土銅幣很難說明貴霜對于闐產生政治影響的程度和時間等情況。又，《後漢書・西域傳》原文是："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這段話的主詞是天竺，既非貴霜，亦非于闐，也不是說整個西域。說者所引譯文有誤，其說不確。

（8）在 Vāsudeva 治期的某時，其金幣分爲兩種類型，其一類發展成貴霜－薩珊貨幣，另一類發展爲早期笈多王朝的錢幣。貴霜錢幣在 Vāsudeva 之後分道揚鑣，說明貴霜是在 Vāsudeva 之後不太久被薩珊王朝推翻的。

Göbl 對貴霜錢幣類型的分析表明，若干貴霜錢幣反面的類型乃派生自羅馬和亞歷山大原型，而迦膩色迦的錢幣類型主要派生自 Hadrian 治世打鑄的錢幣，Huviṣka 的錢幣主要派生自 Antonius Pius（公元 138—161）治世打鑄的錢幣。由此可見迦膩色迦的即位應在公元二世紀前半葉。

今案：凡此皆有利於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二世紀上半葉說之證據。

5. A. K. Narain 的公元 103 年說 [81]

據《後漢書·西域傳》，疏勒王子臣磐在公元 114—119 年間曾爲質月氏，而當安國在公元 119 年去世時，月氏王出兵助他登上了疏勒王位。這位月氏王衹可能是迦膩色迦。臣磐應即《大唐西域記》卷一所記“質子”。《慈恩傳》卷二亦載：“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我寺本漢天子兒作……”“沙落迦”即“疏勒”之異譯。在新疆發現的貴霜錢幣中屬於迦膩色迦者爲數最多，亦堪佐證。

《後漢書》沒有提到迦膩色迦之名不足爲怪，此書畢竟不是一部印度史，因而衹是在叙述疏勒歷史時附帶提及月氏王。班超死後，漢在西域的勢力迅速衰落。這一過程始於安帝，迦膩色迦的極盛時期正值東漢的混亂時期，故疏於記載。

既然公元 114 年（元初元年）迦膩色迦在位，銘文的證據又表明他的治期至少有 23 年，則不妨設公元 114 年爲他治期的中點，也

就是說迦膩色迦的在位年代大約爲公元 103—125 年。《後漢書・西域傳》載："順帝永建二年（公元 127 年），臣磐遣使奉獻。"這表明臣磐於是年轉而效忠於漢，很可能是此前不久迦膩色迦去世。考慮到消息自貴霜傳至疏勒需要一段時間，因而不妨將迦膩色迦去位之年定在公元 125 年。

同樣，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103 年也可以考定。蓋屬於閻膏珍時期的年代爲 187 年（或 184 年）的 Khalatse 銘文，應按元年始於公元前 88 年的 Pahlava 紀元計算，實際年代爲公元 99 年或公元 96 年，這一年未必是閻膏珍去位的年代，但由此可見將迦膩色迦即位之年定在公元 103 年左右是完全合理的。

據《後漢書・西域傳》等記載斷定大月氏征服大夏本土在公元前 100 年以後，丘就卻統一五翖侯開創貴霜王朝在公元 25 年以後，去世於公元 80 年左右。由於貴霜統治者的平均在位年數約 22 年，閻膏珍的統治應該結束於公元 102—103 年。也就是說，漢文史料也表明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103 年說是可以接受的。

至於《三國志・魏書・明帝紀》所載太和三年（公元 230 年）十二月癸卯朝魏的貴霜王波調應是 Vāsudeva 二世而非一世。因爲前者發行錢幣上的銘文是豎寫的，而不像他之前諸王的婆羅謎錢銘那樣自左至右橫寫。這顯然是 Vāsudeva 二世受到中國書寫方式影響的緣故。這也說明公元 103 年說是正確的。因爲根據公元 103 年說，公元 230 年在位的不可能是 Vāsudeva 一世。

今案：以上是此說的核心判據，很遺憾難以成立。[82] 在此基礎上，說者試圖對有關的銘文、錢幣、考古學資料涉及的問題作出解釋。其說多牽強處，玆不一一。

說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對上述年代說作了補充。[83]

說者強調《後漢書·西域傳》所記諸事均發生於公元 100 年之前。蓋傳文所據資料雖由班勇於公元 125 年編纂，但班勇所據均得自班超，後者於公元 100 年東歸。

今案：此說未安。即使在班超東歸洛陽（公元 102 年）至班勇西出柳中（公元 123 年）這一段時間內，東漢與西域完全斷絕關係（其實並非如此），也不能認爲班勇於安帝末所記全是班超時代西域事情。《後漢書·西域傳》有關貴霜諸事（例如丘就卻的情況）就包括許多班超以前的情況，班勇所記其實很可能包括公元 100 年以後所得者。說者之所以強調這一點，無非是因爲《後漢書·西域傳》中沒有提到迦膩色迦，而強調《後漢書》不載迦膩色迦表明他即位於公元 100 年以後。這對於他的公元 103 年說不能不說是一個障礙。班勇不可能不記錄他同時代發生的事情而記錄較遠的事件。[84]

說者以爲，班超死後，東漢在西域勢力迅速衰落，故有關記事疏漏甚多，因而記臣磐事情而不載迦膩色迦之名。

今案：《後漢書·西域傳》不載迦膩色迦事蹟，可知該王即位於公元 125 年之後。既然臣磐事情係班勇所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則不能認爲不載月氏王之名乃因疏漏。

說者又以爲有關臣磐的一則記載並非班勇所記，而是范曄所採用的較後資料。若係班勇所記，則有關月氏王名必定會提及。而由於班超以後一段時間東漢和西域斷絕了聯繫，因此范曄所用資料中不見有關月氏王的姓名。

今案：此說未安。一則完全沒有證據認爲有關臣磐的記載不是“班勇所記”。“班勇所記”亦未必提及月氏王之名。又，月氏遣兵立

臣磐爲疏勒王，《資治通鑒・漢紀四二》繫於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事在班勇出屯柳中前四年，故沒有理由認爲其事不在“班勇所記”之中。又，《後漢書・班勇傳》稱：“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知班勇在延光末曾與疏勒直接發生關係。臣磐之事，不可能不知道。又，《後漢書・西域傳》稱“班勇所記”在“安帝末”（公元125年），可能是指其主要部分的完成時間，未必此後別無追補。這就是說，即使臣磐之事直到順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臣磐來朝始爲東漢所知，也完全有可能包括在“班勇所記”之中。

6. J. M. Rosenfield 的公元 110 — 115 年說 [85]

馬土臘無疑一直是貴霜在恒河流域的主要統治中心。通過對馬土臘派雕塑的類型學和肖像學研究，以及對作爲捐款人的貴霜名流及其許願銘文序列的研究，證實 Vāsudeva 一世的治期結束以後在馬土臘曾使用了第二個貴霜紀元。這表明迦膩色迦的治期大約開始於公元 110—115 年。

Vāsudeva 一世最後一篇銘文（迦膩色迦紀元 98 年）之後不久，開始了一個新的年代系列。馬土臘流派的作品至少延續至這一紀元的第 57 年。這些作品類型表現出一種清楚的朝公元五世紀笈多模式發展的趨勢。

繼 Vāsudeva 一世即位的迦膩色迦王的歷史真實性業已進一步得到證明。根據類型學和肖像學的證據，大量的雕刻（其中若干刻有承認迦膩色迦王權威的銘文）不可能被斷在公元二世紀。他們是直

接從那些承認 Vāsudeva 權威、而年代爲迦膩色迦紀元的 80—90 年代的作品發展而來。這後一位迦膩色迦的名字出現在年代爲 5—17 年的銘文上。有關他的錢幣證據很久以前就被離析出來。

在 Doāb 和中印度的印度斯基泰政權延續到第 57 年。此後，紀年記錄似乎結束了。這位迦膩色迦以後，祇有零散的王號出現。

根據錢幣和往世書的證據，在 Padmāvatī、馬土臘和 Vidiśā 土著的 Nāga 王朝興起，取代了在這地區的印度斯基泰人，產生了七個或更多的國王，直到他們自己被笈多征服，如沙摩陀羅笈多的阿拉哈巴德銘文所載。這也許是紀年銘文序列中斷的原因。

同樣，據 Bijāyagaḍh 銘文，和後期貴霜時期的 Bayānā 一樣，Yaudheya 人似乎長驅進入了恒河上游平原。

結合《魏略》的記載，印度斯基泰霸權的殘餘在恒河上游平原似乎一直保持到三世紀後半葉。笈多帝國興起以前三個世紀這一地區歷史的大輪廓可以勾勒出來，而印度本土的貴霜史可概括如下：

約公元 50 年，征服 Taxila 和旁遮普。

約公元 100 年，Doāb 的貴霜政權鞏固，並南向擴張至 Sārnāth。

約公元 110—115 年，迦膩色迦即位。

約公元 130—150 年，王朝受到外來壓力，處於困難時期。

約公元 210—215 年，在 Vāsudeva 治期之末，王朝分裂爲兩部，統治中心一在 Balkh，一在 Kapiśā 甚或白沙瓦。

約公元 220—260 年，薩珊入侵。

約公元 250 年，失去東旁遮普和 Delhi 周圍直至 Yaudheyas 地區。

約公元 275 年，失去恒河上游地區，包括馬土臘，直至 Padmāvatī 的 Nāgas。

約公元 300 年，薩珊佔領 Bactria、Badaskhān、Kapiśā 和喀布爾上游。

約公元 358 年，沙普爾二世征服喀布爾河下游、乾陀羅、Taxila。

公元 350 年，印度－斯基泰政權的全部痕跡在北、中印度消失。

公元 400 年，在西印度（馬爾瓦和 Gurjaradeśa）消失。

既然 Vāsudeva 一世治期結束後第二個貴霜紀元中止於 57 年（等於迦膩色迦紀元 157 年），貴霜丟失恒河上游在公元 275 年左右，則迦膩色迦紀元之元年應該落在公元 110—115 年之間。

今案：此說的主要依據是馬土臘貴霜時期神殿的雕塑作品，但無論類型學還是肖像學的證據對於斷代均有較大的誤差。

7. E. Zürcher 的公元二世紀四十年代說 [86]

據《僧伽羅剎所集經》，《道地經》（Yogācārabhūmi），僧伽羅剎（Saṅgharakṣa）所集也。“僧伽羅剎者，須賴國人也，佛去世後七百年生此國。出家學道，遊教諸邦至揵陀越土，甄陀罽貳王師焉。”而據《高僧傳》，《道地經》係安世高所譯。世高自公元 148 年入華，死於公元 170 年左右。如果考慮到他赴華之前可能在中亞逗留若干年，則不管怎樣《道地經》可能纂成於公元 140 年前，蓋此經可能由世高自西域攜入中國譯出（也可能是他在離開時已經熟記）。更重要的是，《道地經》屬於 Kashmir 的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而說一切有部的鼻祖中，僧伽羅剎緊接在 Vasumitra（世友）之後，而 Vasumitra 又與迦膩色迦治期舉行的 Kashmir 結集有關。這一切都使“甄陀罽貳王師”僧伽羅剎的年代在二世紀上半葉。

今案：據考證，安世高離開安息在公元135年左右，入華之年爲公元148年，在西域遊歷十餘年。[87] 果然，僧伽羅刹集《道地經》當在公元135年之前。而迦膩色迦師事僧伽羅刹即使是事實，也難以據此推斷其即位年代。蓋不能排除事在迦膩色迦即位之前。至於世友之年代，衆說紛紜，亦難落實。

8. H. Falk 的 127 年說 [88]

印度人 Sphujiddhuaja 於公元269年所撰《希臘聖誕節》（Yavanajataka）一書中稱："當時計算塞種紀元的年代可在貴霜紀元（Kushan Era）的年代上加149年得出。"說者據以爲：貴霜紀元應始於塞種紀元（其元年爲公元78年）之後149年，具體而言爲公元227年。但這一特定年代必定屬於貴霜紀元的第二世紀，既然貴霜紀元在銘文上出現時，往往省略掉百位數，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無疑是公元127年。

今案：此說的基礎在於以迦膩色迦紀元紀年的貴霜銘文分佈於2個世紀，而屬於第二世紀的銘文的紀年省去了百位數。但並沒有證據表明迦膩色迦創建了一個新的紀元，其人繼承父祖紀元的可能性無法排除。更何況，沒有理由認爲這227年屬於迦膩色迦紀元的第2世紀，甚至沒有理由指此處所謂"貴霜紀元"便是迦膩色迦紀元。

（四）對公元二世紀說的幾種不同意見

1. H. C. Raychaudhuri 對公元二世紀說的異議 [89]

（1）迦膩色迦及其繼承人銘文所見紀年數表明迦膩色迦創建了

一個紀元。但是，我們並不知道西北印度曾經流行過一個元年落在公元二世紀的紀元。

今案：迦膩色迦沿用了其父祖使用過的紀元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2）Sui Vihar 銘文表明迦膩色迦的領土至少包括印度河下游的一部分。但是，Rudradāman 的 Junāgadh 銘文表明這位大州長的征服範圍達到 Sindhu-Sauvīra（據往世書和比魯尼，包括木爾坦），甚至沿 Sutlej 河抵達 Yaudheyas 的居地。Rudradāman 無疑於公元 130—150 年在位，他的大州長也不是受封於任何人的。如果迦膩色迦在位於第二世紀中葉，那末他對印度河下游 Sui Vihar 地區的統治和 Rudradāman 在同一時期的統治顯然是矛盾的。

今案：Rudradāman 可能是役屬貴霜的印度土著統治者，承認迦膩色迦的宗主權。反過來，迦膩色迦給予 Rudradāman 較大的自主權。換言之，Rudradāman 和迦膩色迦之間並不存在說者所謂不可調和的矛盾。

2. S. Chattopadhyaya 對公元二世紀說的異議 [90]

Ghirshman 的公元 144 年說立足於貝格拉姆的發掘。他指出貴霜遺物中年代最晚者屬於迦膩色迦組最後一位統治者 Vāsudeva，並假定這座城市在公元 241 和 250 年間毀於薩珊王沙普爾一世之手，而 Vāsudeva 之末年落在這段時間內。Vāsudeva 在位年代爲迦膩色迦紀元第 74—98 年，因而迦膩色迦紀元之元年可能是公元 144 年。其說未安。

一則，貝格拉姆出土的錢幣並不屬於 Vāsudeva 一世。因爲 Vāsudeva 一世銘文的出處表明他的領土限於北方邦，而以馬土臘爲

中心，而 Ghirshman 歸屬於他的錢幣並不是在北方邦發現的。貝格拉姆出土的錢幣無疑是另一位 Vāsudeva，他就是公元 230 年遣使曹魏的波調。他這次朝魏顯然是爲了求得援助以對抗薩珊人的入侵。

二則，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貝格拉姆是毀於沙普爾一世之手。因此任何立足於這一點的 Vāsudeva 和沙普爾一世同時代說都是經不起推敲的。

多數西方學者認爲迦膩色迦並不是即位於公元 78 年而是在公元 120 至 134 年之間，Mashall 說堪爲代表：丘就卻在公元 50 年左右將帕提亞人逐出喀布爾河谷，當時他約 50—60 歲。其子閻膏珍征服了乾陀羅、旁遮普和信德，在公元 78 年左右繼父位，其治期也許持續至公元二世紀之初。此後，直至迦膩色迦即位有一段約 20 年的間隙。這段時間內貴霜似乎有某種分裂跡象，可能有一個以上副王以 Soter Megas 名義爲貴霜君主繼續統治印度。此外，尚有若干重要證據表明迦膩色迦不是塞種紀元的創建者：

（1）公元 73 年至 102 年正是班超在西域活動的時期，東漢勢力強盛，因此不可能出現如玄奘所說河西諸國“畏威送質”的局面。

（2）《後漢書・西域傳》衹提到丘就卻和閻膏珍，但未及迦膩色迦。由此可見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125 年左右。然而其說可議：公元 90 年，月氏遣使求漢公主，這位月氏王應該是迦膩色迦。蓋丘就卻死時年已八十餘，其子閻膏珍即位時年紀必然不小，不可能有求婚之舉。再者，閻膏珍在公元一世紀 80 年代已不可能在位。因此，求婚的月氏王必定是迦膩色迦，否則便是閻膏珍的副王之一。正如年代爲 136 年的 Taxila 銘文所表明的那樣。

玄奘所載“河西蕃維，畏威送質”，據《慈恩傳》可知質子其實

祇有一人，並非許多。《大唐西域記》所謂“諸質子”，恐怕是一種疏忽。可是，迦膩色迦在中亞的統治是短暫的，有關迦膩色迦之死的傳說可以證明這一點。顯然他是被班超打敗的。但這次失敗發生在公元 90 年以後，這似乎直接證實了玄奘關於迦膩色迦在乾陀羅的統治開始之後向中亞擴張的記述。

迦膩色迦即位第 2 年的銘文發現於 Kosam，第三年的發現於 Sārnāth。而 Zeda 和 Sui Vihar 這兩篇最早表示迦膩色迦與西北印度關係的銘文的年代都是 11 年，這可能表示迦膩色迦在這一年或稍前征服了旁遮普和信德。又，他的年代爲 21 年的 Kurram 銘文是表明他統治印度河以西地區的最早證據。這些銘文證明迦膩色迦在北方邦即位，後來纔征服旁遮普和西北邊陲諸省。顯然他原來是閻膏珍的總督，在公元 78 年宣告獨立。而正如根據年代爲 136 年的 Taxila 銀冊銘文所推知的。當時有另一總督在 Taxila 宣告獨立，並發行 Soter Megas 錢幣。既然迦膩色迦統治乾陀羅之年不可能比公元 99 年早太多，中國史籍關於班超與貴霜之間鬬爭和玄奘的有關記載並非不可能調和。

迦膩色迦組統治者的銘文表明迦膩色迦是一個紀元的創建者，但是並沒有證據表明有什麼紀元開始於公元 120 年和 134 年之間。但也許會有人說，確實迦膩色迦曾在公元 120—134 年間某時建元，祇是這一紀元後來廢棄了，因此必須找出一些其他證據來確定迦膩色迦的年代。Rudradāman 的 Junāgadh 銘文提供了這樣的證據：公元 130 年的 Andhau 銘文表明當時 Rudradāman 與其祖 Caṣṭana 聯合統治，而 Junāgadh 銘文表明他在公元 150 年之前征服了北印度和南印度。值得注意的是這篇銘文並未提到貴霜，祇是說他征服

了 Sindhu-Sauvīra 地區（Multan 和 Jharavar）和尤德亞人。尤德亞人居住在 Sutlej 河畔的 Johiyabar 之地。這些地區都是貴霜的領土，因而銘文不提及貴霜的唯一解釋是，當時貴霜人的權力已經喪失，Rudradāman 並沒有從貴霜人那裏奪得任何土地。

據悉，有6年時間沒有貴霜銘文，即從迦膩色迦紀元61至66年。換言之，在這段時間內貴霜已一定程度喪失權力。這 61—66 年必定落在公元 130—150 年之間，當時 Rudradāman 征服了北印度，這與公元 120—134 年說顯然不符，而公元 78 年說正堪接受。

如前所述，公元 79 在位的貴霜統治者既不屬於丘就卻組也不屬於迦膩色迦，這表明當時出現貴霜權力的窺伺者。而粉碎這些窺伺者後，迦膩色迦成了最高統治者。

要之，如果假定迦膩色迦於公元 125 年以後即位，Rudradāman 對 Sindhu-Sauvīra 的統治與迦膩色迦的 Mohenjo Daro 和 Sui Vihar 銘文的記載就不可調和，蓋後者表明迦膩色迦控制着同一地區。另外，Rudradāman 征服北印度時，必定是貴霜政權衰落之際和尤德亞人再次宣告獨立之時。最後，迦膩色迦是一個紀元的創建者，但並不知道有什麼紀元開始於公元二世紀。

今案：說者以爲貝格拉姆未必毀於沙普爾一世之手，該處出土時代最晚的貴霜的錢幣未必是 Vāsudeva 一世的云云，無非是出諸構建公元 78 年說的需要，並未舉出有力的反證。

說者對包括《大唐西域記》在內漢文史料的理解和詮釋是不可接受的，建立於其上的觀點因而也是是站不住的。尤其應該指出：西域諸國同時役屬東西方強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就是所謂“兩屬”現象。[91]

說者認爲 Rudradāman 和迦膩色迦不可能同時代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至於說者關於不存在一個開始於公元二世紀的紀元的看法是則是正確的。但是，迦膩色迦沒有開創一個始於公元二世紀的紀元，並不等於迦膩色迦不可能即位於公元二世紀。

3. A. K. Narain 對其他公元二世紀說的批判 [92]

如果認爲迦膩色迦一世的元年在公元二世紀的三十或五十年代，那末 Vāsudeva 一世應於公元 244（或公元 220—238 年）在位，而 Vāsudeva 二世在公元 275 年依然在位，即使給迦膩色迦三世的治期留出最小的餘地。其時笈多人已經在華氏城和阿逾陀開始他們的統治生涯。即使無視笈多人早期的征服直抵鉢羅耶伽，在公元 350 年左右，沙摩陀羅笈多已經統治着包括馬土臘在內的北印度則毋庸置疑。這意味着在最後一位貴霜王（當然，按某些學者的意見，存在一位 Vāsudeva 三世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和沙摩陀羅笈多之間至多間隔 75 年。在這段間隙裏，必須安排北方邦的 Magdhas 人。從沙摩陀羅笈多的 Allahabad 銘文可以知道，他不僅打敗了北方邦的那伽人和其他家族，而且還打敗了在貴霜之後獨立過一段時間的尤德亞人、馬臘婆人、Ārjunāyanas 人、Kuṇindas 人和 Madras 等。其中大多數的存在可以從《往世書》、銘文和錢幣得到證實。他們的年代最晚在貴霜和沙摩陀羅笈多之間是毋庸置疑的。同時也無法否認在貴霜帝國的東部，貴霜人的繼承者甚至早就被旃陀羅笈多一世摧毀。如果一定要認爲 Vāsudeva 二世在公元 275 年在位，這一切簡直無從安排，這正是多數古代印度史學者相信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爲

公元 78 年的緣故。

公元 120—128 或公元 144 年說的另一問題是不能與 Rudradāman 的年代調和。沒有證據表明 Rudradāman 曾役屬於貴霜人。

今案：貴霜帝國崩潰開始以後，在原帝國版圖內本來役屬於貴霜的各族紛紛獨立，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政權，這些政權在不長的時期內被沙摩陀羅笈多逐個擊滅是完全可能的。一則，以上各種人建立的政權可能同時並存而不是相繼疊興。《往世書》乃至錢銘等所見同一政權不同名字的統治者也可能是各據一方，互不統屬的，因而並不存在前後繼承關係。當然，也可能是篡亂疊生以至治期短促。笈多人能一舉摧毀之，正說明這些小政權極不鞏固。

4. D. C. Sircar 對公元二世紀說（公元 125 年說）的批判 [93]

（1）西印度的塞種大州長 Rudradāman 是一個獨立的統治者，他的 Junāgadh 銘文表明 Ākara 於公元 150 年成爲他的一部分領土，而 Vidiśā 附近的 Sanchi 銘文（屬於 Vasiṣka，年代爲迦膩色迦紀元第 28 年）表明在迦膩色迦及其繼承者的治期貴霜人擁有東馬爾瓦。如果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爲公元 125 年，那末迦膩色迦、Vasiṣka 和 Rudradāman 同時代。Śaka Śrīdharavarman 的 Sanchi 和 Eran 銘文，以及沙摩陀羅笈多的錢幣與 Eran 和 Allahabad 銘文，旃陀羅笈多二世的 Sanchi 和 Udayagiri 銘文，都表明塞種人在二世紀中葉以後一直統治着東馬爾瓦。因而公元 125 年說不能成立。

（2）統治東 Uttar Pradesh 的 Kauśāmbī 諸王之年代肯定在迦膩色迦一世之後、笈多之前，其年代在某個紀元的 51 年和 139 年之間，這個紀元衹可能是迦膩色迦紀元。既然這一地區按照任何紀元紀年的

最早記錄都是迦膩色迦一世的，而在公元最初的幾個世紀該地區沒有使用任何其他紀元的國王進行統治，那就沒有理由認爲在上述時期內這個地區使用過其他紀元。最近發現的 Kailvan 銘文，得自 Bihar 的 Patna 區，年代爲 108 年，雖然也是同一個紀元，但其若干婆羅門字母的形式早於 Śoḍāsa 和迦膩色迦一世。因而即使接受上述古文書證據，也很難將 Kailvan 銘文安排在公元二世紀以後，因而迦膩色迦紀元（年代爲 108 年的銘文必定按此紀年）應始於公元一世紀。

今案：其說未安。Kauśāmbī 諸王記錄所用紀元應爲塞種紀元。諸王臣屬於貴霜，但仍有使用其紀元之自由。至於 Rudradāman 的問題，已見前述。

5. E. Zürcher 對 A. K. Narain 公元 103 年說的批判 [94]

據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可見質子住處並不是僅沙落迦一處。臣磐居住在 Jālandhara 附近某處不是不可能的。雖然《後漢書・西域傳》談到他與月氏王的友誼，因而寧可認爲他居住在 Puruṣapura 的宮廷中，但沒有理由假定他是像迦膩色迦的質子們一樣，“東居印度諸國，夏還伽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其餘住處的名稱不知，沙落迦僅僅由慧立提到，而非玄奘本人提到。慧立所述應該是可信的，但他同時還載沙落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質於此時作也”（卷二）。玄奘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河西”不應包括疏勒，知亦以爲質子來自中國。玄奘的故事可能是由“至那僕底”這一地名引申而得。至於臣磐於公元 127 年朝漢，非不親貴霜，實畏漢也。與班勇在西域取勝有關云云。

今案：公元 103 年說是有問題，但說者的論證亦有可議之處。

例如此處《大唐西域記》所謂“河西”當指西域無疑。“沙落迦”一名顯與疏勒無關，等等。

6. B. Kumar 對公元 128—129 年說批判 [95]

S. Konow 斷定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125 年以後，蓋其名不見載於《後漢書・西域傳》，而結合 Van Wijk 根據 Zeda 和 Und 銘文進行天文學計算，可知迦膩色迦的元年應在公元 128—129 年。然其說未安。一則不能因爲中國史籍不提到迦膩色迦的名字而認爲他即位於公元 125 年以後，因爲中國史籍在記述月氏人在西域活動時從未特別提到月氏王名。

另外，年代爲 11 年的 Sui Vihar 銘文清楚地表明：在公元 139—140 年，印度河下游 Bahawalpur 在迦膩色迦治下。若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128—129 年，則該地直至公元 156—157 年仍然在貴霜治下，因爲迦膩色迦之後 Vasiṣka 和 Huviṣka 治下的貴霜王國並無衰落的蹟像。但是，Junāgadh 銘文所記 Rudradāman 作爲一個實際上獨立的統治者在 150 年左右統治着 Sauvira（包括 Multan 在內），並征服了居住在 Bahawalpur 附近 Rajasthan 的尤德亞人。這與 Sui Vihar 銘文的記載是矛盾的。

同樣，貴霜對 Sanchi 的統治與 Junāgadh 銘文所見 Rudradāman 對 Ākara（東馬爾瓦）和 Avanti（西馬爾瓦）的統治也是不可調和的。再者，公元二世紀並不存在著名的紀元，但銘文表明迦膩色迦確實創造了一個紀元。

今案：既然迦膩色迦繼承了閻膏珍的王位，貴霜又在迦膩色迦治期臻於極盛，《後漢書・西域傳》記載了迦膩色迦之前的丘就卻、閻

膏珍，而沒有記載迦膩色迦本人，又有證據表明該傳所依據的資料年代在公元 125 年之前，迦膩色迦即位於這一年之後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Rudradāman 和迦膩色迦的關係，如前所述，衹要明白貴霜統治中亞和印度的方式就不難理解。

四、公元三世紀諸說

公元三世紀諸說中，以 R. G. & D. R. Bhandarkar 的公元 278 年說最早 [96]，此後遂有 R. C. Majumdar 的公元 248 年說。[97] 後說幾乎沒有支持者，玆略而不論。[98] 至於前說，在此衹介紹 R. G. & D. R. Bhandarkar 之後的一些說法。蓋說者認爲首創者的結論是正確的，但論述業已過時。

（一）公元 278 年説

1. V. Lukonin 的公元 278 年説 [99]

此說本質上也是塞種紀元說：迦膩色迦紀元其實是省略了百位數 2 的塞種紀元。

說者以爲：雖據泰伯里，貴霜與 Ṭūrān、Makrān 諸王到 Ardashir 一世的宮廷表示臣服；若干學者還將 Vāsudeva 與 Vehsadjan（後者見於 Moses Khoren 的《亞美尼亞史》）作同一認定，但說者以爲貴霜領土被薩珊征服的唯一直接證據是貴霜－薩珊錢幣。這些錢

幣最初頒行於公元四世紀七十年代末，其風格與 Vāsudeva 的錢幣密切相關。

至於沙普爾一世的 Kaba-i-Zardusht 銘文（公元 262 年）在臚列沙普爾一世統治的地區時提到“直至白沙瓦的 Kuṣāṇ Śāhr”，不過表明沙普爾對以前曾役屬貴霜的地區提出的要求。既然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沙普爾一世在位時使用過“貴霜王”以及類似稱號，就不能認爲貴霜帝國亡於公元 262 年以前。

沙普爾一世在東方戰役（公元 245 和 248 年之間）之後，設置了“Sakastene、Turestan 和 Indus 直至海岸”的攝政官。這一職位一直存在至四世紀後半葉。不管沙普爾一世的戰士是否到達白沙瓦，上述攝政官所轄的土地界定了當時薩珊波斯的東境。

Vāsudeva 末年，即迦膩色迦紀元第 98 年（公元 376 年），應是貴霜－薩珊錢幣發行年代之上限。

今案：其說未安。一則，即使直至公元 262 年貴霜祗是臣服而非亡於薩珊，Kuṣāṇśāhr 不是薩珊人所置，而是指臣服薩珊的貴霜王，迦膩色迦紀元也不可能始於公元 278 年。

二則，貴霜－薩珊錢幣的絕對年代尚未確定，但其上限肯定不在公元四世紀七十年代末。退一步說，即使貴霜－薩珊錢幣最初發行的時間爲公元四世紀七十年代，也無助於公元 278 年說成立。因爲發行這種錢幣不過表明薩珊對原貴霜領土統治的強化，不能認爲只有發行錢幣纔表明薩珊對貴霜的征服。

要之，此說旨在說明薩珊滅亡貴霜的時間與 278 年說不悖，如此而已。

2. E. Zeymal 的公元 278 年說 [100]

（1）貴霜帝國被薩珊征服，最可靠的證據是貴霜－薩珊錢幣。這種錢幣最早發行的年代與公元 278 年說並不矛盾。

（2）貴霜帝國的部分領土被笈多征服，唯一直接的證據是按笈多紀元紀年的笈多銘文，如旃陀羅笈多二世的馬土臘銘文（笈多紀元第 6 年 = 公元 380/381 年）、Udayagiri 銘文（笈多紀元第 82 年 = 公元 401/402 年）、Sanchi 銘文（笈多紀元第 93 年 = 412/413 年）。有關記載均可與公元 278 年說協調。

旃陀羅笈多二世時代撰寫的 Allahabad 銘文，詳細記錄了沙摩陀羅笈多的功蹟（約公元 350 年），也在臚列邊境地區諸民族和統治者時提到了貴霜王的稱號 devaputra ṣāhi。

（3）前貴霜事件的年代無助亦無妨於公元 278 年說成立，因爲這些事件的年代均取決於貴霜的絕對年代。

（4）不能認爲公元 3—4 世紀在貴霜領土上存在的若干小國或小王朝是公元 278 年說的反證，因爲這些統治者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臣服貴霜中央政權。例如：闍膏珍的州長 Zeionises-Jihonika（塞種紀元第 191 年 = 公元 269 年）也發行自己的銀幣和銅幣。

（5）如果迦膩色迦紀元之元年爲公元 278 年，則可以說明爲何塞種紀元 196 和 211 年之間（公元 274—289 年）和 218—270 年之間（公元 296—348 年）的西部州長不使用“大州長”這一稱號。這正是因爲這兩個時間內貴霜王權力臻於極盛。當然，這與其看作公元 278 年說的證據，不如認爲是該說的推論。

今案：其說未安。

一則，貴霜－薩珊錢幣的發行年代不能看作貴霜王朝滅亡的年代。

二則，笈多王朝的銘文提到原貴霜王朝的部分領土被幷入笈多帝國並不表明貴霜王朝一直存在至旃陀羅笈多二世即位之時。

三則，沙摩陀羅笈多的 Allahabad 銘文提到貴霜人的稱號並不表明公元 350 年左右貴霜王朝依舊存在。即使這一稱號在當時依舊爲貴霜人使用，也至多表明貴霜人的殘餘勢力依舊存在，與迦膩色迦的年代毫不相干。

四則，說者定丘就卻的年代爲公元 178—238 年，閻膏珍的年代爲公元238—278年，完全無視中國史籍關於貴霜起源和建國的記載。

五則，在公元三至四世紀，原貴霜領土上小國林立，表明統一的貴霜已經不復存在。這些小國是否役屬貴霜無法證明。

六則，在塞種紀元 196—211 年以及 218—270 年之間，西部州長不使用“大州長”這一稱號與貴霜無關。

（二）D. C. Sircar 對公元三世紀說的批判[101]

（1）Vāsudeva 統治馬土臘直至迦膩色迦紀元第 98 年，如果該紀元即公元 248 年的 Traikūṭakas 紀元，則 Vāsudeva 統治馬土臘至公元 346 年，而馬土臘最早的笈多銘文是旃陀羅笈多二世的年代爲笈多紀元第 61 年的銘文，該銘文的實際年代爲公元 380 年。雖然馬土臘是旃陀羅笈多二世之父沙摩陀羅笈多征服該處的 Nāga 統治者後奪取的。往世書的記載表明在貴霜與笈多之間，馬土臘的 Nāga 統治者不少於七位。

（2）笈多征服之前 Nāga 朝在馬土臘地區相當長的治期可能表明

Vāsudeva 的年代大大早於公元四世紀中葉。對此，應該注意到，沙摩陀羅笈多的 Allahabad 石柱銘文稱 Āryāvartta 的若干 Nāga 王爲被笈多君主消滅的敵人，而僅稱同時的貴霜王即 Daivaputra-Shāhī-Shāhānushāhī 爲他的盟友。

（3）據《于闐國授記》，迦膩色迦是于闐王 Vijayakīrti（公元二世紀）的同時代人。而其繼承人 Huviṣka 是佛教徒哲學家 Nāgārjuna 的同時代人，因而與 Sātavāhana 王亦同時代，這位 Sātavāhana 在位年代不可能遲於公元二世紀。

（4）《高僧傳》載安世高譯僧伽羅刹所集《道地經》，而迦膩色迦曾師事羅刹，這位迦膩色迦必定在位於公元 170 年以前很久。

（5）如果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 248 年，就很難找到波調的位置。據《三國志·明帝紀》，波調應即 Vāsudeva 在公元 230 年遣使朝魏。

（6）後貴霜最遲在公元三世紀臣服於薩珊，也和三世紀中葉迦膩色迦即位是無法協調的。

今案：公元 248 年說尚且不能成立，更無論公元 278 年說。

五、後記

迦膩色迦年代經過一個多世紀不間斷的研究，可能性已經臚列殆盡。由於自忖很難再有與衆不同的見解，我一開始就決定就這一問題作一綜述，於是閱讀有關論文，逐篇摘要。

忽一日，我覺得自己似乎明白迦膩色迦年代是怎麽一回事了，

閱讀旨趣隨即轉移，原來的計劃也就停頓下來。當自己的論文《迦膩色迦的年代》完成後，不知何故，再也提不起寫綜述的勁頭了。

摘要已有七八萬字，本來打算一刪了之，後來考慮到這雖然衹是一個半成品，但關於迦膩色迦年代之我見可以說脫胎於這一組綜述。這似乎說明這些帶有隨機性的摘要有着某種內在聯繫，將他們放在一起發表，也就有了某種合理性，至少可以作爲我的迦膩色迦年代說的背景讀。

我在各段摘要之後，加上了一些按語。當時對於迦膩色迦的年代尚胸無定見，這些按語不免和《迦膩色迦的年代》一文不盡符合。之所以沒有在最後加以統一，是覺得保留一些自己認識這個問題過程的印迹也是很有趣的。

縮略語表

ABORI.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AIU. R. C. Majumdar, ed., *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 Bombay, 1953.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CHI. E. J. Rapso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Delhi, 1922.

EHNI. S. Chattopadhyaya, *Early History of North India*, Calcatta, 1958.

EI. *Epigraphia India.*

IA. *The Indian Antiquary.*

IHQ.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JA. *Journal Asiatique.*

JBBRAS. *Journal of the Bombay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BORS. *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

JIH.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C. *Numismatic Chronicle.*

OZ. *Ostasiatische Zeitschaft.*

PDK. A. L. Basham,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Leiden, 1968.

PHAI. H. C. Raychaudhuri, *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23, 1953.

SRA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Kamakura.

WZKM.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Wien).

■ 注釋

[1] E. Thomas, "Bactrian Coins and Indian Dales" , *The Academy* 26 (1874), pp. 686-687.

[2] A. Cunningham, "Indo-Scythians" , *Archea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Four Reports*

made during the Years 1862-63-64-65, vol. II. Simla: Printed at the Government Central Press, 1871, 43-82, esp. 68, note.

[3] A. Cunningham,"Coins of the Kushâns, or Great Yue-ti", NC Series 3, 12 (1892), 40-82, esp. 44.

[4] S. Lévi, "Notes sur les Indo-Scythes, I. Les contes" , *JA* 9e série, tome VIII, Paris 1896, pp. 444-484; "II. Les textes historiques" , *Journal Asiatique* 9e série, tome IX, 1897, pp. 5-26; "III. Saint Thomas, Gondopharès et Mazdeo" , *JA* 9e série, tome IX, 1897, pp. 27-42, esp. p. 42.

[5] 注 5 所引 R. D. Banerji 文 , esp. 67.

[6] G. Bühler, "A New Kharoṣṭht Inscription from Swat" , *WZKM*, vol. 10 (1896), pp. 55-58 and 327.

[7] J. Marshall, "The Date of Kanishka" , *JRAS* (1914), pp. 973-986.

[8] 注 5 所引文 , esp. 67.

[9] K. P. Jayaswai, "The Statue of Wema Kadphises and Kushan Chronology" , *JBORS*, vol. 6 (1920), pp. 12-22, esp. 21; "Problems of Saka-Satavahana History" , *JBORS*, vol. 16 (1930), pp. 227-316, esp. 240.

[10] *CHI*, p. 570.

[11]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1933, pp. 494-502.

[12] J. F. Fleet, "A hitherto unrecognised Kushan king" , *JRAS* (1903), pp. 325-334; "St. Thomas and Gondophernes" , *JRAS* (1905), pp. 223-236; "The Date in the Takht-i-Bahi Inscription" , *JRAS* (1906), pp. 706-711; "The Traditional Date of Kanishka" , *JRAS* (1906), pp. 979-992; "The Early Use of the Era of B.C. 58" , *JRAS* (1907), pp. 169-172; "Moga, Maues and Vonones" , *JRAS* (1907), pp. 1013-1040;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eek Uncial and Cursive Characters into

India" , *JRAS* (1908), pp. 177-186; "The Question of Kanishka" , *JRAS* (1913), pp. 95-107; "The Date of Kanishka" , *JRAS* (1913), pp. 913-920 and 965-1011; "Review of E. J. Rapson' s *Ancient Indi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First Century A.D*" , *JRAS* (1914), pp. 795-799; "The Date of Kanishka" , *JRAS* (1914), pp. 987-992; "The Taxila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6" , *JRAS* (1914), pp. 992-999; "The Taxila Scroll of the Year 136" , *JRAS* 1915, pp. 314-318.

[13] O. Franke, *Beiträ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zur Kenntnis der Türk-völker und Skythen Zentralasiens*, Abhandlungen Kön. Prenss, Akad. d.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04, Phil.-hist. Abhandl. I, p. 99.

[14] H. Lüders, *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 Kön. Preuss*, Turfan-Expeditionen, Kleinere Sanskrit Texte, Heft I. Berlin 1911, p. 11.

[15] J. Kennedy, "The Date of Kanishka" , *JRAS* (1913), pp. 920-939.

[16] Barnett, "The Date of Kanishka" , *JRAS* (1913), pp. 942-945.

[17] *PHAI* (1953), pp. 465-467.

[18] D. C. Sircar, "The Kushāṇas" , In *AIU*, pp. 136-153, esp. 144.

[19] B. Kumar, The Early Kuṣāṇas, New Delhi, 1973, pp. 66-70.

[20] 今案:此說未安,見余太山《關於"閻膏珍"》,《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III，商務印書館 2012 年版，第 3—31 頁。

[21] E. J. Rapson, *Indian Coins*, Strassbueg, 1898, p. 18; E. J. Rapson, "Gandhara Sculptures (Some Recent Acquisitions), by J. Burgess, C. I. E., etc" , *JRAS* 1900, pp.388-390. 此說認爲迦膩色迦組貴霜統治者所用紀元可能是 Vikrama 紀元，衹是所見紀年數省去了百位數 1。

[22] 主要有 A. Cunningham, *Book of Indian Eras with Tables for Calculating Indian Dates* (Calcutta, 1883, p. 42) 的 80 年說。他主張的迦膩色迦紀元實卽塞琉古紀元說也

屬於這一類，此說主要依據漢文史料。

[23] A. M. Boyer, "L'époque de Kaniṣka", *JA* 9e série, tome 15, Paris, 1900, pp. 526-579, esp. 578-579.

[24] M. É. Specht, "Les Indo-Scythes et l'Époque du Régne de Kanischka", *JA* Series 9, 10 (1897), pp.152-193; A. 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Vol. I, pp. 55-57; A. Stein, "White Huns and Kindred Trib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ian North-West Frontier", *IA* 34 (1905), pp.73-87; 亦以爲迦膩色迦即位於公元一世紀末或二世紀初。J. Ph. Vogel, Epigraphical Discoveries at Sarnath, *EI* 8 (1905-06), pp.166-179, 根據古文書學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25] J. Fergusson, "On the Saka, Samvat and Gupta Evas", *JRAS*, New Series, vol, XII, 1880, pp. 259-285.

[26] H. Oldenberg, "Über die Datierung der ältern indischen Münz- und Inschriftreihen", *Zeitschrift für Numismatik*, vol. 8, Berlin 1881, pp. 289-328, esp. 292 (H. Oldenberg, "On the Dates of Ancient Indian Inscriptions and Coins", *IA* 10 (1881), pp. 213-227).

[27] H. Oldenberg, "Zwei Aufsätze zur altindischen Chronologie und Literaturgeschichte, 1. Zur Frage nach der Aera des Kaṇiṣka", *Nachrichten von der Kön. Ger.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Phil.-hist Klasse, 1911, pp. 427-441, esp. 441.

[28] 以下諸家堪爲代表：注 5 所引 R. D. Banerji 文；F. W. Thomas, "The Date of Kaniṣka", *JRAS* 1913, pp. 627-650, 1011-1042; C. Waddell, "The Date of Kaniṣka." *JRAS* 1913, pp. 945-952; CHI, pp. 582-585; H. C. Ghosh, "The Date of Kaniṣka", *IHQ* 4 (1928), pp. 760-764; IHQ 5 (1929), pp. 49-80; L. Bachhofer, "Die Ära Kanishkas", *OZ*, Neue Folge 4 (1927-28), pp. 21-43; "Zur Ära Kaniṣka",

OZ 1930, pp. 10-15; PHAI (1953), pp. 458-479. (PHAI (1923), pp. 245-256); J. E. Van Lohuizen-de Leeuw, *The "Scythian"* Period, Leiden: E. J. Brill, 1949, pp. 1-65, 381-382, 387; 注 18 所引 D. C. Sircar 文 , esp. 141-149; A. L. Basham, "The Succession of the Line of Kaniṣka" , *BSOAS* 20 (1957), pp. 77-88; *EHNI*, pp. 74-81, esp. 80-81, 等等。其中, H. C. Raychaudhuri, J. E. Van Lohuizen-de Leeuw, D. C. Sircar 等人的假說, A. K. Narain, "The Date of Kaniṣka" , In *PDK*, pp. 206-239, 有批評, 可參看。

[29] 詳見 *PDK*。

[30] *PHAI* (1953), 1953, pp. 458-479.

[31] 注 20 所引余太山文。

[32] R. E. 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London, 1967, pp. 46-47.

[33] *EHNI*, pp. 74-81, esp. 80-81.

[34] S. Shrava, *The Dated Kushāṇa Inscriptions*, Pranava Prakashan, New Delhi, 1993, No. 211. 案 : 一說 Panjtar 銘文按迦膩色迦紀元紀年。

[35] S. Konow, "Kalawan Copper-plate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4" , *JRAS* 1932, pp. 949-965.

[36] S. Konow, "Taxila Inscription of the Year 136" , *EI* 14 (1917-18), pp. 284-295.

[37] 注 28 所引 J. E. Van Lohuizen-de Leeuw 書 , pp. 1-65, 361-387.

[38] W. E. van Wijk, "The Eras in the Indian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Calculation of the Kharoṣṭhī Dates" , *Acta Orientalia* 3 (1925), pp. 79-91.

[39] 注 38 所引 W. E. van Wijk 文。

[40] J. E. Van Lohuizen, "The Date of Kaniṣka and Some Recently Published Images" , In *PDK*, pp. 126-133.

[41] 注 28 所引 A. L. Basham 文 , esp. 85-87; A. L. Basham, "Introduction" , In *PDK*,

pp. ix-xiv, esp. xi-xii.

[42] P. H. L. Eggermont, "The Purāṇa Source of Merutuṅga's List of Kings and the Arrival of the Śakas in India", In *PDK*, pp. 67-86.

[43]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3 頁，注 47。

[44] A. H. Dani, "The Date of Kaniṣka (Palaeographical Evidence)", In *PDK*, pp. 57-66.

[45] P. H. L. Eggermont, "The Śaka Era and the Kaniṣka Era", In *PDK*, pp. 87-93.

[46]《大正新脩大藏經》T27, No. 1545, 第 1004 頁。

[47] P. H. L. Eggermont, "The *History Philippica* of Pompeius Trogus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Scythian Empire", In *PDK*, pp. 97-102.

[48] 注 43 所引余太山書，第 144-167 頁。

[49] D. D. Kosambi, "Kaniṣka and the Śaka Era", In *PDK*, pp.123-125.

[50] 注 20 所引余太山文。

[51] 注 44 所引 A. H. Dani 文。

[52] R. Göbl, "Numismatic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Date of Kaniṣka", In *PDK*, pp. 103-113; D. W. MacDowall,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ṣka", In *PDK*, pp. 134-149.

[53] A. Maricq, "The Date of Kaniṣka. Two Contributions in Favour of A. D. 78", In *PDK*, pp. 179-199.

[54] D. C. Sircar, "The Saka Satraps of Wetern India", In *AIU*, pp.178-190, esp. 183.

[55] 注 54 所引 D. C. Sircar 文 , esp. 180-182.

[56] B. N. Mukherjee,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I", In *PDK*, pp. 200-205.

[57] R. Ghirshman, "Fouilles de Bégram (Afghanistan)", *JA* (1943-1945), pp. 59-71;

R. Ghirshman, *Bégram,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s Kouchans*, Le Caire, Imperimerie d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46, pp. 105-108; *EHNI*, p. 70.

[58] D. C. Sircar, "Palaeographical and Epigraphical Evidence of Kaniska's Date", In *PDK*, pp. 278-292; 注 18 所引 D. C. Sircar 文，esp. 141-149; D. C. Sircar, "The Kanishka Era", *JIH* 38 (1960), pp. 185-188. 本文之介紹以第一篇爲主。

[59] S. P. Tolstov, "Dated Documents from the Toprak-kala Palace, and the Problem of the 'Śaka Era' and the 'Kaniṣka Era'", In *PDK*, pp. 304-326.

[60] Б. И. Вайнберг,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орезма В Связи С Проблемой Кушанской Хронологии», In B. G. Gafurov; G. M. Bongard-Levin; E. A. Grantovsky; L. I. Miroshnikov; B. Y. Stavisky, ed., *Central Asia in the Kushan Reriod* I, Mockva, 1974, pp. 275-282.

[61] A. K. Warder, "The Possible Dates of PārŚva, Vasumitra (II), Caraka and MātṚceṭa", In *PDK*, pp. 327-336.

[62] F. Wilhelm, "Kanika and Kaniṣka – AŚvaghosa and MātṚceṭa", In *PDK*, pp. 337-345.

[63] D. C. Sircar, "The Sātavāhanas and the Chedis", In *AIU*, pp. 191-216, esp. 206-210.

[64]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823-824 頁。

[65] 注 44 所引 A. H. Dani 文。

[66] 注 28 所引 A. K. Narain 文。

[67] 注 57 所引 R. Ghirshman 書，出處同。

[68] S. K. Dikshit, "The Problem of the Kuṣāṇa and the Origin of the Vikrama Saṁvat", *ABORI* 33 (1952), pp. 114-170; 34(1953), pp. 70-112; 37(1956), pp. 27-

54; 38 (1957), pp. 93-114.

[69] 注 44 所引 A. H. Dani 文。

[70] P. L. Gupta, "The Coinage of the Local Kings of Northern India and the Date of Kaniṣka" , In *PDK*, pp. 114-120.

[71]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ṣka" , In *PDK*, pp. 247-258.

[72] 注 19 所引 B. Kumar 書（Appendix II）, pp. 277-283. B. Kumar 的批評對象主要是 R. Ghirshman。

[73] 注 28 所引 A. K. Narain 文。

[74] 參看注 20 所引余太山文。

[75] 注 53 所引 A. Maricq 文。

[76] J. Harmatt, "Minor Bactrian Inscription" ,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3 (1965), pp. 149-205, esp. 186-195.

[77] F. R. Allchin, "Archaeology and the Date of Kaniska: the Taxila Evidence" , In *PDK*, pp. 4-34.

[78] 注 52 所引 R. Göbl 文。

[79] 注 52 所引 D. W. MacDowall 文。

[80] 注 43 所引余太山書，第 168-181 頁。

[81] 注 28 所引 A. K. Narain 文。

[82] 說見注 20 所引余太山文。

[83] A. K. Narain, "A Postscript on the Date of Kaniṣka" , In *PDK*, pp. 240-243.

[84] 參看注 71 所引 E. G. Pulleyblank 文。

[85] J. M. Rosenfield, "The Mathura School of Sculpture; Two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Kushan Chronology" , In *PDK*, pp. 259-277.

[86] E. Zürcher, "The Yüeh-Chih and Kaniṣka in the Chinese Sources", In *PDK*, pp. 346-390, esp. 356-357.

[87] 說見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西域史地文物叢考》, 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46—59 頁。此文指出：世高以漢靈帝末年關洛擾亂纔南遊豫章、廣州，而最後死於會稽，其卒年必在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以後，並非說者所指公元 170 年左右。

[88] H. Falk, "The yuga of Sphuijiddhvaja and the Era of the Kuṣâṇas", *SRAA* 7 (2001), 121-136.

[89] *PHAI*, pp. 467-468; H. C. Raychaudhuri, "A Note on the Chrological Relation of Kaniṣka and Rudradāman I", *IHQ* 6 (1930), 149-152.

[90] *EHNI*, pp. 74-81.

[91]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西域南北道綠洲諸國的兩屬現象——兼說貴霜史的一個問題》,《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 中華書局 2003 年版, 第 486-494 頁。

[92] 注 28 所引 A. K. Narain 文。

[93] 注 58 所引 D. C. Sircar 文。

[94] 注 86 所引 E. Zürcher 文 , esp. 354-356.

[95] 注 19 所引 B. Kumar 書 , pp. 64-65。

[96] R. G. and D. R. Bhandarkar, "A Peep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urya Dynasty to the Downfall of the Imperial Gupta Dynasty, B.C. 322 - circa 500 A.D", *JBBRAS*, vol. XX, Bombay 1902, pp. 356-408, esp. p. 386.

[97] R. C. Majumdar, "The Date of Kanishka", *IA* 46 (1917), pp. 261-271; R. C. Majumdar, "The Kushan Chronology",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Letters, University of Culcatta* 1 (1920), pp. 65-112.

[98] *PHAI*, pp. 468-469，對 R. C. Majumdar 的公元 248 年說有批評，可參看。

[99] V. Lukonin, "Sassanian Conquests in the East of Iran and the Problem of Kushan Chronology" , In D. Y. Stavisky,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Culture of Central Asia in the Kushan Period (Dushanbe 1968), Abstracts of Papers by Soviet Scholars,* Moscow, 1968, pp. 37-39.

[100] E. Zeymal, "278 A.D. – The Date of Kanishka" , 見注 99 所引 D. Y. Stavisky 書 , pp. 22-27.

[101] 注 18 所引 D. C. Sircar 文 , esp. 145。

“屯田”與“積穀”
——西漢在西域的農業活動拾遺

李豔玲

學界對西漢在西域的屯田問題多有論述，對“積穀”事宜則鮮有涉及。關於屯田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屯田管理機構、屯田地點、方法及意義、屯田人員構成等方面。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對屯田地域的變遷、屯田土地的來源及生產規模、積穀活動等問題做一些補充，以進一步考察西漢在西域的農業活動。不當之處，謹請方家賜教。

一

西汉政權最初屯田於何處？《史記·大宛列傳》稱漢伐大宛之後，“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1]《漢書·西域傳上》稱“自敦煌西至鹽澤，

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書·西域傳下》載“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漢書·鄭吉傳》記“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2]“使者”和“校尉”是“使者校尉”的略稱。[3]引文中記述的初次屯田地點並不一致，學界一般綜合兩書記載認爲武帝時期初屯輪臺，後又屯田渠犂。[4]按《史記·大宛列傳》由太史公撰述，其稱最先屯田輪臺當可信從。輪臺屯田是趁破大宛之威而設置的，當時漢破大宛雖獲得了向西域推進勢力的好時機，但尚無力量顛覆匈奴在這一地區的霸主地位，所以衹能屯田於被漢軍屠滅的輪臺以便觀察西域各國的動向，並宣揚漢之威德，同時積穀以爲漢之奉使西域者提供糧食。該屯田的設立時間當在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或天漢元年（公元前100年）。[5]

至於鄰近輪臺的渠犂屯田，當並不始於武帝時期。《漢書》記征和中，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向漢武帝奏言："故輪臺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㷭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6]桑弘羊等就此提出了在渠犂屯田積穀的

具體策略，但武帝並未採納。這一建議到昭宣時期纔得以實施。或以爲：桑弘羊對輪臺至渠犂一帶的情況比較瞭解，應正是太初、天漢間屯田的結果；奏言稱“益通溝渠”、“益墾溉田”，可以理解爲由於原有的屯田，輪臺一帶溝渠已通，溉田已墾，而桑弘羊不過請求增益而已，即他上奏時，輪臺、渠犂的屯田尚在進行；桑氏提出“置校尉三人分護”，是擴大原有屯田規模的需要。[7] 分析奏言內容，可以發現，“益通溝渠”是用以描述輪臺以東渠犂等地優越的自然條件的。再者，即使存在已通的“溝渠”，也可能是當地土著居民修建的簡易的水利設施，其並無已有屯田的含義；後面的“通利溝渠”正是針對初次屯田而言，“益墾溉田”則是指校尉領軍屯田之後的募民墾殖活動，衹是一種設想。所以，桑弘羊的建議並未透露任何關於渠犂已有屯田的信息。

另外，《漢書》稱“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杅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8]。意即設校尉屯田，坐鎮原已被開墾的輪臺，並以其地爲中心而實施桑弘羊征和四年之議開墾輪臺以東渠犂等地。[9] 若早在武帝時期置校尉屯田輪臺以東的渠犂，又何須稱“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所以，桑弘羊的奏言恰說明輪臺以東渠犂等地在武帝時期不曾設校尉領護屯田，也無所謂當時渠犂屯田一度中止。[10]

因龜茲王殺賴丹，輪臺屯田再次結束。“輪臺”之名亦不復見於有關此後的漢代文獻記載。根據《漢書》中把桑弘羊等人建議與昭帝屯田輪臺及其以東事系於“渠犂條”，以及渠犂的道里四至記載了西到龜茲的距離，可推測昭帝屯田輪臺失敗之後，這一地區成爲渠犂的一部分，“輪臺”地名消失。如此，我們可以理解《漢書·西

域傳下》與《鄭吉傳》所謂（初）置校尉屯田渠犂事，實指武帝田輪臺，即班固在記述時以廣義的“渠犂”指代原來的輪臺。[11] 至於《西域傳上》稱“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應爲狹義的“輪臺”、“渠犂”，是班固連後事通叙之，其中渠犂有田卒是指昭帝時期校尉賴丹屯田事，而非言武帝時輪臺、渠犂已皆設校尉行屯田。

桑弘羊等人建議屯田輪臺以東，與破大宛之後西漢在漢匈交戰中損失慘重密切相關。特别是征和三年（公元前 90 年）李廣利兵敗降匈奴，影響着西域諸國對漢匈兩方的傾向性，桑弘羊等人的建議旨在使之不因漢軍不利而動搖。奏文中特别提到“輔烏孫爲便”，意在保證漢與烏孫的聯繫不被匈奴破壞，以免西漢斷匈奴右臂的努力前功盡棄。衹是因武帝面對内外形勢的變化，決定改弦更張，頒輪臺“哀痛之詔”[12]，桑弘羊等人的意見未被采納。漢與匈奴在西域的力量對比隨之有所變化，匈奴勢力轉甚。如匈奴扶立的樓蘭王因受匈奴反間，多次發兵遮殺漢使。匈奴還曾在征和五年（公元前 88 年）離間羌與西漢，言：“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13] 這無疑會威脅漢通西域的大業。有桑弘羊等人輔佐的昭帝在即位初的始元元年（公元前 86 年）派賴丹領軍屯田輪臺[14]，並稱是“用桑弘羊前議”，當正是對這種狀況所做出的反應，其目的仍是爲對抗匈奴以維護漢在西域的威望。但西漢僅任命扜彌太子爲校尉行屯田事，並且對於龜兹王殺校尉上書謝罪，“漢未能征”，可知昭帝初期仍承武帝末年堰兵休士的策略，亦足見當時西漢的影響力已不比初破大宛之時。

元鳳四年（公元前 77 年），西漢屯田鄯善國的伊循。西漢經過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在始元、元鳳間有所恢復。匈奴内部自始元二

年（公元前 85 年）則因爭單于位發生分裂而勢衰，對西漢北方邊境的威脅減輕。元鳳三年（公元前 78 年），本欲襲擊匈奴的漢軍大敗烏桓，“匈奴繇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15]。匈奴在寇漢北邊不利的情況下，又將戰爭矛頭指向與漢聯姻的烏孫，加強在西域的活動。傅介子使大宛，受詔責詰曾經殺害漢使的龜茲王和樓蘭王，說明當時西漢也有意重新增強自身在西域的影響力。傅介子從大宛還至龜茲誅殺從烏孫歸來的匈奴使者，回中原後又提出斬殺龜茲王，稱“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16]，其最終按霍光令就近以樓蘭驗之。西漢欲再次樹立在西域諸國中的威望，也意味着要重新與該地匈奴的勢力對抗。漢殺親匈奴的樓蘭王而立親漢的尉屠耆，樓蘭更名鄯善。新立的尉屠耆懼被前王之子所殺，請西漢遣將在“地肥美”的伊循城“屯田積穀”，使之“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塡撫之。其後更置都尉”。[17] 這樣既防前王之子反叛，更防匈奴勢力在樓蘭地區捲土重來，從而爲西漢控制西域南道，進一步經營西域奠定基礎。但西漢遣屯伊循人數少於武帝初屯輪臺時期，當與“鹽鐵會議”確定堅持與民休息之策有關。可能至地節二年或三年（公元前 68 年或前 67 年），伊循才更置都尉，擴大屯田規模，並由敦煌太守領屬。[18]

地節二年，宣帝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19]，以討伐親匈奴的車師。這緣於車師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而其親向勢力已衰的匈奴，威脅着西漢與烏孫的交通。[20] 立足於渠犂屯田，西漢一度攻取車師地。面對匈奴發兵，宣帝“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21]。除爲穩固自身在西域諸國中的地位，西漢首次明確提出在西域屯田積穀以驅逐匈奴勢力爲目

的。鄭吉聽從詔令，分渠犂田卒三百人別田車師。但終因車師地近匈奴而遠渠犂，西漢田卒無法應付匈奴爭奪車師，衹得罷車師屯田盡歸渠犂，由三校尉領護該地屯田，車師地重歸匈奴。

隨着匈奴勢力的日益衰落，主管西方的匈奴日逐王先賢撣降漢，車師亦附漢。至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西漢在鄰近渠犂屯田區的烏壘設立西域都護府，並新辟比胥鞬屯田。即如《漢書》所記，“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都護治烏壘城”。[22] 懸泉漢簡證實，文中“北胥鞬”爲“比胥鞬”之誤，並且該地屯田設有比胥鞬校尉。[23] 西漢將渠犂的部分屯田士遷徙到比胥鞬，至於其在現今何地，學界意見不一。[24] 我認爲在莎車國境内的觀點更爲合理。[25] 或以爲西漢將匈奴勢力逐出車師地，不隨即在該地或附近屯田，於理不合，所以比胥鞬應在車師境內。考慮當時情勢，車師附漢，經由車師的交通開始暢通。匈奴設在焉耆、危須、尉犂間的僮僕都尉撤銷，西漢取代匈奴控制西域，在烏壘設府施政，“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匈奴已無力威脅西漢對西域的統治。當時並無立即屯田車師之絕對必要。這時，烏孫和康居成爲西域最大國。烏孫在神爵二年以匈奴外孫泥靡爲昆彌卻沒有扶立西漢外孫元貴靡，康居原先亦羈事匈奴而輕西漢，若兩國再與衰落的匈奴勢力聯合，則必嚴重威脅漢在西域的統治。兩者自然開始成爲西漢防備的對象，上引文所述都護職責特別提到“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也說明了這一點。從渠犂分出一校尉屯田莎車附近，將西漢屯駐勢力向西推進，可增強西漢對南道及西部諸國的控制。《光明日報》曾報導在圖木舒克市北面的絲綢之路古道荒漠中發現

一處屯田及官署遺址群，主要遺址是一座較大型椎形建築，建築物由紅柳、羅布麻、麥草泥分層築成，周圍遺存有民居、水渠和防禦性建築，地面遺留有大量燒灰及漢代陶片。建築周圍尚能分辨的屯田遺址約有萬畝以上。文中認定該遺址爲“北（比）胥鞬”屯田處。[26] 這或可作爲西漢曾屯田莎車附近的佐證。由都護的職責及“屯田校尉始屬都護”可知此時屯田目的不再主要針對衰弱的匈奴，而是改爲鎮撫監察以烏孫、康居爲首的西國。位處西部的比胥鞬屯田與中、東部的渠犂、伊循屯田相互輔助，可以穩固西漢對西域的統轄。

甘露年間，西漢爲平息自己所分立的烏孫大小昆彌之間的矛盾，一度屯田烏孫赤谷城，爲大小昆彌劃分人民地界。該地屯田當始于甘露二年（公元前 52 年），或至多持續了兩年 [27]，並最終達到了分化削弱烏孫和扶植其親漢勢力的目的。曾在烏孫屯田的辛慶忌“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28] 他“屯焉耆國”的原因，以及這一活動是屯田還是僅限於軍事屯守，無從考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本近匈奴而輕漢，及至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漢朝正月，“咸尊漢矣”[29]，漢在西域的聲威日隆。西漢屯焉耆可能是順應這一形勢加大統治西域力度的結果，同時可保障西域都護府至焉耆及經由焉耆至車師的交通。

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 48 年），西漢設立戊、己兩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 [30]，即屯田交河地。兩校尉的前身當是渠犂校尉和比胥鞬校尉，從而以直屬中央的正式武職取代臨時性的職官——屯田校尉，渠犂、比胥鞬屯田規模隨之縮小。[31] 這次屯田重心的轉移或與匈奴郅支單于在西部擴張勢力有關。宣帝末年，居於西部的郅支單于見西漢待呼韓邪單于甚厚，其向西移，欲聯手烏孫小昆彌。在被拒絕

後，郅支單于破烏孫，兼併堅昆、丁令等國，之後又多次侵襲烏孫。這種局勢下，西漢屯田駐守車師孔道以防備郅支勢力，自在情理之中。屯田車師亦當與車師日益凸顯的交通樞紐地位不無關係，因經由該地通往西域其他諸國較自鄯善地區爲易，西漢駐屯車師可以保障愈加頻繁的東西往來。

河平元年（公元前 28 年），己校尉徙屯田於姑墨。[32] 此次屯田起因於匈奴外孫日貳殺烏孫小昆彌後逃至康居。而勢力較強的康居“自以絕遠，獨驕嫚”。[33] 西漢屯田姑墨無疑是防備日貳一如匈奴郅支單于聯手康居襲掠烏孫等周邊政權而威脅漢對西域的統治。日貳被小昆彌安日刺殺後，己校尉當撤回原駐地。但日貳被殺的年代不明，對刺殺日貳人員進行獎賜的都護廉褒的任期也不確定，或至河平二年（公元前 27 年），或至陽朔元年（公元前 24 年）。[34] 姑墨屯田結束的時間最晚也應在這兩個年份。

至遲到平帝即位，戊己校尉治所已從交河東遷至高昌壁。[35] 屯田中心動遷的原因或正如王素所述：高昌正當通道，離通往敦煌的“新道”尤近。[36]

另外，西漢在今土垠遺址設置居廬（訾）倉，遺址所出漢簡及附近的柳堤、灌渠遺跡表明該倉附近極可能存在過屯田。居廬倉的設立，或以爲早在天漢元年（公元前 100 年）漢列亭至鹽水時期，王莽時期仍在使用。[37] 但傅介子刺殺樓蘭王，西漢屯田伊循之前，主要由當地樓蘭人負責迎送接待漢使，即《漢書》稱“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38]。所以，居廬倉的設置及其附近行屯田當不早於伊循屯田。考慮到這一地點也位於東西交通要道，居廬倉附近屯田或在伊循設置屯田後不久。

西域屯田一直持續到王莽時期，在車師受到匈奴與投降的車師後王國人的聯合襲擊，戊己校尉史等擕衆入匈奴後，車師屯田當無從繼續。隨着西域政權重新亲匈奴而叛漢，西漢與西域的關係斷絕，西域屯田活動亦當終止。

二

關於屯田土地的來源，文獻中沒有記載。趙充國奏請在河湟屯田時提到，“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田事出，賦人二十畮”[39]。可見他意將羌人沒有耕墾的“故田”和“公田”作爲屯田土地使用。武帝時期初屯被屠滅的輪臺，以及桑弘羊建議屯田輪臺東的捷枝、渠犂等，都是故國，無疑存在“故田”。與前引《漢書》所載不同的是，明王禕在《大事記續編》卷一中記“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牧園，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40]；《水經注》卷二記桑弘羊等人奏言爲“故輪臺以東，地廣，饒水草，可溉田五千頃以上”。[41]兩書都未稱渠犂等國爲“故國”，按此理解，桑氏建議屯田的土地则是沒有開墾的公田。另外，應鄯善王請求在國中伊循城屯田的土地當屬於“公田”。因此，西漢在西域用以屯田的土地很可能主要是當地無人墾殖的“故田”和“公田”。

至於屯田規模，在此衹從人口數量上進行粗略考察。姑墨屯田

因時間較短，略而不論。前引《漢書》稱輪臺、渠犂的屯田最初祇有田卒數百人。根據《漢書》記載，地節二年宣帝重開渠犂屯田，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發西域城郭諸國兵，並“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車師降漢，鄭吉曾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面對匈奴發兵襲擊田車師者，鄭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但最終漢“罷車師田者……（鄭吉）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42] 可知在漢匈爭奪車師期間及撤銷車師屯田後，渠犂田卒增加，達到 1800 人。按一校尉領兵滿編是一千人左右[43]，那麽在渠犂屯田的三校並不滿編。後來渠犂屯田人數是否增至滿員，不得而知。但神爵三年一校尉徙屯比胥鞬，另一校尉跟隨都護移駐烏壘轉化爲西域副校尉，當致使渠犂屯田人數減少。隨着渠犂校尉與比胥鞬校尉遷往車師轉變成戊己校尉，渠犂屯田祇留有下屬官員負責，規模較以往縮小。[44] 比胥鞬屯田在設置一校尉時，田卒人數至少應有數百人，校尉遷走後，該地屯田是否繼續及屯田人數，無從考察。

前述元鳳四年伊循屯田祇有吏士 40 人，地節二年或三年更設伊循都尉，又稱“伊循城都尉”，另有多枚漢簡記載弛刑士被送往當地，屯田活動一直持續到西漢撤離西域之前。[45] 這一地區的屯田應頗具規模。

戊、己校尉屯田車師之初，所將屯田卒不知是否滿編。但王莽時期始建國二年（公元 10 年），戊己校尉史、司馬丞、右曲侯等“殺校尉刀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之後“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46]，說明西漢末期車師屯田規模已在兩千人以上，且有舉家甚或整個家族遷移到當地者，这已具有民屯性質。

另外，一枚懸泉漢簡記載：

> 五月壬辰，敦煌太守彊、長史章、丞敞下使都護西域騎都尉、將田車師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縣，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白大扁書鄉亭市里高顯處，令亡人命者盡知之，上赦者人數太守府別之，如詔書。（Ⅱ 0115②：16）[47]

該簡年代爲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文中的“部都尉”包括伊循都尉。[48] 按大扁書多公佈在人群集聚、流動性強的較大的驛站、客舍，以及居住人口數量較多的鄉、亭、市、里、官所等要鬧處。[49] 所以，當時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及伊循都尉轄治的人口當不在少數，這些地區或已有設鄉里組織加以管理者。

黃文弼先生根據土垠遺址的一枚簡文“庚戌旦出坐西傳日出時三老來坐食歸舍”，指出鄉官“三老”的存在說明該地已實行鄉村制度。[50] 則居廬倉附近已有較大的平民聚落，當地的屯田人員也不再單純由戍卒構成。

伊循、居廬倉附近，以及車師的大規模屯田，與其重要的戰略地位相對應。車師、居廬倉等地的屯田由軍屯發展成較大規模的民屯，當正是應用了桑弘羊提出的先遣田卒“田一歲，有積穀”，再“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的策略。屯田活動的進行，使西域出現新的農業生產區，無疑能夠推動屯田所在地區的經濟開發。

西域屯田使用犁等鐵制農具，並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建設，使當地的農業生產水平提高。[51] 但屯田是西漢一手造就的獨立於當地政權的再生產組織[52]，以政治、軍事防禦爲首要目的，當無改善當地政權農業生產條件，向其推廣先進技術的意圖。而屯田生產規模有限，也制約着屯田開發對西域農業整體生產水平的影響。考慮到時代較晚

的尼雅遺址，雖出土了鐵鐮，但大部分生產工具仍是木制的[53]，或可推測西漢屯田時，西域諸國土著民的農具以木質爲主，與屯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存在明顯差距，以致西域的農業生產技術總體發展極不平衡。

三

屯田區設倉以積穀，土垠遺址出土的漢簡中出現了“居廬訾倉”、“交河曲倉”等倉名。[54]至於倉的形制，可參考居廬倉遺址的相關資料。黃文弼在該遺址考察時，發現一“長方形土台，高八英尺許，長十九英尺。寬五英尺五寸。上豎立木竿五……在竿之四週，尚有許多四方井穴，用柳條滲以木屑，編織爲褡，覆於井口，約四尺建方，彼此相通爲甬道。……在竿之兩旁，曾掘二井，內滿儲沙子，無一他物。……復掘其旁之其他井穴，有類似高粱之穀粒，已腐化結爲乾餅”[55]。關於那些井穴，孟凡人指出應是用於儲存糧食的窖穴。[56]中原地區以窖穴儲存糧食的方法起源甚早，洛陽西郊漢代居址有方形倉窖，窖內鋪木板或草，上面再撒鋪一層穀糠，以防糧食受潮發霉。[57]居廬倉遺址井窖上的柳條褡摻以木屑或也是爲了防潮，井穴相通爲甬道，則或爲了加強窖內通風散熱。這種地下倉窖與西域極爲乾燥的自然環境相適應，但不排除當地有地上倉儲設施的可能。

前文提到鄭吉“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鄯善王請求西漢在

伊循“屯田積穀”等，似乎“積穀”僅限於屯田收穫。但屯田生產能力有限，需要內地轉運穀物。[58] 此外，屯田地區的“積穀”作爲一種經濟活動，還存在購買的方式。

土垠遺址出土的一枚簡文記曰：

使者王君旦東去。督使者從西方來，立發東去，已。坐倉受糴，黄昏時歸舍。[59]

按“糴”通“糴”，在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懸泉漢簡中多次出現，表示購買糧食。[60] 簡文中的“坐倉受糴”，説明附近有屯田的居廬倉也通過從當地購買的方式儲積穀物。出售穀物的可能是由內地移居參與民屯的人，也可能是當地土著政權的居民。

關於屯田區購買西域土著居民糧食以積穀的可能性，可利用前引桑弘羊等人的建議進行分析。桑弘羊等建議屯田輪臺以東的捷枝、渠犂地區，言："其旁國少錐刀，貴黄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乏。"顔師古注曰："言以錐刀及黄金彩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即把“錐刀”作爲換取西域諸國穀物的物品之一。吳仁桀則認爲："'錐'當作'錢'，其偏旁轉寫，以戔爲佳耳。西域諸國如罽賓、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犂旁國少此，故貴黄金、綵繒，可以用此易五穀。"[61] 吳説相對合理。況且新疆諸多史前考古文化遺存常見金屬制小刀和錐等工具，並不缺少錐刀之物。[62] 因而，桑弘羊等所言意在説明當時西域諸國不流行使用貨幣，商品經濟尚不發達，屯田區可以利用當地民衆喜好黄金和漢地綵繒的風尚，用黄金、絲織品換購土著居民的穀物。

或以爲屯田區周邊政權糧食供給能力有限，雙方開展糧食貿易

的可能性不大。但西域政權間的“仰穀”貿易[63]，說明綠洲政權有餘糧出售，完全具備與屯田區進行糧食貿易的基礎。

另外，《鹽鐵論·輕重十四》中文學對開發邊地的看法，曰：“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64]表明邊屯戍士的衣物由中原內地提供。居延漢簡則證實，政府向屯戍人員發放衣物的同時，還會將布、帛等實物作爲俸祿給屯戍區的官吏；除政府發放的官服外，還有私人攜帶至屯戍區者；絲織品及其他衣物進入當地商品流通領域。[65]土垠遺址也有絲織品殘片出土[66]，可見西域屯田區也不例外，有大量絲織品輸入，爲絲織品—穀物貿易提供了條件。根據班固《與弟超書》稱：“竇侍中令載雜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香、毾㲪。”[67]知東漢時期，西域屯駐區同周邊政權存在用內地攜來的絲織品換購馬匹、香料、毛織品的商業活動。較東漢經營西域深入的西漢時期亦當如此。綜合考慮，在屯田的基礎上，西漢屯田區與西域土著政權之間完全可能存在用絲織品換取穀物的積穀活動。[68]屯田區與西域土著政權間的積穀貿易關係當以屯田區爲中心，需要西漢向屯田區輸送錢帛作爲保障。因而，這種貿易同屯田活動本身一樣，往往隨西漢在西域的統治勢力強弱變遷。西漢勢力一旦退出，屯田積穀活動中止，積穀貿易關係也會隨之瓦解，具有不穩定性。

屯田生產爲積穀活動提供糧食來源，積穀活動也保障着屯田的順利進行。兩者在發揮重要經濟功能的同時，也是西漢向西域擴展勢力、樹立威德，對其進行統轄的重要策略。西漢首屯中部輪臺地區，將自身勢力楔入西域，以對抗匈奴勢力並宣揚漢之威德。在屯

田一度中斷後，西漢重新屯田於靠近漢地的東部地區——伊循（還可能包括居盧倉附近），扶植親漢勢力；進而再次推進到中部渠犂進行屯田，以驅逐匈奴勢力。隨着汉匈力量對比發生轉折性變化，西漢以西域中部爲中心鎮撫諸國，屯田地域進一步向西擴展，田於比胥鞬，以戒備西方勢力較強的烏孫、康居叛亂或與匈奴勢力聯合，後來又重點發展東北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車師前國屯田。間或根據西域事態發展變化，進行臨時屯田。西漢藉屯田，牢牢控制着東部與東北部的戰略要地，經中部向西深入，對西域進行全面管轄。從而西漢在督察西域諸國，防備匈奴勢力捲土重來的同時，保障東西交通的暢通。

西漢在西域屯田利用無人墾殖的“故田”和“公田”進行生產，多有發展成爲民屯聚落者。生產中採用中原的先進技術，推動了當地農業的開發，但也造成西域農業技術兩極分化。而爲彌補屯田生產能力的不足，屯田區從土著民手裏購進穀物，亦能夠刺激當地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藉助屯田積穀，西漢在穩固自身對西域的統治的同時，使土著政權，特別是位於屯田區附近的政權在政治、軍事上有所倚重，保持自身的相對獨立性，經濟上得到發展。諸政權的綜合實力對比因此有所變化，進而對西域政治格局變遷產生一定影響。

■ 注釋

[1] 《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 1982 年版，第 3179 頁。

[2] 《漢書・西域傳上》，中華書局 1962 年版，第 3873 頁；《西域傳下》，第 3912 頁；《鄭吉傳》，第 3005 頁。

[3] 余太山：《兩漢西域都護考》，載氏著：《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3—257 頁。

[4] 有學者結合桑弘羊等人建議屯田渠犂的奏言（詳見後引文），認爲武帝時期衹是提出屯田輪臺（即侖頭）和渠犂的建議，並未實際推行。如勞榦認爲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 86 年）至七年纔屯田於輪臺和渠犂，《漢書》的記載是一種大致叙述，否則武帝的輪臺之詔不可通。見勞榦：《漢代的西域都護與戊己校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 28 本上（1956 年），第 485—496 頁。張維華指出西域屯田始於昭帝時期，即扜彌太子賴丹在始元年間屯田輪臺，大規模的屯田經營是宣帝時鄭吉以渠犂爲中心的屯田，其地域似當包括西面的輪臺。見張維華：《西漢都護通考》，載氏著：《漢史論集》，齊魯書社 1980 年版，第 245—308 頁。李大龍則提出西漢在輪臺、渠犂屯田，首議於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而推行於昭帝時，兩地的大規模屯田卻是在宣帝地節二年（公元前 68 年）。見李大龍：《西漢西域屯田與使者校尉》，《西北史地》，1989 年第 3 期，第 119—122 頁。另外，曾問吾認爲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初屯渠犂，昭帝時期才屯田輪臺。見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 年版，第 50—51 頁。

[5] 關於輪臺屯田的背景，參見管東貴：《漢代的屯田與開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5 本第 1 分（1973 年），第 27—110 頁。至於設立輪臺屯田的時間，參見注 3 所引文。另外，施丁認爲屯田輪臺在天漢年間（公元前 100 年—

前97年)，但他認爲初屯地不是輪臺，可能是樓蘭。見施丁：《漢代輪臺屯田的上限問題》，《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20—27頁。

[6] 《漢書・西域傳下》，第3912頁。中華書局標點爲"輔烏孫，爲便"，今改。

[7] 同注3。

[8] 《漢書・西域傳下》，第3916頁。

[9] 參見張春樹:《試論漢武帝時屯田西域侖頭（輪臺）的問題》,《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4輯第3冊，大陸雜誌社印行1975年版，第89—92頁。

[10] 李炳泉曾指出渠犂屯田始於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或三年之間。他根據桑弘羊等人的奏言，認爲渠犂屯田在征和四年或前一年停止，昭帝時期也未恢復。見李炳泉：《西漢西域渠犁屯田考論》，《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第10—17頁。

[11] 劉光華認爲既然《漢書》稱昭帝用桑弘羊前議，則賴丹屯田輪臺不確，"輪臺"應爲"渠犂"之誤；而《漢書・鄭吉傳》中"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的記載是昭帝時期的事，非武帝時期。見劉光華：《漢代西北屯田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5—76頁。

[12] 關於桑弘羊等人提出奏議的背景及武帝頒佈"輪臺詔"的原因，參見田餘慶:《論輪臺詔》,載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0—62頁。

[13]《漢書・趙充國傳》，第2973頁。

[14] 關於賴丹屯田輪臺的時間，參見薛宗正：《西漢的使者校尉與屯田校尉》，《新疆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第105—110頁。

[15]《漢書・匈奴傳上》，第3785頁。

[16]《漢書・傅介子傳》，第3002頁。

[17]《漢書・西域傳上》，第3878頁。

[18] 對於伊循屯田擴大規模的時間及原因,參見李炳泉:《西漢西域伊循屯田考論》,《西

域研究》2003 年第 2 期，第 1—9 頁。

[19]《漢書・西域傳下》，第 3922 頁。

[20] 有關西漢遣鄭吉等屯田渠犂的原因，參見注 11 劉光華書，第 78—79 頁。

[21]《漢書・西域傳下》，第 3923 頁。

[22]《漢書・西域傳上》，第 3874 頁。

[23] 張俊民:《“北胥鞬”應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89—90 頁。

[24] 参见嶋崎昌：《隋唐時代の東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國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学出版会 1977 年版，第 23—24 頁。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 1981 年版，第 336—337 頁。錢伯泉：《北胥鞬考》，《新疆社會科學》1985 年第 2 期，第 116—122 頁。蘇北海:《別失八里名稱源於北胥鞬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 年第 4 期，第 169—176 頁。張德芳：《從懸泉漢簡看兩漢西域屯田及其意義》，《敦煌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114 頁。殷晴：《漢唐時期西域屯墾與吐魯番盆地的開發》，載殷晴主編：《吐魯番學新論》，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62—565 頁。劉國防:《西漢比胥鞬屯田與戊己校尉的設置》，《西域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23—29 頁。

[25] 參見周軒:《北胥鞬新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 年第 3 期，第 215— 221 頁。

[26] 王瑟：《西漢在西部最大屯田區被發現》，《光明日報》2009 年 7 月 5 日第 5 版。

[27] 參見李炳泉:《屯田與兩漢對西北邊疆的經略》，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 年，第 31—32 頁。

[28]《漢書・辛慶忌傳》，第 2996 頁。

[29]《漢書・西域傳上》，第 3896 頁。

[30] 關於西漢戊己校尉分置的論述，見孟憲實:《西漢戊己校尉新論》，《廣東社會科學》2004 年第 1 期，第 128—135 頁。

[31] 賈叢江：《西漢戊己校尉的名和實》，《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33—42 頁。

[32] 參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附錄》, 中華書局 1991 年版, 第 85 頁。

[33]《漢書 · 西域傳上》, 第 3892 頁。

[34] 有關廉褒的都護任期, 參見注 3 所引文。

[35] 余太山 :《兩漢戊己校尉考》, 載注了所引氏著, 第 258—270 頁。

[36] 王素 :《高昌史稿 : 統治編》, 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81—82 頁。

[37] 關於土垠遺址與居廬（訾）倉的對應關係及其性質、興衰時間, 見孟凡人 :《樓蘭新史》, 光明日報出版社、新西蘭霍蘭德出版有限公司 1990 年版, 第 60—83 頁。王炳華:《"土垠" 遺址再考》,《西域文史》(第 4 輯), 科學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61—82 頁。至於居廬倉附近曾存在屯田的論述, 見王先生文。

[38]《漢書 · 西域傳上》, 第 3878 頁。

[39]《漢書 · 趙充國傳》, 第 2986 頁。

[40]《欽定四庫全書》史部 91,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 第 10 頁。

[41] 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 :《水經注校證》, 中華書局 2007 年版, 第 39 頁。

[42]《漢書 · 西域傳下》, 第 3922—3923 頁。

[43] 賈叢江 :《關於西漢時期西域漢人的幾個問題》,《西域研究》2004 年第 4 期, 第 1—8 頁。

[44] 關於渠犂三校尉的轉徙變遷, 見注 31 所引文。

[45] 同注 18 所引文。

[46]《漢書 · 西域傳下》, 第 3926 頁。

[47] 胡平生、張德芳 :《敦煌懸泉漢簡釋粹》,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15 頁。

[48] 注 18 所引文。關於伊循都尉為部都尉的論述, 另參見賈叢江 :《西漢伊循職官考疑》,《西域研究》2008 年第 4 期, 第 11—15 頁。

[49] 參見馬怡 :《扁書試探》, 載孫家洲主編 :《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 文物出版社

2007年版，第170—183頁。

[50] 黄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1948年版，第189—191頁。

[51] 參見殷晴：《絲綢之路與西域經濟——十二世紀前新疆開發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74—78頁。法國學者童丕根據古代中亞和西亞灌溉技術發達的情況，以及克里雅河流域圓沙古城的考古成果，認爲西域早在西漢屯田經營之前，已存在相當規模的灌溉工程。他還指出，桑弘羊等提到輪臺東部捷枝、渠犂故國"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若按每人耕作20畝計算，則需要25000人經營，這應是一個或幾個當地政權全部居民的數目，亦表明漢族到來之前渠犂等小國居民已依賴於灌溉。見E. Trombert, "Notes pour une Évaluation Nouvelle de la Colonisation des Contrées d'Occident au Temps des Han", *Journal Asiatique*, tome 299, n° 1(2011), pp.67-123. 但根據《漢書》記載，渠犂有1480人，周邊分别與龜茲、烏壘、尉犁、且末、精絕相接。除龜茲人口達8萬之多，其他諸國與渠犂人口總和爲17250人，較25000人相差很多。況且，在地廣人稀的西域，幾國共同開發一地建設水利工程的可能性不大。殷晴也在書中提出《水經注》中的"可溉田五千頃以上"比較合乎情理（同書，第67頁注①）。另外，張波提到，《水經注》記載索勱横斷注賓河，"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第37頁），可證明西域土著民不曾進行攔截河流發展大規模灌溉的水利建設。目前屬於西漢進入西域以前的較爲密集的灌溉渠道除在圓沙古城發現外，並不見於西域其他地區。鑒於西域總體人口數量較少，推測在西漢屯田建設大規模水利工程之前，當地居民實行的灌溉技術主要是"撞田"，即利用地形和水勢等條件進行泛灌，有時修築簡易堤防疏導或堵截流水。參見張波：《綠洲農業起源初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3期，第137—154頁。

[52]〔日〕尾形勇著，呂宗力譯：《漢代屯田制的幾個問題——以武帝、昭帝時期爲中

心》，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62—296 頁。

[53]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考古隊：《新疆民豐大沙漠中的古代遺址》，《考古》1961 年第 3 期，第 119—122，126 頁。

[54] 注 50 所引書，第 192 頁簡 16。

[55] 注 50 所引書，第 106 頁。

[56] 注 37 所引孟凡人書。

[57] 余扶危、葉萬松：《我國古代地下儲糧之研究（中）》，《農業考古》1983 年第 1 期，第 268—269 頁。

[58] 參見注 11 劉光華書，第 155—158 頁。

[59] 注 50 所引書，第 189 頁及木簡摹本 19。簡文內容釋讀得淩文超學長指正，在此表示感謝。

[60] 于振波：《從糴粟記錄看漢代對西北邊塞的經營——讀〈額濟納漢簡〉劄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103—107 頁。

[61]（清）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見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外二種）》，中華書局 2005 年版，第 476 頁。

[62] 參見陳戈：《關於新疆地區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考古》1990 年第 4 期，第 366—374 頁。安志敏：《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圍的青銅文化遺存》，《考古》1996 年第 12 期，第 70—77 頁。

[63] 關於西域政權間的"仰穀"貿易，參見山本光朗：《"寄田仰穀"考》，《史林》，第 67 卷第 6 號（1984 年），第 32—65 頁。拙文《"寄田"與"仰穀"》，載羅豐主編：《絲綢之路上的考古、宗教與歷史》，文物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 頁。

[64]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 1992 年版，第 180 頁。

[65] 陳直：《西漢屯戍研究》，見陳直著：《兩漢經濟史料論叢》，中華書局 2008 年版，

第 1—74 頁。楊劍虹：《漢代居延的商品經濟》，《敦煌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160—166 頁。

[66] 注 50 所引書，第 108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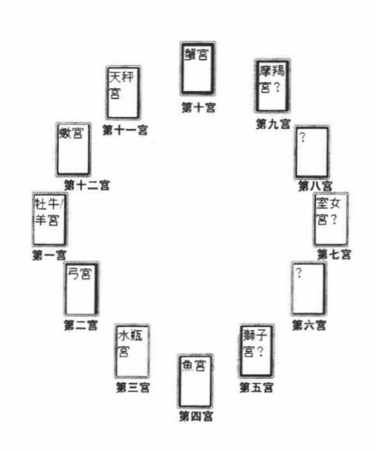
[67]（清）嚴可均輯：《全後漢文》（上），商務印書館 1999 年版，第 247 頁。

[68] 至於屯田區與土著政權間是否存在用黃金換取穀物的貿易模式，若按前注引陳直文，“邊郡錢幣，運輸困難，有時用黃金代替貨幣”，則西域屯田區也可能有黃金輸入，進入流通領域。但其所引簡文並未寫明黃金，理解或有誤。現有文獻多見西漢政府賜予西域政權統治階層黃金的記載，而不見黃金輸入屯田區的記錄。所以，因資料缺乏，在此不做過多推測。

摩尼教“業輪”溯源
——“宇宙圖”與《佛性經》研究 [1]

馬小鶴

一、“宇宙圖”



吉田豊先生近年發表《新出中國摩尼教繪畫反映的宇宙論與教會史》，刊佈了巨幅“宇宙圖”（137.1 x 56.6 cm），此圖可能是元末明初寧波地區繪製的，後來流入日本，整幅畫面詳細地描繪了摩尼教的宇宙結構，（圖版 1）需要另外撰文詳論。本文只討論其黄道十二宮部分。宇宙圖當中一段描繪了十天，最下面一層天的中央有兩個神持着一個轉輪，即黄道十二宮。（圖版 2）這個轉輪上十二宮的排列與通常的排列不同，有些宮的圖案已被磨損，不易看清，（圖版 3）吉田豊擬構如下 [2]：

這個圓盤上黃道十二宮排列不同於一般程序，可能是在流傳過程中出現的訛誤。吉田豊在此文中將亨寧 1948 年刊佈、英譯的粟特文殘片 M178 II 翻譯爲日文，作爲解讀宇宙圖的重要資料。這份文書講述了善母、淨風二神創造了十天八地，而黃道十二宮的轉輪是懸挂在最低一層天（第一層天）的下面的：

> 然後，在十天之下，他們設置一個黃道十二宮的轉輪（cxryy' ty' nxrwzn）。在黃道十二宮裏他們禁錮最邪惡、兇殘和叛逆的暗魔。他們使十二星宿（宮）（xii' nxr）和七星（vii pxryyh）成爲整個混合世界的支配者，讓他們互相作對。
>
> 從囚禁在黃道十二宮裏的所有魔鬼那裏，他們來回編織了根脈（wyx）、經脈（r'k）、絡脈（ptβnd）。[3] 在最低的一層天他們鑽了一個孔，把黃道十二宮（' nxrwzn）懸挂於其上。神的兩個兒子被他們派駐在（那裏）作爲護衛者，這樣就…上方的輪不停地……[4]

"七星"在摩尼教中是邪惡的力量，包括金、木、水、火、土等五大行星，以及兩個星位（ascendants）。[5] 畫面上黃道十二宮轉輪當中的妖魔鬼怪可能就表示"七星"。粟特文' nxrwzn（黃道十二宮）是一個複合詞，也寫作' xrwzn，' (n)xar 意爲"星"+wazan 意爲"運動"。粟特文佛教文獻寫作' nγrwzn[6]，漢文譯作"星宿"，英文翻譯爲 zodiac（黃道十二宮）。[7] 這份文書相當有助於我們解讀畫面上的黃道十二宮部分。此畫作者不是像古希臘人那樣，將黃道十二宮畫在天球上，而是將其畫成一個圓盤，懸挂在最低的一層天下面。但是，僅僅根據此畫與這段粟特文殘片，我們還很難確定黃道十二宮在摩尼教宇宙論中的地位與作用。無巧不成"文"。最近曹

凌先生在其大作《敦煌遺書〈佛性經〉殘片考》[8] 中刊佈的敦煌遺書 BD9401 號殘片，可以與“宇宙圖”互相印證，使我們對於黃道十二宮是否對應“業輪”的問題，作一結論，更清楚地理解業輪在靈魂輪回中的作用。下文將先著錄《佛性經》第八品殘片，然後分析涉及業輪的回鶻文、帕提亞文摩尼教文書，進而回溯其在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獻中的論述，並由此追溯其在古典文化中的源頭，最後對《佛性經》第八品殘片作一闡釋。

二、《佛性經》

BD9401 號殘片圖版收錄於《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105 冊中 [9]。根據殘卷第十八行“佛性經說外道破戒僧業行品第九”，《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所附《條記目錄》將經名擬作《佛性經》[10]。殘卷共存二紙，28 行，本文集中研究殘存的第八品（第 1-17 行），下面是曹凌的錄文，參照圖版與文意，修訂了個別的字與標點符號：

1. 虧闕乃至一餅及一椀水如是□□（施者）……/

2. 復次，當知聽者之行在於法中昇降不等……/

3. 虔恭助法之徒，亦有盡心崇信之衆，如上聽者，性……/

4. 科斷時，罪有輕重。亦如衣裳，垢膩不等。若洗□（滌？）……/

5. 緩急。其諸聽者，隨業受苦解脫遲□（疾）……/

6. 苦惱，生大懊悔。第一苦惱懊悔之處，□□（命死？）日性出身時。□□□□□□□□□（第二苦惱懊悔之處,）……/

7. 時。第三苦惱懊悔之處，性至天間轉受形時。第四苦惱懊悔之處，性入業□（輪）陰陽苦時。第五苦惱/

8. 懊悔之處，性於虛空受寒熱時。第六苦惱懊悔之處，性挂五種草木中時。第七苦惱懊悔之處，受五/

9. 類身改形體時。如上七種，皆是聽者乘自罪殃受苦惱處。然於承前所修功德，常隨救拔，令離諸苦，/

10. 至成佛來，各依行業五處分配而得解脫。第一行者，性至十天，於彼洗濯，便得解脫。□□□□（第二行者,）……/

11. 來墮鹻鹵地而行解脫。第三行者，性入卉木，暫作香華，便得解脫。第四行者，結成菓實……/

12. 得解脫。第五行者，更受人身，依法脩行，然始解脫。以是當知其和合性隨其罪業從於諸天受……/

13. ……百四十萬種生死之苦，然受人身，後得解脫。猶如有人犯罪，各科斷既□還得……/

14. ……所作損害，然被觀音及以勢至，於其輪間洗濯清淨及療瘡痍，復□（次？）痊癒猶如……/

15. 囚脫除枷鏁，離縛去纏。亦似毉藥療損瘡疣，死肉去身，生肌平復。即便串帶……/

16. 嚴，將歸常樂。亦如父母慈愍，男女有過，雖責還復撫慰。喻如有人身帶垢膩……/

17. 是因緣。聽者亦尔，爲於性上有其罪垢，陶鍊洗除令使清淨，然始解脫，得歸□（明）……/

第 5 行說：聽者（摩尼教世俗信徒）隨業受苦解脫遲疾不同。第 9—10 行說：聽者各依行業五處分配而得解脫。第 12—13 行說：聽者的佛性隨其罪業從於諸天受無數生死之苦，然受人身，後得解脫。“行業”即“業”，梵文原文爲 karma。《下部讚・此偈你逾沙懺悔文》說：“我今懺悔所，是身、口、意業，……願罪銷滅！”（第 411—414 行），“你逾沙”是中古波斯文 nywš' g/ 帕提亞文 ngwš' g 的音譯，意爲“聽者”。業包括身體的行爲、口舌的言說，心中的意識。《歎无常文》說：“肉身破壞魔即出，罪業殃及清淨性。”（第 96 行）“清淨性”就是“佛性”。行者的罪業輕重不同，因此受苦解脫的遲早就不同，根據其“行業”，會有五種不同的輪回途徑，最後得到解脫。

曹凌指出：“《佛性經》第 7 行有‘性入業□’。‘□’字略殘，但可辨識，當爲‘輪’字。”驗以圖版，確實如此。《佛性經》第 6—9 行羅列七種苦惱處，業輪爲聽者死後‘佛性’到達的一個處所。但是經文並非由上而下羅列諸處所，“《佛性經》認爲‘佛性’在人死後離開肉體，上昇並再次下降，進入新的身體，轉生爲植物或動物”[11]。業輪位於七種苦惱懊悔處的中間，正是從上昇轉爲下降的轉折點。曹凌指出，玄奘譯《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二中多次出現業輪，指佛爲化度衆生所用的方便手段。《正法念處經》及《大智度論》共三次出現，乃將“業”形象化爲“業輪”。“業輪”一詞兩見於《摩尼教殘經》，該“業輪”究竟是何天體，學術界尚在討論，可參看亨寧和劉南強的意見。[12] 米克爾森（Gunner B. Mikkelsen）先生指出，“業輪”譯自梵文 saṃsāracakra，可能勘同於帕提亞文 'spyr。[13] 芮傳明先生在其即將出版的大作《摩尼教敦

煌吐魯番文書譯釋與研究》中，注釋《殘經》“業輪”一詞時，引用《正法念處經》卷四十七《觀天品之二十六》：“業縛在世間，而不生厭倦。天退人中生，人死入地獄，出彼生畜生，出畜生生鬼。如是業輪中，世間業風吹。流轉於世間，癡故不覺知。”[14] 芮傳明也引用了宋德曼、劉南強的意見。[15] 本文希望通過對新刊佈的“宇宙圖”、《佛性經》及相關資料的研究，解釋漢文摩尼教文獻何以用佛經借自梵語的詞彙“業輪”來指稱黃道十二宮的原因。

三、摩尼教伊朗語、回鶻語文獻

《摩尼教殘經》第13—16行講述了活靈（即淨風）和生命母（即善母）創造宇宙的故事：“其彼淨風及善母等，以巧方便，安立十天；次置業輪及日月宮，並下八地、三衣、三輪、乃至三災、鐵圍四院、未勞俱孚山，及諸小山、大海、江河，作如是等，建立世界。”[16] 宋德曼在《明使演説惠明經》一書中輯錄和補校了一部分與《殘經》相應的帕提亞文、粟特文殘片，與“業輪”對應的帕提亞文詞彙是 'spyr，意爲天球（Sphäre），即黃道十二宮之輪（Rad des Zodiakus）。[17] 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亞文 'spyr 是一個出自希臘文的借詞，希臘文爲 ςφαῖρα。[18] 英文 sphere 出自同一詞源，意爲“天球”、“（天體等的）運行軌道”。宋德曼在《中古波斯語和帕提亞語的摩尼教創造宇宙與譬喻文獻》中釋讀了中古波斯文文書 M853，指出此文書與粟特文文書 M781 類似，'spyr …kw bst dw' zdh ' str 意

指黄道十二宮的轉輪。他還釋讀了中古波斯文文書 M263f、292 和 5228，認爲此文書直截了當以 'spyr 指稱黄道十二宮。[19] 劉南強認爲，雖然 'spyr 並無“輪子”的含義，但是，粟特文的對應詞彙（cxr- ——筆者按）確實意爲“轉輪”。'spyr 這個詞可能已經是帕提亞文中佛教觀念（業輪）的標準詞彙，摩尼教帕提亞文獻中 'spyr 這個詞很難被翻譯成漢文，於是就選用“業輪”這個帶有宗教色彩的詞彙作爲方便的對應詞彙。[20]

黄道十二宮與靈魂關係密切。帕提亞文組詩《安嘎德羅希南》（Angad Rōshnān）第一篇甲中，靈魂以第一人稱出現，哀訴自己的種種不幸與痛苦，寫道：

> 我所有的肢節都不再相互聯結，一旦它們四散各處，它們就準備轉入（下一世的）生存。（我的）日子與月份之數已盡，傷害降臨在黄道十二宮之輪（cxr 'xtrwzn）[21] 的軌道上。

與此相應的粟特文殘片上，黄道十二宮之輪寫作sṯ' ryṯy cxry。[22] 'st' rs 意爲“星”，cxr-意爲“輪”。[23] 顯然，靈魂的輪回與黄道十二宮之輪有關。

回鶻文文書 U169 II [24] 更清楚地表述了靈魂與黄道十二宮的關係。此文書以彌賽亞佛（耶穌）的名義宣揚摩尼教教義 [25]，他引經據典地説：

> 聽者並非全都是一樣的。有“完美的聽者”。此外還有那些稟性良善者。然後還有那些（僅僅）接受律法（宗教教導）者。他們的靈魂向黄道十二宮（aχrwznγaru）上昇的方式、它們到達它的方式、它們轉化成另一個自我的方式、以及它們（再次）降生的方式並非全都一樣。它們之間有許多不同，就像一個罪

人的枷鎖、手銬和腳鐐或重或輕……

回鶻文文書U169 II清楚地説明黄道十二宫在靈魂輪回過程中的樞紐地位，靈魂轉世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靈魂向黄道十二宫上昇，當即《佛性經》第6—7行中所描寫的第一到第三苦惱懊悔之處，靈魂離開死者的肉體，上昇到天間，轉而受形。第二階段是靈魂到達了黄道十二宫，在那裏轉化成另一個自我，也即《安嘎德羅希南》第一篇甲殘片中所説的“轉入下一世的生存”，當即《佛性經》第7行“第四苦惱懊悔之處，性入業輪陰陽苦時”。第三階段是轉化後的靈魂從黄道十二宫下降，當即《佛性經》第7—9行所描寫的第四到第七苦惱懊悔之處，靈魂於虛空中受寒熱，然後或者化爲五種草木，或者化爲五類衆生。

敦煌、吐魯番出土的8—9世紀摩尼教漢語、伊朗語、回鶻語文書反映的業輪觀，可以在更早的4世紀摩尼教科普特文文獻中找到相應的記述。

四、摩尼教科普特文文獻

科普特文《克弗來亞》中記述黄道十二宫與靈魂之處甚多[26]，我們僅舉數例。第46章寫道：

……在他們（人類）死去之前，臨死之人由星宿和天球（ςφαῖρα）上的黄道十二宫（ζῴδιον）所注定命運。這些人各有自己的命運之星；他們出生之時，各自星宿的位置決定了他們

的命運。他們的根脈（即命運）與其黃道十二宮連在一起；他們被其驅使，根據他們自己的行爲與罪惡受到平等的審判。[27]

第 48 章〈關於管道〉是最難解釋的章節之一，題目與文中使用的主要術語 λιϩμε（lihme）不見於其他文獻，英譯者加德納（Iain Gardner）將其翻譯爲“管道（conduits）”。在下一章（第 49 章）中，摩尼解釋道：這些把天體與塵世聯係在一起的管道是精神性的；並不會因爲天體在天空中運行而糾纏在一起，亂作一團，也不會被割斷。管道分爲三種：

第一種管道（λιϩμε）是上界所有強力的根脈，這些強力存在於各層天上。……當生命從地上的完美身體上昇時，它能夠被完全吸上管道的天霄，那些管道是連接在他們身上的。所有的生命也都會在那裏得到淨化。但是，從那些昇上天霄的淨化者身上清掃下來的廢物則通過這些管道（之管道）掉到地上，將傾瀉而下 [⋯]，被扔到下界來。……

第二種管道從存在於天上的廟宇、居所和城市通向地上，通向地上生長的五種草木。……

第三種類管道從住在各層天上的強力和戶主，通向在地上匍匐的五類衆生，互相連接在一起。……

……

當使者（第三使，漢文稱“日光佛”）來到的時候，他展現其形象，引出各層天上的光明，予以淨化。但是，存在於所有統治者身上的物質對着使者的形象噴湧而出。它向上噴湧，想達到使者的形象，但是辦不到。它跌落回來，掉到下面去了。現在，當它從上面掉下來的時候，它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掉在天輪上；另一部分掉在大地上；另一部分掉在海裏。通過掉在天球上的那部分，管道與草木和動物聯係在一起。因此，因爲這一點，它們得到權威，成爲五類衆生和五種草木的主子。通過掉在天球上的物質的本性，根脈與草木聯係在一起。通過掉在地上的流產物，另一種根脈與動物聯係在一起。因此，因爲這一點，通過掉在大地上的罪惡的根脈；通過掉在地上的流產物的根脈，衆星與黄道十二宫獲得了對於草木與動物的權威。……[28]

這裏的“管道”後來演變成粟特文文書M178 II裏講的“根脈”、“經脈”、“絡脈”；黄道十二宫與五種草木、五類衆生則演變成《佛性經》裏講到的“業輪”、“五種草木”和“五類身”。

五、古典文化淵源

關於天象與靈魂輪回的關係，希臘詩人荷馬（Homer，約公元前9—前8世紀）的史詩《奥德賽》（*Odyssey*）裏有一段描寫，成爲後世評注的重點。《奥德賽》敍述希臘軍隊的主要將領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結束之後經歷十年漂泊，返回家園的故事。第十三卷〈奥德修斯幸運歸返難辨故鄉土〉講到奥德修斯來到綺色佳（Ithaca）島的海港福爾庫斯：

港口崖頂有棵橄欖樹枝葉繁茂，

港口附近有一處洞穴美好而幽暗，

那是稱作涅伊阿德斯（νηϊάδες）的寧芙們的聖地。

……

……入口（θύραι）有兩處，

一處朝着北方，凡人們可以由此降生，

朝着南方的是神聖的（θεώτεραι），任何凡人

無法從南面進入洞穴，不朽者們（ἀθανάτων）卻暢通無阻。[29]

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理想國》（*Republic*）第十卷〈來生說〉裏厄爾（Er）的故事也是後世評注的重點。厄爾死而復活，講述了他在另一個世界裏所看到的一切：

他的靈魂脱出肉體以後，便和很多人踏上征途，到了一個神秘的所在，那裏的地上有兩個入口，都頗爲靠近，而正對着它們的，是天上的兩個入口。上下入口之間，有若干判官坐着。判官們在判決了正義的人，並把裁斷掛在他們胸前以後，就要他們從右首昇天。他們又以同樣的方式，要非正義者從左首降生到地上，卻把象徵這些人行爲的東西，掛在他們背上。[30]

荷馬和柏拉圖在此都並未具體講到黃道十二宮，希臘哲學家、中期柏拉圖主義者努墨尼奧斯（阿帕梅亞的）（Numenius of Apamea，公元2世紀后半葉）在討論柏拉圖《理想國》中厄爾神話中的審判之地時，將其兩個入口與荷馬《奧德賽》中寧芙洞的兩個入口聯係起來，並與黃道十二宮相聯係。努墨尼奧斯的著作已經散佚，有關段落保存在普羅克魯斯（Proclus，公元412—485年）的引述和批判中：

努墨尼奧斯説：這個地方是整個宇宙的中心，也是大地的中心，因爲它位於天地之中。審判官們坐在那裏把某些靈魂送

到天上去，把某些靈魂送到地下，送到黃泉去。所謂“天”，他是指佈滿恆星的天球，他說在天球上有兩個入口——摩羯宮和巨蟹宮，一個入口是通往降生（γένεςις）之路，另一個入口是昇天之路，地下的黃泉被他稱之爲行星，他把黃泉、甚至冥府（Tartaus）與其聯係在一起，還進一步異想天開，認爲靈魂會從回歸綫（tropics）跳躍到春分、秋分點（equinoxes），又從春分、秋分點跳回到回歸綫——這些跳躍完全是他自己的想象，他把這些跳躍轉到這些事物上去，把柏拉圖的敍述與占星術的關懷以及神話綴連在一起。他引證荷馬的詩句作爲這兩個入口的見證——它（《奧德賽》）不僅說到：

一處入口朝着北方，凡人們可以由此降生 [《奧德賽》13.110]

因爲 [太陽] 周而復始地從巨蟹宮移動到摩羯宮，[31] [還說] 朝着南方的入口 [是神聖的][《奧德賽》13.111]

任何凡人不可能從那裏 [進入]，因爲那條路完全屬於不朽者 [復述《奧德賽》13.111—12]，因爲摩羯宮吸引靈魂向上，使他們的生命離開人類王國，只接受不朽者和神祇—而且它（《奧德賽》）還吟唱道：

太陽之門和夢幻之人 [《奧德賽》24.12]

努墨尼奧斯聲稱，荷馬把兩個回歸綫的標誌稱爲“太陽之門”，把銀河稱爲“夢幻之人”。努墨尼奧斯還說，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約公元前 570—前 495）以其晦澀的語言把銀河（Milky Way）稱爲“冥府（Hades）”和“靈魂之地”，因爲靈魂集聚在那裏，這就是爲什麼在有些民族中，他們以奶獻祭給

淨化靈魂的神衹，當靈魂降生（γένεςις）時，奶是靈魂最初的食物。[32]

希臘哲學家們將銀河作爲靈魂的匯聚，顯然影響了摩尼教，摩尼教也將銀河視爲靈魂昇天的通道，神化爲光耀柱，在漢文文獻中，借用佛教神名，稱之爲盧舍那佛。靈魂與黄道十二宫（特别是巨蟹宫和摩羯宫）的關係，在希臘哲學家、新柏拉圖主義者波菲利（Porphyry，約公元234—305年）的《論寧芙洞》一書中，有詳細的叙述。[33] 此書一開始引用了《奥德賽》13.102—112，然後詳加評注，關於密斯拉思（Mithras）秘傳宗教寫道：

波斯人同樣將其向入教者介紹秘傳宗教的地方稱爲洞穴，在那裏向其揭示靈魂降生和返回的道路。因爲尤布羅（Eubulus）告訴我們，瑣羅亞斯德（Zoroaster）最早把一個自然的洞穴奉獻給造物主和萬物之父密斯拉思。對他來説，這個洞穴具有密斯拉思創造的宇宙的形象，這個洞穴包含的事物，通過其按照比例的安排，爲他提供了元素的符號和宇宙的諸氣候區。[34]

《論寧芙洞》也引用了努墨尼奥斯的説法：

……荷馬在描寫綺色佳的洞穴時，並不滿足於衹説明它有兩個入口，而是説明一個入口面向北面，另一個面向南面；他説：北面的那個是[靈魂]降生之洞，但是他没有説明南面的那個是不是降生之洞；他衹説：

“任何凡人無法從南面進入洞穴；

不朽者們卻暢通無阻。”

因此，我們就得研究一下，如果荷馬所言屬實，那麼將此洞奉爲神聖的目的何在？或者，如果其描述純屬虚構，那麼這

位詩人的謎底是什麼？努墨尼奧斯及其學生高尼雅（Cronius，約2世紀）將洞穴視爲宇宙的形象與象徵，認爲天上有兩極：冬回歸綫（winter tropic）——南方的極限和夏回歸綫（summer tropic）——北方的極限。夏回歸綫處於巨蟹宮，冬回歸綫處於摩羯宮。因爲巨蟹宮正巧最靠近地球上的我們，它被合理地指定給離開地球最近的月亮；因爲南極是我們所看不到的，摩羯宮被指定給最遙遠、最高的行星——土星。事實上，黃道十二宮（ζῴδιον）從巨蟹宮到摩羯宮是按照這樣的順序排列的：首先獅子是太陽之宮；處女是水星之宮；天秤是金星之宮；天蠍是火星之宮；人馬是木星之宮；摩羯是土星之宮。然後從摩羯宮回來：寶瓶宮被指定給土星；雙魚宮給木星；白羊宮給火星；金牛宮給金星；雙子宮給水星；最後，巨蟹宮給月亮。神學家們把摩羯宮和巨蟹宮稱爲兩個門；柏拉圖把它們稱爲入口。關於這兩個入口，努墨尼奧斯和高尼雅說：靈魂降生之門是巨蟹宮，但是他們通過摩羯宮昇天。巨蟹宮是北面的，適於降生，而摩羯宮在南面，適於昇天。北半天是讓靈魂降生投胎的，相應的，洞穴的北門正是人類降生之門；但是，南半天不是讓神，而是讓靈魂昇天與神會合的，因爲同樣的原因，荷馬沒有說一條“神的通道”，而是說“不朽者的通道”——這個術語一般就是指靈魂，靈魂本身是不朽的，從本質上來說靈魂是不朽的。努墨尼奧斯說：巴門尼德（Parmenides，約公元前5世紀）在其《論自然》中也提及這兩個門，羅馬人和埃及人也是如此。[35]

靈魂輪回與黃道十二宮的關係，不僅在希臘哲學、羅馬人和埃及人中廣爲人知，而且是密斯拉思秘傳宗教的中心教義。《論寧芙

洞》寫道：

> 他們把春分、秋分（equinoxes）作爲密斯拉思（Μίθρας）的專屬寶座。因爲這個原因他握着火星之宮——白羊宮之劍；他也騎在一頭公牛上，金牛是指定的金星之宮。密斯拉思作爲創世主、靈魂投胎之主，位於天球赤道上，其右面是北方，其左面是南方；他們因南方之炎熱，而將其指定給科特斯（Καύτης），因北風之寒冷，而將北方指定給〈科托帕特斯 [Καυτοπάτης]〉。[36]

密斯拉思教是一種秘傳宗教，不立文字，沒有經典，信徒多爲羅馬士兵、小官和新自由民（如被釋放的奴隸），其教義神秘莫測；現代學者對其涵義仍多有爭議。但是，此教在羅馬帝國廣泛傳播，留下了大量密斯拉思洞穴神壇（Mithraeum）遺跡，其圖像資料頗堪玩味。這種神廟通常設在天然的山洞裏，如果在城市裏難以找到方便的山洞，就設在一般房間裏，但是把房間佈置得猶如山洞一般，以此象徵宇宙。圖版 4 是倫敦博物館網頁上刊佈的倫敦沃爾布魯克（Walbrook）出土的密斯拉思神宰殺公牛（Tauroctony）的大理石浮雕像，出自羅馬帝國時代 2 世紀末、3 世紀初此處的一個密斯拉思洞穴神壇。這個浮雕像爲長方形，其中心部分是一個圓盤，由一圈黃道十二宮圖象所圍繞。十二宮從觀看者右面的白羊座開始，按逆時針方向排列。圓盤外面左上角是駕着四馬戰車的日神（Sol）。右上角是駕着雙牛戰車的月神（Luna）。在圓盤裏，密斯拉思神頭戴弗里吉亞錐形軟帽，身穿短袖上衣、褲子，披着翻飛的斗篷（部分破損）。他轉頭向右，左手抓住牛鼻子，右手將短劍刺入牛肩。浮雕的左邊是科斯特，雙手持向上的火炬。右邊是科托帕特斯，向下凝視，持着向下的火炬。一條狗和一條蛇（部分破損）撲上去喝牛血。

一只蠍子咬住牛卵。[37]

要理解上引諸文關於星象的描述，以及密斯拉思教的圖像資料，可參看圖版 5。此圖是貝克（Roger Beck）根據自己的研究繪製的。[38] 太陽的運行軌道——黃道可以分成四個部分：

(1) 春季：從白羊座（其始爲春分）經過金牛座到達雙子座，太陽（密斯拉思）在北方，是上昇的。

(2) 夏季：從巨蟹座（其始爲夏至）經過獅子座達到室女座，太陽仍然在北方，不過是下降的。

(3) 秋季：從天秤座（其始爲秋分）經過天蠍座達到人馬座，太陽繼續下降，不過是在南方。

(4) 冬季：從摩羯座（其始爲冬至）經過寶瓶座達到雙魚座，太陽仍然在南方，不過再次上昇了。

科特斯舉着向上的火炬，象徵太陽從冬至開始向北上昇，科托帕特斯拿着向下的火炬，象徵太陽從夏至開始向南下降。同時，人類靈魂通過在巨蟹座的夏至之門降生投胎，通過摩羯座的冬至之門上昇返回天界。[39] 從圖象和文字資料反映出來的密斯拉思教的中心教義就是教導信徒：人類的靈魂通過黃道十二宮降臨人間，投胎爲人，死後又通過黃道十二宮昇天；整個儀式就是環繞着這個教義展開的。

六、結語

靈魂輪回與天象，特別與黃道十二宮相關，是古代世界普遍信

奉的觀念。希臘人、羅馬人、埃及人都是如此，本文主要概述了柏拉圖主義者的記述和密斯拉思教的圖像資料。這種觀念也影響了摩尼教，在科普特文文獻中可以看到許多有關靈魂輪回與黃道十二宮相關的論述。這種觀念東傳中亞與中原，在伊朗語、回鶻語和漢語文獻中，以及在“宇宙圖”中，都有所表述。我們可以把《佛性經》與“宇宙圖”要傳達的信息揣擬如下：

摩尼教的世俗信徒被稱爲“聽者”，他們由於各自所作的“業”不同，受苦解脫的遲疾也就不同，要經歷種種苦惱，懊悔自己生時的罪業。第一苦惱懊悔處，是生命結束之日，佛性離開肉身之時。聽者的靈魂上昇到空中，在平等王（霞浦文書作“平等大帝”）前受到審判。“宇宙圖”所描繪的平等王形象受佛畫影響，頗似閻羅王，但是並不在地下，而是在須彌山右上方空中的一幢建築物中。建築物的臺階前有五個人頭（可能象徵受審的聽者之靈魂），建築物的右面可以看到所謂“業鏡”，被告的生平所作所爲（業）都會在這面鏡子上反映出來。[40] 經過審判的佛性前往第三苦惱懊悔處，即佛性至天地間轉受形時。

此後佛性繼續上昇，前往第四苦惱懊悔處，即佛性進入業輪陰陽苦時。瓦爾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和楞茨（Wolfgang Lentz）在《耶穌在摩尼教中的地位》一文中的考證，得到翁拙瑞（Peter Bryder）《摩尼教的漢語轉換：漢語摩尼教術語研究》一書的肯定：先意的第六子——呼神和淨風的第六子——應神在漢文摩尼教文獻中分別被稱爲觀音和勢至。[41] 現在《佛性經》證明，他們的考證確有先見之明，“宇宙圖”上黃道十二宮（業輪）左右的兩個神，即粟特文文書 M178 II 所說的“神的兩個兒子”，也即

觀音與勢至。他們的名稱雖然佛教化了，他們在“宇宙圖”上的形象則並未改用觀音、勢至常見的形象。《佛性經》第 14 行說：佛性“然被觀音及以勢至，於其輪間洗濯清淨及療瘡痍”。此處之“輪”，爲“業輪”無疑。因此佛性進入業輪以後，受到觀音、勢至的醫療，還有機會“脱除枷鏁，離縛去纏。亦似毉藥療損瘡疣，死肉去身，生肌平復”，“將歸常樂。亦如父母慈愍，男女有過，雖責還復撫慰”。

《佛性經》第 10—11 行說：“第一行者，性至十天，於彼洗濯，便得解脱。”“宇宙圖”上，黃道十二宫之輪（業輪）的正上方、第二層天到第十層天的中正都有一條船，船上坐着二人，一個穿紅衣服，一個穿白衣服，頭上有光圈。第十層天之上，有兩條彩色的河流（彩虹？）在中間匯聚，通向光耀柱（金剛相柱，即銀河），匯聚後的河流上有三艘這樣的船，船上也坐着各穿紅衣與白衣的人。[42] 這可能就是象徵佛性上昇至十天，得到解脱，進而昇入銀河，經過日月，最後歸於常樂光明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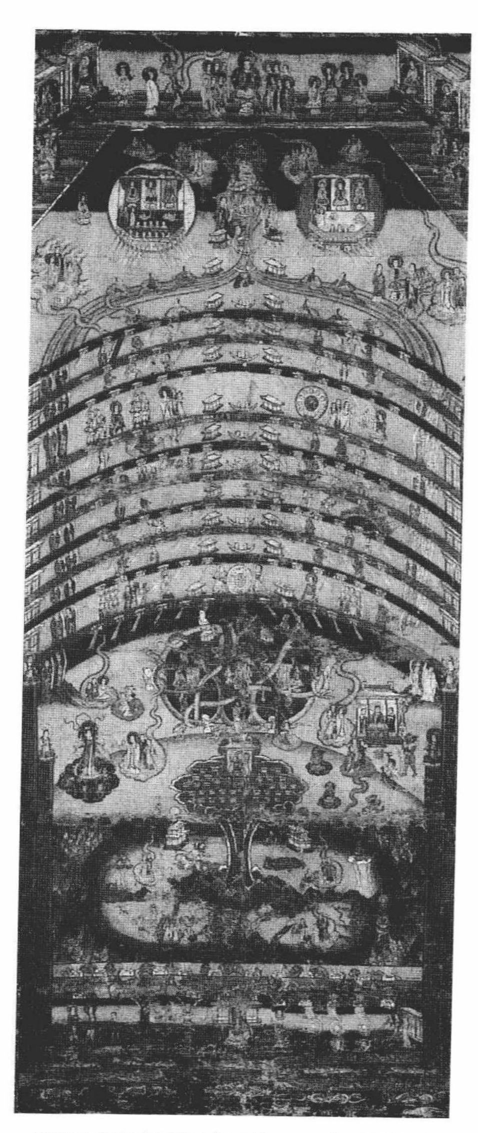
第二種行者至第五種行者則均需經歷輪迴。他們都要經過“第五苦惱懊悔之處，性於虛空受寒熱時。”

曹凌認爲：第二種行者的解脱方式不明，但從“來墮鹻鹵地（按，即指鹽鹼地）而行解脱”的殘文來看，可能與植物有關。第三種行者的性進入植物後開花即得解脱。第四種行者的性要成爲果實纔能解脱。[43] 他們都要經過“第六苦惱懊悔之處，性挂五種草木中時。”“宇宙圖”地面上須彌山的左側，有一棵奇特的樹，樹上有三顆人頭；須彌山的右側也有一棵這樣的樹。[44] 人頭可能是佛性的象徵，這兩棵樹是否象徵佛性進入植物後纔能解脱，則有待進

一步研究。

《佛性經》第12行說：“第五行者，更受人身，依法脩行，然始解脫。”他們要經過“第七苦惱懊悔之處，受五類身改形體時。”不過，“五類身”範圍較廣，不僅包括“人身”，而且包括禽、獸、魚、爬蟲。“宇宙圖”須彌山左上方空中一朵紅雲上跪着四個男人，一個戴黑帽子，可能代表士人；一個穿甲冑，代表兵士；一個戴三角帽，可能代表商人；一個穿白衣，可能代表農民。[45] 他們可能象徵佛性“更受人身”。

“宇宙圖”爲一巨製，描繪了十天八地，日月、神、魔、人，還有飛禽走獸、房屋船隻，以及許多很難解釋的圖像。顯然，此圖圖示了很多超出現存摩尼教文獻之外的教義。雖然經過吉田豊先生的卓越研究，已經可以明其大意，但是還有許多細節尚不清楚。本文將圖上清晰的黃道十二宮之輪勘同爲“業輪”，指出其在宇宙圖上佔據中心地位，是靈魂輪回的樞紐，以期抛磚引玉，引起更深入的探討。在黃道十二宮之輪下面，有六條長蛇纏作一團，據吉田豊觀察，其間有蠍座、天秤座、魚座、半人半馬的射手座、蟹座、有兩隻角的動物（牡牛座或牡羊座？）等。這可能與“業輪”有關。[46] 至於其具體關係如何，尚待進一步研究。



圖版 1:“宇宙圖”(吉田豊,2010 年,圖版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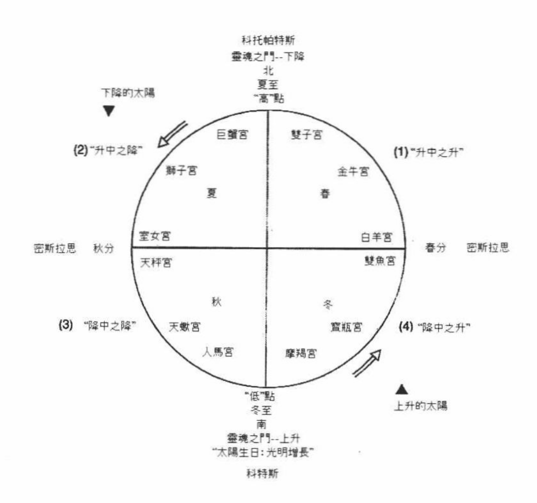
圖版 2："宇宙圖"（部分）（吉田豊，2010 年，圖版 3）



圖版 3："宇宙圖"（部分）（吉田豐，2010 年，第 7 頁，插圖 2）



圖版 4：倫敦密斯拉思神廟（Mithraeum，2 世紀晚期—3 世紀初期）的一幅浮雕（2012/9/9）http://col4.museumoflondon.org.uk/mediaLib/180/media-180715/original.jpg



圖版 5：密斯拉思神話對太陽年的占星術解釋（Beck，2006，p. 210，Fig. 13.）

■ 注釋

[1] 本文爲復旦大學“985”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文史研究院）資助課題的研究成果之一。

[2] 吉田豊：『新出マニ教絵画の形而上』（Cosmogony and Church History Depicted in the Newly Discovered Chinese Manichaean Paintings），『大和文華』第一二一号（平成二十二年 [2010 年] 三月三十一日），図版 1、3；第 6—8 頁；第 7 頁，插図 2；第 29 頁，注 23—24。感謝吉田豊先生以此論文相贈。

[3] wyx，意爲“根”；r' k，“脈”、“血管”；ptβnd，“聯結”、“束縛”；《克弗來亞》第 48、49 章詳細描述了這些管道，很難理解它們，它們可能是無形的，但把宏觀宇宙與微觀世界聯係在一起，光明分子順着這些管道上昇明界，而惡魔的毒素順

着這些管道危害下界。

[4] Henning, W. B., “A Sogdian Fragment of the Manichaean Cosmogon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II 1948, pp.310-313. 吉田豊，2010年，同注，第5—6、29頁，注14。粟特文文書M178圖版見：http://www.bbaw.de/forschung/turfanforschung/dta/m/images/m0178_seite2.jpg 亨寧將cxryy'ty'nxrwzn翻譯成“轉輪和（原文如此）黃道十二宮（a rolling wheel and [sic] zodiac）”，'ty（和）恐爲筆誤。根據教義，當爲“黃道十二宮的轉輪”。參閱芮傳明：《摩尼教敦煌吐魯番文書譯釋與研究》，電子版，第136—137頁。芮傳明將此書電子版發給筆者參考，特此致謝。

[5] 摩尼教的“七星”與七曜不同，不包括日月，而包括兩個星位。

[6] Gharib, B., *Sogdian dictionary: Sogdian-Persian-English*, Tehran: Farhangan Publications,1995, ##2074, 1187, 1017 (pp.82, 47, 40).

[7] 詞組'nγrwzn klp相當於梵文nakṣatrakalpa，漢文翻譯爲“星宿劫”。MacKenzie, D. N., *The Buddhist Sogdian Tex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Leiden: Diffusion E.J. Brill; Téhéran-Liège: Édition Bibliothèque Pahlavi, 1976, I, pp.62-63, 66-67; II, pp.57, 67-68, 80, 181, 206.

[8] 曹凌：《敦煌遺書〈佛性經〉殘片考》，《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第2期（總第106期），第309-337頁。方廣錩、曹凌先生在此文發表之前，即將其初稿的電子版發給筆者參考，特此致謝。

[9]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105冊，第342頁。

[10]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05冊《條記目錄》，第76頁。

[11] 曹凌，2012年，同注8，第316頁。

[12] 曹凌，2012年，同注8，第314—315頁。

[13]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v.III,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and China*, edited

by Nicholas Sims-Williams, pt. 4,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in Chinese*, by Gunner B. Mikkelsen, Turnhout: Brepols; NSW, Australia, Ancient History Documentary Research Centre, Macquarie University, 2006, p.84. 中古波斯文 gyrd'sm'n 意爲"黃道十二宮之輪", 見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v.III, pt. 1,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by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Turnhout: Brepols; NSW, Australia, Ancient History Documentary Research Centre, Macquarie University, 2004, p.170; 吉田豊, 2010年，同注2，第7、9頁，第29頁，注25。

[14] 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17/0721_047.htm 第281頁。

[15] 芮傳明：《摩尼教敦煌吐魯番文書譯釋與研究》，同注4，第20頁，注32。

[16] 芮傳明：《摩尼教敦煌吐魯番文書譯釋與研究》，同注4，第8頁。"業輪"參閱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v.III, pt. 4, 同注13，p.84.

[17] Sundermann, W., *Der Sermon vom Licht-Nous*. Eine Lehrschrift des östlichen Manichäismus. Edition der parthischen und sogdischen Version, Berlin 1992 (Berliner Turfantexte XVII), pp.62-63, 79, 144. 'spyr 見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v.III, pt. 1, 同注13，p.87.

[18] Henning, W. B., "A List of Middle-Persian and Parthian Words, in the Manichaean fragments belongs to the Akademie of Berl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9, 1937, p.81.

[19] Sundermann, *Mittelpersische und parthische kosmogonische und Parabeltexte der Manichäer*, mit einigen Bemerkungen zu Motiven der Parabeltexte von Friedmar Geissler, Berlin : Akademie-Verlag, 1973 (Berliner Turfantexte IV), p.45, note.13; p.48, note 20.

[20] Lieu, Samuel N.C.,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1998, p.69.

[21]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v.III, pt. 1, 同注 13, pp.128, 79.

[22] Boyce, Mary, *The Manichaean hymn-cycles in Parthian*,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 pp.122-123. 參閱芮傳明：《摩尼教敦煌吐魯番文書譯釋與研究》, 同注 4, 第 90 頁。

[23] Gharib, 1995, 同注 6, ##1687, 8989, 3313 (pp.67, 363, 131).

[24] 曹凌已經注意到回鶻文文書 T II D 173 b, 2 對於我們理解《佛性經》第八品的重要性。這份文書由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於 1922 年進行了釋讀與德譯。見 Le Coq, A. von, *Türkische Manichäica aus Chotscho*, II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APAW), Nr. 2, 1922, pp.11-12。克里姆凱特（H.J. Klimkeit, 1939—1999）將其翻譯成英文, 見 Klimkeit, H.J.,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translated & presented by Hans-Joachim Klimkeit, [San Francisco, Calif.]: HarperSanFrancisco, 1993, pp.326-327。一度認爲此件遺書原文遺失, 故未得到 U 字編號, 見 Lieu, 1998, 同注 20, p.245。但是根據維爾金斯（Jens Wilkens）2000 年出版的《柏林吐魯番收集品中的突厥語摩尼教文獻》以及榮新江主編、2007 年出版的《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 此件遺書新編號爲 U169 II。這份文書與 U2、U168 I 、U168 II、U169 I、U270、U350、Mainz 126 I、Mainz 126 II、T II D 173d 屬同一寫本, 見 Wilkens, J.,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8. *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Stuttgart, 2000, pp.105-106, 35-36, 288-289, 190-191, 106-107, 125-127, 139. 榮新江主编：《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98、477、497—498、508、515、701、806 頁。感謝榮新江先生以此書相贈。文書 U169 II 的彩色照片見柏林吐魯番收藏品網站： http://www.bbaw.de/forschung/turfanforschung/dta/

u/images/u0169seite2.jpg (2012/8/25)

[25] 耶穌把那些出於信念而施捨的人、那些熱烈祈禱的人稱之爲“朋友的朋友”。他要這些信徒全心全意地相信：施捨的每一塊麵包和每一杯水都不會白費，肯定會得到回報。這一説法可能出自《馬太福音》10：42：“無論是誰，爲了某人是我的門徒（雖然這門徒是個小輩），就給他一杯清涼的水喝，我確實告訴你們，那人也不能不獲得賞賜。”《佛性經》第八品殘片第 1 行說的“乃至一餅及一椀水如是□□（施者）”可能包含類似的意思。曹凌在初稿中已經指出這一點。《佛性經》雖非文書 U69 II 的譯本，但二者宣揚的教義有共同之處。

[26] 索引見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v.I, *Texts from the Roman Empire: texts in Syriac, Greek, Coptic, and Latin*, compiled by Sarah Clackson, Erica Hunter, and Samuel N.C. Lieu ; in association with Mark Vermes, Turnhout: Brepols; NSW, Australia, Ancient History Documentary Research Centre, Macquarie University, 1998, p.69.

[27] Polotsky, H.J., *Kephalaia*, ed. by H.J. Polotsky and A. Böhlig (Manichäische Handschriften der Staatlichen Museen Berlin ; Bd. 1), Stuttgart, W. Kohlhammer, 1940, pp.117-118; Gardner, Iain, *The Kephalaia of the Teacher : the Edited Coptic Manichaean Texts in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edited] by Iain Gardner, Leiden; New York: E.J. Brill, 1995, p.124.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v.I, 同注 26，p.106.

[28] Polotsky, 1940, 同注 27，pp.120-123; Gardner, 1995, 同注 27，p.127-132. *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v.I, 同注 27，pp.69, 83.

[29] Homer, *The Odyssey*, Homer;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T. Murray; revised by George E. Dimock,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v.2, pp.8-11; 中譯本：荷馬：《荷馬史詩·奧德賽》，

王煥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41—242 頁。寧芙（νύμφη）是居於山林水澤的仙女。θύρα 意爲“門”。

[30] Plato, *The Republic*,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aul Shore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W. Heinemann, ltd.; New York : G.P. Putnam's sons; [etc., etc.] 1930—1935, pp.492-493; 中譯本：柏拉圖：《柏拉圖理想國》，聯經出版事業 1980 年版，第 491 頁。

[31] 此句文字訛誤，引起很多爭議。

[32] Numénius, of Apamea, *Fragments*; texte établi et traduit par Édouard des Places, Paris: Les Belles letters, 1973, fr.35 (pp.85-87); Lamberton, Robert, *Homer the theologian: Neoplatonist Allegorical Reading and the Growth of the Epic Tradition*,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66-68; Beck, Roger, *The Religion of the Mithras cult in the Roman Empire: Mysteries of the Unconquered su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29-130, & p.130, n.36.

[33] 參閱馬小鶴：《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6—87 頁。

[34] Porphyry, *The Cave of the Nymphs in the Odyssey*, A rev. text with translation by Seminar Classics 609,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Buffalo, Dept. of Classic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1969, pp.20-23; Porphyry, *On the Cave of the Nymphs in the Odyssey*, 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 by Thomas Taylor;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athleen Raine, Grand Rapids, MI : Phanes Press, 1991, pp.43-45; Beck, 2006, 同注 32，pp.16, 41-44, 102.

[35] Porphyry, 1969, 同注 34，pp.20-23; Porphyry, 1991, 同注 34，pp.43-45. 意大利羅馬附近奧斯蒂亞・安提卡（Ostia Antica）的密斯拉思洞穴神壇中，黃道十二宮與行星、月亮有比較明確的圖像表述。參閱：Beck, 2006, 同注 32，pp.102-

103, p.104, Fig. 3. 以及網上資訊：http://www.ostia-antica.org/regio2/8/8-6.htm

[36] Porphyry, 1969, 同注 34，pp.24-25; Porphyry, 1991, 同注 34，pp.46; Beck, 2006, 同注 32，pp.103-115.

[37] Shepherd, J. D. (John David), *The Temple of Mithras, London: Excavations by W.F. Grimes and A. Williams at the Walbrook*, John D. Shepher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I. Betts ... [et al.]; and illustrations by S. Banks ... [et al.], London: English Heritage, 1998, p.172, p.174, Fig 196. 在其他殺牛圖上，密斯拉思神的斗篷上有一隻烏鴉，公牛尾巴上有麥穗，在萊茵河與第聶伯河流域出土的殺牛圖象上，往往還有獅子和雙柄杯子。根據貝克（Roger Beck）的研究，這些圖像象徵着黃道帶上從金牛座到天蠍座的各個星座：公牛（金牛座）、狗（小犬座、大犬座）、蛇（長蛇座）、蠍子（天蠍座）、烏鴉（烏鴉座）、科特斯和科托帕特斯（雙子座）、杯子（巨爵座）、獅子（獅子座）、麥穗（室女座 α 星）。Beck, Roger (2002-07-20). "Mithraism". *Encyclopaedia Iranica*, Online Edition. Retrieved 2012/9/9; Beck, Roger, *Beck on Mithraism : Collected Works with New Essays*,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 2004, p.257; Beck, 2006, 同注 32，pp.31-32, & Fig.1.

[38] Beck, 2006, 同注 32，p.210, Fig. 13.

[39] Beck, 2006, 同注 32，pp.209-212.

[40] 參閱馬小鶴：《從‘平等王’到‘平等大帝’——福建霞浦文書〈奏申牒疏科冊〉研究之二》，《史林》2010 年第 4 期，第 90—97 頁，英文摘要第 189—190 頁。修訂本刊於《天祿論叢：中國研究圖書館員學會會刊》，第 1 卷（2011 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 40—54 頁。

[41] Bryder, Peter,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 A Study of Chinese*

Manichaean Terminology, [Löberöd]: Bokförlaget Plus Ultra,1985, pp.103-106, 122.

[42] 吉田豊，2010年，同注2，圖版2、3，第6、1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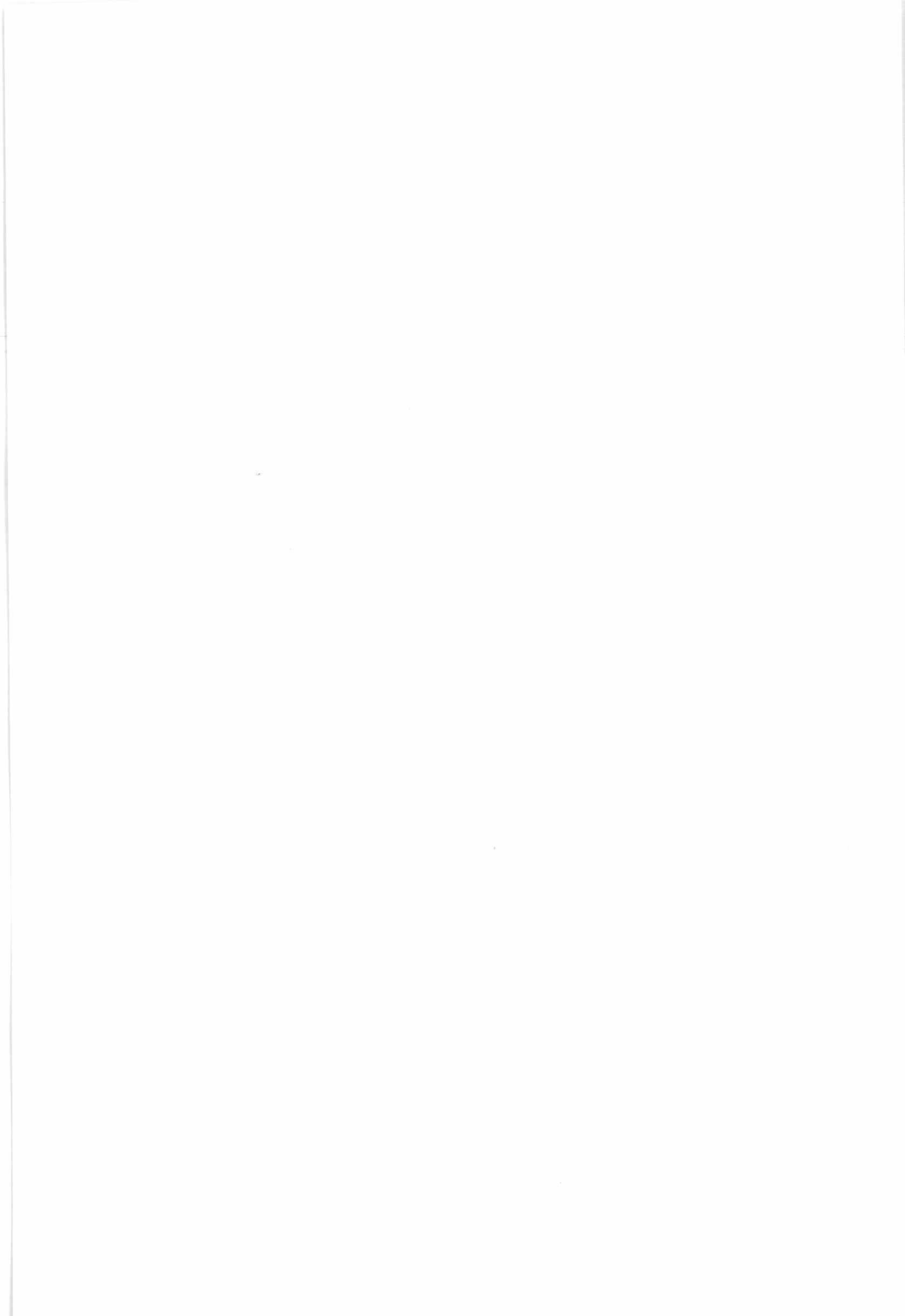
[43] 曹淩，2012年，同注8，第332頁。

[44] 吉田豊，2010年，同注2，圖版4，第11頁。

[45] 吉田豊，2010年，同注2，圖版4，第12—13頁。

[46] 中古波斯文gyrd' sm' n意爲"黄道十二宫之輪"，見*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v.III, pt. 1, 同注13，p.170; 吉田豊，2010年，同注2，第7—9頁，第29頁，注25。

地中海和中國關係史



匈人進入歐洲的早期戰役

劉衍鋼　劉雪飛

匈人（Huns）是歐洲晚期古典史上最重要的民族之一，亦是古代史上最神秘的民族之一。有關匈人的起源充滿爭議，迄今尚無定論。[1] 公元四世紀後期，匈人降服另一支遊牧民族阿蘭人（Alani），隨後脅其越過塔納伊斯河（Tanais，即頓河）進攻哥特諸族，迫使大部分哥特人南遷，避入羅馬帝國境內。晚期羅馬帝國的諸多歷史事件皆與匈人的此次行動有關。

關於匈人越過頓河之後與哥特諸族之間的早期戰爭，最重要的史料來自兩位晚期古典史家的著作，即阿米亞努斯·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的《歷史》（*Res Gestae*）與約鄧尼斯（Jordanes）的《哥特史》（*Getica*）。《歷史》成書於四世紀末；《哥特史》則成書於六世紀，其主要內容爲五世紀學者卡希歐多爾羅斯（Cassiodorus）著作的輯錄。在真實可靠性方面，《歷史》高於《哥特史》。這不僅因爲馬塞里努斯的史學素養遠高於約鄧尼斯與卡

希歐多爾羅斯，還因爲對馬塞里努斯而言，匈人之初入歐洲是“當代史”，馬塞里努斯本人跟這些早期匈人之間可能有過直接接觸。[2]因此，本文對早期匈人戰爭的分析，將主要依靠馬塞里努斯的記載，同時也參照約鄧尼斯的說法，並結合現代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

本文所涉及的匈人戰爭究竟延續了多長時間無法確知，一般認爲長達數年。已知匈人發動的最早戰爭，即征服阿蘭人之戰，時間應該在公元 370 年前後。[3] 關於戰爭的起因，約鄧尼斯轉引五世紀著名匈人史學者普里斯庫斯（Priscus）的記載稱：一夥匈人因追獵一頭雌鹿而走出貧瘠的麥奥提克沼澤（Maeotic swamp）[4]，窺見了阿蘭人的富饒土地，遂決定發動掠奪戰爭。[5] 約鄧尼斯所說的起因富有戲劇性效果，乍看之下可信度不高，但遊牧民族總是傾向於向水草豐美的地域遷徙乃基本的歷史模式，馬塞里努斯也描述過阿蘭人土地的富庶[6]，因此阿蘭人遭到其他遊牧民族的進攻並非特例。

關於匈人對阿蘭人的進攻，馬塞里努斯記載道：

> 匈人穿過阿蘭人的領土。這些阿蘭人與格琉圖恩吉人（Greuthungi）爲鄰，習慣上被冠以綽號“塔納伊斯諸族”（Tanaites）。匈人利用殺戮和劫掠，迫使剩下的阿蘭人同意成爲忠實盟友，與自己聯合行動。[7]

這裏的“格琉圖恩吉人”爲當時羅馬人對東哥特人（Ostrogoths）的稱謂。傳統上阿蘭人與東哥特人之間以頓河爲界，同時頓河亦是當時歐洲與亞洲的分界。[8] 阿蘭人的領土在頓河以東，故而這裏稱“阿蘭人與格琉圖恩吉人爲鄰”。又因爲阿蘭人內部族系繁多，故而用複數，稱其爲“諸族”。

關於匈人征服阿蘭人的過程，由於史料極度缺乏，史學界曾有

過較多爭議。有學者認爲匈人與阿蘭人之間有過大規模決戰，結果阿蘭人戰敗。這種觀點以吉本的說法爲代表。[9] 但二十世紀以來，該看法已被否定，一般認爲匈人的征服活動主要採用漸進滲透方式。[10] 實際上馬塞里努斯曾明確稱匈人之降服阿蘭人“或是通過武力，或是通過盟約（armis aut pactis）”[11]，並強調阿蘭人在勇猛善戰方面與匈人極爲類似。[12] 上述引文亦稱“匈人利用殺戮和劫掠，迫使剩下的阿蘭人同意成爲忠實盟友”。因此匈人對阿蘭人的降服可能較爲艱難，也很難說徹底。對於阿蘭諸族，匈人大概打拉結合，將阿蘭人各個擊破，然後利用阿蘭人壯大自己的實力。那些與匈人有着“盟約”關係並與匈人一起西進的阿蘭部落仍保持着極大獨立性。實際上此後歐洲的阿蘭人部落與匈人部落之間少有統屬關係，匈人諸王的宮廷中亦沒有阿蘭人臣僕。[13] 而且在之後的歐洲民族大遷徙中，阿蘭人所扮演的角色也比匈人更重要。[14]

大約在公元 370 年代初期，匈人與阿蘭人聯軍開始越過頓河，襲擊東哥特王國。匈人與阿蘭人皆爲遊牧民族；而哥特人主要以農業與畜牧維生，大體上屬定居民族。[15] 因此匈人與阿蘭人在戰術上擁有明顯優勢，他們的基本作戰模式大概是發動持續不斷的機動突襲。統轄東哥特諸部落的是赫爾曼納里克（Hermanaric）王。[16] 當時的哥特社會尚未發展到建立統一王國的地步，赫爾曼納里克主要依靠長年征伐在東哥特各部落中樹立起權威。照馬塞里努斯的說法，赫爾曼納里克“是個極爲好戰的君王，因爲衆多各式各樣的勇猛業績而爲周邊民族所忌憚。”[17] 約鄧尼斯也稱赫爾曼納里克“降服了衆多北方好戰民族，迫使他們遵從自己的法律，我們的某些祖先（指哥特人）曾將他比作亞歷山大大帝，這是很合理的。”[18] 但據馬

塞里努斯的說法，赫爾曼納里克還是無法抵禦匈人聯軍的兇猛攻勢。

> 艾爾門里庫斯（即赫爾曼納里克）遭到突如其來侵略風暴的打擊。儘管他在長時間里盡力抵抗外來進犯，但有關侵略者的各種誇大其詞的恐怖謠言還是四處傳播。最終艾爾門里庫斯只得自殺以擺脫這場巨大危機帶來的恐慌。[19]

約鄧尼斯對此的記載有所不同，稱赫爾曼納里克正準備組織抵抗，卻意外因暗殺而身負重傷。隨後匈王巴蘭勃（Balamber）趁機進攻東哥特人，赫爾曼納里克很快死於傷痛與年邁體弱，死時年110歲，東哥特人的勢力遂迅速瓦解。[20] 約鄧尼斯的記載顯然可信度不高，現代學者總體上認同馬塞里努斯的說法。約鄧尼斯所謂的“匈王巴蘭勃”或稱“巴拉米爾”（Balamir）是否確有其人，現代學者對此爭議頗大。較主流的意見認爲：當時匈人的社會尚比較原始，不可能有統一的君主，因此巴蘭勃是個虛構人物。[21]

赫爾曼納里克的繼承者爲維提米利斯（Vithimiris）。維提米利斯意識到敵人的巨大戰術優勢，遂雇傭一些匈人部落爲自己作戰，以抵禦阿蘭人的進攻。維提米利斯在一段時間內擋住了阿蘭人的進攻，但還是屢戰屢敗，終於陣亡。馬塞里努斯的這段記載需要特別予以關注，因爲赫爾曼納里克死後，東哥特人的主要敵人突然由匈人變成了阿蘭人，而且哥特人還能招募到匈人雇傭軍。馬塞里努斯在後文中還提到，匈人爲了進襲西哥特人（Visigoths），遂“放過眼前敵人，與他們達成和約平息戰事”。[23] 這里的“眼前敵人”，應該就是東哥特人。由這些記載推測：東哥特人的勢力範圍在赫爾曼納里克死後已大幅收縮，匈人的主力便停止進攻，迅速西進奇襲西哥特人，由其盟友阿蘭人繼續進攻東哥特人，東哥特人因此得以在頓

河流域支撐了一段時間。東哥特人能夠雇傭匈人爲自己作戰，這是比較明確的證據，表明當時匈人無尚統一領袖，各部落往往自行其是，不相統屬。[24] 匈人有實力發動大規模的西進征戰，其諸部落之間必定存在着某種同盟關係。但這種同盟似乎並不穩固，亦未能覆蓋全體匈族，因此匈人的敵人一直能夠雇傭匈人爲自己效力。匈人諸部落的這種分裂狀態一直持續至後來匈人勢力滅亡。[25]

維提米利斯死後，其幼子維德里庫斯（Viderichus）繼位，東哥特人的實際軍政事務由兩位元將軍阿拉特烏斯（Alatheus）與薩弗拉克斯（Saphrax）負責。[26] 馬塞里努斯稱此二人皆爲經驗豐富且聲望顯赫的首領，這確非虛言。正是這兩位領袖在危機局勢下竭盡全力保存了東哥特部衆及其軍隊的實力，特別是騎兵的實力，後來又將東哥特人安全帶入羅馬帝國境內。在後來的阿德里安堡（Hadrianopolis 或 Adrianople）會戰中，東哥特騎兵發揮了關鍵作用。此時東哥特人處境艱難，在北方已難以立足。據馬塞里努斯記載：

> 考慮到目前的危險局勢，他們不再有反擊敵人的信心，於是他們謹慎地後撤，達到達納斯提烏斯（Danastius）河，這條河流經希斯特（Hister）河與波利斯騰尼斯（Borysthenes）河之間的廣大平原。[27]

這裏的達納斯提烏斯河即今德涅斯特（Dniester）河；希斯特即多瑙河；波利斯騰尼斯河即今第聶伯（Dnieper）河。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雖然馬塞里努斯先提及東哥特人的南撤，但東哥特人的撤離時間應該晚於後面記載的西哥特人的撤退。實際上後來大多數西哥特人征得羅馬皇帝同意遷入帝國境内之後，東哥特人才抵達多瑙河北

岸。[28] 因此東哥特人與匈人的戰爭過程大致如下：首先東哥特人遭到匈人主力攻擊，被迫向西北退卻，讓出南俄草原的西進通道。之後匈人主力西進襲擊西哥特人，尾隨的阿蘭人繼續進攻東哥特人。東哥特人又抵抗了一段時間後終於不支，才決定跟隨其他民族一起向南遷徙。需要特別說明一點：隨着維德里庫斯南遷的并非東哥特人的主體。大部分東哥特人被匈人降服，成為匈人的藩屬。八十年後摧毀匈人霸權并開創東哥特王朝的正是這批在北方的東哥特人。

東哥特人以西居住着特魯因吉人（Theruingi），即西哥特人（Visigoths），當時主要由阿塔納里庫斯（Athanarichus）王統治。[29] 在晚期羅馬帝國史上，阿塔納里庫斯是個重要人物，有衆多史料提到他。馬塞里努斯稱其爲“判官”（iudex），指蠻族中地位較高的國王或者部落盟主。關於阿塔納里庫斯是否爲所有西哥特人認同的強大君主，目前尚無定論。[30] 公元364年羅馬帝國東部爆發內戰，阿塔納里庫斯曾派遣軍隊援助篡位者普羅科皮烏斯（Procopius）。羅馬皇帝瓦倫斯（Valens）平定普羅科皮烏斯後曾數度出兵，越過多瑙河懲罰西哥特人。雙方於369年言和，但瓦倫斯降低了阿塔納里庫斯作爲“羅馬盟友”的等級。[31]

得知東哥特人遭到襲擊的消息之後，阿塔納里庫斯急忙佈置防禦。

> 於是他沿着達納斯提烏斯河岸，在格琉圖恩吉人的護柵距離適中的地方修築自己的營寨。然後他派遣穆恩德里庫斯（Munderichus）與拉迦里馬努斯（Lagarimanus），還有其他高階貴族（越過邊境）二十里以監視敵人的前進動向。同時阿塔納里庫斯得以不受干擾，專注於組建作戰部隊。[32]

但西哥特人大多從事農耕，部落比較分散，舉族軍事動員在短時間內難以完成。匈人利用遊牧騎兵的機動性優勢，放過東哥特人迅速西進，採用大迂回戰術奇襲西哥特人。據馬塞里努斯記載，匈人趁着黑夜迅速行軍，由德涅斯特河上游西哥特人未及佈防的區域迅速渡河。匈人的行軍速度之快，甚至超過了對方偵察兵的情報傳遞速度。於是匈人突襲阿塔納里庫斯的大本營。[33] 此時西哥特人的軍隊主力部署於德涅斯特沿岸，新徵召的部隊尚未集結，因此阿塔納里庫斯的所在地兵力較爲空虛。匈人的攻擊使得阿塔納里庫斯蒙受了相當的損失，但更爲嚴重的後果在於失敗所產生的普遍恐懼情緒。於是阿塔納里庫斯退往南部多山地區，在這裏匈人的騎兵優勢難以發揮，他可以據險防守。[34]

> 阿塔納里庫斯於是加高堡壘，同時派出部隊，在從蓋拉蘇斯（Gerasus）河直到多瑙河的地域內襲擾泰法利人（Taifali）的土地。[35]

阿塔納里庫斯所退守的地區約爲達契亞（Dacia）地區，即今羅馬尼亞西部喀爾巴阡山脈中段，這裏一向是遊牧民族難以抵達的區域。蓋拉蘇斯河即今普魯特（Pruth）河，爲達契亞地區之東界。泰法利人爲北非的柏柏爾民族，這裏提到的泰法利人曾是戰俘，被羅馬帝國安置在該地區，馬塞里努斯對該民族及其遷移安置有不少記載。[36] 這個民族長久以來已脫離羅馬控制，經常以達契亞爲基地襲擾臨近的羅馬省份。他們受到攻擊，則多瑙河對岸的羅馬帝國必定也會感受到威脅，羅馬人對北方的嚴重局勢已逐漸有所瞭解。

> 剛開始時，我們的民衆以輕蔑態度對待這些消息。這是因爲，除了對遙遠地區發生的事情感到不安或震驚，在這些地區

> 的居民完全不知戰爭爲何物。但相信這些事情的人越來越多，當外族使者到來時，流言得到了證實。[37]

然而，匈人在擊敗阿塔納里庫斯後沒有再進一步進攻。馬塞里努斯對此的解釋是匈人忙於收羅戰利品，阿塔納里庫斯得以趁機逃脫。[38] 但事實恐怕並非如此，因爲此後約二十年間匈人都沒有再向多瑙河平原發動大規模的進攻，阿塔納里庫斯及其繼承者的勢力依然在多瑙河以北存在了近 30 年。[39] 這顯然不是因爲一次貪圖戰利品的偶然戰場行動。這段時間內匈人的本部大體仍然在南俄平原，故而匈人主力能夠在公元 395 年突破高加索防綫，深入襲擾羅馬帝國東部省份及波斯帝國西部疆土。[40] 此時匈人因長年遠離故土征戰，可能已達到實力極限，因此停止了進一步進攻，攜帶戰利品返回。這種遊牧民族的征戰模式在歷史上是很常見的。由於匈人行動迅速，他們退走後西哥特人依然不明就裏，陷於巨大恐慌。

> 儘管（阿塔納里庫斯幸存下來，）消息還是傳遍了其他哥特部落，稱某個至今尚不爲人知的強悍種族近來由其藏身之處鑽出來，像源自高山的雪暴一樣震撼並席捲所有周邊之物。[41]

最終大多數哥特人決定不再跟隨阿塔納里庫斯，但他們難以自立，遂決定轉而向唯一可能依靠的強權——羅馬帝國尋求庇護。[42] 他們希望羅馬帝國能夠接納他們，允許他們度過多瑙河在色雷斯（Thrace）地區定居。

> （如此決定）原因有二：首先，色雷斯的土地非常肥沃（利於耕作）；其次，在色雷斯與那些目前暴露於異族戰爭風暴的適耕土地之間，有希斯特河的寬闊波濤相隔。於是所有其他部落皆一致同意了該計畫。[43]

西哥特人的主體在首領阿拉維烏斯（Alavivus）的率領下於公元376年抵達多瑙河北岸。而阿塔納里庫斯與羅馬皇帝瓦倫斯有隙，之前曾誓言不再踏入羅馬國土[44]，他自知不會被羅馬帝國接納，便率領麾下的部衆退往高加蘭達（Caucalanda）地區，他在這裏築堡守衛，擊退了薩爾馬特人（Sarmatae）等遊牧民族的進犯。[45]高加蘭達的具體位置不詳，據推測可能是今羅馬尼亞西部的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地區。馬塞里努斯稱這裏“山巒高聳，樹木參天”，非常適於對抗騎兵的進襲。不過阿塔納里庫斯的大部分部衆與將領此時已離棄了他，決定進入羅馬帝國避難，比如引文中提到的穆恩德里庫斯後來爲羅馬皇帝效力，官至阿拉比亞（Arabia）[46]邊防司令。[47]阿塔納里庫斯的長年抵抗行動後來終於獲得羅馬帝國的認可。381年1月，阿塔納里庫斯違背早先的誓言，避入羅馬帝國，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宮廷受到皇帝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的友好接待。兩周後阿塔納里庫斯病逝，狄奧多西爲其舉行了隆重葬禮，以安撫境內的哥特民衆。[48]

西哥特人主體抵達多瑙河畔後派出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覲見羅馬皇帝，誓言會遵守羅馬的法律，情勢需要時還會向羅馬提供輔助兵士。[49]約鄧尼斯對此事的記載基本相類，只是相對簡略。[50]羅馬皇帝瓦倫斯應允了西哥特人的請求，於是這些西哥特人全族渡河，被安置在多瑙河南岸諸省。[51]之後，維德里庫斯率領的東哥特部衆亦抵達多瑙河北岸，他們同樣提出歸順請求，被羅馬皇帝拒絕。[52]但東哥特人趁着當時局勢混亂，羅馬軍隊疏於防範之機，暗中渡過了多瑙河。[53]過河的哥特人數量難以確知。馬塞里努斯稱羅馬官員曾力圖清點哥特人人數（顯然僅是西哥特人），但徒勞無功。[54]後

來的史家尤納皮烏斯（Eunapius）則稱僅入境的哥特戰士就有二十萬人[55]，這顯然是過於誇張的說法。

至此，哥特人的主體和相當部分的東哥特人已經進入羅馬帝國境內，歐洲的民族分佈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由匈人的戰爭行動所引發的連鎖反應，將極大影響晚期羅馬帝國的歷史進程。其中最直接的重大事件即羅馬帝國境內哥特人之公開反抗以及公元378年的阿德里安堡之役，羅馬皇帝瓦倫斯歿於是役，羅馬帝國從此喪失了對蠻族的軍事優勢。[56]

末了，需要探討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即阿德里安堡會戰中是否有匈人參戰。有現代匈人史家認爲是役有匈人參戰，而且匈人騎兵的進攻可能在戰鬥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最重要的證據是馬塞里努斯的相關記載：阿德里安堡戰役之前，哥特人曾與一些匈人和阿蘭人結盟，共同對抗羅馬[57]，而且戰後也有匈人與阿蘭人跟隨哥特人大肆劫掠。[58] 但所有的古典史料皆未提及匈人參戰。贊同匈人參戰的學者對此的解釋是：羅馬人在戰鬥中損失慘重，“事後無人能對所發生的事有清晰準確的描述”。[59]

但筆者認爲：匈人參戰的可能性不大，匈人在戰鬥發揮關鍵作用更是可能性極小。對於阿德里安堡會戰的經過及前因後果，馬塞里努斯有詳盡記述。戰役的全過程較爲清楚，扭轉戰場局勢的最關鍵因素是阿拉特烏斯與薩弗拉克斯率領的東哥特騎兵，他們突然出現於戰場，協助西哥特騎兵擊潰了羅馬騎兵的左翼，隨後哥特騎兵包抄羅馬步兵，致使羅馬軍隊陷於絕境。[60] 是役羅馬步兵幾乎全軍覆沒，但羅馬騎兵在戰役中期即被擊敗並被驅離戰場，因此大部分羅馬騎兵幸存下來。馬塞里努斯大概正是通過這些幸存者瞭解了戰

役的全過程，要說“事後無人能對所發生的事有清晰準確的描述”，似乎不符合事實。至少對於敵人的騎兵，羅馬人應該有準確的資訊。實際上馬塞里努斯對參戰敵軍的騎兵部隊有很清楚的描述，其中除西哥特人與東哥特人之外，還有少量阿蘭人。[61] 如果真有匈人參戰，記載中應該不會忽略。因此筆者認爲匈人參戰的可能性不大。固然在戰役之前及之後哥特人都有部分匈人盟軍，但馬塞里努斯明確稱他們是“少數”（aliqui）[62]，不可能發揮重要作用。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匈人在歐洲軍事史上的地位如何。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爲歐洲人對匈人的遊牧戰術完全陌生，因而在軍事上不是匈人的對手，國內的多數學者亦樂於接受此種說法。[63] 不過在筆者看來，該說法在文獻與考古層面皆缺乏根據。實際上早於匈人進入歐洲之前八個世紀，歐洲人就已對遊牧騎射戰術有所瞭解並加以吸納模仿。到了羅馬帝國後期，羅馬野戰部隊（Comitatenses）中的騎兵比例已達四分之一以上，其中多數爲騎射手（Sagittarii）。[64] 以史家馬塞里努斯爲例，馬塞里努斯本人精通騎射，在帝國軍隊任職期間多次指揮騎兵部隊作戰[65]，《歷史》中的相關記述頗多。[66] 最值得關注的是，馬塞里努斯談到公元四世紀中期羅馬騎兵已採用遊牧民族慣用的大規模圍獵方式，即蒙古人所謂的“捏兒格”（nerge），進行戰術訓練。[67] 因此在匈人入侵以前，羅馬騎兵的“遊牧”色彩已非常濃厚。此外，自匈人進入歐洲之後，歐洲諸族與羅馬的軍隊中一直不乏匈人雇傭兵，例如本文中提到的哥特人雇傭匈人爲自己作戰，因此歐洲人不可能對匈人戰術感到陌生。[68]

綜合各種史料看，匈人在軍事上成功，主要原因在於純粹遊牧

騎兵的機動性優勢，以及來自苦寒地帶民族的頑強與吃苦耐勞。對於匈人這方面的優勢，馬塞里努斯用了大量篇幅加以說明。[69] 匈人的強悍與堅韌，是生息於豐饒平原上的阿蘭與哥特諸族所等難以想像的，羅馬帝國境內的居民更不能望其項背。然而單純在戰術上，匈人的入侵並沒有給歐洲諸族與羅馬軍隊帶來太大衝擊，即便是阿德里安堡會戰這樣的巨大災難也沒有改變羅馬軍隊的戰術體系。公元六世紀查士丁尼時代的羅馬軍隊在戰術與裝備方面與公元四世紀中期匈人抵達之前的羅馬軍隊基本上大同小異。因此，對於匈人在歐洲戰爭史上的重要性，我們不應過分誇大。

■ 注釋

[1] 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79. 相關綜合的討論見筆者拙文，劉衍鋼：《古典學視野中的“匈”與“匈奴”》,《古代文明》2010 年第 1 期，第 67 頁。

[2]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361.

[3] P. Heather, “The Huns and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0 (1995), p. 6.

[4] 麥奧提克沼澤即今亞速海，目前已知的匈人最早棲身地。見劉衍鋼：《古典學視野中的“匈”與“匈奴”》，第 63—80 頁。

[5] Jordanes, *Getica*, XXIV. 123-124.C. Christopher,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NSW, Evolution Publishing, 2006.

[6]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19. Ammianus Marcellinus,*The Later Roman*

Empir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Marcellinus, Ammianus Marcellinus, Vol. I-III,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58—1982.

[7]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1.

[8] Strabo, *The Geography*, XI.1,1-2.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V,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4.

[9] 吉本 :《羅馬帝國衰亡史》第 2 卷第 26 章。E.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London: Routledge Thoemmes Press, 1997.

[10] E. A. Thompson, *The Hu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p. 27, p. 63.

[11]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

[12]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20-23.

[13]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 35, p. 80.

[14] 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 113-117.

[15] Andrzej Kokowski, “The Agriculture of the Goths between the first and fifth Centuries A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The Roman and the Early Migration Period)”, *The Ostrogoths From the Migration Period to the Sixth Century: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Sam J. Barnish and Federico Marazzi (eds.),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7, pp.221-236.

[16] “赫爾曼納里克”是約鄧尼斯所記載的名字。馬塞里努斯稱其爲“艾爾門里庫斯”(Ermenrichus)，這已是帶有希臘化與拉丁化色彩的名字，古典作家筆下的蠻族人名字常有如此變形。

[17]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1.

[18] Jordanes, *Getica*, XXIII. 116.

[19]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2.

[20] Jordanes, *Getica*, XXIV. 129-130.

[21]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63; Cameron, A. & Garnsey, P.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00.

[22]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3.

[23]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5.

[24]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 54-55.

[25]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429-438.

[26]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3.

[27]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3.

[28]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4.12.

[29]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4.

[30] M. Kulikowski, *Rome's Gothic W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01.

[31] Ammianus Marcellinus, XXVII.5; A. Cameron, & P. Garnsey,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p. 94.

[32]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5.

[33]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6.

[34]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7.

[35]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7.

[36] 見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9.3-5.

[37]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4.3-4.

[38]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8.

[39] A. Cameron, & P. Garnsey,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pp. 502-503.

[40] J.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 51-57; 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 181-183.

[41]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8.

[42] A. Cameron, & P. Garnsey,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p. 500.

[43]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8.

[44] Ammianus Marcellinus, XXVII.5.9.

[45]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4.13.

[46] 阿拉伯半島西北部。

[47]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3.5.

[48] A. Cameron, & P. Garnsey,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p.

[49]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4.1.

[50] Jordanes, *Getica*, XXV. 131.

[51]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4.5-9.

[52]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4.12.

[53]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5.3.

[54]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4.6.

[55] E. A. Thompson, *The Huns*, p. 63; Cameron, A. & Garnsey, P.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p. 98.

[56] T. N. 杜普伊：《武器和戰爭的演變》，嚴瑞池等譯，軍事科學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1 頁。

[57]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8.4.

[58]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16.3.

[59] E. A. Thompson, The Huns, pp.29-30

[60]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12.14-17, XXXI.13.1-2.

[61]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12.17.

[62]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8.4.

[63] 例如齊思和：《匈奴西遷及其在歐洲的活動》。原載《歷史研究》1977 年第 3 期。林幹選編：《匈奴史論文集（1919—1979）》，中華書局 1983 年版，第 144 頁。

[64] P. Sabin, & H. V. Wees, & M. Whitb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93, p. 355.

[65] 見筆者拙文，劉衍鋼：《馬塞里努斯生平考》，《古代文明》2012 年第 2 期，第 27—34 頁。

[66] 例如 Ammianus Marcellinus, XVI.12.2, XVI.12.7, XXIII.2.7.

[67] Ammianus Marcellinus, XXIV.5.2.H. Kennedy,*Mongols, Huns and Vikings Nomads at War*, London, Cassell & Co, 2002, pp. 118-121; P. Sabin, & H. V. Wees, & M. Whitb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II, p. 373.

[68] 劉衍鋼：《古典學視野中的“匈”與“匈奴”》，第 70 頁。

[69] Ammianus Marcellinus, XXXI.2.

[70] P. Sabin, & H. V. Wees, & M. Whitb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II, pp. 355-357.

古希臘羅馬文獻中的遠東——賽里斯人（上）

萬翔

一、文獻記載與研究回顧

（一）西方關於遠東的最早記錄

自巴比倫、亞述帝國時代之後，古希臘羅馬作家的作品成爲西方文化的淵源之一。在古希臘文明逐漸勃興的時代，遠東的商周文明也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發展起來。因此在西方作家的文獻中，留下了關於遠東的印記。

已知西方文獻中關於遠東的最早記錄出現在公元前7世紀古希臘作家阿里斯鐵（Aristeas of Proconnesus）的詩篇《獨目人》（*Arimaspeia*）[1] 中。此書已佚失，保存在其他古典作家如品達（Pindar）[2]、希羅多德（Herodotus）[3] 的著作中關於"北風以外的人"（Hyperboreans）的零星記載，無法讓人看到這一民族的全貌 [4]。有學者指出，希羅多德記載的"北風以外的人"位於希臘世界已知

地理的極限，客觀上可能指居住在遠東的古代中國人[5]。考慮到希羅多德常見的方向錯誤，“極北”可以不妨理解爲遠東[6]，但對此目前尚沒有統一的結論[7]。

公元前5世紀末4世紀初希臘作家克泰夏斯（Ctesias of Cnidus）[8]的作品《波斯志》（*Persika*），是西方古典文獻中留存至今最早的關於遠東地區的記載。克泰夏斯記載了賽里斯人（Seres）身材高大和長壽的特徵。[9]

另一個關於遠東的早期記錄，是馬其頓征服者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36—323年在位）給其導師亞里士多德的通信。在公元前327—325年遠征印度期間，亞歷山大給亞里士多德寫了關於印度奇聞的通信（Epistola Alexandri ad Aristotelem de miraculis Indiae）。信中提到了賽里斯人。[10]信件裏對賽里斯和巴克特里亞的混淆表明，其成文的素材來自於希臘人征服巴克特里亞之前。其後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的記載則明顯區别了巴克特里亞和賽里斯人的土地。[11]

西方古典文獻對遠東的記錄，除了賽里斯這一名稱外，尚有“秦奈”（Thinae）的稱呼。秦奈一般認爲是通過印度洋海上貿易之路傳播的名稱。記載“秦奈”最早的現存文獻是《厄立特里亞海週航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12]該作品的作者不詳，其成書時間約當公元1世紀下半葉。因此，與“賽里斯”相比，“秦奈”晚出且並不多見。除了《厄立特里亞海週航記》之外，衹有公元2世紀的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和公元5世紀的馬爾西安（Marcian of Heraclea）兩處文獻提到過“秦奈”。

“賽里斯”逐漸成爲了西方通過陸路交通所知的有人居住的地區

東界的民族。相較於“北風以外的人”和“秦奈”的零星記載，“賽里斯”成爲西方古典文獻對遠東地區最重要的指稱，也因而是本文討論的主題所在。

（二）貫穿西方古典世界的賽里斯形象

現存文獻中的 serica（其形式爲複數，單數爲 sericum），即“賽里斯織物”這一名詞，首先出現在公元前 1 世紀抒情詩人普羅佩提烏斯（Propertius）的《哀歌》（*Elegies*）中。[13] 自此以後，賽里斯這一名稱便與西方世界的絲綢供應者的身份聯繫起來。[14] 古典世界以來，這種名貴織物的來歷成爲西方作家筆下的難解之謎。而賽里斯商人的形象，以及他們經商的誠實與奇特方式，也成爲希臘羅馬史家津津樂道的內容。

如果說絲綢是我們熟悉的內容，那麼關於賽里斯人的長壽、弓箭、戰車等等的記載，則爲賽里斯人確係中國人之說打下了問號。其中最大的疑問，還是來自希臘羅馬世界地理學家著作的記載。在古典地理學家中，斯特拉波首先提到了賽里斯。現存最早描述賽里斯地理位置的古典著作是梅拉（Pomponius Mela）的《世界志》（*Chorography*）和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又譯《自然志》），均成書於公元 1 世紀。兩者關於地理位置的描述同出一源[15]，談到了沿里海和斯基泰洋航行的綫路，指出亞洲最東部居住著三個民族，並將賽里斯人正確地置於印度人和斯基泰人之間。

古典的地理學，到公元 2 世紀時集大成於羅馬埃及亞歷山大的托勒密。托勒密在《地理學》（*Geography*）中對世界每一個地區標

定了經緯度。其中包括對賽里斯地區的詳細叙述。這一叙述引自推羅的地理學家馬里努斯轉述一位馬其頓商人梅斯的經歷。其不嚴密性在於，據馬里努斯所述，梅斯本人也沒有到過賽里斯，而是他的助手到達了賽里斯。[16] 這一叙述的重要貢獻在於指出了“石塔”（lithinos pyrgos）[17] 在通往賽里斯道路上的關鍵位置。

自古典時代以來，西方世界與中國的交往始終沒有中斷過。但從公元 4 世紀以後，西方文獻中關於賽里斯的形象基本上固定下來，後人的著作都可以在前人論著中找到根據。儘管 6 世紀以後拜占庭史家著作中出現了“秦尼扎（Tziniza）”與“桃花石（Taugast）”這兩個新的稱呼 [18]，由於文獻記載中沒有直接到達遠東的記錄，在西方作家的視野中，賽里斯這一形象的面紗一直沒有揭開。

13 世紀蒙古帝國的建立打通了從中國到歐洲的交通綫，自古典時代以來，歐洲人第一次獲得了從西方直接到達中國的記錄。首先來到中國的歐洲使節之一魯布魯克（William of Rubruck）在其行紀中認爲，當時所稱的“大契丹國”，即中國北部，就是古典文獻中的賽里斯國。[19]

明清兩代鎖國之後，近代西方對賽里斯的討論始於在中亞和中國西部的探險活動。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中亞探險時就試圖考證古典文獻的記載。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從克什米爾初次踏上中國土地的第一站便是塔什庫爾干（Tashkurgan）。這個名字的意義“石頭城”恰如托勒密文字中的“石塔”的形象。[20] 另一個重要的絲路城市塔什干（Tashkent）在探險者的筆下也成爲了“石塔”的候選者。[21] 在第三次中亞探險之後，斯坦因最終將今天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達勞特—庫爾干（Daraut-Kurgan）比定爲

“石塔”。儘管今天對於“石塔”的位置尚存巨大的爭議，塔什干、塔什庫爾干和達勞特—庫爾干都位於可以控制西域的中國所能達到的自然邊界上。這一點從托勒密、梅拉等人所在的東漢，到斯坦因的時代都沒有改變。

（三）近代學者研究下的賽里斯

相比於對遠東的實地探險考察，西方人在古典文獻中對遠東的研究很早就已經開始。這些研究的共同點是抓住古典文獻的叙述，一定程度上結合西方對中國的實地考察和地理文獻。《馬可波羅行記》本身及對它的研究就是這一方法的實例之一。最早涉及“賽里斯”問題的學者是法國的德經（Joseph de Guignes）和德國的克拉普洛特（Julius von Klaproth）。他們討論了“賽里斯”的語源，指出“絲”字與賽里斯的聯繫。[22] 此後，關於賽里斯的論述屢屢出現在西方文獻學者和漢學家的著作中。[23]

衛維恩・德・聖馬丁（Vivien de Saint-Martin）較早運用東方文獻對希臘拉丁文獻中的遠東地理進行了考證。在1858—1860年間出版的作品《對希臘拉丁地理學文獻中關於印度記載的研究》中，聖馬丁對托勒密等西方主要地理學者記載的地名，使用梵語文獻進行全面的考證。由於其文獻來源單一，聖馬丁把很多爲後來學者認爲在中國境内的地名考證在印度次大陸。

洪堡之後最傑出的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1877—1878年出版的巨著《中國》（*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第一卷中對古代中國和印度、西方的交往路綫進行了考證。李希霍芬是

第一個將對中亞的親身考察與中國、西方文獻進行綜合分析的學者。他的研究在很長時期内是西方對中國歷史地理學最詳盡的專著。李希霍芬還是最早提出“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的學者。[24]

英國學者裕爾（Henry Yule）所著的《東域紀程錄叢》（*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從中國 - 歐洲交流史的角度對賽里斯問題進行了詳細的闡述。該作品原著出版於 1866 年，1915-1916 年經法國學者考迪埃（Henri Cordier）修訂再版。與此前德經、克拉普洛特等人的論述偏重具體史料的考訂相比，《東域紀程錄叢》爲漢學學者提供了關於中國對外交流歷史的全景式介紹，並在附錄中翻譯和輯錄了重要的相關史料。經考迪埃修訂後的版本，成爲 20 世紀初研究中國對外關係史的集大成著作。

1910 年法國學者戈岱司（Georges Cœdès）編輯出版了《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à l'Extrême-Orient*）。戈岱司試圖窮盡西方古典文獻中關於古代遠東的記載，收集近九十位作家涉及古代遠東的著作片斷並譯爲法文，上起公元前 5 世紀末的克泰夏斯，下至公元 14 世紀拜占庭作家的作品，基本涵蓋了古典和中世紀西方作家的著述。戈岱司的輯錄長期以來一直是賽里斯問題研究最全面的史料集。同時戈岱司也在其導論中概括性地指出：“作爲一種妥善的辦法，人們不能夠僅僅根據這些資料就肯定，在公元前 1 世紀以前，地中海沿岸諸民族就開始瞭解和猜測遠東地區了。”[25] 這一結論成爲後來著作反復爭辯的主題。有代表性的爭議是 1931 年赫德遜的《歐洲與中國》（*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一書。赫德遜試圖以中國和歐洲作爲對等的兩個文明中心進行論述，上起

遠古，下至1912年。他注意考古資料的收集與使用，認爲希羅多德以前東西方的交流就已經有顯著的證據，從而反對戈岱司的較保守的論述。[26]

德國學者黑爾曼（Albert Herrmann）出版於1910年的《漢代繒絹貿易路考》（Die alten Seidenstraß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beiträge zur alten geographie Asiens）和1938年的《古典之光下的絲綢之國與西藏》（Das Land der Seide und Tibet im Lichte der Antike）是作者長期研究絲路貿易的成果。黑爾曼大量運用中國和西方文獻對比的方法，對絲路貿易的路綫作出推定。在後一本書中，作者對賽里斯、秦奈等詞源的出處都進行了詳細的考察。他指出賽里斯這一名稱可能指所有從事絲綢貿易的遠東民族，而將賽里斯的首都賽拉城定於涼州的位置。黑爾曼的研究繼承了洪堡、李希霍芬以來德國對亞洲地理學研究的領先優勢，又適時參考了斯坦因、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同時代西方探險家在新疆和中亞的考察成果，其在二戰前出版的專著堪稱當時對西方文獻中遠東地理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時代的祁利尼（G. E. Gerini）、貝爾特洛（Andre Berthelot）的著作[27]代表了英法兩國對中亞和遠東古地圖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地理研究之外，對於賽里斯的詞源學研究，以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爲代表。他在20年代作了兩篇劄記，將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新出土的粟特語文獻、佛經梵漢對音與西方古典文獻的記載相結合，以其對歐亞諸多語言的精通，對賽里斯之名探源[28]。在其後出版的《馬可波羅注》（*Notes on Marco Polo*）中，伯希和對賽里斯詞源問題做出了迄今爲止最全面的

總結。由於問題本身的複雜，他沒有就賽里斯的詞源給出確定的答案，但總結了從克拉普洛特以來包括馬夸特（Josef Marquart）、黑爾曼、勞弗（Berthold Laufer）等人對賽里斯的詞源的研究。後來美國學者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加拿大學者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也對此問題展開了進一步論述。[29]

二戰之前對賽里斯問題的研究幾乎都集中在歐洲學術界。唯一例外是日本學者白鳥庫吉1941年發表的《論托勒密所見葱嶺通過路》一文[30]。這篇文章指出了西方學者單方面重視西方古典文獻，而對中國古代史料重視嚴重不足的問題，就托勒密記載的通往"石塔"道路這一問題從中國古文獻記載的傳統出發，得出了與西方學者研究完全不同的結論。

二戰之前中國學者對西方文獻的利用主要是譯介工作。張星烺先生在其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一冊中輯錄了裕爾收集的西方史料。馮承鈞先生則在所著的《西域地名》中引用了裕爾和戈岱司輯錄的史料，結合漢文和多種西域語言資料，對西域地名進行考訂。

（四）二戰後以來對於賽里斯問題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對歐洲學術界的摧殘自不待言，戰後出現的兩大陣營對立的局面，以及後來中蘇兩國關係的緊張和印巴危機、蘇聯入侵阿富汗等亞洲內陸政局的變化，使得除了60—70年代法國阿富汗考察隊等少數考古發掘之外，西方學者對中亞和新疆的考察幾近於停滯的局面。由於非學術的原因，中國的公共圖書館里一度中斷了從西方和蘇聯獲得資料的供給，因此提供給中國學者對上述

問題討論的空間非常有限。

最早對中國文化產生濃厚興趣的法國此時走在了前面。法國學者布爾努瓦夫人（Luce Boulnois）1963 年著的《絲綢之路》，以絲綢作爲中國和西方交流的綫索，刻畫了絲綢工藝的產生和傳播過程，以優雅的筆觸撰寫了從遠古傳說時代到 20 世紀中葉的中國對外交流史。《絲綢之路》超過了前人的著作[31]而成爲最詳盡的絲綢生產和傳播史方面的論著。

20 世紀 70—80 年代，絲綢之路沿途古代語言的破譯推動了對包括賽里斯問題在內的中國－歐洲交流史的發展。研究者對以往的文獻史料進行進一步總結和討論，如 1975、1980 年芬蘭出版的兩卷本《東北歐亞大陸拉丁史料集》（*Latin Sources on North-Eastern Eurasia*）以及 1979 年瑞士出版的《希臘羅馬世界對西藏周邊的探索》（Griechische und römische Quellen zum peripheren Tibet）。

作爲在羅馬史的大框架下對史料的清理和羅馬史領域內問題的全面探索，1978 年歐美各國學者聯合編寫的叢書《羅馬世界的興衰》（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第九卷收錄了弗格森（J. Ferguson）撰寫的《中國與羅馬》（*China and Rome*）和拉西克（Manfred G. Raschke）的《羅馬東方貿易新探》（*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 with the East*）兩篇專論，從東西方貿易的角度對中國和羅馬交往問題重新探討。

這一時期在文獻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是法國學者讓維埃（Ives Janvier）1984 年發表的專論《羅馬與遠東》（Rome et l'Orient lointain: le problème des Sères. Réexamen d'une question de géographie antique）。讓維埃繼承了古典學家對古希臘羅馬文獻深入剖析的特

點，對賽里斯問題進行了全面的再分析。他對史料的和近代學者研究的分類討論都具有獨創性。但是在具體考證中，讓維埃特別注重戈塞蘭（P. F. J. Gosselin）19世紀初提出的觀點，即把有關賽里斯的地名和民族放置在克什米爾（Kashmir）和西藏西部的拉達克（Ladakh）兩地。讓維埃試圖說明，最早的記載中的“賽里斯人”描述的是這一地區，然後賽里斯的形象逐漸向新疆和中國內地（包括西藏）擴展。[32]

同年，西德學者豪西克（H. W. Haussig）結合中文史料指出斯特拉波和老普林尼著作中的賽里斯人實際上是指遊牧的烏孫人。他們在中國和西方的貿易中起中間人的作用。他猜測賽里斯的語源來自錫爾河（Syr Darya）的名稱，由於口述轉譯，帕提亞語稱之爲Silis。[33] 以上的說法與衆說相異，列出以資參考。

自20世紀60—70年代法國考古隊在阿富汗的考察和考古發掘爲進一步討論托勒密關於中亞的記載提供了可能。考古隊領導人貝爾納（Paul Bernard）曾就此撰文，成員之一拉平（Claude Rapin）指出托勒密地圖中關於東方部分的材料來源有相當部分來自希臘化時期的資料，並試圖還原托勒密記載中的通往賽里斯之路。[34]

在前蘇聯學者中，亦不乏對賽里斯問題的關注。由於筆者能力所限，對討論賽里斯問題的俄語文獻中，衹查找到前蘇聯科學院1988年出版的《古代和中古早期的新疆史》系列第一卷。[35] 此著作系統地回述了西方古典著作中關於賽里斯的記載，並對比中亞和新疆的地理情況進行了勘定。此集體著作一卷中收集上千種研究材料作爲參考，體現了前蘇聯學者的研究成果。

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活躍的中國學術界也積極參與了對賽

里斯問題的討論。1985年，莫任南指出《後漢書・和帝紀》記載的“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內附”與托勒密記載的馬其頓商人有關。[36] 1991年，林梅村將托勒密記載的梅斯商團進入賽里斯境內與《後漢書・和帝本紀》記載的西域二國遣使內附相聯繫，並結合中亞古代語言的研究，考證了托勒密《地理學》記載的西域地名和民族。林文指出賽里斯一名起源於當時粟特人對中國首都的稱呼 Srγ，並指出“石塔”的位置在塔什庫爾干。[37]

一時間學者針對林文展開了羅馬商團究竟是否到過中國的討論。楊共樂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爲林文所指的“石塔”位置和賽里斯稱謂均有誤，前者應在帕米爾西部地區，後者與中國首都長安（或洛陽）的稱謂無關。[38] 臺灣學者邢義田對林文的敘述發起了全面的質疑，懷疑作爲托勒密材料來源的地理學家馬里努斯（Marinus of Tyre）的可靠性，並認爲梅斯商團沒有到達過洛陽。[39] 張緒山則在討論了普林尼所說的賽里斯鐵[40]和羅馬帝國向東方探索路綫的基礎上[41]，指出馬其頓商團很可能並未到達洛陽，但可能在西域都護得到了漢朝官員的接見；同時指出用托勒密轉述馬里努斯的記載確定塔里木以東的地理位置是相當困難的。[42]

目前對賽里斯的問題，各國學者仍然莫衷一是。筆者希望在本文的討論中，在回到文本的前提下，對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進行探討，以期提起對賽里斯問題的關注。[43] 這一問題需要不同領域的學者的共同研究，從古典學到東方學，從語言、歷史到地理，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才有希望獲得較圓滿的解決。

二、歷史的映像——文本的再檢討

（一）文本的時段選取與分類

回顧古希臘羅馬文獻中的賽里斯形象，首先要對文本進行重新清理。戈岱司的史料集收集了幾乎全部關於賽里斯問題的史據，包括大段古文引文。這一文集有些過時，對年代的推定也有錯誤。然而它仍是不可替代的基礎性文獻。此文集已於 1987 年由耿昇先生譯成中文，筆者討論的主要史料來自此文集中。

借鑒讓維埃的思路[44]，筆者試圖將關於賽里斯的史料分爲四類。前兩類幾乎同時出現在羅馬共和國晚期和帝國早期，分別代表羅馬詩人和劇作家的傳統，以及繼承了希臘化時代遺產的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傳統。第三類是哲學與宗教思辨的傳統下的基督教和諾斯替教作家的傳統，此時正值羅馬帝國中期，基督教興起但還未成爲國教。第四類傳統則在晚期羅馬帝國與早期拜占庭時期，這一時期的文獻呈現出古典傳統與新興基督教傳統的碰撞與融合。

筆者沒有將較早的零星記錄如克泰夏斯和亞歷山大傳奇包括在考察範圍內。不僅因爲其可信度存疑，而且因爲它們所記載的時段在希臘化時代東西方交往擴展之前。而對於所載史料的下限，筆者以公元 4 世紀作家阿米安·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爲限。其時沙普爾二世（Šapur II, 公元 309—379 年在位）確立了薩珊波斯在亞洲西半部的霸權，羅馬 - 拜占庭世界與波斯以東諸民

族的交通受到了自亞歷山大東征以來最大的阻礙。從此以迄6世紀科斯馬斯[45]遊歷印度和彌南德（Menander Protector）記載的拜占庭使節出使西突厥[46]，西方沒有獲得更多關於遠東的知識。對於早期中古著作中散見的獨特記載如6世紀作家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Isidore of Seville）對賽里斯的描述，筆者也將在下文中加以涉及。

（二）羅馬詩人和劇作家筆下的賽里斯

賽里斯的形象馳騁在羅馬“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詩人的筆下，其中尤以黃金時代詩人的作品爲重要。從公元前37年起：維吉爾（Virgil）、賀拉斯（Horace）、普羅佩提烏斯（Propertius）和奧維德（Ovid）的著名詩篇中，都出現了賽里斯的形象。

賽里斯人首先被描繪成珍稀紡織品提供者的形象：在維吉爾筆下“賽里斯人從他們的樹葉上采下來纖細的羊毛”[47]；賀拉斯提到了“賽里斯人的坐墊”[48]；奧維德則述及“賽里斯人的面紗”[49]；普羅佩提烏斯直接使用“賽里卡”（serica）來命名這種紡織品。[50]作爲最早集中描寫賽里斯人的作家，四位用拉丁語寫作的詩人筆下都出現了賽里斯人的紡織品。這決非偶然的行爲，而是表現了當時羅馬對東方絲織品的巨大需求。普羅佩提烏斯的描述，正是西方文獻中對從遠東傳入的絲織品所使用的最早的專有名詞。

然而，黃金時代詩人對賽里斯的描寫並非僅僅局限在絲織品一個方面。在賀拉斯獻給皇帝屋大維（即奧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的頌詩（Odes）中，賽里斯人作爲未征服的東方民族之一，與帕提亞人（波斯人）、巴克特里亞人、印度人、蓋提人（Getae）[51]和塔奈斯人（Tanais）[52]並列：

或者他（奧古斯都）能使威脅着拉丁地區的帕提亞人，
使他們遭受應得的慘敗，
也許東方海岸的臣民，
賽里斯人和印度人，
都將臣服於唯一的您對世界公正的統治。(I, 12, 53—57)
你爲小鎮而惴惴不安，
爲大城而憂心忡忡。[53]
怕引誘來賽里斯人、處在居魯士統治下的
巴克特里亞人或內亂中的塔奈斯人。(III, 29, 25—28)
飲用深深的多瑙河水的人們，
不敢違抗愷撒的敕令，蓋提人、
賽里斯人、不忠的波斯人、
以同名之河流命名的塔奈斯人（都不敢）。(IV, 15, 21—24)

當時羅馬人已經熟知自己各個邊界上的民族。羅馬在東方的主要對手是控制波斯的帕提亞人。來自東北方的威脅則是色雷斯人和黑海沿岸民族。賀拉斯祝願屋大維能夠戰勝帕提亞人，從而使賽里斯人和印度人都成爲羅馬的附庸，在這裏賽里斯和巴克特里亞人、印度人一起成爲帕提亞以遠的東方的代名詞，但並沒有對其具體方位的說明。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賽里斯人作爲羅馬可能征服的對手之一，出現在賀拉斯的想像中。[54]

賀拉斯的記載中還提及了賽里斯人的利箭[55]；而普羅佩提烏斯則記述了賽里斯人的戰車。[56]這條軍事的綫索始終貫穿在西方史料中。希臘作家查理同（Chariton）也記載了賽里斯的弓箭。[57] 2至3世紀賀拉斯詩集的兩位注釋者：僞阿克倫（Pseudo-Acron）和波

爾菲利昂（Porphyrion），在詮釋賽里斯人的箭時，都提到了帕提亞人的箭。對賀拉斯《頌詩》“善於射出賽里斯國的利箭……”(Odes, I, 29, 9) 的注釋：

> 賽里斯國得名於同名的賽里斯人。賽里斯民族與帕提亞人相毗鄰，以他們善於造箭而廣負盛名，Sericum（這裏指賽里斯織物）一名也由此而來。(僞阿克倫)
>
> 此處賽里斯國的箭：就是帕提亞人（的箭），其箭名來自賽里斯民族的名稱，他們居住在東方世界的一隅。(波爾菲利昂)

羅馬克拉蘇軍團在公元前53年卡爾萊戰役中的全軍覆沒，使羅馬人領教了帕提亞弓箭的威力。後世的作家並未指出賽里斯和帕提亞弓箭的區別，說明賽里斯在黃金時代羅馬詩人與修辭家心目中衹是一個遠方神秘模糊的形象。帕提亞耀眼的絲質軍旗，給賽里斯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在白銀時代的羅馬詩人和修辭家筆下，賽里斯仍然以其距離的遙遠和奇妙的織物令羅馬人稱奇。在公元 1 世紀上半葉著名作家塞涅卡（Seneca）的悲劇作品中，尤其反映了這兩點。他使用“極遠的”（ultimi）一詞來形容賽里斯人 [58]，但同時承認不知道賽里斯的確切位置。[59] 與維吉爾一樣，塞涅卡也認爲賽里斯的羊毛摘自樹上。在公元 1 世紀下半葉作家西流士・伊塔利庫斯（Silius Italicus）筆下，賽里斯人“往小樹林中去採集枝條上的羊毛”的形象躍然紙上 [60]，彷彿已成爲當時羅馬人對賽里斯人的常識。伊塔利庫斯還提到酒神巴庫斯（Bacchus）征服東方的故事，並把賽里斯人和印度人作爲他勝利凱旋的俘虜。巴庫斯即希臘神話中的狄奧尼索斯（Dionysus）征服印度，是希臘神話中的傳說之一，在希臘化時代作

家的作品中常見。[61]

與黃金時代詩人的描寫相同，賽里斯人的形象也不是單一的。例如公元1世紀末作家斯塔提烏斯（Statius）首次從對錢財的態度描寫了賽里斯人。他記載“賽里斯人吝嗇已極，他們把聖樹枝葉剝摘殆盡，我對此深表惋惜。”[62] 而後又將賽里斯人與印度人、阿拉伯人並列爲富裕的民族。[63]

這個時候的羅馬人不僅關注到了賽里斯人的富足，也深知賽里斯作爲羅馬遠方強大民族存在的政治意義。在公元2世紀初，馬提亞爾（Martial）記載了如下的內容：

帕提亞的貴族和賽里斯的首領，

色雷斯人、薩爾馬提亞人、蓋提人和不列顛人，

我能向你們指明真的愷撒[64]：來吧！（Epigrams, XII, 8, 8—10）

圖拉真皇帝（Trajan，公元98—117年在位）時代的羅馬帝國擴大到了其歷史上最大的版圖範圍。羅馬在色雷斯人和蓋提人居住的地區建立了色雷斯、梅西亞和達西亞行省，防備來自北面薩爾馬提亞人的進擊。不列顛人則處於羅馬不列顛行省的統治下。在東方，圖拉真的大軍在吞併亞美尼亞之後，於公元116年佔領了帕提亞的首都泰西封（Ctesiphon）。

馬提亞爾寫作這段詩篇的時間在公元100年至他去世的102年間，此時圖拉真正開始發動對北部邊界蓋提人的戰爭。在馬提亞爾筆下的世界圖景中，賽里斯人也是圖拉真時代盛極一時的羅馬將要征服的對手之一。

在2世紀初詩人玉外納（Juvenal）的諷刺詩中，好打聽的妻子

被謔稱爲“通曉普天下所發生的一切：如賽里斯人所做、色雷斯人所爲……”[65] 賽里斯再次成爲了遙遠地方的代名詞。

在戈岱司收集的白銀時代詩人的作品中，1 世紀中葉詩人盧坎（Lucan）的《內戰記：法爾薩利亞》（Bellum Civile: Pharsalia）中描寫埃及的第十篇里，恰當與不恰當地出現了賽里斯人的名字：

白膩酥胸[66] 透過西頓的羅襦閃閃發亮，
那是用尼羅河的織針將賽里斯人細密梳過的
絲綫撚開，織成寬鬆的薄紗。(X, 141—143)

這一段生動描寫了西頓人將賽里斯織物重新紡織成輕紗的過程[67]。而在下一段里，盧坎卻錯誤地將賽里斯與尼羅河的源頭聯繫起來。

賽里斯人首先見到你（尼羅河），並探問你的源泉，
然後你又在埃塞俄比亞的田野掀起了巨浪。(X, 292—293)

將賽里斯人與尼羅河錯誤聯繫在一起，是“受到某一地理學理論的錯誤影響（戈岱司語）”[68]。在阿里安的《亞歷山大遠征記》里，這一錯誤的影響早就可見。[69] 將埃及、埃塞俄比亞與印度相聯繫是當時古典作家的普遍觀念，即認爲埃及以遠的南方，埃塞俄比亞的上游就是印度。盧坎這樣寫，無非是將賽里斯置於比埃塞俄比亞和印度更邊遠的“尼羅河源頭”而已。在他的同時代，也有一批學者認真考訂了地理知識，得出了更加準確的認識——有時甚至是驚人準確的。這些學者便是從古典作品中汲取營養，又受益於希臘化時代以來東西方交往，從而對東方世界更爲瞭解的歷史地理學家。

（三）希臘羅馬歷史地理學家記載中的賽里斯

幾乎在同時，與詩人傳統相呼應的，是希臘羅馬歷史地理學家的傳統——儘管在汗牛充棟的歷史地理著作中，賽里斯依然衹是寥寥數語，但他們的表達卻成最重要的歷史證據，也佔據了本文最多的篇幅。在目前的傳世著作中，保留下來的最早的歷史地理學著作是公元前後希臘作家斯特拉波（Strabo）的《地理志》（Geography），成書於公元 7—18 年。

斯特拉波參考阿波羅多魯斯（Apollodorus，生活於公元前 2 世紀中葉）的敘述，作了如下的記載：

> （巴克特里亞國王們）始終不斷地向賽里斯人和富尼人[70]（的地區）擴張自己的領土。（XI, 11, 1）

羅馬詩人還完全不知道賽里斯人的準確位置，衹是拿他們和印度人、帕提亞人，甚至和黑海沿岸、多瑙河以北的歐洲"蠻族"相並列，與他們相比，斯特拉波的記載可謂頗爲確切了。公元前5世紀末，克泰夏斯的記載還衹是把賽里斯人和北印度人相提並論；到兩個世紀以後，阿波羅多魯斯的時代，巴克特里亞已納入希臘世界的東北邊境，賽里斯便與之聯繫起來。這一聯繫在後世歷史地理學家的記載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克泰夏斯記載說賽里斯人長壽可達200歲。斯特拉波則兩次提到這一點：一處說他們比能活130歲的穆西卡尼亞人（Musicanians）[71]還要長壽（XV, 1, 34）；另一處記載說有人說賽里斯人長壽可達200歲（XV, 1, 37），但斯特拉波本人認爲這種說法有所誇張。[72]與羅馬詩人一樣，斯特拉波提到了賽里斯人的織物：

> 賽里斯布（Serica）是一種從乾燥的樹皮中採集的麻布……[73]

(XV, 1, 20)

據斯特拉波，這一說法來自公元前4世紀奧內西克里圖斯（Onesicritus）對亞歷山大東征的記載，叙述者則是亞歷山大的部將尼亞庫斯（Nearchus）。斯特拉波關於賽里斯人的全部記述中最重要的是他對地理學方面的細緻描述：

印度的地勢呈菱形：其北端是從波斯之門（Areias）[74] 開始一直延伸到東方邊緣的高加索山，這一山脈把北部的塞種人（Sakas）、斯基泰人（Schythes）和賽里斯人同南部的印度人分開了。(XV, 1)

儘管沒有指明高加索山向東延伸的具體路綫，斯特拉波正確地指出了賽里斯人等民族和印度人在地理位置上的區別，但是他沒有區分塞種人、斯基泰人地區和賽里斯人地區之間的位置關係。被認爲是羅馬首位地理學家的梅拉（Pomponius Mela）在他成書於公元43年的《地志》（*Chorography*）里第一次將賽里斯人的準確位置記錄下來：

人們在東方遇到的第一批人是印度人、賽里斯人和斯基泰人。賽里斯人住在臨近東海岸的中部，而印度人和斯基泰人在邊緣地帶。(I, 11)

賽里斯人居中、印度人和斯基泰人在南北兩側的基本形狀，構成了當時希臘羅馬世界對歐亞大陸東部最詳細的描述。梅拉在下面的章節里（III, 59—70）對這一段地區的地理進行了描述，其中描寫賽里斯人的部分寫道：

（從大陸東北角的斯基泰海角向南航行）然後又是一片猛獸出沒的空曠地帶，一直到達俯瞰大海的塔比斯山（Tabis）。（距

離塔比斯山）很遙遠的地方聳立着陶魯斯山。賽里斯人居住在兩山之間，是充滿正義的民族，以其將商品放在無人的地方然後躲避起來等待成交的貿易方式而出名。

根據梅拉的描述，在東海之濱，由北部的塔比斯山和南部的陶魯斯山相夾的地帶，就是賽里斯人的土地。塔比斯山以北是斯基泰人和塞種人[75]；之南則是印度人。梅拉提供了前代歷史地理學家沒有介紹的新內容，不僅包括地理的位置，還包括對賽里斯人高尚道德的評價。在後期羅馬宗教作家的筆下，這一點被抹上了濃墨重彩。

對賽里斯人貿易方式的描寫也十分耐人尋味。在此前羅馬詩人的筆下，賽里斯人被描繪爲服裝的提供者。[76] 而對賽里斯人與西方進行的貿易形式，則是到了梅拉和其後一代人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時代才受到關注。

羅馬白銀時代文學的代表人物，同時又是博物學者的老普林尼所著《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對賽里斯的記載頗爲詳細，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特別是有兩處提到了賽里斯人的特徵：

首先遇到的一族人是賽里斯人，他們以其樹木中出產的羊毛而名聞遐邇。賽里斯人將樹葉上生長出來的白色絨毛用水弄濕，然後加以梳理，於是就爲我們的女人們提供了雙重任務：先是將羊毛織成綫，然後再將綫織成絲匹。它需要付出如此多的辛勞，而取回它則需要從地球的一端翻越到另一端：這就是一位羅馬貴婦人身著透明薄紗展示其魅力時需要人們付出的一切。賽里斯人舉止溫文敦厚，但就像其樹林中的動物一樣，不願與人交往，雖然樂於經商，但坐等生意上門而絕不求售。(VI, 54)[77]

賽里斯人居於伊莫都斯山（Hemodus）以外，（錫蘭的）人們曾經見過他們，以其商業而著名。（錫蘭使節）拉契亞斯（Rachias）的父親曾經造訪過賽里斯國，而使節們自己也曾見過賽里斯人。他們描述說賽里斯人身材高大超乎常人，長着紅色頭髮、天藍色的眼睛，說話聲音很粗，交易時不說話。這一敘述與我們的商人所述相同：他們把運去的貨物放置在河對岸，與賽里斯人用來易貨的商品並列，如果賽里斯人滿意就取走貨物。(VI, 88)

與梅拉一樣，老普林尼的記載也非同尋常。他對賽里斯人貿易方式和外形的描述，在古典時代諸作家中是最詳細、最全面的。[78] 而他對賽里斯織物如何生產的記載，則與前代作家大同小異。他認爲賽里斯人在樹叢里採摘羊毛，並多次提到"羊毛樹"(lanigeras)。[79] 他還提到了賽里斯人出口鐵：

在各種鐵中，賽里斯鐵名列前茅。賽里斯人在出口服裝和皮貨 [80] 的同時也出口鐵。(XXXIV, 145)

賽里斯人出口鐵的說法，與普羅佩提烏斯談到的賽里斯戰車、賀拉斯記載的賽里斯弓箭一樣，證明了賽里斯這一民族在技術上的先進性，以及經濟和軍事實力。這也難怪老普林尼會在他的著作里驚呼：

以最低的估算，從我帝國每年流入印度、賽里斯和（阿拉伯）半島的財富，合計達一億塞斯特（羅馬銀幣單位）。(XII, 84) [81]

老普林尼的書還介紹了遠東的地理。他對基本方位的描述和梅拉相似，但是記述了賽里斯人和印度人之間的很多民族 [82]，特別是

包括富尼人（Phuni）和吐火羅人（Thocari）。可以看出那時羅馬作家已經知道賽里斯人和印度人之間有衆多民族，以及複雜的地形關係了。此外，梅拉和老普林尼都提到，在斯基泰人（以及塞種人）與賽里斯人居住的北界塔比斯山之間，都有一片野獸出沒的不毛之地。梅拉和老普林尼對東方地理細緻入微的描述表明，在羅馬黃金時代以後，拉丁作家對東方的瞭解已經極爲深入。

老普林尼的作品後來廣爲引用。例如 3 世紀初作家索林（Solin），戈岱司評論說，他的作品“衹不過是照抄多少有些删節的普林尼著作罷了”[83]。然而，在對老普林尼的記載有所發揮的作家中，索林還是模棱兩可地提供了新的信息。與梅拉和老普林尼的記載有所不同的是，在索林筆下，翻過了塔比斯山之後，仍然要經過一段沙漠地帶才能到達賽里斯人的國家（LI）。索林還提到，錫蘭人可以從他們的山頂眺望到賽里斯的海岸（LII, 21），這一說法是對距離遠近不明的遠方民族的臆想。

哈德良皇帝（公元 117—138 年在位）統治時期的兩位作家弗洛魯斯（Florus）和德尼斯（Denys，即 Dionysus Periegetes）都分別有不同於前人的新記載。在弗洛魯斯的《史綱》（*Epitome*，又譯《史鈔》）中，作家描寫了奥古斯都加冕禮上東方各國使節前來拜訪的情景：

> 斯基泰人和薩爾馬提亞人都遣使尋求與羅馬友好。同樣，賽里斯人和處於太陽垂直照射下的印度人也來了，他們帶來了寶石、珍珠和大象，他們考慮最多的就是這漫長的路程——他們說需要走將近四年始可到達。實際上衹要看一看他們的皮膚，就知道他們來自與我們不同的世界。(II, 34)[84]

在奧古斯都的紀念銘文（Res Gestae Divi Augusti）中，衹有印度人遣使的記載（§31）而沒有賽里斯人的名字。以作品的浮誇著名的弗洛魯斯發揮想像，把賽里斯和印度人相提並論，提及了他們與衆不同的膚色。這裏應當是指奧維德記載的“黝黑”膚色而不是老普林尼筆下的那種容貌。

同時代的德尼斯編寫的《百科書典》（*Periegesis*）的幾個不同版本里，都提到了賽里斯：

> 吐火羅人、富尼人和賽里斯國內的蒙昧部族，
> 都不重視肥壯的牛羊，
> 他們可以織出自己荒涼地區五彩繽紛的花朵，
> 還能以高度的技巧裁製貴重的服裝，
> 具有草原上綠草閃閃的光澤，
> 即使是蜘蛛的勞作成果也難以與之媲美。(752—757)

在4世紀阿維埃努斯（Avienus）和普里西安（Priscianus）編纂的拉丁文版本中，對以上記載的表述略有不同[85]——這又是一種對賽里斯人獲得織物的解釋。與老普林尼的記載相同，在德尼斯的筆下，吐火羅人和富尼人再次成爲賽里斯人的鄰居。

希臘地理學家中最重要的著作當屬托勒密的《地理志》（Geography）。托勒密對全世界地理的詳盡描述，主要借鑒了地理學家馬里努斯（Malinus of Tyre）的著作。此外，托勒密還很可能借鑒了《厄立特里亞海周航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86]經過最近學者的詳細研究，托勒密《地理志》關於東方的部分主要來自兩部分原始資料，除了關於賽里斯的部分（VI, 16）主要來自馬里努斯的記載外，此前部分的敘述（VI, 10—15）中相當大的部

分是來自賽琉古帝國所繪製地圖的史料。[87] 而他所做的不過是修正馬里努斯的地理表——將世界的邊界縮小，並重新勘定了各個地點的經緯度。

托勒密在描述已知有人居住的世界（ecumene）的四至時，對賽里斯所處位置的基本描述如下：

大地上我們人類所居住的部分地域的東部邊界毗鄰未知的大地；未知大地內是居住在大亞細亞的東方民族秦奈人和居住在賽里斯國的諸民族……與北面的未知之地接壤的則是屬於大亞細亞的極北土地：薩爾馬提亞、斯基泰和賽里斯三國。(VII, 5, 2)

以上的描述即把賽里斯人置於有人居住的世界的東北邊界。就東部邊界來說，在所謂“大亞細亞”（Megale Asia）的北部，南面是位於正東的“秦奈”（托勒密使用Sinai而不是《厄立特里亞海周航記》中的Thinae）；就北部邊界來說則在薩爾馬提亞和斯基泰（斯基泰人的土地）的東面。

此外，托勒密保留下來馬里努斯對當時馬其頓商人梅斯（Maes Titianos）的代理人行程的記載，提供了當時商人前往賽里斯進行貿易的路綫。在他的記載中出現了“石塔”或“石堡”（Lithinos pyrgos）這個關鍵地名。除去其中對經緯度的考訂和對路程遠近迂回的爭辯，重新整理托勒密的地理敘述後，對梅斯的代理人去往賽里斯國的行程可以作如下的概述：

代理人從幼發拉底河畔的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出發，經過美索不達米亞到達底格里斯河，然後經過亞述的加拉米亞人地區和米底亞到達埃克巴塔納和里海之門，再經帕提亞到達赫卡頓比勒……從赫卡頓比勒前往希爾卡尼亞首都，必須向北

繞行……接下來是從希爾卡尼亞首都經阿里亞到達馬爾吉亞那的安條基亞的路程，這段路是先向南行……再向北……從這裏道路通向東方，直至巴克特拉，然後向北登上科梅多地區的山脈，再向南到達平原通向的山谷。這座山脈靠西北的部分，即（從巴克特拉出發後）登上的地方和拜占庭在同一緯綫上，而靠東南的部分則和赫勒斯滂（Hellespont）在同一緯綫上。因此他（馬里努斯）說儘管這條路是一直向東的，但是會略偏向南方。而接着從山谷上行直至石塔約五十雪尼的方向略偏向北，據說從山谷爬上去就到達了石塔，從此向東延伸的山脈與從帕林波特拉（Palimbothra）向北而來的伊麥奧斯山相接。(I, 12, 5-8)

……從石塔到賽里斯的都城賽拉的路程要經過七個月……(I, 11, 3)

……從石塔到賽拉途中要經受猛烈的風暴，因而必須在途中多次停留。(I, 11, 5)

這一段記載是目前唯一保留的從西方去往賽里斯的完整行程記錄（參見附錄地圖二）。可惜的是，自石塔以後到賽拉的路程，除了需要七個月時間和沿途風暴之外，沒有明確的地理記載。這也說明，當時西方作家對去往賽里斯的地理路綫瞭解的最遠處是石塔。

托勒密的著作中還以較大的篇幅叙述了賽里斯國的地理狀況(VI, 16)。他記述了包括賽里斯國的邊界、山川、民族和城市在内的詳細内容，對主要的地理特徵都標注了經緯度。作爲托勒密宏大地理著作的一部分，他對賽里斯國的概括爲後世提供了一串地名與民族名稱，其中大部分散見於此前諸作家的筆下。但是直至今日，對托勒密留下的地名的考證仍然未能令人滿意，就連托勒密所記載的

賽里斯國的具體位置，也處在爭論不休的境地。蓋希臘羅馬世界與遠東路途遙遠，其記述的地理位置難以準確。托勒密又主要依據馬里努斯一人的作品爲材料寫成，卻將馬里努斯採用的經緯度盡數修改，因此很難通過最終記載在案的內容推定出真實的地理狀況。

在托勒密的另一部作品《占星四書》（*Tetrabiblos*）中，也記載了賽里斯人：

> 在四分大地的第三部分，其中包括大亞細亞的北半部，包括希爾卡尼亞、亞美尼亞、馬提亞納、巴克特里亞、卡斯佩里亞、賽里斯、薩爾馬提亞、奧克西亞那、粟特以及整個有人居住世界東北部分的其他地區……這些地區的居民崇拜木星與土星[88]，財貨充盈、盛產黃金，其生活方式潔淨而文雅，睿智而善崇信神靈，生性公正而愛好自由，心靈寬廣而高尚，嫉惡如仇而又溫柔深情；若有善良與神聖的緣由，他們隨時願爲朋友勇敢赴死。他們的情愛關係嚴肅而純潔，著裝奢侈，和藹而有雅量……巴克特里亞、卡斯佩里亞和賽里斯地區屬於天秤宮和金星，因此這些地區的居民非常富有，喜愛藝術，而且更加奢華。(II, 3)

將占星應用在賽里斯人之上的作品，在托勒密之後也有論及，這就是敘利亞諾斯替教作家巴爾德薩納（Bardesanes）及其學生僞巴爾德薩納（Pseudo-Bardesane）等人的作品。這些作品將在下一節中專門展開討論。

在進入宗教作家的討論之前，最後一位需要著重提及的歷史地理學家是公元 2 世紀下半葉的保薩尼亞斯（Pausanias），他的作品《希臘道程》（*Description of Greece*）中記載了賽里斯人是如何獲得

絲綫的（VI, 26, 6-8）。這一段描述已經反復爲歷代學者所論及，從而被看作是西方第一次知道中國人養蠶繅絲的大致手段。對於保薩尼亞斯記載的小蟲“賽兒”（Ser），有學者如克拉普洛特認爲就是“賽里斯”之詞源所在。詞源的問題且置後論，從保薩尼亞斯的生動描述來看，他已經完全脫離了前代作家“給樹葉澆水”和“梳理羊毛”的觀念，而是從一處不明的來源得知了近似實際的養蠶過程[89]。但是對於獲得蠶繭以後的處理，保薩尼亞斯沒有留下記載。

保薩尼亞斯接下來的叙述（VI, 26, 8—9）也是在西方文獻中首次出現。他指出，賽里亞島（Seria nesos）爲一條叫做賽兒（Sera）的江河和厄立特里亞海所包圍而成；而且，賽里斯人是埃塞俄比亞種[90]；也有人說他們是“斯基泰人和印度人的混血種”。與其他作家的記載相比，保薩尼亞斯對“賽里亞島”的說法過於離奇；而他說賽里斯人是混血種的說法，似乎是對賽里斯人處在斯基泰人和印度人之間位置的一種延伸思考。

有趣的是，保薩尼亞斯對織物生產方法的比較準確的記載沒有在當時馬上流行開來。不必說前面提及的 3 世紀作家索林，即使到 4 世紀的著名作家阿米安・馬塞利努斯的筆下，維吉爾和老普林尼的“權威”說法依然記錄在紙上。直到 6 世紀拜占庭作家普羅可比（Procopius）的《哥特戰爭》中叙述了查士丁尼皇帝（Justinian, 公元 527—565 年在位）從印度僧侶（一說爲波斯人[91]）的手杖中獲得蠶種，關於絲織品的秘密才漸漸被西方人掌握。難怪研究絲綢之路的學者布爾努瓦夫人會這樣激動地問道：

在保薩尼亞斯時代，是否無意中洩漏過絲綢的秘密呢？是

> 否因爲偶然的機會使西方人得到了有關這方面的信息，後來由於遭到駁斥就又被永遠忘記了呢？雖然保薩尼亞斯所持之說最爲接近實情，但與他同時代的人是否會相信他呢？[92]

歷史中較爲真實的記載，或許總有一些是要遭受如此命運的吧。

（四）羅馬帝國宗教作家筆下的賽里斯

前文講到的叙利亞諾斯替教神學家巴爾德薩納（公元 154—222 年）及其門徒的作品，就屬於宗教作家的傳統。他們一再重複的一段話是："賽里斯人嚴禁殺人、賣淫、盜竊和崇拜偶像"。巴爾德薩納的原著是叙利亞文，其英譯名爲《命運對話：世界各國的法律之書》(*Dialogue on Fate: The Book of the Laws of the Countries*)，以對話體寫成，由巴爾德薩納講述。一般認爲，現存的叙利亞文作品是巴爾德薩納的叙利亞學生菲利浦（Philip）所作[93]，因此戈岱司在他的譯文中稱其爲"僞巴爾德薩納"(Pseudo-Bardesane)。[94] 在目前保留下來的希臘引文取自尤西比烏斯（Eusebius）的《宣講福音的準備》(*Praeparatio evangelica*)[95] 和凱薩里烏斯（Caesarius of Nazianzus）的《對話》(*Dialogue*)[96] 中。筆者下面節選的是尤西比烏斯的版本。現存的拉丁文引文則來自克力門傳奇（Pseudo-Clementine Romance）中的《認知》(*Recognitions*)。[97]

> 從大地的開端起（叙述）。在賽里斯人中，法律嚴禁殺人、賣淫、盜竊和崇拜偶像。在這遼闊的國度里，人們既看不到寺廟，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姦的婦女，看不到逍遙法外的盜賊，更看不到殺人犯和兇殺受害者。經過子午綫上空光輝的阿瑞斯戰神之星體不能違背人心而用武器殺人，與阿瑞斯相合的啟普里

斯也不能強迫他們之中的任何人與別人的妻子私合。儘管在他們之中，阿瑞斯戰神每時每刻都在天中央巡視，賽里斯人每天、甚至每時每刻都在生育。(Praeparatio evangelica, Liber VI, X) [98]

下面一段出現在克力門傳奇的叙述則在內容上略有添加和差異：

所以賽里斯人是首先居住在大地盡頭的，他們擁有一整套法律，嚴禁兇殺、通姦、賣淫、盜竊和崇拜偶像。在這遼闊的國度里，既沒有寺廟也沒有偶像，既沒有妓女也沒有通姦的婦女，從沒有傳庭公審的盜賊，也沒有人記得那裏曾經有人被謀殺死。最後，燃燒的馬爾斯之星不像在你們之中一樣對他們的自由仲裁施加影響，不讓用武器殺死他們的同類。與馬爾斯相合的維納斯女神並沒有迫使他們去玷污別人的妻妾，儘管在他們之中，馬爾斯戰神整天佔據着天空的中央。但在賽里斯人中，對法律的畏懼比對人們在其之下降生的星辰的畏懼還要強烈。(Ps. Clement, IX, 19) [99]

巴爾德薩納稱，在賽里斯人廣袤的土地上，人們都遵循着嚴格的法律，還將金星（啟普里斯 [100] 或維納斯）和火星（阿瑞斯或馬爾斯）相合的影響考慮其中。[101] 除了尤西比烏斯和克力門傳奇之外，巴爾德薩納的叙述在後來的拜占庭作家如 9 世紀的哈馬爾托爾的喬治（George Hamartolus）、11 世紀的賽德雷努斯（Cedrenus）以至 15 世紀的弗蘭茨（Phrantzes）等人的作品中也全文引用。[102] 基督教會史上的著名作家奧利金（Origen）在他的《反對塞爾蘇斯》（*Contra Celsum*）一文中也引用了巴爾德薩納叙述中關於偶像崇拜的問題。[103] 戈岱司認爲，奧利金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基督教直到他生活的時代（3 世紀上半葉）還未傳播到賽

里斯人中間。[104] 奧利金在反對信奉羅馬傳統宗教的塞爾蘇斯時明確指出，賽里斯人沒有任何的偶像或寺廟，是因爲他們並不信神，而是無神論者。奧利金對馬太福音的詮釋中也記載道："無論在賽里斯人中還是（其他）東方民族中，至今尚未傳播基督教。"[105] 裕爾曾經提到比奧利金稍晚的基督教作家阿爾諾比烏斯（Arnobius of Sicca）的著作。在後者爲反對異教徒而作，因而顯得誇張的記載中，到 3 世紀下半葉，基督教的福音已經傳播到了賽里斯人中間。[106]

巴爾德薩納以後描寫賽里斯人高尚道德的作家大都是基督徒——巴爾德薩納本人也是基督徒，衹是後來被正統教會宣佈爲諾斯替教異端。[107] 作爲基督徒描寫並不信教的賽里斯人，還在其中引用異教的神靈和占星術的內容，這體現了在成爲羅馬國教之前基督教傳播早期的一個時代特徵。這些基督教作家仍然需要提到占星術這個時尚的話題，異教的諸神被賦予神化的星辰形象，從而成爲基督教作家筆下邪惡的源泉。在公元初思想活躍、各種知識流派百花齊放的羅馬帝國，基督教要與各種救世神學相鬥爭，而基督的降臨則成爲此後的時代與古典宇宙秩序的深刻決裂。因此，尚未取得思想上的權威地位的基督教作家要參與到對占星術的討論之中，而並不是像後世的正統基督教教義那樣對占星術採取一概排斥的態度。[108]

巴爾德薩納在他的對話中警告弟子，人的行爲並非由星辰所註定的命運所左右，世界各地的法律、風俗和禮教——從遙遠的賽里斯人開始——決定了一個地區人民的生活，這實際上是他反對羅馬傳統宗教和占星術決定人的命運的看法。雖然他後來被斥爲異端，

但是叙利亞哲學家的傳統實際上是完全與古典羅馬作家追求“羅馬永恆”（Roma aeterna）和相信羅馬是（異教諸神的）“神意的代表”的史學傳統[109]相悖的。儘管在《命運對話》中巴爾德薩納試圖以人間的法律和習俗取代以占星術爲代表的命運，他的調和主義論調受到了以聖以法蓮（St. Ephrem）爲代表的正統派教徒的抨擊。[110]

這種把賽里斯人的種種傳聞和其風俗習慣聯繫的說法並非從3世紀開始。與保薩尼亞斯同時代的作家琉善（Lucian）爲賽里斯人的高壽陳述了理由。賽里斯人的壽齡達到了300歲，超過斯特拉波記述的200歲。琉善說，“有人把這種高壽歸之於氣候原因，還有人認爲是土質原因，甚至更有些人歸之於養生之道；確實有人說整個賽里斯民族以喝水爲生。”[111]這裏的闡釋帶有道德勸誡的意味。同在公元2世紀的著名醫學家蓋侖（Galen）對“賽里斯蘋果”的描寫也是對養生之道的議論。他告誡人們要趁鮮嫩時食用，而且不要吃得太飽。[112]

這一時期羅馬作家所作的虔誠描寫，將賽里斯人樹立爲理想中的民族、人類道德的楷模。這一形象並非單純出於想像，也是符合傳統的。在古希臘羅馬文獻中，描繪遠方幸福生活的烏托邦已然司空見慣。賽里斯人被描繪成“充滿正義的”高貴民族，通過潔身自好的生活來實現凡人難以企及的長壽。描寫賽里斯人的想像力，其實不過是對希羅多德記載的“北風以外的人”所處的文明而高潔的生活方式的一種延續——就像讓維埃指出的：“這不是發明，而是變形。”[113]不僅西方人有這樣的愛好，即使是我們古代中國人在記載到遠方的大秦國時，也說了如下的話語：

（大秦）其王日遊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

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114]

以上對羅馬共和國政體的速寫，流露的是由衷的欣賞。中國史官對周圍“蠻夷”民族多持輕蔑態度，但在他們筆下，遠方的大秦文明卻如此耀眼。

值得一提的是，在羅馬宗教作家傳統的同時期，還活躍着以出色的文學作品流傳于世的作家。3世紀作家赫利奧多魯斯（Heliodorus of Emesa）就是其中一位。[115] 在其作品《埃塞俄比亞人》（Aethiopica）中，他沿襲了盧坎所堅持、爲保薩尼亞斯所提及的地理學理論，把賽里斯與埃塞俄比亞聯繫起來。

《埃塞俄比亞人》的第九章描寫道，在埃及南部邊境，遠征的波斯騎兵和來自其首都麥羅埃（Meroe）的埃塞俄比亞人交鋒。埃塞俄比亞人一方，由布蘭米耶人（Blemmyes）和賽里斯人組成的重裝步兵擔任先鋒。他們與大象隊一起大破波斯騎兵。[116] 戰後，賽里斯人的使節向埃塞俄比亞國王希達斯佩斯（Hydaspes）[117] 敬獻了“該國蜘蛛織成的絲綫和織物，以及染成紫紅色或素白色的服裝”[118]。有學者認爲，這裏出現的賽里斯使節意味着公元3世紀以前中國與非洲的遠洋貿易航路的存在，比15世紀的鄭和下西洋早了1200年。[119] 但是如果回到文本細察，中國人並沒有將自己的絲織品染成地中海世界偏愛的紫紅色（代表尊貴）或素白色（中國喪服的顏色）的習慣，相反，如果要染成紫紅色，所需要的染料必須在地中海東岸的推羅、西頓等地獲取。[120] 總之，赫利奧多魯斯生動表

現的賽里斯使節，如果確有其人，也不過是爲了迎合地中海世界的審美而將買來的絲綢進行過加工染色和重新織造的中間商。然而即使如此，所謂“蜘蛛織成的”賽里斯絲綫和織物，則有可能是未經加工的中國絲織品。縱然不存在所謂中國與東非的直接聯繫，絲織品也早已通過發達的海路貿易到達了遙遠的東非海岸。

（五）晚期羅馬帝國與早期拜占庭時期作家的描述

4 世紀初，伴隨着君士坦丁大帝遷都拜占庭，羅馬帝國進入了其晚期歷史階段。其時帝國的政治軍事重心已逐漸轉移到東方，而古典傳統在新的帝國宗教基督教的傳統面前，逐漸退居其後。崛起的薩珊波斯成爲羅馬的勁敵，曾經一度繁盛的東西方貿易受到波斯人的阻礙。作爲對波斯國王沙普爾二世長年戰爭的親身體驗，被稱爲最後一位古典作家的阿米安·馬塞利努斯提供了與前人不同的知識，這些知識大概來源於他在東方作戰期間。在阿米安的《歷史》（Res Gestae）中，賽里斯是波斯的衆多行省之一。

在記載前往賽里斯的道程時，阿米安敘述說：

> （粟特地區）附近是野蠻的塞種人，居住在衹生長牲畜的不毛之地，因此他們沒有文明開化。阿斯卡米尼亞和科摩多山高聳於其上。在經過這些山腳下到達叫做石塔的村莊之後，伸展開一條通向賽里斯的長路，供商旅不斷往來。(XXIII, 6, 60)

在托勒密之後二百餘年，阿米安的記載中再次提到了“石塔”（Lithinos Pyrgos）。他明確指出“商人們便由此地前往賽里斯人中去”。他提供的綫索中，包括不毛之地和兩座山的位置，給尋找石塔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而下面的記載則詳細說明了賽里斯的位置：

> 在（伊麥奧斯山內外的）兩個斯基泰地區以遠、向東的位置，由高聳的壁壘頂端連結成的環形區域圍繞着賽里斯國，這裏豐饒多產、周遭廣闊，西接斯基泰地區，北面和東面則毗鄰荒蠻的雪原，而南部邊界則延伸到印度和恒河。(XXIII, 6, 64)

接下來，在叙述了一系列山的名字之後，阿米安特別提到了兩條河流，這兩條河流成爲後來學者爭議之一。

> 在四周爲斜坡和陡峭懸崖環繞的（賽里斯國）平原廣袤的土地上，相互分開的兩條著名河流奧伊哈爾德斯河（Oichardes）與鮑提斯河（Bautisos）緩慢而蜿蜒地流過。平原上各地的自然環境各異：這裏寬闊而開放，那裏則帶有緩緩的坡度，如此的環境中農作物、畜群和果樹都欣欣向榮地生長着。(XXIII, 6, 65)

下面又提到了許多民族和城市的名字，其中最後一個城市是賽拉（Sera），即托勒密記載的賽里斯都城（Sera metropolis）。然後，阿米安再次進行了大段叙述 (XXIII, 6, 67—68)，儘管其中的相當一部分有抄襲前人（錯誤觀點）的嫌疑，例如老普林尼所述的向樹林噴水採集絨毛，以及賽里斯人奇特的交易方式；有一些地方明顯是穿鑿，比如由氣候宜人、森林茂密過渡到給樹林噴水、採摘絨毛；有的甚至是不合情理的，比如說賽里斯人不要求任何的進口物品作爲交換。但是應該承認，阿米安的全部描寫提供了寶貴的信息：圍繞着賽里斯國的高牆，以及對兩條河流的微妙描寫，是推斷賽里斯國地理的重要證據；他對賽里斯國人民喜愛寧靜和平、決不訴諸武力的描述，繼承了宗教作家們美好的幻想，而對立於早期羅馬詩人筆下那個強悍的形象。這種立場不僅表現了羅馬人自己心態的變化，

也透露出當時所記載的商旅之路上的賽里斯，與早先羅馬黃金時代詩人筆下的形象亦有所不同。

晚期羅馬帝國的文學傳統分多個頭緒展開，其中古典派的代表人物除了阿米安之外，還包括當時的詩人。在古典風格的詩作中，縹緲的賽里斯人形象不時閃現。奧索尼烏斯（Ausonius）、克勞狄安（Claudian）等人依然如故地提到那個和紡織品相聯繫的賽里斯人：賽里斯人的長裝（vestifluus）、服裝（vestis）[121]；賽里斯人的羊毛樹林（lanigerae）、羊毛（vellera）、紗綫（subtegmina）、帷幔（velamina）和絲綫（stamina）。[122] 這些對紡織品的用詞都十分精細，不再像早期的詩人那樣使用模棱兩可的“賽里斯織物”等詞語。賽里斯人和紡織品的聯繫雖然變得更加深刻，但詩作中仍然堅持傳統的“羊毛樹”作爲賽里斯織物的出處。[123]

晚期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作家的傳統已經在帝國境內佔據了主要位置，這一傳統下的文學又與古典詩作大相徑庭，尤其是在對同一事物的關注重點上。與奧利金作品中的情形一樣，賽里斯作爲不信教的遠方民族，在基督教教父們與異教徒和異端的論戰中不斷被提起。前面說到的塞薩爾等人引用巴爾德薩納的作品就是一個例子。4 世紀下半葉希臘教父埃彼法尼烏斯（Epiphanius）的《反對異端》中叙述了賽里斯人的習俗。他指出賽里斯人的男子結髮並使用香料和梳妝，以博得妻子的歡心；而女子則剪去長髮，著男裝從事農業勞動 。

4 世紀的另一個延續前代的傳統是歷史地理作家的傳統。雖然由於蠻族入侵和波斯的崛起，新的歷史地理作品已經不可能達到帝國早期那樣的精確度，希臘羅馬作家還是試圖在基督教文獻和古

典作品兩處汲取資源。帕拉迪烏斯（Palladius）是其中歷史作品的代表人物。在帕拉迪烏斯關於賽里斯國記載的兩個版本[124]中，有亞歷山大曾到達賽里斯國，並立下石柱的說法，還提到婆羅門（brachmanes）來自印度與賽里斯兩地。帕拉迪烏斯在記載中把埃塞俄比亞的阿克蘇姆王朝（Axum）和印度聯繫起來——印度商人“乘小舟自阿克蘇姆”順尼羅河而上，從而到埃及的底比斯進行貿易。[125] 這裏的記載與前面討論的盧坎、赫利奧多魯斯等人的描述有相承關係。

這一階段地理志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則包括朱利烏斯·霍諾留斯（Julius Honorius）和奧羅修斯（Orosius）。戈岱司似乎極爲重視這一時期地理志的意義，他強調說：

> 霍諾留斯等人的著作……實際上和一項由愷撒大帝創始，而由奧古斯都完成的壯舉有關，這一壯舉目的在於對羅馬帝國各行省進行地形測量。他們所搜集的資料已被彙編成冊，形成一幅包括已知世界全部疆域的路綫圖。這一巨著成了後來一系列地理著作的基礎，令人遺憾的是原圖沒有流傳下來。……
>
> 霍諾留斯和奧羅修斯的作品反映的是同一傳說內容，而且是出於羅馬帝國的地圖繪製術。它們對於遠東的地形地貌的描繪與我們從普林尼和梅拉的著作中所看到的沒有什麽明顯的差異，這又一次證明他們著作反映的是一個古老傳統，而且無論如何比托勒密地圖要古老得多。[126]

戈岱司所謂羅馬帝國的地圖繪製術，從目前留存的波伊廷格爾地圖（Tabula Peutingeriana）中可以窺得其貌。[127] 就此處所關心的文本而言，霍諾留斯等人的記載的確包括了不同於前人的內容。

奧羅修斯[128]都記載了從東洋（oceanus eous）中恒河河口的海路繼續東行偏北的地方有一個河口[129]，自此以北就是賽里斯洋（oceanus Sericus）。這是賽里斯首次作爲海洋的名稱見載。奧羅修斯接下來叙述說，在恒河源頭與前面提到的那條偏北的河流的源頭之間有從陶魯斯山綿延而來的帕羅帕米薩達山區（montani Paropamisadae）。[130]奧羅修斯記錄了從此以北的山脈、河流和民族的名字，但是其中沒有賽里斯人，衹有賽里斯洋。

奧羅修斯還記載說，斯基泰人"因爲土地貧瘠而向遠方四散流浪"[131]。或許，前者對斯基泰人居地描述本是屬於賽里斯人的。

除了位於已知世界東北方的賽里斯洋之外，另一處記載說大賽里斯（Seres magnum）是著名的城市。這一說法見於霍諾留斯筆下。6世紀作家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Isidore of Seville）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賽里斯人之名即得自同名的城市"[132]。這個說法在霍諾留斯的記載中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印證。他提到了東洋（oceanus orientalis）的大賽里斯和泰里奧德斯（Teriodes）兩座城市（I, 6），在下面的章節里又都記載了北洋（oceanus septentrionalis）的兩個民族：賽里斯人和泰里奧德斯人。這樣的對應記載看似有些滑稽和順序倒錯，即使是再粗心的讀者也會發現東洋和北洋的不對應性。然而，正是此處記載使讀者看到了一種模棱兩可的特性——無論是在東面還是北面都適用的賽里斯的位置。[133]

關於這裏出現的泰里奧德斯，有一條河流和它對應。泰里奧德斯河由位於斯基泰地區的三處源頭匯合，匯合之後的流程是942哩[134]，最後流入里海。當時的作家還不能確知里海的大小，但對其相對位置是明確的。因此有理由認爲，泰里奧德斯人所在的地區比賽里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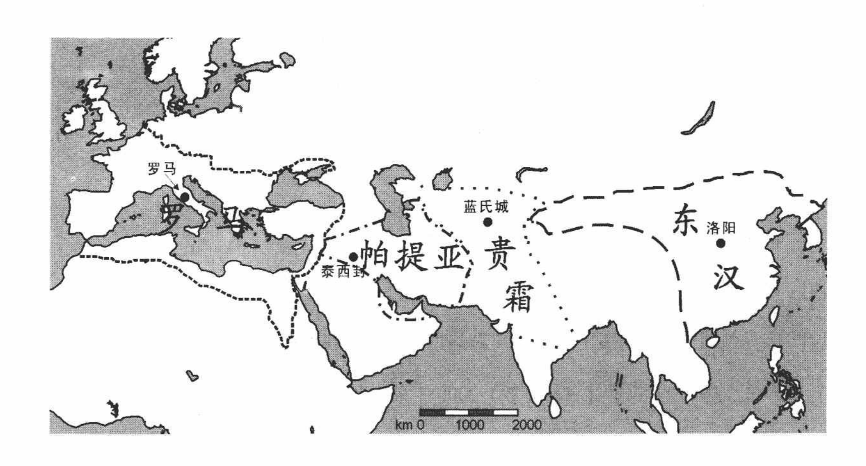
更靠近里海。[135]

從晚期羅馬帝國和拜占庭早期的文獻中可以看到的是一種從過去的傳統中尋找知識的熱情——無論是從古典作家、歷史地理學傳統或是基督教宗教作家的傳統中，當時的作品里體現了些許有價值的信息。但是總的來說，這時的西方世界已經逐漸與遠東隔離起來，對對方的信息也變得非常模糊。[136] 絲綢之路上的陸路交通爲陸續崛起的薩珊波斯、寄多羅、嚈噠以及後來的突厥所阻斷。5 世紀以後希臘作家如赫拉克利亞的馬爾西安（Marcian of Heraclea）、拜占庭的艾提拿（Etienna of Byzantine）和以親身造訪印度而著名的科斯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留下的大段歷史地理學記載都是關於海路航行到印度的內容。拉丁作家如 6 世紀的約爾達內斯（Jordanes）和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則是將前人的著作重新整理和加工而著述。[137] 除了普羅可比對蠶種西傳的記載外，這一時期的西方文獻對遠東的賽里斯人實在乏善可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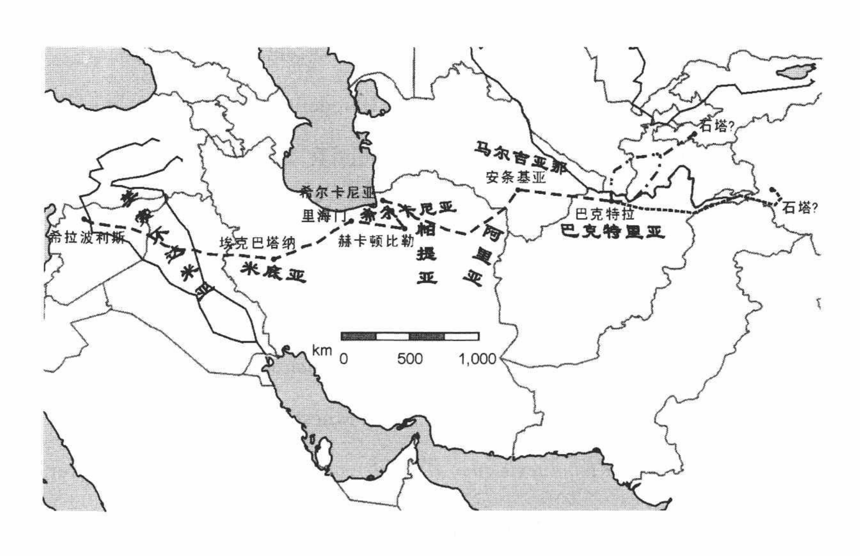
6 世紀中葉突厥帝國的建立和在中亞的霸權深刻改變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新的信息從此傳入西方。西方文獻中以“桃花石”（Taugast）稱呼陸路交通到達的遠東地區，但賽里斯之名並未被取代。傳播景教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叙利亞文碑文提到的 Saraga，以及粟特文殘卷中的 Srγ，都被學者認爲與賽里斯有關。而第一個親歷中國，並真的認爲當時的中國就是古典作家筆下賽里斯的，恰恰是以拉丁文寫作的方濟各會修士威廉·魯布魯克。[138]

如果說文本中的賽里斯衹是一個西方人眼中的映像，那麽它所反映的歷史真實則需要經過一番去僞存真來得到驗證。在本文的下半部分，筆者將試圖揭開賽里斯的真面目。

附：地圖



地圖一：公元 2 世紀的東西方世界：東漢、貴霜、帕提亞與羅馬



地圖二：托勒密記載的梅斯商團從希拉波利斯到石塔的行程

■ 注释

[1] 關於《獨目人》名稱之來歷參見 Alemany i Vilamajó, Agustí, "Els «Cants arimaspeus» d'Arísteas de Proconnès i la caiguda dels Zhou occidentals", *Faventia*, 21 (1999), p. 49, nt. 12.

[2] Pindar, *Ol*, 3,16; *Pyth*,10,30; *Isth*,6,23; *Pae*,8,63.

[3] Herodotus, IV, 32—33.

[4] 參見張緒山:《三世紀以前希臘 - 羅馬世界與中國在歐亞草原之路上的交流》,《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5 期,第 67 頁。

[5] 如英國學者赫德遜(Geoffrey Francis Hudson)之觀點,參見(英)赫德遜:《歐洲與中國》,王遵仲、李申、張毅譯,何兆武校,中華書局 1995 版,第 45—52 頁。

[6] 此爲余太山先生之觀點,請參見余太山:《希羅多德關於草原之路的記載》,《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四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版,第 22 頁。

[7] 有學者試圖將阿里斯鐵記載的民族大遷移(Herodotus, IV, 13)與《史記・周本紀》中記載的犬戎(或獫狁?)攻陷西周鎬京相聯繫,參見 Alemany, 注 1 所引文, pp. 50-55.

[8] 公元前 404 年—397 年間,克泰夏斯作爲宮廷醫生,爲波斯君主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 Memnon,公元前 404 年—前 358 年在位)服務。

[9] Cœdès, Georges, *Textes des 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Extrême-Orient depuis le IVe siècle av. J.-C. jusqu'au XIVe siècle*, Paris: Ernest Leroux, 1910, p. 1.

[10] Palladius et al., *Kleine texte zum Alexanderroman*, ed. by Friedrich Pfister, Heidelberg: C. Winter, 1910, p. 23.

[11] 斯特拉波就記載道,巴克特里亞國王在侵入賽里斯人的土地,見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Leonard Jone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W. Heinemann, 1917-32, XI, 11, 1.

[12]〔英〕裕爾撰，〔法〕考迪埃修訂：《東域紀程錄叢》，張緒山譯，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2 版，第 10 頁。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p. 22-26.

[13] 此前維吉爾的《田園詩》和賀拉斯的《希臘抒情詩集》分別提到了賽里斯人從樹上採羊毛和賽里斯國產的坐墊，參見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 2.

[14] 布爾努瓦引述老普林尼的論點，認爲西方古典時期的部分類似絲綢的織物實際上是愛琴海地區科斯島（Cos）的一種野蠶（Bombycine）提供的“野絲”，以及所謂“亞述蠶絲”（Bombyx Assyria）。參見〔法〕布爾努瓦：《絲綢之路》，耿昇譯，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 版，第 47—50 頁。關於普林尼的論述，裕爾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包括對科斯和亞述蠶絲的考證，他指出普林尼著述引自亞里士多德，參見裕爾：注 12 所引文，165—167 頁。

[15] 裕爾：注 12 所引文，165 頁。

[16] 中國的班超在幾乎相同的時代向西出發，其副使甘英也到達了“西海”邊，卻最終沒有抵達大秦國（前 97 年，漢和帝永元九年），見《後漢書・西域傳》。對比梅斯和班超這位政府官員，可以看到商業利益的驅動更能夠提供足夠的動力完成使命，從而爲我們提供了更多的材料。

[17] 一作“石堡”，關於其稱呼的討論見楊共樂：《“絲綢之路”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與〈公元 100 年羅馬商團的中國之行〉一文作者商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1 期，第 109—110 頁。

[18] 前者出自埃及的科斯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見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p. 132-135. 關於科斯馬斯及其著作請參見張緒山：《拜占庭作家科斯馬斯中國聞紀釋證》一文。後者出自塞奧菲拉克圖斯・西莫卡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a），見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p. 138-141. 關於西莫卡塔及其著作請參見張緒山：《西

摩卡塔所記中國歷史風俗事物考》，《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版，第 82—102 頁。

[19]《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第 254 頁。關於這一時期的中西交通問題，請參見 Reichert,Folker E., *Begegnungen mit China, Die Entdeckung Ostasiens im Mittelalter*, Sigmaringen: Jan Thorbecke,1992.

[20] 這一觀點由 H.C. 羅林森（Henry Rawlinson）提出，參見 Rawlinson,H.C., "Monograph on the Oxus",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42 (1872), pp. 503-504. 在斯坦因第一次考古探險之後的著作《沙埋和闐廢墟記》中，他支持這一觀點（Stein, M. Aurel,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1904, p. 71），但在其後的著作《古代和闐》（*Ancient Khotan*）中，他轉而接受"石塔"位於瓦赫什河谷的觀點，參見 Yule, Henry,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rev. by Henri Cordier,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15, vol I, Note II, p. 190, nt. 5。到第三次中亞探險之後，斯坦因最後確定達勞特 - 庫爾干作爲對"石塔"考察的最終結果，這在他的《亞洲腹地考古圖記》中得到了確切的表述，參見 Stein, M. Aurel,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Carried Out and De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M. Indian Government,* Oxford, Clarendon,1928, vol II, pp. 848-850.

[21] Stein, M. Aurel,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Vol. I, Oxford: Clarendon, 1907, p. 54.

[22] 裕爾：注 12 所引文，13、23 頁。

[23] 1910 年同時出版的戈岱司和黑爾曼的著作中分別綜述了此前的研究著作，请參見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VII-IX; Herrmann, Albert,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beiträge zur alten geographie Asiens*, Berlin: Weidmann, 1910, pp. 20-22.

[24] Richthofen,Ferdinand Freiherr von,*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Berlin*: Dietrich Reimer,Vol. I, 1877, p. 507。

[25] Cœdès, 注 9 所引文〔法〕X. 戈岱司編:《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耿昇譯,中華書局 1987 版，第 12 頁。

[26] 赫德遜，注 5 所引文，34—35 頁。

[27] 分別見 Gerini, G. E.,*Researches on Ptolemy's 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 (Further India and Indo-Malay Archipelago)*,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1909 與 Berthelot, Andre,*L'Asie ancienne centrale et sud-orientale d'après Ptolémée*,Paris: Payot,1930.

[28] Pelliot, Paul, "« Šul » ou Sarag (?)", *Journal Asiatique*,211 (1927), pp. 138-141; 伯希和：《景教碑中敘利亞文之長安洛陽》，載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一卷一編，商務印書館 1995 版，第 34—35 頁；原載《通報》（T'oung Pao）1927—1928 年合刊，第 91-92 頁。

[29] 卜弼德說見 Boodberg, Peter A.,"Sarag and Serica", in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compiled by Alvin P. Cohe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147-150；蒲立本說見 Pulleyblank, Edwin G.,"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Part II", *Asia Major*, 9 (1973), pp. 206-265.

[30] 原文筆者未見：白鳥庫吉：『プトレマイオスに見えたる葱嶺通過路に就いて』,《蒙古學報》第二輯，昭和十六年（1941），第 1—48 頁。本文所援引之文章出自白鳥庫吉嗣後出版的《西域史研究》中：白鳥庫吉：『プトレマイオスに見えたる葱嶺通過路に就いて』,《西域史研究》下卷，岩波書店 1981 年版，第 1-41 頁。

[31] 在《絲綢之路》中提及的著作还包括：M.Ernest Pariset, *Histoire de la soie*, Paris,1862；Tesnieres, *Les noms de la soie*,Alleche,1942；A. Varron, *The Early*

History of Silk, Les Cahiers Ciba, 1960。以上諸篇筆者均未引用。

[32] Janvier, Ives, "Rome et l'Orient lointain: le problème des Sères. Réexamen d'une question de géographie antique", *Ktema*, 9 (1984), pp. 294-303.

[33] Haussig, H. W.,"Die ältesten Nachrichten der griechischen und lateinischen Quellen über die Routen der Seidenstrasse nach Zentral- und Ostasien", *From Hecataeus to Al-Huwārizmi*, ed. by J. Harmatta,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84, pp. 20-23. 與前面戈塞蘭的討論一樣，此處的解釋也不能接受。其原因在於，两人都試圖从居於絲綢之路中间的民族（印度人或北方遊牧民族）中尋找在絲綢之路東端的"賽里斯"词源，故不得其解。

[34] Rapin, Claude, "L'incompréhensible Asie centrale de la carte de Ptolémée. Propositions pour un décodag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2 (1998), p. 201-225.

[35] 關於其内容介紹請參見耿世民：《俄文新書多卷本〈古代和中古早期的新疆〉介紹》，引自歐亞學研究網：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90.html。

[36] 莫任南：《中國和歐洲的直接交往始於何時》，《中外關係史論叢》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 1985 版，第 31 頁。

[37] 林梅村：《公元 100 年羅馬商團的中國之行》，《中國社會科學》1991 年第 4 期，第 71—84 頁。

[38] 楊共樂：注 17 所引文，第 109—111 頁。

[39] 邢義田：《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關係的再檢討》，《學術集林》第十二輯，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5—186 頁。

[40]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XXXIV, 14.

[41] 張緒山：《三世紀以前希臘 - 羅馬世界與中國在歐亞草原之路上的交流》，《清華大

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5 期，第 69—70 頁；張緒山：《羅馬帝國沿海路向東方的探索》,《史學月刊》2001 年第 1 期，第 87—92 頁。

[42] 張緒山：《關於“公元 100 年羅馬商團到達中國”問題的一點思考》,《世界歷史》2004 年第 2 期，第 111—114 頁。

[43] 近年来有中國學者如華濤先生从新穎的角度討論此問題者，參見華濤：《“塞里絲誤解”的消除與葡萄牙人的歷史貢獻》,《文化雜誌》（澳門），49，2003 年冬季刊，第 1—18 頁。

[44] Janvier, 注 32 所引文 , pp. 261-262. 讓維埃採取了分以下四類傳統的方法，但在具體的材料選取上和筆者不同。

[45] 參見前注 18。

[46] 關於彌南德的記載參見張緒山：《6—7 世紀拜占庭帝國與西突厥汗國的交往》,《世界歷史》2002 年第 1 期，第 84—87 頁。

[47] Virgil, *Georgica*, II, 121.

[48] Horace, *Epodes*, VIII, 15-16.

[49] Ovid, *Amores*, I, 14, 5-6.

[50] Propertius, *Elegies*, I, 14, 22.

[51] 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民族，與色雷斯人親緣較近。參見 Herodotus, IV, pp. 93-97.

[52] 指黑海東北岸希臘化的博斯普魯斯王國。其主要城市是頓河河口的塔奈斯城（Tanais），是希臘世界最東北端的城市，在今烏克蘭羅斯托夫（Rostov）以西 30 公里。

[53] 此兩句採戈岱司：注 25 所引文，第 2—3 頁。

[54] 利伯曼（Samuel Lieberman）考慮到這一問題，參見 Lieberman, Samuel, “Who Were Pliny's Blue-Eyed 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 52 (1957), pp. 174-175.

[55] Horace, *Odes*, I, 29, 7-10.

[56] Propertius, *Elegies,* IV, 8, 23.

[57] Chariton, *De Chaerea et Callirrhoe*, IV, 4. 據近年来考證，查理同的年代比賀拉斯稍晚，約爲公元 2 世紀初。

[58] Seneca, *Phaedra*, 389; *Idem, Hercules Oetaeus*, 414.

[59] Seneca, *Thyestes*, 378-379.

[60] Silius Italicus, *Punica*, VI, 1-4.

[61] 較典型的是公元前 1 世紀作家西西里的狄奥多魯斯（Diodorus Siculus）引用公元前 3 世紀初塞琉古王國駐印度大使麦加斯提尼（Megasthenes）的説法，参見 Diodorus Siculus, *Bibliotheca Historica*, II, 2, 38.

[62] Statius, *Silvae*, I, 2, 122-123.

[63] *Ibid*, V, 1, 61.

[64] 指羅馬皇帝圖拉真（公元 98—117 年在位）。

[65] Juvenal, *Satires*, VI, 402-403.

[66] 這裏的“酥胸”是指克莉奥帕特拉。

[67] 與之相似的是，塞涅卡記載了推羅人的紫紅染料，見 Seneca, *Phaedra*, pp. 387-389. 詳細的討論见布爾努瓦：注 14 所引文，第 31—34 頁。

[68]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XV.

[69] 據阿里安的記載，東征的亞歷山大見到印度的河流，覺得與尼羅河極爲相似，生長的植物也頗爲相似，於是便从神話中聯想到，尼羅河的源頭可能在印度，参見 Arrian, *Anabasis*, VI, 1, 1-4.

[70] 富尼人（Phrynos 或者 Phrunos），可能是匈奴人的譯名。

[71] 其意義不詳。

[72] Janvier, 注 32 所引文 , p. 265.

[73] 原文爲“Σηρικά ἔκ τινων φλοιῶν ξαινομένης βύςςου.” 此處採 Richter, Gisela M. A.,

"Silk in Greec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33 (1929), p. 30 的英譯文譯出。對於 βύςςου(byssus)的翻譯,洛布叢書的譯者認爲斯特拉波所指的就是蠶絲,衹是他把這種織物當作棉紗的一種,參見 Strabo, *Geography,* VII, p. 34, nt. 23。此處不採耿昇先生的翻譯"足絲",參見戈岱司:注 25 所引文,第 6 頁。

[74] 這一解釋来自 Hesychius, Γλῶςςαι: http://el.wikisource.org./wiki/Γλώςςαι/A.

[75] Pomponius Mela, *Chorography,* III, 59.

[76] 例如 Seneca, *Letters to Lucilius*, Ch. 15.

[77] 裕爾:注 12 所引文,第 163 頁。

[78] 除了上面两段之外,還包括對賽里斯人長壽可達 140 歲的記載,見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VII, 27. 根據老普林尼,這裏的說法来自伊西戈努斯(Isigonus of Nicaea,約生活在公元前 1 世紀,主要著作已遺失)。

[79]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XII, 17, 38; XIV, 22.

[80] 老普林尼提到了賽里斯人也出口皮貨,这一點在其他史料中没有提及。

[81] 裕爾:注 12 所引文,第 164 頁。此處可參考塔西佗《編年史》的記載:Tacitus, *Annals*,II, 33:"decretumque ne vasa auro solida ministrandis cibis fierent, ne vestis serica viros foedaret". 賀嚴、高書文譯文作"(元老院)決定在私人的招待宴會上不許使用黄金製造的食具,男子的服装也不應該再用絲織品,因爲這會使他们墮落下去。"參見(古羅馬)塔西佗著:《羅馬帝國編年史》英漢對照全譯本,賀嚴、高書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 版,第 201 頁。

[82]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VI, 53, 54.

[83]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XXVI. 戈岱司,注 25 所引文,第 27 頁。

[84] 裕爾:注 12 所引文,第 22—23 頁。

[85] Rufus Festus Avienus,*Descriptio Orbis Terrarum*, 769-771; 關於普里西安的版本請參見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p. 72-73.

[86] Berggren,Lennart and Alexander Jones,*Ptolemy's Geography: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hapte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p. 27.

[87] Rapin, 注 34 所引文 , pp. 209-212.

[88] 這两個行星作爲希臘諸神是宙斯（Zeus）與克羅諾斯（Kronus），作爲羅馬諸神是朱庇特（Jupiter）與薩杜恩（Saturn）。

[89] 可能是从由海路訪問中國的羅馬商人處获得此消息，參見 Yule, Henry,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rev. by Henri Cordier,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15, vol I, 18, p. 21. 張緒山 :《羅馬帝國沿海路向東方的探索》，第 90 頁。

[90] 這與盧坎的說法，以及下面提到的赫利奥多魯斯和帕拉迪烏斯的記載一脈相承。

[91] 泰奥法内斯(Theophanes)的記載持此說法,參見 Yule, 注 89 所引文 , Note VII, p. 204;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 152.

[92] 布爾努瓦 : 注 14 所引文，第 72 页。

[93] Moule,Arthur Christopher,*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930,p. 23. Denzey, Nicola,"A new Star on the Horizon: Astral Christologies and Stellar Debates in Early Christian discourse",in Scott Noegel, Joel Walker and Brannon Wheeler eds., *Prayer, Magic and the Stars in the Ancient and Late Antique World,*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 p. 209, nt. 3. 該文收入 *Spicilegium Syriacum*. 這一版本中還收录了凱薩里烏斯的希臘文引文。

[94] 戈岱司的法譯文見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 79.

[95] 電子版本見 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eusebius_pe_00_intro.htm/。

[96] 在法國教父米涅（Jacques-Paul Migne）編著的《希臘教父全集》（*Patrologia Graeca*）第 38 卷中收录，參見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p. 89-90.

[97] 克力門傳奇是早期基督教著作中的一類布道與訓誡作品，記述的內容是作爲使徒保羅之友的克力門（教皇克力門一世）的成長經歷。其現存部分爲《克力門教諭》（*Homilies*）和《克力門認知》（*Recognitions*）兩部分，二者的成書時間至今還是一個謎。但在現存的《認知》版本中，以 4 世紀下半葉魯菲努斯（Tyrannius Rufinus）的拉丁文譯本为最早。參見 Clementines, in Catholic Encyclopedia of 1913.

[98] 戈岱司：注 25 所引文，第 57 頁，有改動。

[99] 戈岱司：注 25 所引文，第 58 頁，有改動。

[100] 希臘神話中代表金星的爱神阿芙羅蒂忒（Aphrodite）的別名叫喀普里斯（Cypris），得名於其傳說中的出生地塞浦路斯（Cyprus）。

[101] 據托勒密的說法，火星被賦予暴力衝突、戰爭、專制和殺死的意義（Ptolemy, *Tetrabiblos*, II. 8）。金星與火星相合即維納斯與瑪爾斯的結合，是羅馬宗教神話傳說中羅馬人繁衍生息的開始。

[102]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XXVI; pp. 89-91.

[103]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p. 82-83.

[104]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XXVI, nt. 2.

[105]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 83: “nec apud Seras, nec apud Orientem audierunt Christianitatis sermonem”，中译文見戈岱司，注 25 所引文，第 62 頁。

[106] Yule, 注 89 所引文 , 64, p. 102.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p.87-88.

[107] 正统基督教認爲，諾斯替教是“宣揚以知識而获拯救的異端”。參見 Gnosticism, in *Catholic Encyclopedia* of 1913.

[108] Denzey, 注 93 所引文 , pp. 209, 221.

[109] Rutilius Namatianus, *De reditu suo*, I, 68-88. 葉民認爲阿米安・馬爾塞林的思想與盧提利烏斯・那馬提安有相同之處，參見葉民：《最後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筆

下的晚期羅馬帝國》，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版，第 99 頁。

[110] Bardesanes and Bardesanites, in *Catholic Encyclopedia* of 1913.

[111]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 75. 戈岱司，注 25 所引文，第 55 頁。

[112]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 76。

[113] Janvier, 注 32 所引文 , p. 274: "*il y a eu deformation et non invention*"。

[114]《後漢書・西域傳》。

[115] 關於赫利奥多魯斯的年代，戈岱司將其定爲 400 年左右（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 103）；但晚近學者將其年代考訂爲 3 世紀中葉前後，參見 Janvier, 注 32 所引文 , p. 272。

[116] 赫利奥多魯斯还暗示，賽里斯人是養象的（Heliodorus, *Aethiopica*, IX, 17）。這又與弗洛魯斯的記載有聯繫。

[117] 希達斯佩斯是古典作品中一条印度河流的名稱，即流經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傑盧姆河（Jhelum）。亞歷山大遠征印度時最遠到達此河，在河岸边他認爲自己見到了尼羅河的源頭，參見前註 71 所引阿里安的記載。赫利奥多魯斯使用這個名字，顯示了他所引用的材料中印度和埃塞俄比亞的聯繫。

[118] Heliodorus, *Aethiopica*, X, 25.

[119] Janvier, 注 32 所引文 , p. 273, nt. 60.

[120] 因此希臘文將紫紅色稱爲 *Phoinikobaphe*，即"腓尼基人染的顏色"。推羅、西頓正是腓尼基人的城市。

[121] Ausonius, *Technopaegnion*, X, 24; XI, 6; XLV, 7. 值得一提的是，在 XI, 6 中，奥索尼烏斯描繪："穿長裝的賽里斯商人飞越了大海"（Jam pelage volitat mercator vestifluus Ser），這是唯一的把賽里斯人和海路貿易聯繫起来的記載——虽然這很可能衹是詩人的想象而已。

[122] 轉引自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p. 102-103.

[123] 轉引自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 91.

[124] 其一爲僞卡利斯提尼（Pseudo-Callisthenes）的希臘文版本《論婆羅門》；另一个版本是聖安布羅斯（St. Ambrose）的拉丁文版本。參見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p. 98-100.

[125] 僞卡利斯提尼版本如是記載。見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p. 99-100。在聖安布羅斯的拉丁文版本中，同樣的商人被記錄爲“来自埃塞俄比亞和波斯的”，見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 101。

[126]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XXVII-XXVIII. 戈岱司，注 25 所引文，第 28—29 頁。

[127] 關於波伊廷格爾古地圖，請參見龔纓晏、鄔銀蘭、王知寒：《波伊廷格古地圖：條條大路通羅馬》，《地圖》2004 年第 2 期，第 37—40 頁。

[128] Orosius, *Historiarum adversus paganos*, I, 2, 13-14.

[129] 奧羅修斯稱爲 Ottorogorras，還記述說在其源頭有同名的城市。

[130] Orosius, *Historiarum adversus paganos*, I, 2, 44.

[131] Orosius, *Historiarum adversus paganos*, I, 2, 47.

[132] Isidore of Seville, *Orig*., IX, 2, 40.

[133] 奧羅修斯在此處的記載有所不同，在他的筆下，賽里斯人被置於希達斯佩斯河與印度河之间（相當于今天的巴基斯坦控制克什米爾與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請參看 Orosius, *Historiarum adversus paganos*, III, 23, 11。

[134] 一種版本是 842 哩。在此筆者要感謝北京大學圖書館的無名讀者（一位相當嚴肃認真的先生）將戈岱司錯誤的譯文 1442 milles 上改出了一個 9。戈岱司大概是出于粗心地將 DCCCCXLII 當作 1442，而把下一頁另一版本的 DCCCXLII 當作 1342。參見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p. 109-110。

[135] 然而在托勒密的著作中，泰里奧德斯是一个从恆河外印度航行到秦奈時所要經過的海灣的名字（VII, 3, 1-2）。可見托勒密所著與霍諾留斯的来源完全不同。

[136] 與之相似的是，漢文史料中對泰西的記載也在此時變得模糊和富於穿鑿附會起来。在 3 世紀魚豢所著的《魏略》（引自《三國志・魏志》裴松之註）之後，中國史書中關於“大秦”的記載便減少了許多，甚至不能獨立成爲单獨的章節。参见 Leslie, D. D.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Bardi Editore, 1996, pp. 5-6。

[137] 例如，約爾達内斯《哥特人》（Getica）中對斯基泰一段的記載（其中包括對賽里斯的敘述，見於 Cœdès, 注 9 所引文 , p. 135），體現了對奧羅修斯的模仿和改编，參見 Merrills, Andrew H.,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57-158。

[138] 貝凱、韓百詩、柔克義譯注 :《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耿昇、何高濟譯，中華書局 1985 版，第 254 頁。參見華濤 : 注 43 所引文，第 4 頁。

Southeast Asian Islam and Southern Chin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4th Century

Geoff Wade

Introduction

Islam came to the polities and societies of Southeast Asia by sea, along the girdle of trade which extended from the Arab and Persian worlds through the ports of South Asia, to Southeast Asia and onwards to the southern extensions of the Chinese world in the East China Sea. Islamic influences extended into Southeast Asia from both ends of this trade route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examining such influences, the extension of Islam into Southeast Asia prior to 1500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stages:

1) The period from the emergence of Islam until the Cōla invasions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11th century;

2) The end of the 11th century until the 13th century;

3)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Islamic Southeast Asian polities in the 13th century.

The present article will focus attention on the early part of the third period, specificall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4th century,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how key were events of this period in the Islamis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earliest introduction of Islam to Southeast Asia was by Muslim merchants who travelled along the maritime routes which, for at least a millennium earlier, had connected the two ends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The foundation of the urban centre of Baghdād in 762

C.E. –with Basra as its outlet to the Arabian Sea—was a major impetu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between the Persian Gulf and East Asia. [2]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arly maritime vector is still evident today, as it is in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rather than the mainland where reside the major Muslim communities. The specific activities of the early Persian and Arab traders [3] in Southeast Asia are poorly documented, but we can glean some knowledge of them from accounts written in the destination ports in southern China. In the 8th century, for example, Ibn Khurdādhbih recorded the trade ports at the furthest distance from the Arab world as Lūqūn (likely Loukin, situated in what is today Vietnam), *Khānfū* (Guangzhou/Canton), *Khānjū* (Quanzhou), with *Qānsū* (Yangzhou) marking the end of their maritime route. In the middle of the same century (758/59 C.E.), followin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the major Chinese port of Guangzhou was sacked by persons from "Da-shi," the name which Chinese chroniclers assigned to the Arab world. [4] By a century later, there was evidence in the same city of a quite large Islamic community. Suleimān, who visited Guangzhou in 851, noted that the city had a Muslim community governing itself according to the *sharía* under a *kādī*, whose appointment had to be confirm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t is likely that this was the port from which the Arab/Indian ship wrecked off Belitung island in about 826 CE and carrying cargo possibly bound for Western Asia had sailed. [5] That the foreign community in Guangzhou was quite large in the 9th century is affirmed by Abū Zaid, who reported that some 120,000 Muslims, Jews, Christians and Parsees were killed when the city was taken in 878/79 by Huang Chao, a rebel against the ruling Tang dynasty. [6] There is evidence, also from Chinese texts, that Muslim communities had appeared by this period in the ports of Sumatra and of Champa.

Islam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11th to the 13th centuries

It wa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1th century that disruptions to the trade route connecting the two ends of Eurasia resulted from the attacks on and possibly

capture of the major peninsular and Sumatran ports in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by Cōla forces. This period also saw a major shift in the region' s maritime trade, with the Fujian port of Quanzhou eclipsing the former trade centre of Guangzhou. Quanzhou quickly became the site of mosques [7] and Tamil temples, as the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lands extending all the way to Asia Minor brought trade products to China and took Chinese products on their return journeys. It is clear that Champa was a major staging post on these voyages, and that Muslim traders led Champa "tribute" missions into China throughout the 10th and 11th centuries. That the Islamic communities of coastal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ere still intimately tied during the 12th century is apparent from a comment by al-Idrīsī (1100-65) who stated that when China was convulsed by troubles, the (Muslim) merchants would descend to the harbours of a place they called Zābaj. [8]

Half way around the globe, in and around the Red Sea,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saw Yemeni ports developing their links with regions to the East under the aegis of the Ayyūbid (1171-1250) in Egypt and subsequently the local Rasulid dynasty (1228-1454). This revitalized the luxury and spice trades with India and with ports further east, providing increased avenues for Muslims to travel to and interact with people from the Southeast Asian realm, as well as further reasons for Southeast Asians and Chinese to travel to the major Islamic centres in the Middle East.

Quanzhou thus became the end port for the long journey from the Arab and Persian lands, as well as a key port for those Muslims trading from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sources we have available, more than half of the foreign trade into Quanzhou appears to have been controlled by Muslims in this period. By the 13th century, when the Mongols ruled over China, it seems that Quanzhou was being administered almost as a Muslim polity, funded through its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The boom in maritime trade during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underwrote Islamic power in Quanzhou, and in this process a figure known as Pu Shou-geng and his family members were major players.

Islamic links between Quanzhou and Brunei during this period are

evidenced by material remains. A grave of a Song dynasty official surnamed Pu and likely from Quanzhou has been found in Brunei. Dated to the equivalent of 1264 C.E., it is the earliest Chinese-script gravestone in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one of the earliest Muslim gravestones. [9] The Pu clan was a major element in the story of Islam in the maritime realm which connected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China. One account suggests that an unnamed Pu ancestor had originally come to Guangzhou from somewhere in the Arab world and had been appointed as the head-man of the foreign quarter in that city, eventually becoming the richest man in the entire region. Another version suggests that this person was a noble from Champa which, as noted above, does not preclude him from having been an Arab. Could he have been a descendant of the Pu Luo-e who led his family members to Hainan from Champa in 986 following political disturbance in that place? The fact remains that during the 12th century a person "surnamed" Pu, a Muslim, was one of the richest men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and behind whose residence stood a giant "stupa," unlike Buddhist ones. This was likely the minaret of the Huai-sheng-si, the famous mosque of Guangzhou. The wealth of the family, however, declined, and the son of the Guangzhou foreign head-man, named Pu Kai-zong (蒲開宗), removed the family to Quanzhou [10] as that port rose to dominate the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It was his son, Pu Shou-geng (蒲壽庚) who was to become famed in the histories of Quanzhou, Chinese Islam and maritime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11] Reputedly for his assistance in suppressing pirates in the region of Quanzhou, Pu Shou-geng was rewarded by the Song court in 1274 with the position of Maritime Trade Supervisor of the port. All maritime trade through Quanzhou was subject to his control, and as this was the major port of the entire polity, the opportunities for gain would have been enormous. He and his brother also operated many ships on their own account. Pu Shou-geng was subsequently appointed to even higher office with a provincial post, only a few years before the Yuan armies crushed the Southern Song capital at Hangzhou and the Song dynasty came to an end. [12]

Even before they took Hangzhou in 1276, the Yuan generals had recognised the power of Pu Shou-geng and his brother in south-eastern China and had

sent envoys to invite them to side with the Yuan. The Pu brothers knew where their future lay, and they gave their allegiance to the incoming Mongol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to the Yuan was enormous, as it provided the Mongols a local regime with access to the sea, something which the Mongols had never commanded. Their new ally subsequently massacred the Song imperial clansmen who resided in Quanzhou, showing his allegiance to the Mongols. The Yuan rulers richly rewarded those who had assisted them and Pu Shou-geng was appointed as the Grand Commander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and subsequently as a vice minister of the Fu-jian administration. Pu was tasked with assisting the Mongols in both promoting maritime trade and providing ships and personnel for some of the Mongol invasions of overseas politie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first countries to respond to Pu Shou-geng' s invitation to resume trade were Champa in Southeast Asia and Ma' abar, on the subcontinent' s Coromandel Coast -- both major trading polities with large Muslim populations. One of the latest reports we have of Pu Shou-geng, dating from 1281, notes that he had been ordered by the Yuan emperor to build 200 ocean-going ships, or which 50 had been finished.

The arrival of the Yuan forces in southern China in the 1270s and the violence which accompanied that arrival had apparently spurred some Muslims to leave Chinese ports and, as in the past, flee south. Li Tana has examined the Vietnamese annals on this point and found reference to Muslim refugees from China arriving in the Vietnamese polity in 1274. [13] This date fits well with flight prior to the last-ditch Song defence of Yangzhou during the Yuan attack on that city in 1275. Yangzhou was a very cosmopolitan city and it would not have been surprising if some of the residents there – Muslim and other-- would have opted for safer climes to the south prior to the attack. [14]

At approximately the same time, in the Southeast Asian archipelago, we begin to see evidence for the emergence of Muslim rulers. An Islamic gravestone is reported for one Sultān Sulaimān bin Abd Allāh bin al-Basīr of Lamreh dated 608 AH (1211 CE). [15] It remains controversial, but if confirmed this will be the first evidence of a Muslim ruler in the Nusantaran world. Separately, in the account of his return journey by sea from China, Marco Polo

reported in the 1290s that the Sumatran city of Pĕrlak/Ferlec was Muslim, [16] but neighbouring urban centres named Basman and Samara were not. The latter polity was more than likely Samudera, where a gravestone of the reputed first Islamic ruler of that polity --Sultān Malik al-Sālih – dated 696 AH (1297 CE) has been found. [17] In the 1280s, two envoys came to the Yuan court from Samudera (Su-mu-da), and they bore patently Islamic names— Hasan and Sulaimān. These phenomena manifest a new a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lam and Southeast Asia, with rulers of polities taking on the new religion.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se Islamic polities was linked with 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the Mamlūks (1250-1517) in Egypt is suggested by the adoption by Samuderan sultans of the title Al-Malik al-Zahir, an apparent commemoration of the Mamlūk Sultān al-Malik al-Zahir Rukn al-Dīn Baybars al-Bundukdārī (1260–77) of Egypt and Syria, who had defeated the seventh Crusade sent by Louis IX, as well as the Mongol forces at Ayn Jalūtin Palestine in 1260. The indigenous tradition relating to these earliest Islamic polities in Sumatra was later recorded, somewhat anachronistically, in *Hikayat Raja-raja Pasai*. [18]

The Quanzhou Violence and Flight to Nusantara

Why Islamic polities should have emerged in northern Sumatra in the 13th century remains an enigma. It is obvious that Muslim traders had been passing and stopping at these port-polities for centuries before this. It is likely that the rise of Islamic states in Sumatra was linked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Cōla dynasty in southern India, the collapse of that country into war and the end of the integrated regional economy which incorporated the northern Sumatran polities. With the rise of the more domestically-oriented Vijayanagara in southern India, the linkages of the Hindu-Buddhist polities of Sumatra with the subcontinent would have declined, as would have the Tamil guilds, the resultant lacuna likely providing new avenues for religious conversion. Moreover, the ports of the Malabar Coast continued to be meeting places and

commercial marts for traders from Yeme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The expansion of Islamic trading networks, and some have suggested Sufi guilds, along these maritime trade routes appears to have thus burgeoned.

From the 14th century we see growing evidence of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In Sumatra (or al-Jāwa as he referred to it), Ibn Battūta recorded what he, or his informants, observed when passing through the port-polity of Samudra in 1345 and 1346. He noted that the ruler—one Sultān Al-Malik Al-Zāhir—was "a Shāfiī in *madhhab* and a lover of jurists" who "often fights against and raids the infidels." It was further noted that "the people of his country are Shāfī who are eager to fight infidels and readily go on campaign with him. They dominate the neighbouring infidels who pay *jizya* to have peace." [19] Through the account provided, we see a polity whose ruler was engaged in frequent *jihad*, who sent missions to Delhi and to Zaitūn/Quanzhou, and who, at home, was surrounded by wazīrs, secretaries, sharifs, jurists, poets, and army commanders, and who obviously had close links with Islamic societies to the west, and direct sea links with Quilon. The Shāfiī school which the sultan followed has remained important throughout Indonesia and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India. We should not, however, consider this to have been simply a Middle Eastern society or ruling structure transplanted to Southeast Asia. It has been remarked that Ibn Battūta likely concentrated excessively on the cosmopolitan Arab/Iranian aspects of the court, and ignored the Indic and local elements unfamiliar to him. Certainly, the *batu Aceh* of the period reflect a strong indigenous element to the culture of the polity. [20]

Ibn Battūta then visited Mul Jāwa, the "country of the infidels," which is accepted to mean that Islam had not gained any real foothold in the island of Java by the mid-14th century. The only other major stop on the voyage to China, was Tawālisī, which has never been definitively identified. The long-standing importance of Champa as a stop on the Islamic trade route to China, however, makes it the leading candidate. This supposition is supported by Yamamoto Tatsuro's equation of Kailūkarī, the name of the largest city in Tawālisī according to Ibn Battūta, with the Cham name Klaung Garai. [21]

The West Asian links with Champa are manifested in the princess whom Ibn Battuta met in Tawālisī, who spoke to him in Turkish, who was literate in Arabic, and who wrote out the *bismillāh* in the presence of the visitor. Ibn Battūta, however, considered the polity to be outside Islam. This may well be a manifestation of the diversities of Islam within 14th-century Southeast Asia. He then travelled on to China, where Ibn Battūta noted the option of staying with Muslim merchants resident there, and that in Zaitun/Quanzhou, the "Muslims live in a separate city." There he met Muslims from Isfahān and Tabrīz. It thus appears that, for Ibn Battūta in the mid-14th century, the areas extending between the Islamic polity at Samudera and the Muslim communities on the Fujian coast remained outside Islam.

Events which occurred in Southern China not long after the visit of Ibn Battūta appear, however, to have had major effects on Islam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s noted, the port of Quanzhou was controlled by Muslim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Mongol Yuan rulers including them within the *semu* [22] group of Central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officials who exercised Yuan power over the Chinese inhabitants. The two major groups competing for power over the city and its foreign trade were the locally-born Islamic families, including that of Pu Shou-geng, and the newly-arrived Isfahān group of Persians who had come to the area with the Yuan armies. In the 1350s, a descendant of Pu Shou-geng, named Na-wu-na, controlled the local Maritime Trade Supervisorate for the Yuan court, while the Persians were represented by two persons -- Sai-fu-ding and A-mi-li-ding -- both holding military positions as brigade commanders. At a time when the Yuan was in steep decline, and when rebellions against the Yuan administration were occurring widely throughout China,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tensions in Quanzhou also spilled over. The standard *Yuan History* tells us: "In the spring of the 17th year of the Zhi-zheng reign (1357), the local brigade commanders Sai-fu-ding and A-mi-li-ding rebelled and took control of Quanzhou." This so-called Isfahān（亦思巴奚）[23] rebellion was to last for 10 years.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prominent merchant Sharaf al-Dīn of Tabrīz, whom Ibn Battūta met in Quanzhou and of whom he noted that he had borrowed money in India, was the same "Sai-fu-ding" who is mentioned in the

Yuan text. [24]

By 1362, the forces of Sai-fu-ding controlled much of the area around the provincial capital Fuzhou, but were then defeated by Yuan forces and fled back to Quanzhou, where it is reported that both Sai-fu-ding and A-mi-li-ding were killed by the Maritime Trade Supervisor Na-wu-na, a descendant of Pu Shou-geng.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Pu Shou-geng clan were Sunni, while the Işfahān forces were Shi'ite. This intra-Islamic struggle in Quanzhou also quickly involved Mongol forces of the Yuan and the Chinese themselves who felt that they had been maltreated under Yuan rule. The breakdown of dynastic order gave an opportunity to a more powerful contender for regional power -- Chen You-ding, a former Yuan general. With the assistance of Jin Ji, a general of Persian origin, Chen eliminated Na-wu-na and then began methodically murdering Sunni followers, as well as destroying Sunni graves, mosques and residences. It appears that initially the purge was directed at Sunni followers, but that it later expanded into a broader anti-Islamic campaign, with the depredations lasting for almost a decade after Chen You-ding captured Quanzhou. Those who escaped the purge either fled into the mountains or set sail. This flight of Muslims by sea from Quanzhou and elsewhere in Fu-jian into Southeast Asia in the 1360s was to greatly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 in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In the 1370s, not much more than a decade after the purges and massacres began in Fu-jian, Muslim tombs began to appear in Java. Most of these were devoted to elite figures apparently intimately involv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Majapahit state. The first of the Islamic gravestones (*maesan*), which are found at Trowulan and Trayala near ancient Majapahit, has an inscription dated to Śaka 1298 (equivalent to 1376 CE) and the dates of subsequent gravestones extend into the third quarter of the 15th century. [25] They are inscribed with the Śaka year in ancient Javanese script on one side of the stone, and with pious Islamic inscriptions in Arabic on the other. Given what we know of the situation in Quanzhou in the 1360s and the links already established between Champa and Quanzhou in this period, the existence of

the tomb of *Puteri Cempa* (the Campa princess) in Trowulan [26] , dated to 1448 C.E., underlines the likelihood that these graves belong to Muslims who fled the conflagrations in southern China in the 1360s, and were then engaged in various capacities by the Majapahit court, maintaining links with both Champa and the southern Chinese ports.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a group of Muslims, intimately tied to the Javanese administration is otherwise difficult to explain.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Puteri Cěmpa* was Haji Ma Hong Fu's wife, whom Parlindungan's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irebon" tell us, "had passed away and was buried in Majapahit according to Islamic rites" in or just before 1449. [27] Earlier references in these Annals tell us that Haji Ma Hong Fu, who had his origins in Yunnan, had been married to the daughter of Haji Bong Tak Keng, who had been appointed by the Ming commander Zheng He as a representative to Champa. [28] Separately, at Surabaya, the *Pěcat tanda*, that is, the "head of the market" at Terung was also a Chinese person employed as an official by the Majapahit court, and it was he who protected the young Muslim who had come from Champa and who would later become Raden Rahmat. [29]

While Damais and others believe that the persons interred in the graves at Trowulan and Trayala were Javanese [30] , the possibility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that these were persons from abroad who had given their allegiance to the Majapahit polity. Nascent polities on Java also suggest new arrivals during this period. Demak (淡巴) on the northern Javanese coast first appeared i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 in 1377 [31] , and is also recorded as having sent "tribute" to the Ming court in 1394. The founding or expansion of this *pesisir* polity by refugees in the 1360s or 1370s also conforms to all that we know of it. In addition, Javanese texts record Muslim leaders coming to Java from Champa, and settling in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early centres of Islamic propaganda –Surabaya (Ngampel), Gresik (Giri) and Cerbon (Gunung Jati). By the early 15th century, with the arrival of further observers on the ships of Zheng He, we read that Gresik had over 1,000 "Chinese" families, likely including the Muslim people of diverse ethnic origins who had fled from Fujian.

Ma Huan, a Muslim who accompanied Zheng He on several voyages,

included Java in his first-hand descriptions, later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Ying-yai sheng-lan* (or "Supreme Survey of the Ocean Shores"). Of Java, which he visited on the 1413-15 mission, he noted:

> The country contains three classes of persons. One class consists of the Muslim [32] people; they are all people from every foreign kingdom in the West who have flowed to this place as merchants; and in all matters of dressing and eating, they are all very clean. One class consists of T'ang people, [33] and they are all people from Guangdong and from Zhangzhou and Quanzhou and such places, who fled away and now live in this country; the food of these people, too, is choice and clean; and many of them follow the Muslim religion, following the precepts and fasting. One class consists of the local people; they have very ugly and strange appearance, tousled hair, and go in bare feet. They are devoted to devil worship, this country being among the 'devil countries' spoken of in Buddhist books. The food which these people eat is very dirty and bad. [34]

Two major points emerge from Ma Huan's account. The first is that by the early part of the 15th century, there were already quite a large number of Muslims, both Chinese and those from further west, resident in Tuban, Gresik, Surabaya and Majapahit on the northern coast of Java, but that the "local people" had not adopted the religion. The second is that many of the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had "fled" from China, endorsing the thesis that they had fled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Isfahān rebellion" in Quanzhou.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earliest Javanese mosques were modelled on Chinese forms has been suggested by De Graaf and Pigeaud, citing the similarity of the top ornament (*mastaka*) of the mosques and the pinnacles of Chinese stupas and pagodas. They note: "It could be expected that the first mosques in Java built by Chinese Muslims were imitations of Chinese pagodas. In their homeland in China or Indo-China pagodas were erected and used by various religions. This supposition is corroborated by the Malay Annals' story about the cooperation of the Chinese shipbuilders of Sĕmarang in the building of the first mosque of Dĕmak." They also note the absence, in the earliest Javanese mosques, of the *surambi*, or front gallery, found in later mosques, and also suggest this as having originated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35]

Evidence from Sumatra also supports the argument for a flight of hybrid Persian-Arab-Cham-Chinese Muslims out of southern China into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360s. Recent archaeological surveys and excavations in Barus reveal that the earliest Islamic tombstone found there dates from 772 AH/1370 CE [36], which fits excellently with the chronology proposed above. The name of the woman buried beneath the tombstone – Suy –may be Chinese, while the inscription itself contains Persian grammar and Arabic terms. Thus, the 1360s likely saw the return of an Islamic community to Barus following the driving out of the earlier community in the 11th century by the Cōlas.

Brunei's adoption of Islam in this period is reflected in the gravestone of a 14th-century Sultān, named "Mahārājā Brunī", found in the Residency cemetery in Bandar Seri Begawan. Links between that community and China are indic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gravestone was certainly manufactured in Quanzhou and transported to Brunei, as it is almost identical to those carved in China and, like them, is also made of diabase and inscribed completely in Arabic. In Terengganu, a stone inscribed in Malay written in Arabic script and dating from the 14th century suggests that Islamic law was being practised (or at least promoted) in this estuary of the Malay peninsula. In both these places, there is evidence that Islam had been a recent arrival, and that the process of adjustment was still taking place. The Brunei Sultan, for example, was still being entitled Mahārājā [37], while the Terengganu inscription referred to the Almighty by the Sanskritic name "Dewata Mulia Raya" alongside the name Allah. In addition, the Terengganu law code provided for differentiated fines depending on social rank, a practice unknown to more orthodox Islam. Kern suggested that "we have here a stone inscription from a convert, undoubtedly assisted by someone learned in the law, among a population yet to be converted." [38] The same phenomenon is manifested in two late 14th-century gravestones at Minye Tujuh in north Sumatra for the daughter of Sultān Al-Malik Al-Zāhir [39], which have inscriptions in both Arabic and in Old Malay written in an Indic-inspired Sumatran script.

Thus, the late 14th century can certainly be seen as a period of wide

extension of Islam within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of hybridity and synthesis. Apart from those manifestations noted above, Chinese texts note the existence of other Islamic rulers including Sultan "Melayu Da-xi", ruler of Samudera in 1383 and Sultān Zayn al-Ābidīn, who had assumed the throne of that polity by 1419; Sultān Husayn, the ruler of Aru in 1411; and Muhammad Shāh, the ruler of Lambri in 1412. Thus,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15th century,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coasts of Sumatra were the location of at least three Muslim polities. We remain unsure whether the extension of the presence of Islam in the northern half of Sumatra was the result of the raids by Sultān Al-Malik Al-Zāhir and his successors or other processes.

The Ming Maritime Missions

By the end of the 14th century, it thus appears that the influx of Muslims from Southern China as well as the activities of rulers in the north of Sumatra had already begun to change the religious nature of Nusantara. [40] It was at this juncture, following the coming to power in China of the usurper Ming emperor Yong-le, that another southward push from China was to occur. The voyages of the eunuch Muslim admiral Zheng He, which extended over the period 1405 to 1435, have attracted a wide range of explanations as to their impetus and function. The most appealing is that the usurping emperor Yong-le needed to boost his legitimacy by extending Ming power over as great an area as possible. [41] The sending of these vast armadas under the command of Zheng He and other eunuch officials was intended to bring the known maritime world to submission. Thereby, a *pax Ming* could be established, trade nodes and routes to the West could be controlled, and bo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would reside in the hands of the Ming emperor. It was thus that these missions proceeded along the trade routes which the Arabs and Persians had been using for centuries, all the way to the East coast of Africa.

The prominence of Muslim traders and Muslim polities along the existing trade routes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decision to have Muslims lead these

massive missions, each of which comprised up to hundreds of ships and up to 30,000 troops. Like Zheng He, some of the other senior commanders were Muslims, as were many of the soldiers and seamen who accompanied the missions. It was thus at this time, in an effort to soothe the remaining Muslims of Fujian, to aid the conscription of interpreters and pilots for the eunuch-led armadas and to facilitate links with those who had fled southwards, that the Yong-le emperor issued a proclamation in 1407 that no more violence was to be perpetrated against Muslims. "No official, military or civilian personnel shall despise, insult or bully [Muslims] and whoever disobeys this order by doing so shall bear the consequences." [42]

The Ming missions were certainly not intended by the Ming court to have a religious proselytizing function, but given the religious affiliations of many of the senior members of the missions, it would not have been surprising if there had been efforts to encourage the adoption of a new religion among some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 met on the voyages. These missions had the added unintentional effect of linking together the major Muslim communities in southern China and those throughout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 with the societies of the great Islamic centres of West Asia. Many of the rulers, or at least senior envoys from places visited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were carried in the Ming ships to the Chinese capital together with envoys from Islamic polities further west—Cochin, Hormuz, Aden, Dhofar and even Mecca. Awareness of the extent and influence of Islam in these areas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ongoing Islamis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e Ming naval forces definitely became engaged in the politics of Java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15th century. Chinese texts inform us that two competing rulers of Java –a Western king and an Eastern king -- were engaged with the Ming stat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entury. The Ming naval forces were apparently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Eastern ruler before he was killed by the Western ruler in 1406. The Western ruler also killed 170 Ming troops involved with the Eastern kingdom, for which the Ming court demanded 60,000 ounces of gold as compensation. As the Eastern king was likely the ruler of Majapahit, we might surmise that the Western king ruled a newly-emergent coastal polity,

probably in Semarang-Demak [43] ,where a new power base had arisen around the Muslim refugees who fled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 in the 1360s and 1370s. [44]

This scenario lends credence to the otherwise quite contentious Malay-language *Peranakan* chronicles of Semarang and Cerbon "discovered" and published by Mangaradja Parlindungan in the 1960s. Parlindungan's account, supposedly derived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archives in these cities, depicts a wide-ranging early 15th-century network of Chinese Hanafi Muslims, spread through polities all over Southeast Asia, and tightly connected to Ming agents such as Zheng He. These Chinese Hanafi communities were supposedly established in Palembang, Sambas, Malacca, and Luzon, as well as all along the north coast of Java—Ancol, Cirebon, Lasem, Tuban, Semarang, Gresik, and Joratan. The account further assigns Chinese origins to some of the Islamic saints of Java, including Sunan Ngampel and Sunan Giri, as well as to Njai Gede Pinatih, the Great Lady of Gresik. [45]

It needs to be affirmed that much of the Parlindungan account is in accord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uslim communities overseas as reflected in the foregoing account. People did flee from Quanzhou to various ports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late 14th century, and the links which Parlindungan suggests are congruent with other sources he was unlikely to have known. The 15th century *Xi-yang fan-guo-zhi* actually stated that all of the Chinese in Java were Muslims [46] , and within Java there are traditions of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the Islamisation of Java. [47] The Sino-Javanese envoy Ma Yong-long (Ma Yong-liang) is well-attested in other sources, but most interestingly, another of the leaders of the Javanese Hanafi community as reported in Parlindungan's work -- Gan Eng Cu – is found to have a correlate only in the Ming veritable records (*Ming shi-lu*) which would not have been available to Parlindungan. Of Gan Eng Cu, the Parlindungan account reads:

> 1423: Haji Bong Tak Keng transferred Haji Gan Eng Cu from Manila / Philippines to Tuban/Java to control the flourishing Hanafite Muslim communities in Java, Kukang and Sambas. At that time, Tuban was Java's main port, with the kingdom of Majapahit as hinterland. Haji Gan Eng Cu became a kind of consul-

gener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Ming Emperor, having control of all Muslim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southern Nan Yang countries including Java, Kukang and Sambas…… [48]

In the Ming veritable records, we read of Gong Yong-cai (龔 用 才 —in Hokkien "Giong Eng-cai"), a Chinese envoy from Java, travelling to the Ming court in 1429, and receiving robes from the Chinese emperor, exactly as was recorded of Gan Eng-cu in Parlindungan's work. [49] This reference opens up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se annals do provide us with new factual material on Sino-Javanese Islamic networks of the 15th century.

Regardless of the veracity of this account, we do observe in this perio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age of Islamisation along the Javanese northern coast. [50] We have evidence of Islam in Gresik by 1419 [51] , and further evidence of the religion's gradual growth along this coast. These *pesisir* communities were to become some of the most powerful agents of Islamic expansion in Southeast Asia both during the 15th century and beyond. Demak is depicted in some accounts as having waged *jihad* against other *pesisir* polities through the 15th century. [52]

But would any of this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southward flow of Muslims out of Quanzhou to Java and elsewhere in Nusantara, as a result or warfare and purges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14th century? We can never know. What can be affirmed is that that movement of Muslim persons –diverse in ethnicity—to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ports of Fujian during this period was a key event in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n Islam.

■ NOTES

[1] For a fuller discussion of the spread of Islam to Southeast Asia prior to 1500, see Geoff Wade, "Early Muslim expansion in South-East Asia, eighth to fifteenth centuries",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ume 3 - The Eastern Islamic World Elev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edited by David O. Morgan and Anthony Rei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66-408.

[2] Pierre-Yves Manguin, "The Introduction of Islām into Champa" , in *The Propagation of Islām in the Indonesian-Malay Archipelago*, edited by Alijah Gordon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2001), pp. 287-328. See p. 311, n. 12.

[3] The "Persian and Arab traders" referred to here is a generic reference to peoples from the Middle East trading on ships crewed by people of a likely diverse range or ethnicities and religions.

[4] Recorded in the *Jiu Tang shu*, or "Older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in *juan* 10. The term Da-shi (大食) derives from the Persian name Tazi, referring to a people in Persia. It was later used by the Persians to refer to the Arab lands. The Chinese used it from the Tang dynasty until about the 12th century to refer to the Arabs.

[5] Michael Flecker, "A ninth-century AD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 first evidence for direct trade with China", *World Archaeology*, 32, no. 3 (February, 2001): 335-354.

[6] Note, by comparison, the 10,000 Muslim population of Chaul (= Saymur), the main port for the Konkan coast as given by al-Mas'udi. Wink suggests that the exodus of Arabs from China at this tim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ise of the major ports in the isthmian region, particularly Kalāh. See André Wink, *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 3 vols. (Leiden & New York: E.J. Brill, 1990-2004), Vol. I, p. 84.

[7] The oldest mosque in Quanzhou reputedly dates from the 11th century when the port began to rise in importance.

[8] Al-Idrîsî, *Opus Geographicum*, edited by E. Cerulli et al., 4 vols. (Naples: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70-74, p. 62. Cited in Michael Laffan, *Finding Java: Muslim nomenclature of insular Southeast Asia from Śrîvijaya to Snouk Hurgronj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2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5). p. 22, n. 65. This term Zābaj was a generic reference to the ports of Sumatra and surrounding areas, and is the apparent origin of the Chinese name San-fo-qi for Sriwijaya.

[9] The assumption is that the official surnamed Pu was, like other members of the Pu clan, a Muslim. There reportedly exists in Leran, East Java an Islamic gravestone dated AH 475 (1082 C.E.) for a woman, the daughter of Maimun. However, there is no firm evidence that the gravestone originated in Java, with suggestions that it was possibly being brought there as ballast. See Ludvik Kalus and Claude Guillot, "Réinterprétation des plus anciennes stèles funéraires islamiques nousantariennes: II . La stèle de Leran (Java) datée de 475/1082 et les stèles associées", *Archipel* 67 (2004): 17-36.

[10] This is noted in He Qiaoyuan 何喬遠, *Min Shu*閩書, (Fuzhou: Fujian People's Press,1994), *juan* 152.

[11] For the most detailed available account of Pu Shou-geng, see Kuwabara Jitsuzo "On P'u Shou-keng",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II (1928): 1-79 and VII (1935): 1-104.

[12] For further details of these events, see Billy K.L 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 946-1368* (Cambridge, Mas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Hugh Clark, "Overseas Trade and Social Change in Quanzhou through the Song", in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 - 1400*, edited by Angela Schottenhammer (Leiden: E.J. Brill, 2001), pp.47-94; and John Chaffee, "Muslim Merchants and Quanzhou in the Late Yuan-Early Ming: Conjectures on the Ending of the Medieval Muslim Trade Diaspora", in *The East Asian 'Mediterranean': Maritime Crossroads of Culture, Commerce, and Human Migration*, edited by Angela Schottenhamm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8), pp. 115-132.

[13]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rom Li Tana. For original text, see Chen Ching-ho, 陳荊和(編校)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Critical edition) 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 3 vols. (3 本). Tokyo: 1985-86. pp. 348-49。

[14] One apparent victim of the battles at this time was Pu Ha-ting, a Sayyid of the 16th generation and builder of the Xian-he Mosque in Yangzhou, who died in 1275. See D. D. Leslie, *Islam in Traditional China: A Short History to 1800* (Canberra: Canberra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 1986), p. 48.

[15] Suwedi Montana, "Nouvelles données sur les royaumes de Lamuri et Barat", *Archipel* 53 (1997): 85-96. See p. 92. There remains much dispute over the dating and other aspects of this gravestone.

[16] "This kingdom, you must know, is so frequented by the Saracen merchants that they have converted the natives to the Law of Mahommet—I mean the townspeople only, for the hill people live for all the world like beasts…" Henry Yule (trans. and ed.),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London: Murray, 1929), Vol. II, p. 284.

[17] For further details of the gravestones, see Elizabeth Lambourn, "The formation of the batu Aceh tradition in fifteenth-century Samudera-Pasai",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32 (2004): 211-248; and Claude Guillot & Ludvik Kalus, *Les monuments funéraires et l'histoire du Sultanat de Pasai à Sumatra* (Paris: Association Archipel, 2008), pp. 177-78.

[18] See A.H. Hill, "Hikayat Raja-Raja Pasai",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33, no. 2 (June 1960).

[19] H.A.R. Gibb,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A.D. 1325-1354*, Translated with revisions and notes from the Arabic text edited by C. Defrémery and B.R. Sanguinetti, completed with annotations by C.F. Beckingham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94), Vol. IV, pp. 876-77.

[20] See Lambourn, "The Formation of the *Batu Aceh* Tradition".

[21] The name of a Cham temple complex (Po Klaung Garai) located at Phanrang in what is today Ninh Thuận Province. It comprises three towers dating back to about 1300, built during the reign of Cham King Jaya Simhavarman II. Yamamoto Tatsuro, "On Tawalisi as Described by Ibn Battuta", i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VIII (1936): 93-133. See p. 117.

[22] Lit: "Diverse peoples."

[23] Chen and Kalus suggest an alternative -- that the term "yi-xi-ba-xi"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ispāh and that it derives from the Persian term *sepâh*, meaning "great army". See Chen Da-sheng and Ludvik Kalus, *Corpus d'Inscriptions Arabes et Persanes en Chine –1. Province de Fujian (Quanzhou, Fuzhou, Xiamen)*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Geuthner, 1991). See p. 45, note 151. However, if their proposal was the case, the final Chinese character would be superfluous. Isfahan is the only feasible origin for this expression, particularly as read in Hokkien, the characters provide "Yik-si-ba-he."

[24] It is also likely not coincident that another senior person whom Ibn Battūta met in Quanzhou was Shaykh al-Islām Kamāl al-Dīn, "a pious man" who indeed came from Isfahān. Was he the other leader of the rebellion "A-mi-li-ding" (= Kamāl al-Dīn)?

[25] See Louis-Charles Damais, "Études Javanaises: Les tombes Musulmans dates de Tralaya",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48 (1956): 353-415. See listing and dates of the graves on p. 411.

[26] The grave remains today an Islamic pilgrimage site.

[27] Hermanus Johannes de Graaf & Theodore G. Th. Pig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ĕmarang and Cĕrbon*, edited by M.C. Ricklefs,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 12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 1984), p. 20. I am assigning this text more veracity than hitherto given to it for reasons detailed below.

[28] De Graaf and Pig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p. 14. This fits wonderfully with the date of the Trowulan grave, but those who are suspicious of the Parlindungan source might point to the fact that Damais' article on the graves was

published in 1956, while Parlindungan's work *Tuanku Rao* within which the "Annals" are contained, was only published in 1964, allowing for the grave date information to be incorporated in the latter work.

[29] Denys Lombard and Claudine Salmon. "Islam and Chineseness" in *The Propagation of Islam in the Indonesian-Malay Archipelago*, edited by Alijah Gordon, pp. 181-208.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2001), p. 184. See also the correlation in Javanese texts between Champa and the spread of Islam as detailed by Manguin in "The Introduction of Islam into Champa", pp. 294-95.

[30] Merle Ricklefs notes of these graves: "The use of the Indian Śaka era and Javanese numerals rather than the Islamic Anno Hijrae and Arabic numerals to date several gravestones leads to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se mark the final resting place of indigenous Javanese followers of Islam rather than of Muslims from elsewhere. Moreover, on several of these stones are found distinctive sunburst medallions also found on other forms of Majapahit art, suggesting that these were in fact the graves of members of the Majapahit royal family." See M. C. Ricklefs, *Mystic Sythesis in Java: A History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Abingdon: EastBridge, 2006), p. 13.

[31] Geoff Wade (trans.), *Southeast Asia in the Ming Shi-lu: An Open Access Resource* (Singapor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Singapore E-Pre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5).

[32] The term used was "Hui-hui," likely derived from Hui-gu, the term by which the Chinese knew the Uighurs.

[33] Chinese persons.

[34] J.V.G. Mills, *Ma Huan, Ying-yai Sheng-lan [1433]: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70).

[35] De Graaf and Pig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p. 153.

[36] See Ludvik Kalus, "Chap XV: Les Sources Épigraphiques Musulmanes de Barus", in *Histoire de Barus, Sumatra: Le Site de Lobu Tua, II Étude archéologique et Documents*, edited by Claude Guillot, pp. 303-338 (Paris: Association Archipel, 2003). For the tombstone cited, see pp. 305-06. Thanks go to John Miksic for drawing my attention to this tombstone. A recent update on the Islamic vestiges at Barus can be found in Daniel Perret & Heddy Surachman (ed.), *Histoire de Barus III Regards sur une place marchande de l'océan Indien (XIIe-milieu du XVIIe s.)* (Paris, Association Archipel & EFEO, 2009), pp. 582-88

[37] The title Maharaja was still in use for the ruler of Brunei in the early 15th century.

[38] R.A. Kern, "The Propagation of Islam in the Indonesian-Malay Archipelago", in *The Propagation of Islam in the Indonesian-Malay Archipelago*, edited by Alijah Gordon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2001), pp. 23-124. See p. 36.

[39] Either the same sultan whom Ibn Battuta had met in the 1340s, or his son.

[40] Slametmuljana also examined the role of Chinese Muslims in the Islamization of Nusantara, but included some unconfirmed sources. See Slametmuljana, "Isla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of Demak",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27, no. 1 & 2 (Dec 1972): 41-83. My thanks to E. Edwards McKinnon for bringing this source to my attention.

[41] The claim that Yong-le and other Ming emperors were closet Muslims is unsubstantiated by any accepted source. For such claims, see Yusuf Chang, "The Ming Empire: Patron of Islam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nd West Asia",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61, no.* 2 (1988): 1-44.

[42] Chen Da-sheng陳達生, *Quan-zhou Yi-si-lan jiao shi-ke*泉州伊斯蘭教石刻 (Islamic Stone Inscriptions from Quan-zhou), (Quanzhou: Fujian People' s Press, 1984). See pp. 11-13.

[43] Demak first appeared in Ming texts (under the name Dan-ba) in 1377, which gels well with the thesis that it emerged as a base for the Muslim refugees who fled from Southern China in the 1360s. See Geoff Wade, *Southeast Asia in the Ming Shi-lu:* Entry1883. http://epress.nus.edu.sg/msl/entry/1883.

[44] Relevant materials can be gleaned from the *Ming Shi-lu*, *Ming-shi* and *Shu-yu-zhou-zi-lu*. The last of these works notes that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who sojourned in Java were Muslims.

[45] See De Graaf and Pig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D.A. Rinkes, *Nine Saints of Java*, translated by H.M. Froger, edited by Alijah Gordon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and Rinkes, *Nine Saints of Java*; and Tan Yeok Seong, "Chinese element in the Islamisation of Southeast Asia—A study of the story of Njai Gede Pinatih, the Great Lady of Gresik",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30, nos. 1 and 2 (1975): 19-27.

[46] Lombard and Salmon, "Islam and Chineseness", p. 183.

[47] Slametmuljana, *Runtuknja Keradjaan Hindu-Djawa dan Timbulnja Negara-negara Islam di Nusantara* (Jakarta, Bhratara,1968) as quoted in Lombard and Salmon, "Islam and Chineseness", p. 184.

[48] De Graaf and Pig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pp. 15.

[49] De Graaf and Pigeaud,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pp. 15-16.

[50] For further details of which, see Lombard and Salmon, *Islam and Chineseness*, pp. 115-117.

[51] J.P. Moquette, "De datum op den grafsteen van Malik Ibrahim te Grisse", *Tijdschrift voor Indisch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LIV (1912): 208-14. Again the gravestone derived from Cambay.

[52] De Graaf and Pigeaud, however, write of a tradition which holds that the first Muslim ruler of Demak, (who was of Chinese origin) did not emerge until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15th century. See Hermanus Johannes de Graaf & Theodore G. Th. Pigeaud, *Islamic States in Java 1500-1700* ('s-Gravenhage: KITLV, 1976), pp. 6-8.

REFERENCES

Chaffee, John. "Muslim Merchants and Quanzhou in the Late Yuan-Early Ming: Conjectures on the Ending of the Medieval Muslim Trade Diaspora". In *The East Asian 'Mediterranean': Maritime Crossroads of Culture, Commerce, and Human Migration*, edited by Angela Schottenhammer, pp. 115-13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8.

Chang, Yusuf. "The Ming Empire: Patron of Islam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nd West Asia".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61, no. 2 (1988): 1-44.

Chen Ching-ho, 陳荊和 (編校)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Critical edition) 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 3 vols. (3 本). Tokyo: 1985-86.

Chen Da-sheng 陳達生 . *Quan-zhou Yi-si-lan jiao shi-ke* 泉州伊斯蘭教石刻 (Islamic Stone Inscriptions from Quan-zhou). Quanzhou: Fujian People's Press, 1984.

Chen Da-sheng and Ludvik Kalus. *Corpus d'Inscriptions Arabes et Persanes en Chine –1. Province de Fu-jian (Quanzhou, Fuzhou, Xiamen)*.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Geuthner, 1991.

Clark, Hugh. "Overseas Trade and Social Change in Quanzhou through the Song". In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 - 1400*, edited by Angela Schottenhammer, pp. 47-94. Leiden: E.J. Brill, 2001.

Damais, Louis-Charles. "Études Javanaises: Les tombes Musulmans dates de Tralaya".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48 (1956), pp. 353-415.

Flecker, Michael. "A ninth-century AD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 first evidence for direct trade with China", *World Archaeology*, Vol. 32:3 (February, 2001), pp. 335-354.

Gibb, H.A.R.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A.D. 1325-1354*, Translated with revisions and notes from the Arabic text edited by C. Defrémery and B.R. Sanguinetti, completed with annotations by C.F. Beckingham.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94.

Gordon, Alijah (ed.). *The Propagation of Islam in the Indonesian-Malay Archipelago*.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2001.

Graaf, Hermanus Johannes de & Theodore G. Th. Pigeaud. *Islamic States in Java 1500-1700*. 's-Gravenhage: KITLV, 1976.

____________.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ĕmarang and Cĕrbon*, edited by M.C. Ricklefs,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No. 12.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 1984.

Guillot, Claude (ed.). *Histoire de Barus, Sumatra: Le Site de Lobu Tua, II Étude archéologique et Documents*. Paris: Association Archipel, 2003.

Guillot, Claude & Ludvik Kalus. *Les monuments funéraires et l'histoire du Sultanat de Pasai à Sumatra*. Paris: Association Archipel, 2008.

He Qiaoyuan 何喬遠. *Min Shu* 閩書. Fuzhou: Fujian People's Press,1994.

Hill, A.H. "Hikayat Raja-Raja Pasai".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33, no. 2 (June 1960).

Idrîsî, Al-. *Opus Geographicum*, edited by E. Cerulli et al., 4 vols. Naples: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70-74.

Kalus, Ludvik. "Les Sources Épigraphiques Musulmanes de Barus". In *Histoire de Barus, Sumatra: Le Site de Lobu Tua, II Étude archéologique et Documents*, edited by Claude Guillot, pp. 303-338. Paris: Association Archipel, 2003.

Kalus, Ludvik and Claude Guillot. "Réinterprétation des plus anciennes stèles funéraires islamiques nousantariennes: II. La stèle de Leran (Java) datée

de 475/1082 et les stèles associées". *Archipel* 67 (2004): 17-36.

Kern, R.A. "The Propagation of Islam in the Indonesian-Malay Archipelago". In *The Propagation of Islam in the Indonesian-Malay Archipelago*, edited by Alijah Gordon, pp. 23-124.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2001.

Kuwabara Jitsuzo 桑原隲藏. "On P'u Shou-kêng: a ma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ho was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trading ships' office in Ch'üan-chou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ung dynasty, together with a general sketch of trade of the Arabs in China during the T'ang and Sung era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II (1928): 1-79 and VII (1935): 1-104.

Laffan, Michael. *Finding Java: Muslim nomenclature of insular Southeast Asia from Śrîvijaya to Snouk Hurgronj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52.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5.

Lambourn, Elizabeth. "The formation of the batu Aceh tradition in fifteenth-century Samudera-Pasai".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32* (2004): 211-248.

Leslie, D. D. *Islam in Traditional China: A Short History to 1800*. Canberra: Canberra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 1986.

Liu Xu 劉昫 et al. *Jiu Tang shu* 舊唐書. Beijing : Zhonghua shu ju, 1975.

Lombard,Denys and Claudine Salmon. "Islam and Chineseness". In *The Propagation of Islam in the Indonesian-Malay Archipelago*, edited by Alijah Gordon, pp. 181-208.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2001.

Manguin, Pierre-Yves. "The Introduction of Islam into Champa". In *The Propagation of Islam in the Indonesian-Malay Archipelago*, edited by Alijah Gordon, pp. 287-328.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2001.

Mills, J.V.G. *Ma Huan, Ying-yai Sheng-lan [1433]: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70.

Montana, Suwedi. "Nouvelles données sur les royaumes de Lamuri et Barat". *Archipel* 53 (1997): 85-96.

Moquette, J.P. "De datum op den grafsteen van Malik Ibrahim te Grisse". *Tijdschrift voor Indisch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LIV (1912): 208-14.

Parlindungan, Mangaraja Onggang. *Pongkinangolngolan Sinambela gelar Tuanku Rao : terror agama Islam mazhab Hambali di tanah Batak 1816-1833.* Jakarta: Tandjung Pengharapan, 1964.

Perret, Daniel & Heddy Surachman (ed.). *Histoire de Barus III. Regards sur une place marchande de l'océan Indien (XIIe-milieu du XVIIe s.).* Paris: Association Archipel & EFEO, 2009.

Ricklefs, M.C. *Mystic Sythesis in Java: A History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Abingdon : EastBridge, 2006.

Rinkes, D.A. *Nine Saints of Java.* translated by H.M. Froger, edited by Alijah Gordon.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Slametmuljana. *Runtuknja Keradjaan Hindu-Djawa dan Timbulnja Negara-negara Islam di Nusantara.* Jakarta: Bhratara, 1968.

Slametmuljana. "Isla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of Demak".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27, nos. 1 and 2 (1972): 41-83.

So, Billy K.L.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 946-13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Tan Yeok Seong. "Chinese element in the Islamis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 study of the story of Njai Gede Pinatih, the Great Lady of Gresik".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30, Nos. 1 and 2 (1975): 19-27.

Wade, Geoff (trans.). *Southeast Asia in the Ming Shi-lu: an open access resource*, Singapor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Singapore E-Pre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5. http://epress.nus.edu.sg/msl/.

Wade, Geoff (trans.). "Early Muslim expansion in South-East Asia, eighth to fifteenth centuries".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ume 3 - The Eastern Islamic World Elev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edited by David O. Morgan and Anthony Reid, pp. 366-40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Wink, André. *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 3 vols. Leiden & New York: E.J. Brill, 1990-2004.

Yamamoto, Tatsuro. "On Tawalisi as Described by Ibn Battuta".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VIII (1936), 93-133.

Yule, Henry (trans. and ed.).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London: Murray, 1929.

Tongking in the Age of Commerce

Li Tana

Studies on the pre-modern history of Vietnam owe much to Tony Reid, whose concept of the "Age of Commerce" has enlightened and inspired a generation of younger scholars. The "traditional" Vietnam had hitherto been portrayed as an undifferentiated swamp of peasantry living in closed and identical villages -- "the Vietnamese village" -- which stretched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Reid's representation of pre-modern Southeast Asia in relati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re-shaped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rew powerful new light onto facets of Vietnamese history and society which had previously not been properly investigated. For the first time, commerce was seen as an index of power and prosperity in pre-modern Vietnam like in its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erparts. If,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scholars on Vietnam have more or less demolished the image of "a united Vietnam, a village Vietnam, a Confucian Vietnam, and a revolutionary Vietnam", this owes much to Reid for providing powerful weapons and frameworks within which new ground could be opened.

Over the last 10 years, our knowledge of seventeenth-century northern Vietnam (Tongking, or Dang Ngoai) has grown remarkably. [1] In a way this is indicative and a result of the acceleration of researches on Vietnamese history over this period. Scholars in Vietnam, sometim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foreign

scholars, have also contributed important work to the field, and much of this is based on stele inscriptions collected from northern and central Vietnam. [2] This article will build on these new findings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ongking' s overseas trade and social changes, particularly th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chang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Tongking society.

The Size of Seventeenth–Century Tongking's Overseas Revenue

The role of commerce in changing societies has been recognized almost everywhere in Asia, but Tongking until recently retained the image of being comprised of classic autonomous villages, with deeply-rooted Confucian values and centred of an agricultural economy. If there was any sign of significant commercial growth here, it was but a "capitalist sprout," incidentally grown out of the soil of a typical subsistence economy. Although the existence of foreign trade was acknowledged, it was treated as an affair between the king, mandarins and foreign merchants, with little or nothing to do with the ordinary people, their petty trade, or the society. This approach of viewing foreign trade and domestic society as isolated compartments was partly due to the lack of systematic economic data.

The greatly improved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ies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has shed valuable light on seventeenth century Tongking. If we were not so sur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foreign trade before this, the new researches indicate with little doubt that it was indeed significant to Tongking' s economy, comparable to the effects in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during the Age of Commerce. Between 1637 and 1680, a yearly average of 278,900 guilders or about 90,000 taels of silver were brought into Tongking by the VOC [3] , and another 43,500 taels were brought in by the Chinese merchants. [4] This meant that about 4.3 tons of silver was flowing into the country each year from these

two sources alone. George Souza points out that Portuguese ships or *chos* yearly brought silver or coins (*caixas*) to Tongking between 1626 and 1669, at about 2-3 tons per year. [5] Before the VOC and Portuguese factors came into existence, there had been a constant inflow of silver between 1604 and 1629, when Japanese silver export to Tongking was around 2.5 tons per year. [6] We have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hinese investment in Tongking remained constant or increased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one of the peaks of commercial growth i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light of the work of Souza, Hoàng Anh Tuấn and Iioka on Tongking, among others, we can now safely conclude that, for roughly 80 yea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ngking yearly had an inflow of around six to seven tons of silver. [7]

This suggests that around 450,000 *quan* of copper cash were being annually injected into Tongking's economy, throughout most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8] This figure i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means that the foreign silver income was eight times the taxes derived from passes, ferries and markets of Tongking in the 1730s.[9] This income from exports was thus also comparable to Tongking's southern rival Cochinchina, or Đàng Trong. The Nguyễn's annual revenue during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was an average of 380,700 *quan* [10], and two-thirds of that would have come from overseas trade. [11] The Trịnh's silver income was more than the state revenue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Nguyễn.

We have thus in recent years come to know that a large volume of silver flowed into Tongking society, significant enough to influence some of the policies. But once it came into the country, where did the silver go? Are we able to trace this from the surviving evidence, in order to see the impact of this foreign silver?

A set of figures about the religious life of seventeenth-century Tongking suggests one direction. There are still thousands of *đình* or village halls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and the few hundred oldest ones have steles indicating their founding years. None of these indicates that it had existed prior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2] Another set of figure is also interesting: among the 411 Certificates granted to the local deities (*thần sắc*) by different Vietnamese courts, none of the documents was done befor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3]

If the income from overseas trade gives a rough idea of the size of the

seventeenth-century Tongking economy and the share of its export sector, the emergence of the communal halls and a dazzling number of deities suggest a series of lively and significant changes occurring in Tongking society overlapping with the commercial boom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following is an attempt to trace the path of the silver in exchang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o as to present seventeenth-century Tongking as a "coherent arc of change" [14] through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foreign and domestic trade, between commerce and the state, and between commerce and the society.

Was 1550–1680 a Golden Era?

Contrary to the long-held view that the sixteenth century was a regressive and desolate era in Vietnamese history, which saw the country ruled by a usurping Mạc family, who constantly fought against the Lê-Trịnh, recent scholarship suggests a quite different picture of Vietnamese society in this period. According to Trần Quốc Vượng,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the suffocating atmosphere of Confucian domination under Lê Thánh Tôn was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It was also the Mạc, according to Đinh Khắc Thuân, after coming to power in 1527, who reformed the country's rapidly declining economy. Agriculture was extensively developed, and an irrigation system was built around the Mạc capital region in Hải Dương. At least 15 new bridges were built,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stele inscriptions; while revived handicrafts production stimulated the need for more markets, and overseas trade flourished. [15]

This renewed vigour was also manifested in the constructions of this period. A survey of the 2000 steles of the period shows that, in terms of building or renovating temples, communal halls, markets, bridges and ferries,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s under the half century of Mạc rul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e projects from c.1680 to c.1840 combined (see Figure 1 below).

The civil war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seem to have stimulated the two Đại Việt societies. When the war with the Mạc ended in 1593, the Lê-Trịnh continued to carry out the Mạc's open-door policies, encouraging handicrafts production and foreign trade, which offered the quickest source of income to repair the damaged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post-war era.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thus saw Tongking picking up the momentu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ạc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ut Tongking also benefitted greatly from the broader background of the booming late Ming economy, one of the greatest economic expansions in Chinese history. By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China was intimately a part of the growing global economy. The Chinese traded active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mmercial trading networks with silk and porcelain in exchange for silver. These two exports were precisely the same staples of Tongking. It seemed therefore, while Tongking shared the boom year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between 1570 and 1630, as noted by Reid [16] , it shared the same export markets and products with China. Different from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during the Age of Commerce, whose export items were spices, pepper, and luxury trade items such as aromatics and gold, Tongking's main export items were silk and porcelain. Tongking's strength, in other words, rested on manufacturing, whic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silver earner and one of the main engines of the seventeenth-century Tongking economy.

The demand for silk from Tongking first by the Japanese and then by the Dutch must have stimulated the expansion of silk production. By the late 1640s the size of raw silk production was considerable. In 1648, for example, although the Chinese offered a high price and brought 6000 piculs of Tongking raw silk to Nagasaki, the VOC was still able to buy 522 piculs of raw silk, and a good amount of *pelings*, velvet and other silk products to Japan, worth over 300,000 guilders. Again in 1650, while junks from China brought a total of 930 piculs of raw silk to Nagasaki, Chinese junks from northern Vietnam carried 820 piculs of Tongking raw silk, plus large amounts of silk piece goods. [17] This indicates that Tongking raw silk was competitive in Japan markets and thus was an attractive alternative to Chinese silk, both in terms of quantity and price.

The capacity of silk production of Tongking averaged 130-150 tons of raw

silk and around 10,000 piece-goods a year. It would have required no less than 20,000 households or 100,000 labourers to produce the amount. [18] But since 90% of silk production was women's work and silk was a sideline production, the households involved in the silk production would have been three or four times the 20,000 figure. In response to the demand for silk, and the silver flowing in, the number of Vietnamese peasants involved in silk produc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able. Raw silk production is a labour-intensive business. A study of the silk-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indicates that if the cycle of rice-planting on an acre of land requires 76 days, tending an acre of mulberry trees needs 196 days. Silkworm tending is equally labour-intensive and labour is usually 30-50% of the total production cost. [19] If we are not clear whether silkworm tending, cocooning, and spinning were done by the same family, we do know that dying operations were performed by specialised villages [20] ,and silk piece-good producers definitely bought raw silk rather than producing their own. So there were layers in the silk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export sectors, each relying on the other, and all demanding some co-ordination. These in turn relied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ransport and commerce, as these provided the necessary materials, food, transport and commercial link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cutting taxes to encourage domestic trade was to the government's advantage, as the enormous silver revenue derived from foreign trade had made the income from the domestic trade sector less important anyway. It was no coincidence therefore that the Trịnh abolished tax collecting passes in the country in 1658, and in 1660 further forbade officers from charging high fees on ferries and markets. [21] In the same year the government ordered the whole country to build highways (*đường thiên lì*, "roads of a thousand li"),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ravel." [22]

The half-century war with Cochinchina seems to have stimulated silk production and given it more focus, as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for obtaining hard cash to finance the more advanced weapons from the West. Silk manufacturing in Tongking thus developed to a higher level and numerous silk-producing centres flourished in and around Thăng Long. New villages emerged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us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settlement of the Red River Delta.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a ten-year Japanese project on the history of village formation in the Nam Định area reveals that a new landscape was made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ossibly by both land expansion of the older villages and establishment of new settlements. [23]

New cash crops were introduced and became rapidly popular. Tobacco was brought into Tongking in the early 1660s from Laos and soon became an essential part of ordinary people's life. "Officers, common people and women all compete to get addicted to it, so much so that there is a saying that, 'one can do without eating for three days but cannot do without smoking for one hour'". [24] The method of brewing rice wine came from Guangdong but was originally from Siam, according to Lê Quý Đôn. This involved "adding aromatics to the wine which was called a-la-ke (arrack)." [25] Corn was also brought in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lthough its Vietnamese name is *Lúa Ngô* (the crop of Ngô, i.e. the Chinese), the method of planting using a knife to dig a hole and plant the seed suggested that it might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ongking from the mountain peoples. The Sơn Tây region even came to rely on corn as its staple food. Both corn and sorghum became important crops in the bordering provinces with China. [26]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as in many ways a "'golden era' and gave birth to an unprecedented commercial system", as described by Hoang Anh Tuan. [27] The next sections examine this golden era.

The First Indicator: Expanded Constructio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 large percentage of the silver earne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ent to the war effort. According to De Rhodes, Tongking had at least 500 galleys, three times more than Cochinchina, and superior to those of Cochinchina in their size, armaments and decorations. The soldiers were well trained and disciplined, and skilfully used all weapons, as was shown

by the pistols and arquebuses which they fired with admirable skill. [28]

I will concentrate here however, on the expanded consumption resulting from this unprecedented inflow of silver. To begin with, the court spent considerably on the building and renovation of the capital, particularly the palaces. In 1630 alone, three palaces were built for the Lê king, together with another sixteen new buildings. [29] The funds spent on the Trịnh lord's palaces were carefully not recorded but must have been comparable to those used for the king's residence. Government offices were enlarged and renovated. An example was the enlargement of the Chiêu Sự Hall of the Trịnh lord in 1663, where gold and red lacquer was extravagantly utilized. [30] Together the Vietnamese capital made an impressive sight for De Rhodes, who described Kẻ Chợ as "a very large, very beautiful city where the streets are broad, the people numberless,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walls at least six leagues around". [31]

Because the Trịnh lord did not monopolise the silk trade, enough space was left for ordinary people to make profits. In 1644, for example, among the raw silk the VOC purchased from Tongking, only 21% was bought from the Trịnh lord and the local mandarins, and about 80% was bought from the local people. [32] Income from silk production was about 39 *piculs* (or 2,331 kg.) of rice, enough for a household of five to live on. [33] The silk income mainly flowed from the coast to the regions around the capital area, and these were the areas where concentrated construction occurred. In the absence of information on civilian residence construction, the steles recording constructions and renovations of temples (*chùa*), communal halls (*đình*), markets, bridges and ferries suffice to show that there was a construction boom in Tongking between 1500 and 16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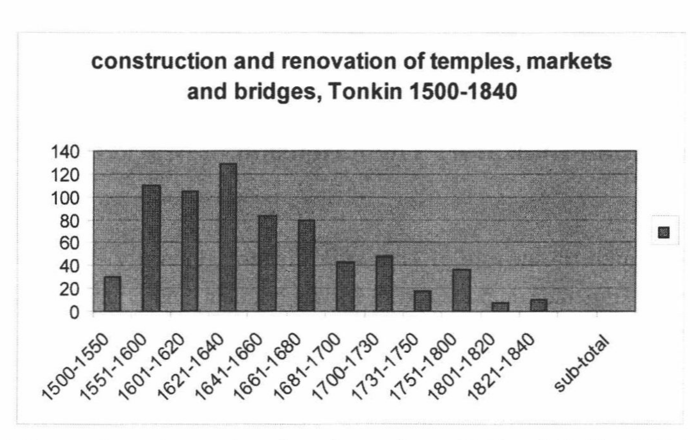


Fig 1: Construction and renovation of temples, markets and bridges in Tonking 1500-1840

What was also remarkable is that the most rapid growth in construction occurred in the neighbouring provinces of two major urban centres - Hanoi and Phố Hiến – rather than in the two centres themselves. Construction in Hải Dương and Hưng Yên provinces was five times more than that of Hanoi, while Bắc Ninh province doubled Hanoi, and Hà Tây equalled that of Hanoi. [34] This suggested that there was fairly large volume of capital available in the society. Tongking's urbanization in the Age of Commerce thus was represented more by the mushrooming village markets, more extensive market networks and more frequent exchanges, than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 cities. The reason that these provinces saw the most remarkable growth was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seventeenth-century silk production in Tongking was that the producers were not producing household surplus but were manufacturing for the overseas markets. Although the producers continued to live in farming households, they specialised in parts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relying on markets. The markets will be the focus of the section below.

The Second Indicator: The Extension of Markets

Although the people of Tongking did not generally engage in sea commerce, the trade on ports and rivers was frequent, and profit considerable, according to De Rhodes.

> Yet without leaving the Kingdom … merchants do a lot of business, thanks to the convenience and multitude of the ports, and in a manner so advantageous for them that they double their capital two or three times in a year without running the risks so common everywhere at sea. For along all the coast of the Kingdom of Annam, extended for more than 350 French leagues, you count a goodly fifty ports, able to welcome at least ten or twelve large ships, at the mouths of so many rivers. [35]

Markets proliferated around the country – village markets, district markets, morning and afternoon markets - when the pace of production was quickened. Most of them appeared around the ports and rivers. On the Red River, according to Nguyễn Đức Nghinh, in a distance of mere 10 kilometres, "there was a whole string of riverside markets." [36] The dense network of waterways in the Red River Delta facilitated travel, trade, and transport of heavy and cumbersome merchandise.

Travel by land also became frequent and easy, facilitated by many inns or guesthouses which mushroomed during this Age of Commerce. A map of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was accompanied by an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routes and suggestions for places to stay, not unlike the *Lonely Planet* these days: [37]

> Find a nice day to start your journey from the capital, in the early morning. Travel for a day and you stay in the (*quán*) Lễ Inn, second day in the Cót Inn, third day in Cát Inn, fourth day in Vạn Inn, fifth day in Bò tục Inn, sixth day in Hoàng Mai, seventh day in Sò Inn, eighth day in Vinh Market (Chợ), and the ninth day at Nhà Bridge (Cầu). On the 10th day you stay in Lạc Inn, 11th day in

Khe-lau Inn; 12th day in Phù-lưu Market, and on the 15th day and a half you stay in Lũ-đăng Inn.

These inns seemed to suggest the existence of fairly dense and evenly distributed regional marketing networks. This contrasts with the density of the market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Vietnam in the year 1417, recorded by the Ming documents. According to this source, there was a rough average of one market in every 50 villages, with great variation between the coast and the upland regions. On the coast where markets were more easily found, the density of markets was an average of one market per 10 villages. [38] A great many village markets emerged and thrive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ccording to Nguyễn Đức Nghinh, the surviving documents suggest that 15 out of 17 temple markets came into be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39]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 a Vietnamese scholar who has done research on 1063 inscriptions found in Kinh Bắc (today's Bắc Ninh and Bắc Giang provinces),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majority of markets in Kinh Bắc recorded in stele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during this "peak of the commercial economy in pre-modern Vietnam." [40] The average of village markets of her data gives us one market per 4.4 villages in this province. [41]

Village markets mushroomed because of the rapidly growing need for exchange. Producers of raw silk, cotton and cotton thread for example needed markets to sell the products, and some markets were established to cater to that need. [42] Establishing a market was also a relative quick way to obtain cash income. According to a seventeenth- century inscription of a market in Hanoi suburb, textile sellers were to pay 5 *tiền* (60 cash) per head, and each pork stall had to pay 2 *quan* (1200 cash). These rules however were applied to the traders from outside only, while the host villagers enjoyed a total or partial tax exemption. [43] Since a market was an income generator for the village in which it was located and the main purpose was to attract traders from the outside, villagers were keen to set up markets in their own villages but careful to avoid overlapping with the market days of the nearby villages. The folkloric saying in the region near Nam Định thus goes:

On the 1st and 7th days go to Luong market,
On the 2nd and 6th, to Ninh Cuong, on the 5th and 9th to Dong Bien.

The 4th and 10th are market days at Con Cham,

On the 3rd and 8th days, it's the turn of Don and Trung.

At Hom Dinh, the market is crowded in the morning,

While Phe Sau is full toward noon and so is Cau on the riverside.

Nearby is Phuong De, while Dau opens in the morning.

On odd days let's go to Con Coc, and on even days to Dong Cuong.

O traders, Quan Anh is full of markets where you can buy and sell! [44]

The development of handicraft villages, together with advantageous land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gave rise to many trade markets and trade villages in Kinh Bắc. The Đoan Minh pagoda in 1693 said that "we had a Buddhist market from the previous dynasty [i.e. Mạc] which met 12 times a month to sell earthen wares and ceramics. Traders piled up their stocks in mounds, wealth and goods were always in circulation. Each and every household had its own kiln to make utensils, and each autumn there was a festival for celebration". [45]

Because of the financial benefit the village markets brought in, conflicts occurred frequently over the possession of a certain market. For example, when the villagers of Cổ Loa determined to fight a lawsuit over the ownership of the market against the neighbouring village of Duc Tu, they agreed that "the population of Cổ Loa unanimously pledged to see the lawsuit through to the end, whatever the costs." Should the lawsuit be lost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ổ Loa were flogged at the court, "the population of the village would raise money to indemnify them, at the rate of 2 *tiền* (or 120 cash) for each lash he received." [46]

The number of vendors must have mushroomed. Again De Rhodes had a unique way to measure them, by way of counting the betel-nut traders in Thăng Long:

> The more comfortable people have servants who prepare the packet [of betel nuts], but to supply the rest of the people … who have no one in their service to prepare it for them, we count up to 50,000 dealers who for a modest price sell it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town; from which it is necessary to conclude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buy it is inestimably great.

Most, if not all of these betel-nut vendors would have been women. To have good business, as a Vietnamese proverb goes, the best place is close to the market, and the second best is close to a river (*Nhất cận thị, nhị cận giang*), so travel became important. A government edict of 1663, which issued 47 rules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confirms that travel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life for ordinary people. These rules include Number 20, "Inns should be careful not to provide venues for illicit sexual activities, while not rejecting guests who are seeking accommodation". Rule Number 18 also related to lifestyle in the public space: "Men and women are not to indulge themselves in sexual debauchery (肆淫風)." [47]

The picture of women busy along the rivers or crossing on ferries was portrayed by Tú Xương, a Vietnamese writer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he described his wife as follows:

> All year round you are busy trading at the riverside,
>
> Earning enough to feed 5 children and one husband.
>
> Sleeping alone, you toss and turn in bed,
>
> Crossing on the ferry, you chat happily on the river. [48]

The more relaxed atmosphe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ilk production and commerce "gives great liberty to the young women, who offer themselves of their own account to any strangers, who will go to their price (from 5 to 100 dollars)." [49] This was not unlike, in the eyes of the VOC factors, their colleagues in Japan who enjoyed Japanese wives, or the company employees in Ayutthaya who courted and lived with the Siamese and Mon women. As Reid points out, interracial unions were a feature of all the commercial cities of Southeast Asia. [50] It was those women traders, according to Olga Dror, who were able to travel around the country protected by Liễu Hạnh's cult. [51] This female deity, a singing girl, a *geisha*, or a prostitute when she was alive, emerged from the coast as a most powerful female spiri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t least as potent as other male deities.

The Third Indicator: The Thriving *đình*

While the impact of silver was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of the society, it is even easier to trace the silver used for the founding of *đình*. The *đình*, we are told, was a communal hall, and both a product and the symbol of the ancient and autonomous villages in which they were situated. Yet, the earliest stele inscriptions found in a *đình* only goes back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most of the *đình* were founded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nward. This contrasts sharply with Buddhist temples, where stele inscriptions go as far back as 618 AD. [52] 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the *đình* in other words, indicate their rather late founding dates, and can hardly support the view that these symbolise the ancient villages.

There were indeed *đình* before the sixteenth century but they were shelters for travellers, which reflect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亭 (pavilion), [53] built along the route to allow travellers to rest. The *Annam chi lược* (a brief history of Annam), compiled in 1333 CE, lists a *đình* called Phấn Dịch (粉驛亭 , "A courier station/pavilion in pink colour or painted"). Under this entry it explains: [54]

> Because the [country] is hot, there are often pavilions (*đình*) built along the big roads (通衢) to rest the travellers. Before the first Tran king became a king as was still but a teenager, he met a Buddhist monk who predicted that he would become influential when he grew up…when he became the king, he ordered that every *đình* in the country build a statue of Buddha in thanks to the monk. [55]

From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 can glean that before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đình* was a simple building combining the functions of resting-place for travellers and courier station. The official Ming documents in the year 1417 recorded 339 courier stations 驛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Vietnam. [56] Some of them likely overlapped with pavilions (*đình*) or indeed were the pavilions themselves. [57] It also suggests that no deity had existed in the *đình* or

pavilions before the Trần Dynasty. The fundamental and earlier function of *đình*, in other words, was to assist in linking different places through travel and trade. This extroversive nature of the early *đình* was overwritten by the scholar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ho emphasised the nature of the *đình* as a property possessed by only the villagers within a certain community, as against other communities. The locations of the *đình* however betray such a view. According to Hà Văn Tấn, they were often built along the rivers, and faced towards the river [58] , rather than being in the heart of the village.

The *đình* had its second incarn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hile the earlier *đình* was a simple building with 4 rows of pillar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n they grew larger and began to have six rows of pillars. While inscription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dicate that there were *đình* with thatched roof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nwards a tiled roof was the norm. [59] Most importantly, where there was no deity in the *đình*,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n most of the *đình* started to house the *thành hoàng*. This *thành hoàng* is a collective name for thousands of local deities or spirits, so each village could have a different *thành hoàng* in their *đình*. It was from this time that we began to have the earliest sign of the worshiping of tutelary spirits in the *đình*. It was this religious function that attracted followers, and importantly, donations. This led to the further widespread building of *đình*, and from then on the *đình* and their founding dates were recorded in the steles.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s data, for example, suggests that 58% of the *đìnhs* in Bắc Ninh province were buil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rest were built later. [60]

The reason that *đình* suddenly became so popular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as that it opened a glorious way to make a living person, his wife and dead family members, an object of worship as *thành hoàng*. A large number of big donors or their mothers became the *phúc thần* (deity of fortune or happiness) of the *đình* to which they made the donation. [61] Many eunuchs also thus became the "deity of fortune" or the protector of the *đình*, because they donated a large amount of silver to establish *đình* in their native villages. A senior eunuch Nguyễn Thái Duong, for example, donated some 500 taels of silver in 1657 to his village so that a *đình* could be built, and more importantly,

his ancestors could be worshipped alongside the local deity. [62] Before he died in 1667, he donated another large amount of money and land to the three villages nearby, and thus was made the "*thành hoàng*" or the tutelary guardian of the three villages. [63] In 1670 another eunuch Trương Tho Kien donated 120 taels of silver together with land to build a *đình* for the same purpose. The Eunuch General Ngô Lệnh Công also enthusiastically donated money to build two *đìnhs* in 1697.

Here we can clearly see how VOC silver passed into the *đìnhs*. The *capados* or eunuchs were the most feared and hated people of the VOC factors in Tongking. They had the ears of the Trịnh lord and were the ones directly involved with collecting taxes and engaging in negotiations. This put them into the best position to squeeze silver out of the VOC. In 1650 alone, other than the 25,000 taels paid to the Trịnh lord and 10,000 to the Crown Prince, the VOC paid 10,000 taels to the five chief eunuchs. [64]

Not surprisingly eunuchs became the richest people after the Lê-Trịnh rulers, if we take the donations of Bắc Ninh province as examples. Among the donations made to *đình*, temples and other public properties, 44 were made by queens and court women, 71 were made by Lê-Trịnh government officers, and 99 were made by the eunuchs. What is really telling however was the quantity of donations. While no officer's donation was more than 8 *mẫu* of land, and the total land of 71 donations by the officers was below 200 *mẫu*, in 1655, one eunuch alone donated 44 *mẫu* and 300 taels of best silver, plus 210 strings of copper coins. [65]

Here we see a crucial income flow from overseas trade feeding almost directly into the founding of *đìnhs*. Much wealth generated or squeezed from the foreign merchants came to the court,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particularly to the eunuchs. A considerable amount in turn flowed from them to serve religious purposes, particularly building and renovating temples and communal halls. Many *đìnhs* could not have been founded without the direct involvement of some of the eunuchs, as the examples above indicate. The most visible avenues of silver disbursement were to two destinations. One went to the constructions of *đình*, and the other to the building of temple markets. Many new temple markets were buil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lthough it

was one of the oldest forms of market in Vietnam. [66]

A large amount of silver flowed into the pockets of the rich and powerful, in other words, wa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đình* and the local religion of *thành hoàng* worship, and in the flourishing of temple markets. Remarkably both establishments were created to generate more financial income to serve religious functions. What is also important here is that Tongking in the Age of Commerce did see the flourishing of a universal religion, in this case Buddhism, as pointed out by Anthony Reid, but along with this development, the worship of local spirits mushroomed, many of them housed under the roof of the *đình*, in this age of religious revolution. In fact, if there was anything remarkable in the religious aspect of Tongking society, it was not the revival of Buddhism or Confucianism, but the emergence and worship of hundreds of spirits. Although about a dozen deities had been worshipped before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Đại Việt [67] ,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aw the flourishing of hundreds of deities, and none had been heard of before. A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veler thus reported: "[Vietnamese] read fairly widely, and are literate, but they fancy strange and wield things··· [They] worship shamans and spirits, not the two religions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68]

The Formation of Village Literati

It is puzzling that the rather rapid commercialisation, easier travel, more frequent mobility, width of choice in local religion and more relaxed social relations which were displayed in seventeenth-century Tongking society, it was to develop into a much more village-based society by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Here a view by a well-known Vietnamese scholar Phan Đài Doãn is worth pondering. He noted that Confucianism of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Tongking was typically rural, which made it different from its contemporary and more urban-based Confucianist counterpart in southern

China. [69] Tongking' s literati of this period also contrasted sharply to their forefathers of the Lý and Trần periods. In those earlier periods the aristocrats were mostly aristocrats and more urban-based.

The dramatic political upheaval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rought drastic changes at the elite level–Lê to Mạc, and Mạc to Lê-Trịnh within half a century, each producing a different group of aristocrats. Here "social disorder" literally and repeatedly occurred. When the Mạc fell, the temples owned by them became the property of villages, as did the temples privately owned by the aristocrats. [70] These village temples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binding villagers together.

The easier access to wealth and to cheap, printed books brought into Tongking by Chinese merchants expanded the size of village-based literati.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onwards the cost of printing in the Yangzi River Delta dropped dramatic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here the Chinese junks that visited were predominantly from Guangdong and Fujian, the Chinese junks visiting Tongking most frequently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were those from Ningbo, the port of the Yangzi River delta and the centre of print culture. [71] Cheap and abundant Chinese books therefor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aising literacy levels and enlarging the base of the literati.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literati revival of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northern Vietnam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rint culture flourishing in the Yangzi River delta. Nor can it be separated from the Japan trade, which was the main driver of the Asian trade in general, and book export in particular. [72] In other words,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village" values of the Vietnamese elites was built precisely upon the mass p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print industry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onward. The books brought into Vietnam by the merchants formed the stock of knowledge, and served as important sources for the newly-developed approaches to textual interpretation, bi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73]

Although the conventional view tends to put literati and merchants at two poles far apart from each other and sharing little, the stele inscriptions indicate that most scholars who passed examinations were from Hải Dương and Kinh Bắc, the two provinces that had the highest level of commercialisation. The

places where the largest percentage of stele inscriptions is found were villages with a more developed economy of handicrafts and trade, [74] rather than purely agriculture-based villages. [75]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the village-based literati was to a large extent the trade and commercialisation of the society during this period.

■ NOTES

[1] Hoàng Anh Tuấn, "Silk for Silver: Dutch-Vietnamese Relations, 1637-1700"(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eiden, 2006); Iioka Naoko, "Literati Entrepreneur: Wei Zhiyan in the Tonkin-Nagasaki Silk Trade" (Ph.D dissertation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9); Olga Dror, *Cult, Culture, and Authority: Princess Lieu Hanh in Vietnamese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for new studies on Vietnamese villages, see Philippe Papin and Olivier Tessier (eds.), *Làng ở vùng châu thổ sông Hồng: Vấn đề còn bỡ ngỡ* [The village in questions] (Hanoi: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Trung tâm Khoa học xã hội và Nhân văn Quốc gia, 2002).

[2]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 *Văn bia thời Lê xứ Kinh Bắc và sự phản ánh sing hoạt làng xã* [The Stelae of the Kinh Bac Region during the Lê Period: Reflections of Village Life], (Hanoi: Bibliotheque vietnamienne-VIII and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3); Đinh Khắc Thuân, *Lịch sử triều Mạc* qua thư *tịch và* văn bia [A history of the Mac through books and inscriptions] (Hanoi: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1).

[3] Hoàng Anh Tuấn, "Silk for Silver", Appendix 3. Hoàng's estimation of average was based on the period between 1637 and 1699, while the annual average would be much higher for the period 1637 and 1680, the period to which this article refers.

[4] Hoàng Anh Tuấn, "Silk for Silver" , p. 181. My calculation is again based on the annual average between 1637 and 1680.

[5] 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11-115. The figure of 2-3 tons came from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with Prof. Souza. My deep gratitude to him for his advice.

[6] Japanese exports of silver to Southeast Asia were 20 tons per year between 1604 and 1629, and the percentage of Red Seal ships which sailed to Tonking was 12.4%. See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ume Two: Expansion and Crisi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8, 24.

[7] This did not include the investment of the English and the French during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8] The silver/cash ratio fluctuated between 1 tael: 2000 cash and 1: 1300 cash, and sometimes dropped to as low as 1 tael: 500 cash in the 1650s, when there was a high inflow of silver from the VOC. See Hoàng Anh Tuấn, pp.178-179. The average ratio was still around 1 tael: 2 quan, as recorded by Phan Huy Chú. See Phan Huy Chú, *Lịch triều hiến chương loại chí* [A reference book of the institution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3 volumes (Hanoi: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1992), 2: 243.

[9] Taxes collected from passes (1732): 26731 *quan*; taxes from ferries (1732): 2737 *quan*; Taxes from markets (1727): 1660 *quan*. Total: 31128 *quan*. Phan Huy Chú, *Lịch triều hiến chương loại chí*, 2:268-270.

[10] Li Tana and Anthony Reid (eds.), *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Nguyễn: Document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ochinchina (Dang Trong), 1602-1777,* Economic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roject (Canberra & Singapore: ANU/ISEAS, 1993), p.118. Silver: cash ratio 1:2 *quan*.

[11] Li Tana, *Nguyễn Cochinchina: Southern Vietna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98), pp. 87-89.

[12] *Văn khắc Hán-Nôm Việt Nam* [Steles in Han-Nom characters in Vietnam] (Hanoi: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1993), pp.27-192.

[13] Liu Chun Yin, Lin Qing Zhao and Tran Nghia (eds.), *Yuenan hannan wenxian mulu tiyao* [Catalogue and Abstracts of Han-Nom textual material in Vietnam] (Taipei: Asia-Pacific Studies Centre, Academic Sinica, 2004), Supplement vol. 1, pp.1-127.

[14]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xvii.

[15] Đinh Khắc Thuân, *Lịch sử triều Mạc*, pp.198-207.

[16]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 2, pp.17-24.

[17] Hoàng Anh Tuấn, "Silk for Silver", pp. 141-142.

[18] The VOC's exports comprised 90 tons of raw silk and 6000 piece-goods in a good year in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Chinese export were equivalent to two-thirds of the VOC figures; the yield and income are based on Hoàng Anh Tuấn, "Silk for Silver", pp.181-182.

[19] John Lossing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7), p. 302.

[20] Cotton thread was made by some specialised villages to supply the textile-weaving villages. Vú Đức Thơm, "Bước đầu tìm hiểu về cây bông trong đời sống của người nông dân trước năm 1945 ở Quỳnh Côi"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cotton planting in peasants' livelihood before 1945], in *Hồi thảo khoa học người dân Thái Bình trong lịch sử*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the people of Thai Binh], (Thái Bình: Bộ phần lịch sử dân tộc, ban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Đảng tỉnh Thái Bình, 1986), p. 417.

[21] Phan huy Chú, *Lịch triều hiến chương loại chí*, 2: 267.

[22]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The Vietnamese Annals] (Tokyo: Tokyo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1984-86), p. 965. Hereafter *Toàn Thư*.

[23] Nishimura Masanari and Nishino Noriko,"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settlement formation in the Red River Plain: a case of Bach Coc and the surround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Vietnamese Peasant Activity: An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Nature', Leiden, 28-31 August 2002), p.10.

[24] Lê Quý Đôn. *Văn Đài Loại Ngữ* [Classified talk from the study], (Saigon: Phủ quốc vụ khanh đặc trách Văn hóa, 1973), vol. 3, pp. 34b-35a.

[25] Lê Quý Đôn. *Văn Đài Loại Ngữ*, p. 40a.

[26] Lê Quý Đôn. *Văn Đài Loại Ngữ* , p. 49b.

[27] Hoàng Anh Tuấn, "Silk for Silver", p. 47.

[28] Alexandre de Rhodes, *Histoire du royaume du Tonkin*, edited by Jean-Pierre Duteil (Paris: Éditions Kimé, 1999), pp. 33-36. My thanks to Nola Cooke for translating the relevant sections for me.

[29] *Toàn Thư*, p. 941.

[30] *Toàn Thư*, p. 975; See also the stele "Nam Giao điện bi ký", no. 161, Han-Nom Institute.

[31] See Solange Hertz (trans.), *Rhodes of Vietnam: the travels and missions of Father Alexander de Rhodes in China and other kingdoms of the Orient* (Westminter, Maryland: The Newman Press, 1966), p. 64.

[32] Hoàng Anh Tuấn, "Silk for Silver", p. 140.

[33] The VOC exported 90 tons of raw silk and 6000 piece-goods in a good year in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Chinese exports were two-thirds of those of the VOC; the yield and income are based on Hoàng Anh Tuấn,"Silk for Silver", pp.181-182.

[34] Interestingly, this pattern is repeated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The 2006 growth rates of

Hưng Yên, Vinh Phúc, Hải Dương and Hà Tây near Hanoi were between 23% and 28.3%; while Bình Dương and Đồng Nai provinces near Ho Chi Minh City were 23.4% and 21.2% respectively. The GDP growth rates of the two major cities were 12% and 11% respectively.

[35] Alexandre de Rhodes, *Histoire du royaume du Tonkin*, p. 58.

[36] Nguyễn Đức Nghinh, "Markets and Villages",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in Vietnam*, edited by Phan Huy Lê et al. (Hanoi : The Gioi, 1993), p.353.

[37] *Thien Nam Tứ chí lồ đồ* [The map of Thiên Nam] compiled between 1630 and 1653, according to Truong Bao Lam. *Hồng Đức bản đồ* [Maps of the Hong Duc reign] (Saigon: Bộ quốc gia Giáo dục, 1962), pp. XII, 72.

[38] *Ngannan tche yuan* (Hanoi: Imprimerie d'Extreme-Orient, 1932), vol. 2, pp. 61-63.

[39] Nguyễn Đức Nghinh, "Markets and Villages", p. 331.

[40]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 *Văn bia thời Lê xứ Kinh Bắc*, p. 166.

[41]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 *Văn bia thời Lê xứ Kinh Bắc*, pp. 166-170. See "諒江府安勇縣玉林社福嚴寺", "集市碑記", "二社共論碑記", and "開市立碑"。

[42] "They sell cotton thread to people outside the county, even those from Hà Đông would come and buy cotton thread here." Vũ Đức Thơm. "Bước đầu tìm hiểu", p. 417.

[43] Nguyễn Đức Nghinh, "Markets and Villages", pp. 328-329.

[44] Nguyễn Đức Nghinh, "Markets and Villages", p. 324.

[45]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 *Văn bia thời Lê xứ Kinh Bắc*, p. 221.

[46] Cited from Nguyễn Đức Nghinh, "Markets and Villages", pp. 326-327.

[47] Toàn Thư, p. 974.

[48] "Thương vơ", Tú Xương(1870-1907):Quanh năm buôn bán ở mom sông, Nuôi đủ năm con với một chồng. Lặn lộn thân cô khi quãng vắng, Eo sèo mặt nước lúc đò đông. Một duyên hai nợ âu đành phận, Năm nắng mười mưa há quản công. Cha mẹ, thói đời ăn ở bạc, Có chồng hờ hững cung như không.

[49] Quoted from Hoàng Anh Tuấn, p. 174.

[50]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ume One: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55.

[51] Dror, *Cult, Culture, and Authority*, p. 81.

[52] Not even one earlier stele inscriptions was collected from a *dinh*. See Phan Văn Các & Claudine Salmon, *Épigraphie en chinois du Viêt Nam = Văn khán Hán Nôm Viêt Nam* (Paris: Press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Hà Nôi: Vien nghiên cuu Hán Nôm, 1998).

[53] Hà Văn Tấn and Nguyễn Văn Kự, *Đình Việt Nam: Community Halls in Vietnam* (Ho Chi Minh City: Nhà xuất bản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1998), p. 75.

[54] Lê Trắc, *Annam Chí lược*, p. 27.

[55] The practice of placing statues of Buddha in the pavilions seemed to have disappeare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erhaps during Lê Thánh Tôn's reign. The oldest *dinhs* existing in Vietnam still do not have any deity. See Hà Văn Tấn and Nguyễn Văn Kự, *Đình Việt Nam*, p. 83.

[56] *Ngannan tche yuan*, vol. 2, pp. 61-63.

[57] Hà Văn Tấn insists that two types of *đình* existed before the sixteenth century: one was resting pavilions and the other communal halls. His evidence was that the former did not have accommodation facilities. But as the name "*Phấn Dịch Đình*" recorded in 1333 for a *đình* attests, pavilions (*đình*) and courier stations (*dịch or tram*) wer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Courier stations in the Ming period did provide free accommodation, food and transport labour to those bearing travel permits, and were spaced along routes every 60 to 80 li (35-45 kilometers). See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p. 35.

[58] The *Toàn Thư* records that in 1522 the Lê king stopped at a *đình* on his way into exile. *Toàn Thư*, vol. 2, p. 828. Hà Văn Tấn and Nguyễn Văn Kự, *Đình Việt Nam*, p. 80.

[59] Hà Văn Tấn and Nguyễn Văn Kự, *Đình Việt Nam*, p. 82.

[60] My calculations are based on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 *Văn bia thời Lê xứ Kinh Bắc*, pp. 573-587.

[61] For example, the "Hau than bia ky" in the year 1682, in Mai Dinh village, Hiep Hoa district, Bac Ha prefecture, see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 *Văn bia thời Lê xứ Kinh Bắc*, p.574; the "Phùng sự hầu thần", of 1694, No. 3905-3912-13; the "Cảm ơn duc bi" of 1683 in An Tru village, Lương Tài district, Bắc Ninh province, no.6008-11; "Phùng sự hầu thần bi", No.3905; 3912-13 in Hán-Nôm Institute.

[62] No.2355-56, Hán-Nôm Institute, "Hung tao Minh dinh bi"; also see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 *Văn bia thời Lê xứ Kinh Bắc*, p. 610.

[63] No.2345-47, Hán-Nôm Institute, "Vinh tran am bi";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 *Văn bia thời Lê xứ Kinh Bắc*, p. 612.

[64] Hoàng Anh Tuấn, "Silk for silver", p. 90.

[65]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 *Văn bia thời Lê xứ Kinh Bắc*, p. 610.

[66] In 1632, for example, the marquis of Van Nghien from Hải Hưng founded a market and offered it to a pagoda; in 1650 another marquis named Võ also bought a plot of land to

set up a market which was later donated to a pagoda. Nguyễn Đức Nghinh, "Markets and Villages", p. 333.

[67] See Lý Tế Xuyên, *Yuedian youling ji* [Việt Điện U Linh Tập, Compilation of the potent spirits in the Realm of Viet], in *Collection Romans & Contes du Vietnam écrits en Han* (Paris-Taipei: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Student Book Co. Ltd, 1992), serie II, vol. 2.

[68] [Qing dynasty] Li Xiangen李仙根,"Annan zaji" 安南雜記 [Miscellaneous notes on Annam], collected in *Congshu jicheng chubian: Annan zhuan ji qita erzhong* (Shanghai: Shangwu Press, 1937), p. 2.

[69] Phan Đài Doãn,"Introduction", in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 *Văn bia thời Lê xứ Kinh Bắc*, p. 208.

[70] Đinh Khắc Thuân. *Lịch sử triều Mạc*, p.237.

[71] 1689: April 28 (ship no. 42): statement of Lin Ganteng: There were two ships which visited Tongking from Ningpo in the March-April period. Another statement by Jiang Chouquan from Xiamen (ship no. 44) said that the two ships would soon head back to Ningpo. See Chen Chingho, "Chinese Junk Trade at Nagasak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New Asia Journal, no.1, vol. 3 (1960): 273-332. 250. For other references to ships trading to Nagasaki from Tonking, see Kai-hentai華夷変態 (Tokyo: Toyo Bunko, 1958):1690: ship no. 87 (June 22) Ningpo ship, came from Tongking. (vol. 2, pp. 1285-86);1691: ship no. 18 (Jan. 27), Ningpo ship from Tongking (vol. 2, pp. 1316-17)；1692: ship no. 59, (May 27), Tongking-Tongking (vol. 2, pp. 1471-72)；1693: ship no. 58, (June 3), Ningpo ship from Tongking (vol. 2, pp. 1565-66)；1698: ship no. 70 (June 16), Ningpo ship from Tongking. (vol. 3, pp. 2022)；1699: ship no. 37 (May 16), Ningpo ship from Tongking. (vol. 3, pp. 2065-66)；1708: ship no. 101 (June 5), Guangdong ship from Tongking (vol. 3, p. 2580)；1710: ship no. 52 (July 10), Ningpo ship from Tongking (vol. 3, p. 2680)；1711: ship no. 55 (June 22), Ningpo ship from Tongking. (vol. 3, pp. 2689-90)；1712: ship no. 62 (July 16), Tongking ship via Putuo Shan. (vol. 3, p. 2690)

[72] Keith Taylor, "The Literati Revival in Seventeenth-Century Vietnam",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VIII, no. 1 (March, 1987): 1-23.

[73]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04-405.

[74]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 *Văn bia thời Lê,* p.228. See also Thinh Liet village in Shaun Malarney, "Ritual and Revolution in Vietnam",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gan, 1993, p. xiv.

[75] "The chief riches,and indeed the only commodity, is silk,raw and wrought" from Samuel Baron, "A Description of the Kingdom of Tonqueen" (1685), in *Views of Seventeenth-Century Vietnam: Christoforo Borri on Cochinchina, and Samuel Baron on Tonkin*, introduced and annotated by Olga Dror and K.W. Taylor (Ithaca: SEAP, 2006), p. 210. According to Hoàng Anh Tuấn, the main silk-producing areas were Sơn Tây, Bắc Ninh, Hải Dương and Sơn Nam. These were also the places from where the highest number of persons passing examinations came. See Hoàng Anh Tuấn, " Silk for Silver", p. 41.

REFERENCES

Brook, Timothy.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Buck, John Lossing.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7.

Chen Chingho. "Chinese Junk Trade at Nagasak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 *New Asia Journal*, vol. 1, no. 3 (1960): 273-332.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The Vietnamese Annals]. Tokyo: Tōkyō Daigaku Tōyō Bunka Kenkyū jo Fuzoku Tōyō gaku Bunken Sentā, 1984-86.

Đinh Khắc Thuân. *Lịch sử triều Mạc qua thư tịch và văn bia* [A history of the Mac through books and inscriptions]. Hanoi: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1.

Dror, Olga. *Cult, Culture, and Authority: Princess Lieu Hanh in Vietnamese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Dror, Olga and K.W.Taylor (Intro. and Annot.). *Views of Seventeenth-Century Vietnam: Christoforo Borri on Cochinchina and Samuel Baron on Tonk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2006.

Hà Văn Tấn and Nguyễn Văn Kự. *Đình Vietnam: Community Halls*. Ho Chi Minh City: Nhà xuất bản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1998.

Herz, Solange (trans.). *Rhodes of Vietnam: the travels and missions of Father Alexander de Rhodes in China and other kingdoms of the Orient*. Westminster,

Maryland: The Newman Press, 1966.

Hoàng Anh Tuấn. "Silk for Silver: Dutch-Vietnamese Relations, 1637-170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eiden, 2006.

Hồng Đức bản đồ [Maps of the Hong Duc reign]. Saigon: Bộ quốc gia Giáo dục, 1962.

Iioka Naoko. "Literati Entrepreneur: Wei Zhiyan in the Tonkin-Nagasaki Silk Trade". PhD dissert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9.

Kai-hentai 華夷変態. Tokyo: Toyo Bunko, 1958.

Lê Quý Đôn. *Văn Đài Loại ngữ* [Classified talk from the study]. Saigon: Phủ quốc vụ khanh đặc trách Văn hóa, 1973.

Lê Trắc. *Annam Chí lược* [A brief history of Annam]. Hue: Viện *đại* học Huế, Uỷ ban phiên dịch sử liệu Việt Nam, 1961.

Li Tana. *Nguyen Cochin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98.

Li Tana and Anthony Reid (eds.). *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Nguyen: Document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ochinchina (Dang Trong), 1602-1777.* Canberra and Singapore: Economic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roject, ANU/ISEAS, 1993.

Li Xiangen. "Annan zaji" 安南雜記 [Miscellaneous notes on Annam]. In *Congshu jicheng chubian:Annan zhuan ji qita erzhong*. Shanghai: Shangwu Press, 1937.

Lieberman, Victor.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Liu Chun Yin, Lin Qing Zhao and Tran Nghia (ed). *Yuenan hannan wenxian mulu tiyao* [Catalogue and Abstracts of Han-Nom textual material in Vietnam]. Taipei: Asia-Pacific Studies Centre, Academia Sinica, 2004.

Lý Tế Xuyên. *Yuedian youling ji* [Việt Điện U Linh Tập, Compilation of the potent spirits in the Realm of Viet]. In *Collection Romans & Contes du Vietnam écrits en Han* (Paris-Taipei: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Student Book Co. Ltd, 1992.

Malarney, Shaun. "Ritual and Revolution in Vietnam".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3.

Ngannan tche yuan. Hanoi: Imprimerie d'Extrême-Orient, 1932.

Nguyễn Đức Nghinh. "Markets and Villages".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in Vietnam*, edited by Phan Huy Lê et al. Hanoi : Thế Giới, 1993.

Nishimura Masanari and Nishino Noriko.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settlement formation in the Red River Plain: a case of Bach Coc and the surrounding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Vietnamese Peasant Activity: An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Nature", Leiden, 28-31 August 2002.

Papin, Philippe and Olivier Tessier (eds.). *Làng ở vùng châu thổ sông Hồng: Vấn đề còn bỡ ngỡ* [The village in questions]. Hanoi: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Trung tâm Khoa học xã hội và Nhân văn Quốc gia, 2002.

Phạm Thị Thủy Vinh. *Văn bia thời Lê xứ Kinh Bắc và sự phản ánh sing hoạt làng xã* [The Stelae of the Kinh Bac Region during the Lê Period: Reflections of Village Life]. Hanoi: Bibliotheque vietnamienne-VIII and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3.

Phan Huy Chú. *Lịch triều hiến chương loại chí* [A reference book of the institution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3 volumes. Hanoi: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1992.

Phan Văn Các & Claudine Salmon. *Épigraphie en chinois du Viêt Nam = Văn khác Hán Nôm Viêt Nam*. Paris: Press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Hà Nôi: 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1998.

Reid, Anthony.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ume One: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id, Anthony.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ume Two: Expansion and Crisi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Rhodes, Alexander de. *Histoire du royaume du Tonkin*. edited by Jean-Pierre Duteil (Paris: Éditions Kimé, 1999).

Souza, George Bryan.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Văn khắc Hán-Nôm Việt Nam [Steles in Han-Nom characters in Vietnam]. Hanoi: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3.

Vũ Đức Thơm. "Bước đầu tìm hiểu về cây bông trong đời sống của người

nông dân trước năm 1945 ở Quỳnh Côi"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cotton planting in peasants' livelihood before 1945]. In *Hồi thảo khoa học người dân Thái Bình trong lịch sử*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the people of Thai Binh]. Thái Bình: Bộ phần li.ch sử dân tộc, ban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Đảng tỉnh Thái Bình, 1986.

A Two–Ocean Mediterranean

Wang Gungwu

Europeans know how important the Mediterranean Sea is in their history. In Asia, historians appreciate that Sea' s connection with the powerful civilizations that arose there. But some are likely also to highlight it as the location for millennia of trading and military actions that ended with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Christian West and core Islamic lands. It was that stalemate between the two civilizations from the 7th to the 15th century that finally led the Europeans to turn to the Atlantic in search of a new route to India and China. After that, new groups of actors emerged to dominate the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for the next five centuries. The West steadily colonized large parts of Asia and brought their brand of imperialism everywhere. During that period, the Mediterranean syndrome of war and division took various shapes and underwent changes arising from relationships that became globalized in increasingly intense ways. Only recently, with the new war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we been reminded that the syndrome is alive both within and beyond its original home, and that it remains the seedbed of power struggles that the world faces today.

For Southeast Asia, the region' s historians have been inspired by Fernand Braudel' s study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some have been ready to compar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two regions. The work of Anthony Reid in

the 1980s o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in Southeast Asia led the way. Denys Lombard then took the subject further and organized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 Méditerranée asiatique" in 1997. Since then, we have also had Heather Sutherland's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very concept of the Mediterranean itself. [1] For most historians, the conditions in Southeast Asia around the Java Se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shortened here as "Nanhai") would make a very imperfect match for that Mediterranean. But the insights provided by Braudel's approach were certainly enlightening and using it to elucidate these maritime areas of Asia has certainly been worthwhile. Thus, interest remains and closer comparisons have become thinkable today. This essay honours Anthony Reid for having drawn attention to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seeking to explain some new developments that now hinge on this region. In particular,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insular and continental states in the emerging regional structure around the Pacific Ocean that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Indian Ocean have become more significant. If they are compared with the Mediterranean syndrome both past and present, there are features that deserve careful examination.

When we simply look at the map, the near-Mediterranean nature of the Nanhai, or Southern Sea, may seem obvious. But when we go beyond maps, the differences stand out. Around the lands of the Mediterranean coasts, for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there were complex struggles for dominance among various civilizations, religions and empires and these struggles dictated developments in every aspect of that region's history. By contrast, for the littoral peoples of the Nanhai, the powerful empires from North China (the Qin dynasty and its successor the Han) had marched south from the great river valleys of the Huang Ho and the Yangzi during the 3rd and 2nd centuries BC, and conquered the small kingdoms and tribal states of the Yue peoples. That empire then stopped at the coasts of modern South China and the Gulf of Tongking, and was content thereafter to control less than half these lands of the northern Nanhai. Thereafter, there were growing but limited trading and cultural contacts across the Nanhai. But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imperial states in the north and the small port kingdoms scattered around the Nanhai coasts did not lead to any developments that could be compared to the centuries of intense activities

around and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before and during this period.

It is, however, possible to point to some features that could be described as potentially Mediterranean or semi-Mediterranean, or if I may coin a word, semiterranean, but these features were to become apparent only later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I suggest that this word can be applied to the later half of the Tang dynasty (8th-9th centuries), especially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10th century when the southern Chinese of the Nan Han and Min kingdoms began in earnest to trade with the region.

For the next five centuries (10th-14th centuries), new trading relationships developed for all the littoral stat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they remained no more than *semiterranean*. It was not until the 16th century that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were extended in various directions and arrived in Southeast Asia. By the 18th century, these conflicts led to some two centuries of colonial rule, followed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by decades of decolonization and the ongoing phenomenon of globalization. [2] The ramif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re still present. In recent decades, seeking a degree of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the region faces new challenges that include the larger Mediterranean syndrome encompassing both the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s. The work of integration is still work in progress. If it fails, Southeast Asia may be drawn into power configurations across both those oceans to its east and west that could resemble the historical divis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This essay suggests why the analogy is thinkable today and why Southeast Asia as a contested region may have critical roles to play in such an extended transoceanic Mediterranean.

My interest in the region began with the broad concept of a "Malay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lay" peoples of the archipelago, and that of the Dutch and British who sought to rule over them. I compared that concept with the term Nanyang (Southern Ocean) as understood by Chinese settlers and sojourners and used in Chinese documents. It led me to write about the trade that the Chinese conducted with the ports and kingdoms on the coas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up to the 10th century. [3] For this trade, I used the term Nanhai (Southern Sea), an indeterminate term found in early Chinese writings. One of my conclusions was that, although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this Nanhai

reminded me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e key ingredients in Mediterranean history could not be found there. I did not consider whether the term Nanyang was equivalent to the region we call Southeast Asia. Instead, I simply described what I thought wer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regio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various Chinese dynasties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Southeast Asia became the term of choice for the emerging region by the time I began to teach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1957. At the new campus in Kuala Lumpur after Malayan independence, the demand was for writing and teaching national history to help build the new state. This history was to be freed from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and located in a yet to be shaped region in the new Asia. At the core, therefore, was th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That was supplemented by courses on East and South Asian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and world history on the other. In the latter, the emphasis was on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developmen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 thus became essential backgroun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laya's national history. Anthony Reid joined the university at the time and played a vital part to ensure that the region's history would be well integrated into the core themes for historic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ince the 1960s,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efforts at defining Southeast Asia, justifying its integrity as a region and underlining its significance. There have also been doubts whether everyone is comfortable with Southeast Asia as a regional entity and whether that entity has a secure future. Understandably, the historians of each country tend to present the region's history in their own way and give uneven weight to the major developments that affected the region as whole. Elsewhere, economic and security analysts regularly complain that, despite the establishment and enlargement of ASEAN in 1967, Southeast Asian governments still do not really think regionally and have not done enough to make the new regionalism effective. Many of them are sensitive to these criticisms but, in their belief that the region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continue to encourage work that would put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on the map.

This essay comes at Southeast Asia from another angle. It draws inspiration from Anthony Reid's research that emphasizes the maritime core of the region when he identified the Age of Commerce and acknowledged the

work of Fernand Braudel on the Mediterranean. Braudel's seminal writings have influenced many others to re-look at Mediterranean-like conditions in the China Seas, the Java Sea, the Baltic, the Caribbean and even in less obvious maritime areas like the two halves of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east and west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hese inquiries have been both stimulating and productive. Tony Reid's two volumes,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and Expansion and Crisis*, testify to the enormous impact that the Mediterranean paradigm has had.

I have written elsewhere about why the Mediterranean complex was not native to the China Seas. [4] It was never the geography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at interested me, but its history. I identified four ingredients of that history that are central to its distinctiveness, factors that propelled the kingdoms and empires that grew out of the Mediterranean to be enlarged far beyond its shores. The ingredients were: (1) The Mediterranean was a central place for multiple civilizations. (2) Its shores attracted intense migratory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3) It spawned empire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maritime power. (4) It sustained tenets of religion and ideology that have determined the nature of lat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5]

In my early work, I brushed aside the idea that the Nanhai littoral in ancient times, made up of China and various Indianized kingdoms and ports, was in any way comparable to the Mediterranean complex. After the tenth century, however, and progressively to the present, including the centuries that have been seen as the age of commerce,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more *semiterranean* can be discerned. South China became economically more active after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When that dynasty fell in 907, a number of independent southern kingdoms were established that took new initiatives in the Nanhai. It is possible to date the emergence of *semiterranean* conditions from that time. The powerful kingdoms and empires among the littoral states developed regular trade and tribute relationships, but were only tangentially engaged across what was geographically fragmented and one-sided space. They did not produce the forces and compulsions that drove the Mediterranean states and cultures to become an inseparable complex. [6]

In re-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and cultures who lived on these

shores, we can say that the Nanhai was potentially two smaller *semiterranean* zones, the South China and the Java Seas, that could, given a strong push, have produced Mediterranean characteristics. The Mongol imperial explosion from Eurasia that led to naval attacks on Java and Japan at the end of the 13th century, for example, could have produced such a push. [7] But it was not sustained and, in any case, failed to leave any lasting impact on the region. This was still true a century later when the Ming Emperor Yongle sent Zheng He in 1405 on the first of his seven expeditions to the Indian Ocean.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remained one-sided when, three decades later, the Ming court decided to disband its navy and effectively withdrew to defend its coastal boundaries. [8] For some, that series of imperial displays of overwhelming force may be seen as a preview of what was to come when, after 1498, European naval power began to be applied continuously to most of Asia. But I suggest that would be an anachronistic reading that could be misleading if pursued further. Nothing in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mid-15th century till the end of the 19th could be depicted as having any push towards naval aggression.

What burst out from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however, was a new kind of power that told a different story. It stimulated an increasingly global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sustained use of aggressive maritime power. The story had begun with alternating power centres that spanned the Mediterranean coasts of the three continents of Europe, Asia and Africa for millennia. There had developed patterns of change that produced the unending struggles between the Greco-Roman-Christian world and the Arab-Islamic ummah. The hinterlands of these two forces were *united* and divided in turn by that inland sea but, across the centuries, the Mediterranean complex did represent an extraordinary exampl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This wa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asymmetry found in the Nanhai where China's power and wealth was overwhelming on the rare occasions when the Chinese state took an interest in maritime affairs. Instead, it was the exhilarating but diffuse Indian Ocean cultures that exerted more influence on local populations over the centuries. From the sub-continent, they came to dominate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the languages and scripts, the gods, and rituals, the music and dance in most of the Nanhai. In time, the situation became one of a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asymmetry that led the region's peoples to lean towards the West. It also reflected an asymmetry that was to remain as long as China was focused on overland security threats in the north, and as long as no grouping of Nanhai states appeared that could challenge the power of China.

Thus it was *semiterranean* commerce, migrat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s that characterized the region. The Malay peoples moved around their island world more intensely and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polities that extended the range of Sri Vijaya and then the Majapahit and Malacca empires. Other migrations overland, by the Viet conquerors of Champa and the Thai rulers of Ayutthaya, pushed southwards, and Ayutthaya developed enough naval power to put pressure on Malacca. Limited numbers of Indian and Muslim merchants continued to come from the west, but the Chola invasions from India, for example, were not sustained. The Chinese, often together with Arabs, traded in larger numbers and, after the arrival of Europeans, the trading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in particular expanded rapidly to all parts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9]

Japanese and Korean traders and sailors joined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from time to time. Muslim merchants from the west also extended the trade they had with the Islamic kingdoms in first Sumatra and Malacca and then in Java, Borneo, Sulawesi and beyond. [10] But the nature of their trade did not radically change until they had to deal with new institutions like the Dutch and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ies. These long-distance trading companies had creatively evolved from the merchant guilds and city states that formed the original frontlines in the centuries of struggle between Christian monarchs and the Moors of the Mediterranean. They were increasingly well-organized and difficult for local polities to defend against.

The rapid Islamization of the Malay world also brought new chang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indu-Buddhist rulers and Islamic merchant enclaves eventually divided the Buddhist mainland from an increasingly Muslim Nusantara,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divisions that characterized the Mediterranean, albeit on a lesser scale. The coming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16th century disrupted the early divisions by introducing Christianity, at least on the eastern periphery of Southeast Asia. Later, with

the advent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secular values, this European impact became even stronger. Most dramatically, this awakened political forces in Japan and added a modern and powerful naval dimension that was rooted in Asia.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combined power of Japan and the West challenged the ancient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China and paved the way to new ideological and nationalist revolutions that totally transformed the region.

Although *semiterranean* Southeast Asia around the Nanhai after the 16th century was still unable to balance the power of China, the region had come alive. This vitality encouraged greater multilateral intercourse. The potential for Mediterranean development was there from the time the Portuguese and Spanish kings ousted their Moorish rivals first in Europe and then challenged them in Asia. The way the Spanish led the way across the Atlantic and were confronted by the Dutch, British and the French could be described as extending the Mediterranean complex and turning the Pacific into something of a Spanish lake. [11] The first change came from the Spanish push out of the Mediterranean into the Atlantic and then into the Pacific. When others even better organized and more determined joined them, a new future began to take shape for the Nanhai. The key development hinged on a new power balance between the European powers and the Qing Empire, although the latter was slow to recognize the shift. It took two so-called Opium Wars in the 19th century to bring that message home to the Chinese, events that were to change the *semiterranean* nature that the region had so far experienced.

The Europeans then built new centres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that linked a strategic network of ports. Out of these came the ring of Western empires that sought to extend their China trade and eventually cooperated among themselves in order to stand up to Qing dynastic power. Beginning from the 19th century, the British led the way to break the barriers that the Manchu regime had put up. Finally, strong countervailing power had arriv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is possible now to see that these were the first steps towards making local *semiterranean* conditions more comparable to those of the Mediterranean, conditions that British empire-builders had so carefully studied.

The maritime empires that emerged after 1800 ensured that interactions between powerful states on opposite coasts were no longer one-sided. The

Qing Empire was counterbalanced by a concert of European powers and this was further strengthened by the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ed by the belated rise of the maritime Japanese empire. During that time, trade volum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increased sharply. The one-sidedness that used to be in China's favour was reversed as foreign imports and investments coming from the powers controlling Southeast Asia began to outstrip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China. Chinese exports increasingly included the outflow of human resources as Chinese labourers swelled the communities in every major port of the China Seas.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rapid decline in Chinese power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native Chinese economy had become so pronounced that many in China feared that the one-sided reversal would become permanent and result in the carving up of China into many parts. Fortunately, the Western powers saw Japanese ambitions as threatening to their dominance and decided to hold the Japanese back. Eventually, the Second World War provided them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vene and restore the balance by helping China in a war that the Chinese could not have won alone. In so doing, that contributed further to create the Mediterranean conditions that local Southeast Asian polities had not been able to develop themselves.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ited China's imperial territories and took the Soviet Union's side in the Cold War, the ideological division of the world was distinctly modern but not all that different in nature from the religious divides that marked the Mediterranean complex. The new secular religions were new versions of the historic Mediterranean divides, but on a much larger global stage. Although the Cold War is now over and the new divides are more complicated, the prospect of continual division along religious or ideological lines remains. The shape of the division is still unclear. On the one hand, the extended role of Islam in the region is less predictable and, on the other, China confounded all expectations in the 1980s by reversing their revolutionary past and successfully building a new kind of state-sponsored capitalism within three decades.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secular but still ideological West has become a subject of intense concern. When China re-emerges as a maritime power, Southeast Asia will certainly face further changes in the global struggle.

These changes may be depicted simply as the logical consequences of Great Power rivalries or as realist applications of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But a deeper change becomes clear by employing the image of the Mediterranean complex. The Mediterranean Sea was the arena where several ancient civilizations contended for power. The sea evoked images of maritime trade and colonization and the waxing and waning of empires down the centuries. Then the Portuguese and the Spanish broke out of the Mediterranean impasse between the Christian and Muslim kingdoms and found new routes to India and China across the Atlantic and via the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s. The Europeans were tired of being at the mercy of Muslim merchants who dominated the routes to Asian markets. After 1492, and especially after 1498, they could finally compete directly with Muslim traders. The unbearable tensions that had confined them to the Mediterranean Sea for so long finally outgrew the limits of medieval technologies and religious divisions. That enterprise did not represent a rupture in European history but was the result of an expansion of a strong historical complex that had long connected the three linked continents of Africa, Asia and Europe, and now added the continent of the Americas.

Obviously there is no exact fit today between the Nanhai and its oceanic extensions on both sides and the region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 For example,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more intense migratory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at have brought the economies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loser together, the strengths of the economies are still very uneven. While there are new maritime centres in the region, they are, with the exception of Japan, still economically dependent on powers much further away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It is possible to identify new versions of religions and ideologies that can shape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But the region by itself is still *semiterranean* because the hinterland of each of the countries is weaker than that of China,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s when the Chinese took an interest in building a credible navy. [12] The multiple 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s that characterized the Mediterranean complex may now be present, but they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still supported from elsewhere. Southeast Asian cultures that are now exposed to modern civilizational divisions still have to draw their strength from the Indian Ocean

or the West. Couched in terms of the ancient conflicts between Christian and Muslim or between Muslim and Hindu-Buddhist, that might appear familiar. But modern secular divisions like the political ideologies of the Cold War have also left deep impressions. And there are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 have compressed beyond recognition the geopolitics of the whole world. It is thus possible to view the Nanhai as a frontline for older and newer maritime powers to face the rise of China. If the larger complex based primarily on the Pacific Ocean (and can now include the Indian Ocean) is compared with the idea of an enlarged Mediterranean, the deeply divisive experiences of that historic Mediterranean complex can become part of the entire's future. That would envisage the formation of a maritime arc from at least Japan to Indonesia that can be backed by powerful hinterlands further away. Distance has become less of a factor as new technologies bring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 Whether we see all this in the end as a matter of compressing the world to be analogous to the Mediterranean complex, or of enlarging the Mediterranean complex to encompass future geopolitics, is not important.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o recognize that the Mediterranean analogy is useful and that studying the long process of historical change between the China Seas and the two Oceans will give u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The Nanhai that was divided during the Cold War resembled that between Christian Europe and Muslim Afro-Eurasia. After the Cold War, with globalization and the military technology now available, an extended divide that is based on efforts to balance greatly enhanced naval power is now evolving. On one side are powers that wish to contain China with multiple alliances; on the other, China and its hinterland are trying hard not to be isolated. It is already a more complicated set of power configurations than any in the past. For example, in place of ideology, there are now divisions along religious lines where the borders are unclear. Faced with the extended role of Islam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eastern limits of Southeast Asia, such divisions will be hard to manage.

In China,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reforms transformed the revolutionary agenda by initiating a capitalistic process that depends on strong state initiative and control. This is still evolving and it is too early to say how this will change

the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in the China Seas. But it is clear that China will never again neglect naval power. It is now determined to become a maritime power if only to ensure its sovereignty, protect its coastal territories and guarantee the sea-lanes that supply the resources essential to its continued economic growth. [13] The impact of such naval power on the nature of the China Seas and beyond is still not clear, but if there is an equivalent countervailing force, however distant across either if not both the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s, the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is extended complex and the Mediterranean syndrome will remain valid.

Using the analogy of the Mediterranean complex may not be reassuring to Southeast Asia. From beyond the China Seas, power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could employ the image of a maritime arc to support an integrated region and set it against possible future Chinese growth. If ASEAN is not integrated, it could be divided between states that link up the maritime arc and those that choose to maintain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a powerful China. That would lead to divisions that would closely resemble the way the Mediterranean is still divided today.

China has great need for a friendly maritime neighbourhood and is working hard for ASEAN integration as a defense against this region being used as a hostile group. If the region does become fully integrated, ASEAN would be empowered to play a pivotal role in keeping the peace for the larger region beyond the China Seas, including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Indian Ocean. If China can convince its neighbours that it is committed to nothing more than the peaceful restoration of its historically secure environment, ASEAN integration would be a valuable development for all concerned.

The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want to maximize their security and ens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most advantageous conditions they can get. They have through ASEAN sought to use the organization to persuade interested parties that this represents the most effective route to regional peace. If successful, they can seek to avoid reproducing the fiercely divisive nature of the Mediterranean complex. But they would not want to return to the asymmetrical *semiterranean* condition before the 19th century. They can do this only by becoming truly integrated and thus having the capacity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China with those of powers that want to keep China out. Only in that way could they ensure that they will not be the instruments of future rival powers.

■ Notes

[1]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a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Libraire Armand Colin, 1949); Claude Guillot, Denys Lombard and Roderich Ptak (ed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China Sea: Miscellaneous Not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8);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 1: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Vol. 2: *Expansion and Cris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1993); and Heather Sutherland,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the Mediterranean Analogy" ,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4, no. 1 (2003): 1-20.

[2] Although this development began with the Portuguese and Spanish monarchs at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it was not until the 19th century that the modern phase of globalization can be said to have started. See K.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1498-1945* (London: Allen & Unwin, 1953);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Wang Gungwu, "The Nanhai Trade: a stud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aya, 1956)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uala Lumpur, Monograph Issue, Vol. 31, part 2 (1958) (New paperback edition published by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in 2003).

[4] Wang Gungwu, "The China Seas: Becoming an Enlarged Mediterranean" , in *The East Asian 'Mediterranean': Maritime Crossroads of Culture, Commerce and Human Migration*, edited by Angela Schottenhammer (Wiesbaden: Harrossowitz Verlag, 2008), pp. 7-22.

[5] The four ingredients are drawn from a range of historie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including the classical works of Herodotus' *History* and Thucydides' *Peloponnesian War*; and modern studies by M.I.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and Max Cary, *The Geographic Background of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9). On later periods, important writings include those by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translated by Franz Rosenth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and the modern studies Henri Pirenne, *Mahomet et Charlemagne*, translated by Bernard Miall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39); and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3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1954).

[6] Paul Pelliot,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Vol. IV (1904) : 215-363; 372-373; and George Coedes, *Les États hindouise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 (Paris: E. De Bocard, 1948).

[7] J. J. Saunders,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1); Tanaka Takeo田中健夫 (ed.), *Kamakura Bakufu to Moko shurai*鎌倉幕府と蒙古襲来 (Tokyo: Gyosei, 1986); Yu Changsen, 喻常森 *Yuandai haiwai maoyi.* 元代海外貿易(Xi'an: Xibei daxue chubanshe, 1994); John Andrew Boyle, *The Mongol World Empire, 1206-1370*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77).

[8] Ma Huan, *Ying-y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Translated by J. V. G. Mil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70). Also Roderich Ptak, *China and the Asian Seas: Trade, Travel, and Visions of the Others (1400-1750)* (Brookfield, Vt.: Ashgate, 1998); Edward L. Dreyer, *Zheng He: 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405/1433*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6).

[9] W.P. Groeneveldt,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rces*, Batavia (1876, republished 1880 in *Verhandelingen v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vol. 39);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2 vols. (Paris: E. Leroux, 1881-1885); Friedrich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a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885); and Friedrich Hirth and W.W. Rockhill,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Zhufan zhi)* (St Petersburg: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1). Also, Paul Wheatley, "Geographical Notes on Some Commodities Involved in Sung Maritime Trade", *Journal of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2:2 (1959): 1-139; and Paul Wheatley, *The Golden Kherso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Malay Peninsula Before A.D. 1500*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1).

[10] Lin Tien-wai林天蔚and Joseph Wong黃約瑟 (eds.), *Gudai Zhong-Han-Ri guanxi yanjiu古代中韓日關係研究* [Studies 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Korea, and Japan in Ancient Times]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7); Charlotte von Verschuer, *Across the Perilous Sea: Japanese trade with China and Korea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Kristen Lee Hunter (Ithaca, New York: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06); and Wontack Hong, *Korea and Japan in East Asian History: a Tripolar Approach to East Asian History* (Seoul: Kudara International, 2006).

[11] O.H.K. Spate, *The Spanish Lake*, Volume 1 of *The Pacific since Magel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9). Chang T'ien-tse,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 (Leiden: E.J. Brill, 1933); K.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Anthony Disney and Emily Booth (eds.), *Vasco da Gama and the Linking of Europe and Asia* (New Delhi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Uma Das Gupta (ed.), *The World of the Indian Ocean Merchant, 1500-1800: Collected Essays of Ashin Das Gupta* (New Delhi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 Lo Jung-pang,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during the Late Sung and Early Yüan Periods",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4 (1955): 489-504; "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Oriens Extremus* 5:2 (1958):149-168; and "Maritime Commer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ung Nav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2:1 (1969): 57-101.

[13] James C. Hsiung, "Sea Power, Law of the Sea, and a Sino-Japanese East China Sea 'Resource War'", in James C. Hsiung (ed.), *China and Japan at Odds: Deciphering the Perpetual Conflic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133-154; Bruce Swanson, *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 a History of China's Quest for Seapower*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Thomas M. Kane, *Chinese Grand Strategy and Maritime Power.* (London: Frank Cass, 2002); Alexandra Chieh-Cheng Huang, "Chinese Maritime Modernization and its Security Implications: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d Beyond" (Ph.D. Dissertation,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4).

References

Boyle, John Andrew. *The Mongol World Empire, 1206-1370*.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77.

Braudel, Fernand.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a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Libraire Armand Colin, 1949.

Cary, Max. *The Geographic Background of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9.

Chang T' ien-tse.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 Leiden: E.J. Brill, 1933.

Chaudhuri, K.N. *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oedes, George. *Les états hindouise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 Paris: E. De Bocard, 1948.

Cordier, Henri.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2 vols. Paris: E. Leroux, 1881-1885.

Disney, Anthony and Emily Booth (eds.). *Vasco da Gama and the Linking of Europe and Asia*. New Delhi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Dreyer, Edward L. *Zheng He: 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405/1433*.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6.

Frank, Andre Gunder.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Groeneveldt, W.P.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rces*. Batavia: W. Bruining, 1876. Republished in *Verhandelingen v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vol. 39 (1880).

Guillot, Claude, Denys Lombard and Roderich Ptak (ed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China Sea: Miscellaneous Not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8.

Gupta, Uma Das (ed.). *The World of the Indian Ocean Merchant, 1500-1800: Collected Essays of Ashin Das Gupta*. New Delhi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Hirth, Friedric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a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885.

Hirth, Friedrich and W.W. Rockhill.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Zhufan zhi)*. St Petersburg: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1.

Hong, Wontack. *Korea and Japan in East Asian History: a Tripolar Approach to East Asian History*. Seoul: Kudara International, 2006.

Hsiung, James C. "Sea Power, Law of the Sea, and a Sino-Japanese East China Sea'Resource War'". In *China and Japan at Odds: Deciphering the Perpetual Conflict*, edited by James C. Hsiung, pp. 133-15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Huang, Alexandra Chieh-Cheng. "Chinese Maritime Modernization and its Security Implications: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d Beyond" . Ph.D. Dissertation,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4.

Kane, Thomas M. *Chinese Grand Strategy and Maritime Power*. London: Frank Cass, 2002.

Khaldun, Ibn.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translated by Franz Rosenth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Lin Tien-wai 林天蔚 and Joseph Wong 黃約瑟 (eds.). *Gudai Zhong-Han-Ri guanxi yanjiu* 古代中韓日關係研究 [Studies 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Korea, and Japan in Ancient Times].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7.

Lo, Jung-pang.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during the Late Sung and Early Yüan Periods".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4, (1955), pp. 489-504;

Lo, Jung-pang. "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Oriens Extremus* 5, no. 2, (1958): 149-168;

Lo, Jung-pang. "Maritime Commer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ung Nav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2, no. 1 (1969): 57-101.

Ma Huan. *Ying-yai sheng-lan:'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Translated by J. V. G. Mil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70.

Panikkar, K.M.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1498-1945*. London: Allen & Unwin, 1953.

Pelliot, Paul.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Vol. IV (1904): 215-363; 372-373.

Pirenne, Henri. *Mahomet et Charlemagne*, translated by Bernard Miall.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39.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tak, Roderich. *China and the Asian Seas: Trade, Travel, and Visions of the Others (1400-1750)*. Brookfield, Vt.: Ashgate, 1998.

Reid, Anthony.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 1: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Vol. 2: *Expansion and Cris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1993.

Rostovtzeff, M.I.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Runciman, Steve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3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1954.

Saunders, J. J.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1.

Spate, O.H.K. *The Spanish Lake*, Volume 1 of *The Pacific since Magel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9.

Sutherland, Heather.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the Mediterranean Analog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4, no. 1 (2003): 1-20.

Swanson, Bruce. *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 a History of China's Quest for Seapower*.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Tanaka Takeo 田中健夫 (ed.). *Kamakura Bakufu to Moko shurai* 鎌倉幕府と蒙古襲来 . Tokyo: Gyosei, 1986.

Verschuer, Charlotte von. *Across the Perilous Sea: Japanese trade with China and Korea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Kristen Lee Hunter. Ithaca, New York: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06.

Wang Gungwu, "The China Seas: Becoming an Enlarged Mediterranean". In *The East Asian 'Mediterranean': Maritime Crossroads of Culture, Commerce and Human Migration*, edited by Angela Schottenhammer, pp. 7-22. Wiesbaden: Harrossowitz Verlag, 2008.

Wang Gungwu. "The Nanhai Trade: a stud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aya, 1956,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uala Lumpur, Monograph Issue, Vol. 31, part 2 (1958) (New paperback edition published by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in 2003).

Wheatley, Paul. "Geographical Notes on Some Commodities Involved in Sung Maritime Trade". *Journal of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2:2 (1959): 1-139.

Wheatley, Paul. *The Golden Kherso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Malay Peninsula before A.D. 1500*.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1.

Wong, R. Bin.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Yu Changsen 喻常森. *Yuandai haiwai maoyi* 元代海外貿易. Xi'an: Xibei daxue chubanshe, 1994.

The Concepts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Southeast Asian Archipelago

Denys Lombard

Our concepts of space and time are highly useful in our daily lives and are, moreover, ingrained in our history. Hence it seems almost impossible for us to understand any phenomenon in our own culture or any other without first defining it by placing and dating it, thereby relating it to other phenomena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ndowing it with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is way of thinking goes back far into the past.

The Greeks already had the idea of progression - and history - as well as an autonomous notion of space that was sufficiently developed to allow for both geometry and geography. Subsequently Christianity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wards consolidating our idea of linear time by giving a meaning to the life of the individual (through reflecting on its finality) and by tracing the collective adventure of the human race from a starting point at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o a conclusion at the Last Judgment.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scientific thought and the ideology of progress have not challenged the primacy of either concept, and while some of Einstein' s ideas clearly called them into question, it is obvious that these ideas have been swept along with the encroaching tide of modernity.

We well know – as research has shown – that our Western societies have not always held such definite opinions on this subject. For a long time there were quite complex views about an after-life, whether in space or time. Where did souls go after death? Whereabouts in space could purgatory be situated? The world was only mapped through a long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 Pilgrimages were contemporaneous with voyages of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 Europe too has known the millenarian upheavals that can be seen today in certain countries in the throes of decolonization. Not so long ago in the privacy of our homes makeshift shamans used Ouija boards in their attempt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dead, and we know that astrology and numerology still flourish at the very heart of the most developed urban societies. At this point one could simply accept that different conceptual systems can overlap or exist in juxtaposition, but in general we prefer to consider these concepts as 'residual' aberrations. In contrast with them, our pure concepts of space and time seem all the more precious and indispensable.

There is some interest in trying to look at another way of perceiving things, in a region of the world whose history has been very different. The Southeast Asian Archipelago lies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 great Asian cultures of India, Islam and China, yet it has retained a strong Austronesian identity. Contact with the West was established there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first Portuguese (Afonso de Albuquerque captured Malacca in 1511), but the real confrontation with Western ways of thinking began much later, with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Netherlands Ind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religious missions (which had been forbidden by the Dutch Company before that dat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schools. We are not concerned here with the details of this confrontation, which was rendered even more intense by the achievement of independence (in 1949 for Indonesia, 1957 for Malaysia) and exposure to a much more diversified 'Western' culture. Our main concerns are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first signs of an Islamic 'modernity', which can be discerned fairly clearly from the 15th century in the societies of the great sultanates of the port cit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retention of a much more archaic concept in the agrarian societies in the interior, notably in Java, in which the notions of space and time still seem to converge.

First of all a few words on the great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that affected the Archipelago as well as the rest of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centuries that preceded the arrival of the first Portuguese. No doubt these changes followed in the wake of major transformations that took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networks-disruption of the route through Central Asia that had been so important under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the Mongol system. This era saw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ime route linking the China Sea to the Indian Oce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great agrarian cities of the interior (Pagan, Angkor, Majapahit) and the flourishing of a new generation of cities situated on the coast (Malacca, Aceh, Banten) or on a river close to the sea (Pegu, Ayutthaya). [1] This radical change in urban cartography was accompanied by a progressive increase in the use of monetary systems (the import of Chinese copper cash, then the minting of gold or tin coins in situ) and of course important social changes: traditional hierarchies began to be challenged and new clienteles were established (together with a new dependency based on debt.)

This phenomenon took place over at least three centuries – from the 13th to the 16th century. It was accompanied by a radical change in ideologies. Hinduism, often associated with Mahayana Buddhism, had inspired the great monuments in the most ancient cities in Cambodia and Java (and as we know, retained its hold in Bali). Now these two ideologies were gradually replaced by two new religions: Theravada Buddhism in most of the countries of Indochina (Burma, Siam, Cambodia and Laos) and Islam in the Southeast Asian Archipelago.

Comparative research has hardly touched this area, but it is striking to note certain parallels between the latter two ideologies, which are so different in other ways. Firstly, in both cases they place importance on the chronological and the topographical, for example giving an eminent role to great historical figures such as Muhammad and Siddhartha, and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making pilgrimage to the sources of the belief, whether this be journeying on the one hand to Mecca and Medina, or on the other hand to the holy places in Northern India where the Buddha lived during the major stages in his life. Another significant fact is that in both cases the idea of the person is given

greater emphasis. The individual is encouraged to feel responsible and to behave in a moral way in expectation of the judgment which will decide his fate in the afterlife.

The progress made by Islam was particularly marked in the trading sultanates in the west of the archipelago (Malacca, Aceh, Johore, Banten, Demak and Makassar), and inspired a wealth of literature, basically in Malay (written in the Arabic script) but also in Javanese, Bugis and Makassarese. Fairly often these texts were influenced by Arab or Persian models. These could be considered an excellent corpus through which to study the changes in mentality at this time, and especiall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Precise terms can be found in these texts, borrowed from Arabic, to express'time'(*waktu*),'the era'(*zaman*),'the century'(*abad*) and 'the hour'(*jam*). However the most striking novelty is the widespread use of the Muslim calendar. In the epigraphic texts of ancient Java, the year was lunar-solar and, as in India and Cambodia. was calculated as part of an era, called *shaka*, which began in 78 CE. [2]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Islam, in the coastal sultanates the year consisted of 12 synodical months, each 29 days long, counted from the *Hijra*. This implies adherence to a widespread reckoning system and an effort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the events that took place in the Islamic community (*ummah*). Moreover, henceforth the rhythm of the day was marked by the succession of the five prescribed prayers (*subuh, lohor, asar, maghrib and isya*), which served as a means of ordering the day's activities. In addition, while minarets were rare in the Archipelago, the *bedug*, large drums made of buffalo hide, would sound out the hours that were important to the community, somewhat like our church bells.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quite correctly that this lunar calendar which had been introduced by traders is better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city dwellers than to peasants, who need above all to take note of seasonal changes, in the equator as in more temperate climat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 system had positive, almost modern, aspects. Introducing the unchanging regularity of the rhythm of the months (as well as that of the seven-day week) establishe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time is coherent and neutral. Reference to the

almanacs (*primbon*) still in use in Java (and Bali) will show that pre-Islamic time was, on the contrary, fragmentary and heterogeneous, consisting essentially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ments and days that were lucky or unlucky. Their nature could only be identified by a difficult process of calculation. It was much more important 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of the moment, its'density', than to calculate the shortness or length of a period of time, as the success of an enterprise depended entirely on that quality.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a given moment, you would need for exampl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specific tonality of each of the 30 *wuku*, or combinations of seven days each,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d a cycle. [2] Alternatively, taking account of the fact that no fewer than six weeks existed, all of different lengths (seven, three, five, six, eight or nine days), one would need to carefully study the complex interplay arising when days of different cycles coincided. Hence, for example, when *kliwon*, the most important day in the five-day week, fell at the same time as *kajeng* (a day in the three-day week), it was necessary to make offerings to malevolent spirits; but if *kliwon* fell at the same time as *sanescara* (a strong day in the seven-day week) – which happened every 35 days – these circumstances were considered particularly auspicious.

In comparison, the Muslim calendar is extremely simple. It levels all the disparities and, except for Fridays (as well as a small number of major festivals such a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Prophet's birthday) it imposes a regular system of calculating time where man can take the real initiative. This change is even more radical than the Christian system where each day has its 'saint', which to some extent reflects its heterogeneous origins.

The new calendar not only established a homogeneous system for calculating time. In addition, by identifying a beginning and an end to the world, Islamic ideology gave meaning to history. This gave rise to the idea of time moving on, oriented towards a goal, which is found elsewhere in other prophetic religions. There is a strong message about the fleeting nature of material thing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st Judgment in a short Muslim moral tract that probably originated in one of the ports on the north coast of Java in the 16th century:

Nothing is eternal in this world (*ora kekel ing dunya*). Be aware that on the

Judgment Day (*ari kiyamat*) only a rare few faithful ones will be recognized among the true Muslims. [4]

A similar idea appear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7th century in an important tract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Kings' Crown* (*Tāj us-salatin*) written in Malay in Aceh or Johore:

> Man is a traveler (musafir) who must pass through several stages – his father's loins, his mother's breast, then a third stage in this lower world, then the grave, then the Judgment Plain, and finally heaven or hell, where he will remain forever.The way open to him is long and difficult, and he can only find provisions on this earth. Once launched, the chariot of his life (*kendaraan umurnya*) rolls on without stopping, and without his being aware of it. Each time he breathes is one more step along the way, each month another league, each year further still. [5]

Probably there is no better illustration of this linear view of time in existence. However in his very fine '*Poem on the Ship*' (*Syair Perahu*), written in Malay in North Sumatra towards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6] Hamzah Fansuri compares life in this world to making a sea crossing:

> Ah, young man, know your true self!
> This ship represents your body.
> Your time on this earth will be fleeting;
> You will only know peace on the other side···
>
> There is no God but Allah, and you are following him.
> The wind is roaring, the seas are tempestuous,
> Whales and sharks are pursuing you...
> Make sure you hold tight to the tiller, don't falter!
>
> If you can always be vigilant
> All these tempests will die down.
> There will be calm after the storm,
> You will land safely on the island···

A new concept of the past and a new historiography were developing that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is new concept of human progress. In particular, there was a marke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ilsilah*, or genealogies, that link up the

generations in long chains, giving a marvelous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of linear continuity. The importance of lineage in the Archipelago is certainly much more ancient, but Isla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here by privileging paternal descent. Moreover, following this same model Islam introduced the idea of a 'spiritual chain' through the *tarekat* (brotherhood) linking the current sheikh to the founding sheikh (and the founding sheikh to the Prophet).

In addition, in certain sultanates (Makassar, Bima and the island of Sumbawa) court scribes began to maintain 'daily diaries' where they kept note of the sovereign's main activities, ships departing or embassies arriving. It is true that this practice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very widespread. The other sultanates generally preferred 'chronicles' that were more or less romanticized, where history was often interwoven with mythology in a complex fabric that sometimes drives historians to despair. [7]

A glorious exception to this rule is the *Sultans' Garden (Bustan us-salatin)*, an ambitious survey of human knowledge in seven volumes written in 1638 in Aceh in Malay. The author, Nuruddin ar-Raniri, a Gujarati, sets out to relate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its creation,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Islamic achievements from the time of Muhammad to the Sultanates of the Archipelago.

Parallel to this developing sense of time, the concept of space also became more precise. Here we will not concern ourselves with the effects of new inventions that were certainly instrumental in changing ma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These would, for example, include the role of firearms, which were well-known in Southeast Asia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Portuguese, especially the 'giant' cannon that various sultans had manufactured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hey were used not so much for firing heavier cannonballs at their adversaries as to sound the alarm, or to announce their demands to the farthermost corners of the land. [8] They would also include the first mechanical objects, such as toys or automatons inspired by distant Alexandrian models that are described in Malay texts, or skilful models of animals portrayed in the first European accounts, [9] which show the desire to imitate nature and by this means control it.

Rather, this study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slow but basic move away

from cosmological to geographical space, or in other words a move away from the mandala to the map. At the margins of the very simplified diagram (a centre and four cardinal directions) that continued to provide the sedentary with a reassuring explanation of the macrocosm, helping them to harmonize their lives in relationship to that concept, gradually topographical contours were beginning to emerge that certainly gave a less stylized picture of a totality, but instead showed one better adapted to the traveller' s needs.

Our information on this subject is still very fragmentary. There seems to be no doubt that the geographical map was in use in the Archipelago before the Portuguese arrived. Unfortunately we have no original examples of this cartography. However we do have a report from Ludovico de Varthema, who states that he traveled from Borneo to Java in 1505 on a native vessel whose pilot had a compass and a map 'where a good many lines were drawn to indicate the winds, in the same way as the maps we use ourselves.' [10] Admittedly one cannot always rely on Varthema. Nevertheless, we also have Albuquerque' s detailed account of a superb Javanese map that he had translated and copied by his pilot, Francisco Rodrigues. The original was lost in 1511 with the rest of the treasure that had been seized in Malacca, when the ship taking it back to Portugal was wrecked. [11]

In 1876, moreover, in the little village of Ciela south of Garut in West Java, a Dutch civil servant named Karel Frederik Holle discovered a very interesting map of the region on fabric that possibly dated from 1560. This precious document has since then disappeared, leaving only the account that Holle published at that time. What is all the more remarkable is that it was not a maritime map, but gave a particularly rich toponymy of the whole centre of the Sunda district. [12]

This new sense of geography is also well-illustrated in several Malay literary texts. In the East Javanese Panji stories from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we can already see a vogue for adventure and travellers' tales, but the hero, who is setting out to search for his beloved Candrakirana, is still part of a fictional universe ruled by magic.

However the 17th-century Malay novel that features the hero Hang Tuah is based in a very realistic world. [13] The task which the Sultan of Malacca gives to

his admiral Hang Tuah is to carry out a whole series of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in places that mostly have well-known place names from which a reader referring to a map can trace out a certain political horizon. For example, relations with the neighbouring trading ports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Malay Peninsula (Trengganu and Indrapura) are rather tense, and Malacca has to resort to force. On the other hand, relations with Palembang (in Sumatra) and the islands in the Straits (Bintan, Lingga, Singapore) are cordial and always peaceful. Further to the east there are two powers that have to be reckoned with: Brunei (on the north coast of Borneo) and especially Java, where Hang Tuah is sent several times, and which seems to be the most dangerous rival. Beyond the Archipelago properly speaking, contacts are maintained with the distant powers. Embassies are sent to China and Siam, Vijayanagar, South India, Mecca and as far as Egypt and Rum (Constantinople), where the Admiral goes to ask the Great Lord for cannon. The author endeavours to give each of the countries visited its special character by adding a little 'local colour.' In Siam there is a humorous touch in descriptions of the swashbuckling Japanese guards, who saunter about 'with their sabres trailing along the ground'; while in Negapatam the author is concerned about the 'outspoken' traders whose arrogance is second to none.

Another text that is roughly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Hang Tuah novel conveys a similar impression. It tells of the conquest of the world by King Iskandar, the propagator of Islam. [14] Of course this is the Malay version of the *Novel of Iskandar*, which follows the hero from one end of the inhabited world to the other, introducing a host of details about distant lands to the Malay readers, who had hitherto known nothing about them. Notable examples are Andalusia; Sicily, home of a terrible volcano whose crater is one of Hell's gates; the great desert in Africa, land of giraffes and ostriches; the land of cotton (between Antioch and Aleppo); the gardens of Kashmir; the copper mines of Central Asia; the forays of Gog and Magog, nomadic peoples against whom Iskandar has a great wall built; China, with its musk. Returning to Egypt, in the end the hero establishes Kandariah, a vast city with numerous palaces honeycombed with underground passageways, a bronze fortress and a high tower (*al-Manar*), equipped with mirrors to keep watch on the ships passing by along the coast.

Of course this is a fictional itinerary and in no way geographically accurate, but what is important here is its interest in the global. The conqueror wishes to go from the 'land where the sun sets' to the 'land where it rises'; and once he reaches the eastern limits of the world he decides to venture into the ocean in order to visit the anti-world (or the world upside down, *dunia balik*), which is symmetrical with our world. To do this he order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rt of bathyscaphe, a great 'glass container' (*peti kaca*) suspended by a cable, in which he has himself lowered into the ocean. Iskandar's curiosity and his drive to confront the unknown purely for the joy of discovery are reminiscent of some 16th century European heroes.

Putting aside all these changes that were informed, if not inspired, by Islam, we now turn to the pre-Islamic system as witnesses saw it in ancient Java and as it still survives in the agrarian societies of the interior, as well as in Bali.

Her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is fairly simple, even if we often have some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all the implications. This principle postulates that all concepts and all perception can and must belong to one of four distinct poles, or more precisely five, as the centre is a privileged place where the elements from the four domains on the periphery must be able to converge and become harmonized. Ac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 then, each of these five points-the centre and the four cardinal directions of North, South, East and West-is associated not only with a deity but also with a basic colour, a metal, a liquid, an animal, a series of letters and one day from the five-day week. Properly speaking it is not space but the totality of Being that is divided up according to a gigantic system linking and harmonizing these five categories (or nine, as sometimes there is the further complication of intermediate directions). To understand this system, a Westerner might think of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the symbolism of precious stones or Rimbaud's 'Sonnet des voyelles.'

A whole technical literature on this subject developed, beginning in the 11th century with the Sang Hyang Kamahãyãnikan, followed by the Korawãsrama (16th century?) and the Manikmaya (18th century) and continues to flourish today, giving rise to the many primbon (almanacs) that continue to appear. Basically this literature is intended to provide the keys to these

'correspondences' so that the world can be deciphered or 'read.' In fact the same word, baca, is used in Javanese for 'interpreting' a phenomenon and 'reading' a book.

Rather than launch into a host of variations, we shall only consider a few elementary examples here. In general the colour white, silver and coconut milk correspond with the East; the colour red, copper and blood correspond with the South; the colour yellow, gold and honey correspond with the West; the colour black, iron and indigo correspond with the North; and finally the centre, which represents the synthesis of the four directions and embodies all their qualities, is linked with blended colour, bronze (which is an alloy) and boiling water (wédang). The days of pancawara, the five-day week, are similarly divided up according to the cardinal directions, with kliwon at the centre (which is generally hel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day). This seems to suggest that time is not seen as an autonomous category, but simply divided up like the other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quintuple system: [15]

	North	
West	Centre	East
	South	

	Black	
Yellow	Multicoloured	White
	Red	

	wagé	
pon	*kliwon*	*legi*
	pahing	

Fig. 1 : *Illustration of the various affiliations among directions, colours and week days*

This study is not the place for a more detailed conside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is system. Nevertheless it posits some fascinating problems and has inevitably inspired some interesting comparisons. [16] Louis-Charles Damais has clearly shown that this identification of five cardinal directions with the five basic colours was in no way influenced by Indian or Chinese symbolic systems, but originated purely from Nusantara. [17] Some scholars have gone further than this in suggesting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must date back to a period when Javanese society was divided into four complementary clans, and it is certainly possible to see parallels with other societies in the region. Others again have gone still further, for example in relating it to the cruciform schema, recalling the words of Saint Jerome: *Ipsa species crucis quid est nisi forma quadrata mundi?* (Can this crucifix form represent anything else than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world?) Similarly, Saint Irenaeus stated that the four gospels corresponded to the four cardinal points. [18]

The matter in question here concerns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a classification on a conceptual level. Since we are accustomed to our own idea of a historical, linear time, it requires effort to imagine a 'time' that is motionless and confined within things. From that perspective, society does not seem to be progressing along a certain path, leaving its past behind. Instead, it grows on itself, driving its past out to the periphery somewhat like onion skin. The dead become 'spirits' (*yang*) and go off into the neighbouring forests where they continue to take part in community life. While the coming of Islam puts an end to this wandering, the spirits still continue to intercede on behalf of the living who come to their tombs to appeal to them.

Perhaps the essential point is that the future is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People have to learn to interpret the 'signs' (pralambang) that can reveal it. There is a very important literature of 'predictions' (*ramalan*) on this subject. [19] Of course these predictions can only be verified after the event, but it is Westerners who feel the need to be skeptical, because their linear view inhibits them, preventing them from interpreting such predictions properly. An interesting study could be undertaken of the 'logic' that is peculiar to this science of deciphering, which is based on etymological interpretation (*keratabasa*) – because words are part of the profound nature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represent – and on numerological calculation (*petungan*) because numbers too are within things, and reveal their essence.

There is a strange little booklet published in 1965 under the title 'The meaning of the sacred numbers' that might give some idea of this way of thinking. [20] The author sets out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significance' of the date 17 August 1945 (17-8-45), which was the date when Sukarno declared the independence of Indonesia. First of all one must calculate a number by multiplying 17 by 8 and then by 45. This gives a number of days (6,120), which corresponds more or less to 17 years. The author then endeavours to build a scale of numbers (periodization) based on the number 17, starting from the 'sacred year' which is 1945. Going backwards in time, this gives 1928 (the year of the Youth Oath) and 1911 (the year of the founding of the Sarekat Islam, an important Islamic movement). Going forwards, 1962 (the year when the Netherlands ceded Western New Guinea) would lead on to 1979, the year when Indonesia would once again become a 'maritime power', and finally 1996, when a socialist regime would be established.

The author's speculations in the area of cartography are even more remarkable than these manipulations of chronology. Here the links between the notions of space and time are still apparent. The author compares Krakatoa (the famous volcano in the middle of the Sunda Strait) and the islands of Sumatra and Java to the axis and two hands of an enormous clock, and states that these two hands point exactly to 10.28 a.m., the moment (in Java time) when Sukarno rea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another example of this type of speculation, he draws an oblique line on a map of Indonesia, passing through the centre of Kalimantan and cutting through the equator at an angle of 17° (still keeping 17 August in mind), and observes that this line goes 'exactly' from Sabang to Merauke, that is to say from one end of Indonesia to the other. There is no better illustration of the link between time and mat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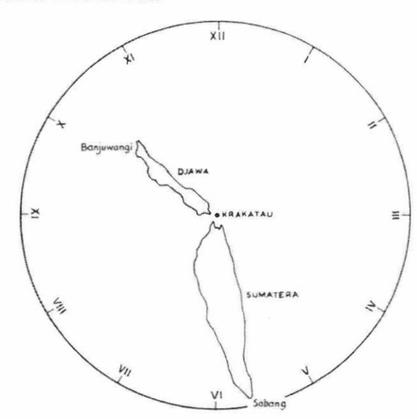


Fig 2: Archipelagic space as a clock of national history (after B. Setiadidjaja, *Arti Angka-angka Keramat bagi Bangsa Indonesia dan Dunia Baru*, Bandung 1965, p. 78)

This is a very simplified exposé. It does, however, show that two radically different systems of space and time coexist in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One of these is very close to our own, and can easily coincide with that system, although its origins are in no way the same. The other system is completely foreign to our way of thinking, but far from being merely 'residual,' is part of a very strong tradition that shows no sign of disappearing. In an era where there is much talk of the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Westernization that often accompanies that development),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these two points.

■ NOTES

[1] For the rise of these new merchant towns see Denys Lombard, "Pour une histoire des villes du Sud-Est asiatiqu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No.4 (1970): pp. 842-856.

[2] Indianists are still divided on the exact nature of the event that put its mark on the year 78CE. In Java there seems to be no memory of such a moment in 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haka* era has traditionally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arrival in Java of a mythical person, Aji Saka, who enriched the culture notably by introducing writing to the island. For a study of the dating system used in the epigraphical texts of ancient Java, see Johannes G. de Casparis, *Indonesian Chronology* (Leiden & Cologne: Brill, 1978).

[3] See Louis-Charles Damais, "Le Calendrier de l'ancienne Java", *Journal asiatique*, CCLV (1967): pp.133-41; also Miguel Covarrubias, *Island of Bali* (New York: A.A. Knopf, 1965. Originally published 1937), p.282ff.

[4] The Javanese text wa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Gerardus Willebrordus Johannes Drewes, *An Early Javanese Code of Muslim Ethic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8). Quoted from pp.14-15.

[5] One of the many manuscripts of *The Kings' Crown* was published by Khalid Hussain, *Bukhair Al-Jauhari: Taj us-Salati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66). A French translation of a different manuscript appeared in the 19th century: Aristide Marre, *Makôta radja-râdja ou La Couronne des rois* (Paris: Maisonneuve,1878).

[6] For Hamzah Fansuri, see J. Doorenbos, *De Geschriften van Hamzah Pansoeri* (Leiden: Batteljee & Terpstra, 1933) and the more recent study by Syed Muhammad Naguib Al-Attas, *The Mysticism of Hamzah Fansurî*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70). For an Italian translation of the *Poem on the Ship* (*Syair Perahu*), see Alessandro Bausani, *Le Letterature del Sud-Est Asiatico* (Milan: Accademia, 1970), pp. 317-321.

[7] In *Archipel*, 20, 1980, the section 'De la philologie à l'histoire' focuses entirely on the problems of 'reading' posed by the Malay manuscripts. This is notably the case in the study by Lode F. Brakel, 'Dichtung und Wahrheit, Some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Indonesian Historiography', pp. 35-44.

[8] For example Augustin de Beaulieu, who went to Aceh in 1619, remarked: 'Every morning and evening the King has cannon fired as the castle gates opened, and if any neighbouring king decided to do the same thing, he would make war on him, saying that he had invented this custom, and wished to keep it for himself alone, to bear witness to his might.' (Melchisédech Thévenot, ed., *Collections de voyages*, vol.2 (Paris: 1666), p. 119).

[9] For example Edmund Scott, a factor in the English post at Banten, gives a long account of the great pageant organized in June-July 1605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ircumcision of the young prince. He describes the animals, artificial as well as living, that were part of the procession:

'beasts and foules, both alive and also so artificially made that except one has been neere, they were not to be discerned from those that were alive…' (Sir William Foster (ed.), *The Voyage of Sir Henry Middleton to the Moluccas, 1604-1606*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3), pp. 152-162.

[10] The text is quoted by Frederik Caspar Wieder in the article 'Kaartbeschrijving' (Cartography) in D.G. Stibbe (ed.) *Encyclopaedi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2nd ed. ('s Gravenhage &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 Brill, 1919), vol.2.

[11] See Armando Cortesão, ed.,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vol.1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4), Introduction, pp. lxxviii-ix.

[12] Karel Frederik Holle, "De Kaart van Tjiëla of Timbangenten", *Tijdschrift v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XXIV (1877): pp.168-76, with separate facsimile. Several Bugis maps have also been preserved, but they seem much more recent.

[13] The *Hikayat Hang Tuah* was translated into German by Hans Overbeck *Die Geschichte von Hang Tuah*, 2 vols. (Munich: Georg Müller, 1922), and more recently into Russian by Boris Parnikel, *Povesti o Hang Tuahe* (Moscow: Nauka, 1984).

[14] There is not yet a satisfactory edition of the *Hikayat Iskandar Zulkarnain*; nor has it been translated. The first part (372pp., up to the conquest of Egypt) was published by Khalid Hussain in Latin script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67). The most useful work is still the study by P. J.van Leeuwen, *De Maleische Alexander-roman* (Meppel: Ten Brink, 1937), which comprises fairly long extracts.

[15] Another sign that gives further evidence of this linking of time with the general system of correspondences is the use of *candrasangkala*, or 'chronograms', which is still highly regarded in Java. The procedure consists of noting the year of an event not with numbers but with words to which numerical values have been attributed. However these words still retain their original meaning, which allows for an allusion to the dated fac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the three Indonesian words *empat* (four), *tempat* (place) and *sempat* (occasion, time of an action) are all etymologically linked and originate from the same root, pat.

[16] Note particularly Patrick Edward de Josselin de Jong (ed.),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in the Netherland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which republished a number of articles on the classifications system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notably Frederik Daniel Eduard van Ossenbruggen, "Java's Monca-pat: Origins of a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System", pp. 32-60; and Théodore G.Th. Pigeaud, "Javanese Divin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pp. 64-82.

[17] Louis-Charles Damais, "Etude javanaise III: à propos des couleurs symboliques des

points cardinaux,"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l'Extrême-Orient*, LVI (1969): pp.75-118.

[18] Van Ossenbruggen, "*Java's Monca-pat*," p. 58, refers to Salomon Reinach, *Orpheus,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religions* (Paris: A. Picard, 1909), p. 320.

[19] Many of these predictions are attributed to King Joyoboyo (12th c.) but they are in fact much more recent. In the 20th c.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these predictions during the most troubled times: 1945-49, the period of the so-called 'Physical' Revolution, and 1965-7, the upheavals following the events of September and October 1965. The predictions give the impression of being an attempt to reassure people by showing that all these changes were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conformed to prophecies.

[20] B. Setiadidjaja, *Arti Angka-angka Keramat bagi Bangsa Indonesia dan Dunia Baru* (Bandung: Balebat, 1965).

REFERENCES

Al-Attas, Syed Muhammad Naguib. *The Mysticism of Hamzah Fansurî*.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70.

Bausani, Alessandro. *Le Letterature del Sud-Est Asiatico*. Milan: Accademia, 1970.

Brakel, Lode F. "Dichtung und Wahrheit, Some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Indonesian Historiography." *Archipel* 20 (1980): 35-44.

Casparis, Johannes G. de. *Indonesian Chronology*. Leiden & Cologne, Brill, 1978.

Cortesão, Armando (ed.).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2 vol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4.

Covarrubias, Miguel. *Island of Bali*. New York: A.A. Knopf, 1965 (Orig. publ. 1937).

Damais, Louis-Charles. "Le Calendrier de l'ancienne Java." *Journal asiatique* CCLV (1967): 133-41.

Damais, Louis-Charles. "Etude javanaise III: à propos des couleurs symboliques des points cardinaux."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l'Extrême-Orient* LVI (1969): 75-118.

Doorenbos, J. *De Geschriften van Hamzah Pansoeri*. Leiden: Batteljee & Terpstra, 1933.

Drewes, Gerardus Willebrordus Johannes. *An Early Javanese Code of Muslim Ethic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8.

Foster, William (ed.). *The Voyage of Sir Henry Middleton to the Moluccas, 1604-1606*.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3.

Holle, Karel Frederik. "De Kaart van Tjiëla of Timbangenten." *Tijdschrift v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XXIV (1877):168-76.

Khalid Hussain (ed.). *Bukhair Al-Jauhari: Taj us-Salati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66.

Khalid Hussain. *Hikayat Iskandar Zulkarnai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67.

Josselin de Jong, Patrick Edward de (ed.).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in the Netherland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Leeuwen, J.van. *De Maleische Alexander-roman*. Meppel: Ten Brink,1937.

Lombard, Denys. "Pour une histoire des villes du Sud-Est asiatiqu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No.4 (1970): 842-56.

Lombard, Denys. "Les concepts d'espace et de temps dans l'archipel insulindien."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No. 6 (1986): 1385-1396.

Marre, Aristide. *Makôta radja-râdja ou La Couronne des rois*. Paris: Maisonneuve, 1878.

Ossenbruggen, Frederik Daniel Eduard van. "Java's Monca-pat: Origins of a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in the Netherlands*, edited by Patrick Edward de Josselin de Jong, pp. 32-6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Overbeck , Hans. *Die Geschichte von Hang Tuah*. 2 vols. Munich: Georg Müller, 1922.

Parnikel, Boris. *Povesti o Hang Tuahe*. Moscow: Nauka, 1984.

Pigeaud, Théodore G. Th. "Javanese Divin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in the Netherlands*, edited by Patrick Edward de Josselin de Jong, pp. 64-82.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Reinach, Salomon. *Orpheus,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religions*. Paris: A. Picard, 1909.

Setiadidjaja, B. *Arti Angka-angka Keramat bagi Bangsa Indonesia dan Dunia Baru*. Bandung: Balebat, 1965.

Thévenot, Melchisedech (ed.). *Collections de voyages*. Paris: 1666.

Wieder, Frederik Caspar. "Kaartbeschrijving." In the *Encyclopaedi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2[nd] edited by D.G. Stibbe. Vol. 2. 's Gravenhage &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 Brill, 1919.

環太平洋史



幕末の薩摩藩主・島津斉彬の薩摩焼輸出

渡辺　芳郎

（日本鹿児島大学法文学部）

はじめに－本稿の目的－

19世紀後半（江戸時代末期（幕末）～明治時代前半）、ヨーロッパを席巻したジャポニスムにより、日本製の陶磁器は重要な輸出品となった。その中でも金彩を多量に施した色絵陶器=金襴手様式のそれは「SATSUMA」の名で愛好される。ただし金襴手様式の産地は必ずしも鹿児島（薩摩）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ではなく、京都や横浜、東京などでも生産された。

一方、幕末の薩摩藩主·島津斉彬（1809-58年、藩主在位：1851-58年）は、欧米列強に対抗するための近代工業化政策「集成館事業」に着手する。その事業内容は、鉄製大砲、西洋船、ガラス製品（薩摩切子）、金属製活字、銀板写真、電信、ガス灯などじつに幅広い分野におよぶ。その中で貿易振興のため、鹿児島在地の焼き物であ

る薩摩焼を改良し、海外輸出を計画したとされている。

この斉彬の薩摩焼輸出計画は、しばしば明治期に輸出された金襴手様式と関連づけて語られることが多いが（たとえば野元1982 p.126など）、実際に斉彬がどのような薩摩焼を輸出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かについては、不明な点も多い。そこで本稿では、近年進展している薩摩焼窯跡の考古学的調査成果を手がかりとしながら、斉彬が輸出しようとしていた薩摩焼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かについて、より蓋然性の高い仮説を提示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たい。

1．文献に見られる島津斉彬の薩摩焼輸出

まず島津斉彬の薩摩焼輸出について伝える文献を整理する。その根拠となっているのは、明治17年（1884）に市来四郎によってまとめられた『斉彬公御言行録』（以下『言行録』と略称）である。市来は斉彬の家臣として集成館事業に深く関わっており、同書は斉彬の事跡をまとめたものである[1]。その中から薩摩焼に関わるものを以下に抽出する（ページ数は岩波文庫版『島津斉彬言行録』1944年より。また以下の引用文中の下線は渡辺による）。

「安政五年戊午ノ夏御逝去ノ前頃マデ六七年間ノ間ニ御開キ相成リ候品目」(p.27)

「陶磁器用ノ釉薬」(p.28)

「磁器製造竈　一基　和洋折衷」

「陶器製造竈　一基　和漢洋法折衷」(pp.49-50)

「陶磁器ノ製造御改良ノ事
陶磁器ノ製造ヲ好マサラレ、御徒然ニハ外御庭御茶屋内ニ製造器ヲオカレ、御手自ラ御製造アラセラレシコトモアリタリ、特ニ苗代川又ハ竪野等ノ製造所モ御奨励相成リ、或ハ集成館内ニモ陶磁器製造場御建設、和漢洋ノ製式ヲ大成シ、或ハ錦手焼ニ用ル釉薬ハ、従来漢洋ノ製品ニテ高価ノモノナル故、洋法ノ製法ヲ御花園精錬所ニオイテ御開キ相成リ、洋品ヲ用ルハ三分一ニ減ジ、従テ器物モ廉価トナレリ、中ニモ金銀色紫色ハ従来其製式拙ナカリシヲ新式ニ改メラレシヨリ大イニ便利トナレリ。
安政四年丁巳ノ秋、肥前佐賀ヨリ御使者来リ、磯御庭ニオイテ拝謁ヲ允サレ、（御使者千重大之介外数名、其内砲術家築城家製錬家等ニテ、専ハラ反射竈或ハ銃薬方砲台等見聞ノ為メナリトゾ）、当日千重ヲ召列ラレ集成館ヘ入ラセラレ、種々御話の内ニ、焼物所ニオイテ千重ヘ御沙汰ノ趣、焼物ハ必用ノモノナレドモ用ニ足スニハ何ゾ美麗ヲ尽スニ及バザルナリ、然レドモ外国貿易追々開ケルニツイテハ、物産開発ヲ先ンゼザレバ其詮ナシ、国産ノ陶器ハ夷人モ称美セリ、仍テ其タメ製造ヲ精良ニスルノ見込ナリ、幸ヒ国産ノ白土ハ（指宿土、霧島土）陶器ニ宜シキ由ナレバ、製造ヲヨクスル時ハ佐賀ノ磁器同様ノ産物トナルベシ（下略）」（pp.68-69）

以上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ようになる。

①斉彬は苗代川·竪野など従来の窯場を奨励するとともに、集成館に陶器製造所を開設した。
②その窯として「和洋折衷」の磁器窯と「和漢洋法折衷」の陶器窯を各１基、築いた。
③「錦手焼ニ用ル釉薬」は高価なのでそれを改良し廉価にした。とくに、それまで拙かった金銀色·紫色は新式に改められ向上した。
④安政４年（1857）に集成館を訪れた佐賀藩士に、外国貿易がはじまったとき、外国人も賞賛する国産陶器は、品質を向上させれば肥前の磁器と同様になるだろうと語っている。

このうち④の記述が、斉彬が薩摩焼の海外輸出を計画していたことを示唆するものと理解されている。後述するように、佐賀の磁器は、17世紀後半～18世紀前半、オランダ船や中国船により海外輸出されており、また天保年間（1830～1843）には、一時期停止していた海外輸出が再開されている。つまり「佐賀ノ磁器同様ノ産物」とは、輸出品のことを指すというわけである。

このほか斉彬と薩摩焼との関係を示唆する史料として、『斉彬公史料』嘉永５年(1852)３月16日の記事に以下のようにある（鹿児島県維新史編さん所編1981　p.497）。

「騎シテ、伊集院苗代川ノ陶磁器製造ヲ覧玉ヒ、錦手焼ノ改良、及ヒ今里（伊万里）焼ヲ創ムヘキノ旨ヲ令シ玉フ」

ただしこの内容は、苗代川の磁器（＝今里焼）生産が、南京皿

山窯において弘化3年（1846）にすでに始まっていることから（後述）、やや疑問が残る。しかし先の『言行録』における「特ニ苗代川又ハ竪野等ノ製造所モ御奨励相成リ」と同様、斉彬が苗代川に関心を寄せていたことの証左にはなる。

また斉彬の陶磁器生産に関連して、苗代川の陶工･朴正官の履歴がある（『繭糸織物陶漆器共進会　陶器功労者履歴』「朴正官」1885年）。苗代川とは、現在の日置市美山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呼称で、17世紀から朝鮮陶工たちによって陶器生産が始まり、現在まで操業を続ける、鹿児島を代表する窯業地のひとつである。苗代川では甕･壺･擂鉢･土瓶などの日用陶器生産が近世を通じて主体であるが、19世紀に入ると藩の殖産興業政策により苗代川振興策が取られ、その一環として磁器や色絵陶器の生産が始まる。履歴によれば、朴正官は薩摩藩藩窯･竪野窯から技術を導入し、苗代川において色絵陶器生産を始めたとされる人物である。彼の履歴中に以下のようにある。

「安政年間藩主斉彬公鹿児島磯御仮屋構内ニ陶器所被召建、陶磁器ノ製造被遊候砌、安政四年六月磯焼物所ヘ御召呼相成、御前ニテ画附ケ方ハ勿論、焼方迄被仰付、画風ヨリ画ノ具色合等の吏迄善悪ノ御沙汰被遊候ニ付、刻苦焦慮シ、漸ク御意ニ叶フ処ニ至リシハ、安政五年三月ナリ。此間数度難有御褒賞等有之。同月二十三日苗代川ニテ盛ニ精工ノモノ製造可仕旨御沙汰被遊御暇被下。同月二十八日帰村シ、夥多ノ御用品製造方指揮シ、又毎月或ハ隔月

一周間計、磯御焼物所へ御召呼、親シク陶器ノ品位御沙汰被遊候間、御暇被下候。」

つまり安政4年6月に「磯焼物所」に呼び出され、「画風」や「画ノ具（絵の具）色合」などについて、斉彬から直接指示を受け、その開発に努力し、成功したと伝えている。さらに以下のようにある。

「元治元年墺国（ママ）万国博覧会出品に付、錦手大花瓶製造可仕旨被仰渡候に付、昼夜精神を苦、画風より着色等御先代斉彬公の御沙汰の趣に基き、生地の出来を待て、百類（数か）十日を費やし、画附方致、新に巨竈を築き焼揚候処、存分の出来にて則鹿児島へ相廻し候処、御賞誉に預り申候。尤墺国博覧会にても各国人の賞誉を得て、此時より薩摩陶器の名誉を海外に顕し候ば承り申候」

ここで「墺国万国博覧会」とあるが、その年代（元治元年＝1864年）から、オーストリア·ウィーン万博（1873年）ではなく、フランス·パリ万博（1867年）の誤記と考えられる。かつての斉彬の指示に基づき「錦手大花瓶」を製作し出品したところ、好評を博し「薩摩陶器の名誉」を得たという。

以上のような文献史料から、島津斉彬は、のちにパリ万博で好評を博し、明治以後、欧米に盛んに輸出される色絵陶器（金襴手薩摩）の基礎となる薩摩焼改良を試みていたという評価が与えら

れている。一方、実際に斉彬が輸出を試みたのは磁器ともされており、その点については、次章で改めて触れたい。

2．考古学資料における斉彬時代の磁器生産

(1) 磯窯における磁器生産

先述したように、斉彬は「和洋折衷」の磁器窯と「和漢洋法折衷」の陶器窯を築いたとされているが、それらが具体的にどのような構造の窯であったかは不明である。しかし斉彬が、鹿児島市磯地区に集成館事業の一環として陶磁器焼成用の窯＝磯窯を開い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現在、磯窯の構造を伝えるのは、安政４年に集成館を訪れた佐賀藩士の見聞を元に描かれた『薩州鹿児島見取絵図』中の窯である。その絵図によれば磯窯は燃焼室＋焼成室10～11室よりなる連房式登窯で、むしろ在来の陶磁器焼成窯を踏襲したものと言える（図１、渡辺2006）。

ところで薩摩焼に関する考古学的研究は、1934年の田沢金吾·小山冨士夫の調査によって始まる。彼らは薩摩焼窯跡２基を発掘するとともに、県内各地の窯跡を網羅的に踏査し、その成果を1941年に『薩摩焼の研究』として刊行している（田沢·小山1941、以下『研究』と略称）。薩摩焼の研究史において画期をなす調査研究である。田沢·小山らは磯窯跡の踏査も実施している（『研究』pp.138-142）。その記述と『薩州鹿児島見取絵図』の描写から、両者は同じ地点と考えられ（渡辺2006）、同窯跡で採集された資料は、磯窯製品である可能性はきわめて高い。報告されている採集資料をまとめると図２になる[2]。

『研究』では、窯跡採集資料において磁器が多くを占めることから、斉彬の薩摩焼輸出の内容は磁器であったろうとし、当時島津家が所蔵していたコンプラ瓶（図３）[3] がその製品であったとしている（p.139）。同様の見解は1934年刊行の前田幾千代『薩摩焼総鑑』において、すでに言及されており（前田1934）、近年の概説書等でもそれを踏襲する記述が見られる（野元1982 p.126など）。しかしコンプラ瓶生産·輸出については、先行する『薩摩陶器伝統誌』（坂田編1926）や、『言行録』では出てこない。またこれまでに発掘調査された薩摩藩内の磁器窯跡は計７例におよぶが（脇本窯跡（阿久根市）、平佐焼大窯跡·同新窯跡（薩摩川内市）、弥勒窯跡·日木山窯跡（姶良市加治木町）、重富皿山窯跡（同市姶良町）、南京皿山窯跡（日置市美山））、コンプラ瓶を生産したことを示す資料は見つかっていない。コンプラ瓶は製品そのものが商品ではなく、醤油や酒を入れるコンテナであり、もし輸出用に生産するとしたら膨大な数を必要とする。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れまで窯跡で発見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から、薩摩における生産は疑わしいもの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であろう [4] 。

ところで現在、磯窯跡の所在した地点は磯庭園内の展望レストランとなっている。そのレストラン下の石垣が、1993年８月６日、鹿児島を襲った大水害の際に一部破損し、その破損箇所から陶磁器片などが採集されている。採集された陶磁器片は合計18点で、うち磁器片14点、陶器片２点、窯道具１点、不明１点である（図４）。磁器片の中に焼成不良品なども含まれ、採集地点からしても磯窯製品の可能性が高い。また採集磁器には、幕末期に多

数生産される端反碗や楼閣山水文を描く染付が含まれ、年代的にも符合する（渡辺2006）。

この14点の磁器のうち、興味深いものが２点ある。ひとつは輸出用洋風皿に近い白磁皿で、釉薬が完全に溶けていない焼成不良品である（図４－11）。もうひとつは器壁の薄い染付碗で、内面に焼成時の降りものが付着している（図４－７）。つまり両者ともに磯窯製品であることはほぼ確実であるが、ともに幕末～明治初期の輸出用磁器と形態的に近い。後者については改めて詳述するが、これらの製品から、磯窯で海外輸出を目的とした磁器を生産していた可能性が推定できる。しかしそれは、先述したようにコンプラ瓶ではない。

(2) 苗代川・南京皿山窯における磁器生産

次に苗代川系窯場に目を転じたい。先述したように19世紀の苗代川振興策により、色絵陶器とともに磁器生産が始まる。この振興策は、斉彬が藩主に着く以前から進められていたが、斉彬もその政策を引き継いだことは、前章で挙げた文献史料からうかがいしれる。

苗代川における磁器生産は、弘化３年（1846）に、先行して磁器を生産していた藩内の平佐焼窯場（薩摩川内市）から技術を導入して開始され、磁器窯·南京皿山窯が開窯する。同窯は明治初め頃まで操業していたと推測される。現在、同窯跡では２基の並行する連房式登窯跡が残っており、2011年の発掘調査の結果、西側の１号窯跡は全長約30m、焼成室＋６～７室の燃焼室よりなり、東側の２号窯跡は全長25m以上、７室以上の焼成室よりなること

が確認されている。ただし両窯体が同時操業していたのか、時期差があるのかははっきりしていない（渡辺·金田2012）。

さてその窯跡より磁土製匣鉢という特殊な匣鉢が採集されている。その特徴は以下の5点にまとめられる（図5·6）。

①匣鉢本体·蓋ともに原料として磁土を使用している（通常の匣鉢は耐火粘土製）。

②匣鉢本体の形態は耐火粘土製匣鉢と同じ円筒形のものもあるが、胴部·底部穿孔例やロクロ成形で高台を有するものなど多様であり、また法量にも変異がある。

③匣鉢本体の外面は無釉で、内面は施釉されているが、内底部中央は無釉である。外底部にも施釉するものがある。施釉の仕方には精粗がある。

④蓋の形態には受け口を作るタイプと、受け口がなく把手を作るタイプがある。

⑤蓋外面は無釉で、内面にのみ施釉する。

現在、この匣鉢を用いてどのような製品を焼成していたかについては、考古学資料からは判明していない。しかしその特殊性（磁土製·内面施釉·形態の多様性など）と、後述する佐賀県有田年木谷３号窯跡との類似性から、量産品ではなく高級品であった可能性が高い（渡辺2011）。

そこで有田年木谷３号窯跡の出土資料について見てみたい。有田を含む肥前地域（現在の佐賀県·長崎県）は言うまでもなく日本ではじめて磁器を生産した窯場であり、近世を通じて日本の磁器生産の中心地である。年木谷３号窯跡は、幕末期に操業していた

磁器窯で、この窯跡より南京皿山窯跡と同じ磁土製匣鉢が出土している（図７、村上･野上編1997　以下、同窯跡に関する記述は同書による）。陶磁器生産において、器形や文様などは、製品の模倣により類似することはしばしばあるが、このような焼成技術の共通性は、陶工の移動などを含む密接な技術交流の存在を示唆している。島津斉彬と佐賀藩主･鍋島直正は母方のいとこ同士であり、またともに近代化事業を推し進めた開明派藩主として親交も深かった。斉彬の集成館事業に際して、直正は斉彬に反射炉や熔鉱炉の構築方法を記したオランダ書の訳書を贈呈している（『言行録』p.41）。そのような関係から、南京皿山窯跡の磁土製匣鉢およびその製作･使用技術も、有田からの技術導入による可能性が考えられる。

年木谷３号窯跡からは「卵殻手」と呼ばれる器壁のきわめて薄い磁器が出土しており、磁土製匣鉢を用いて焼成し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また卵殻手の製品には「蔵春亭三保造」の染付銘が記されている。「蔵春亭」は幕末･明治の有田の商人である久富家の商標の類である。「蔵春亭」を最初に号した久富与次兵衛昌常は、天保12年(1841)に藩の許可を得て、オランダ貿易を始めており、彼の長男･与次兵衛昌保(明治11年(1878)没)が「蔵春亭三保」銘を用いた(有田町史編纂委員会編1987　p.350)。つまり幕末の年木谷３号窯では、磁土製匣鉢を用いて輸出用の卵殻手製品を生産していたことが知られる。

ひるがえって、先に触れた礒窯跡採集の薄手の染付磁器碗と年木谷３号窯跡出土の卵殻手磁器とを比較してみると（図８）、両

者は胴部付近の器壁の薄さは共通するが、底部および高台の作り方では、年木谷３号窯のものがきわめて薄いのに対し、磯窯のそれはやや厚い。このような違いは有田と薩摩での磁器成形技術の差を示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それゆえ磯窯の薄手磁器を卵殻手と断ず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ものの、胴部器壁の薄さの共通性から、少なくとも卵殻手を志向した製品と評価できよう。

ところで卵殻手磁器に関しては興味深い文献がある。日英修好通商条約締結のため、1858年に来日したイギリスの外交官エルギン卿の滞在記に、長崎での記述として以下のようにある（オリファント（岡田訳）1968）。

「きわめて薄い陶器egg-shell China[5] もヨーロッパの市場向けに製造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それは主に肥前Fizenや薩摩Satsumaで作られるきわめて精巧な品で、日本人自身には使用されていない。江戸ではこれほど薄手のものは手に入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p.49）

「ヨーロッパ人の要望するきわめて薄い陶器は、大量に売られているが、これは主に肥前と薩摩Satsumaの地方から供給されるものである」（p.58）

つまり1858年段階の長崎において、肥前と薩摩から供給された輸出専用のきわめて器壁の薄い「egg-shell china」が売られていたという内容である。この記述は、南京皿山窯における磁土製匣鉢の使用、磯窯における薄手磁器の生産とあわせて考えると、斉

彬の生存時に、実際に薩摩産の磁器が輸出されていた可能性を示している。

(3) 小結

これまでのところ以下の4点が確認できる。

①有田年木谷3号窯における磁土製匣鉢を用いた輸出用卵殻手磁器生産

②南京皿山窯跡採集の磁土製匣鉢（有田からの技術導入を示唆）

③磯窯跡採集の洋風皿と薄手の磁器碗

④エルギン卿滞在記における記述（egg-shell chinaの供給元：肥前と薩摩）

これらのことから、島津斉彬は、有田の技術を導入することで、輸出用の卵殻手のような薄手の磁器を、磯窯および南京皿山窯で生産していた可能性があり[6]、またエルギン卿滞在記に信を置けば、それらは1858年段階で、長崎において輸出されていた可能性がある、と言えよう。

3．色絵陶器について

最後に島津斉彬が色絵陶器、つまりのちの金襴手様式のような陶器の輸出を考えていたかどうかについて、検討しておきたい。

先述した『言行録』の記述から斉彬が色絵製品（「錦手焼ニ用ル釉薬」）の改良·開発を試みていたことは否定できない[7]。しかし朴正官の履歴によれば、薩摩産の色絵陶器がヨーロッパにおいて好評を博すのは、1867年のパリ万博を待たねばならない。さ

らに現在ヨーロッパに残る初期の色絵陶器を調査した松村真希子は、それらがパリ万博以降に美術館に収蔵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としている。つまり、現在、東京英国大使館が所蔵する「色絵象耳付花瓶」は、1869年にサウスケンジントン博物館（現Ｖ＆Ａ美術館）が収蔵したものであり、またパリ·セーブル美術館の「色絵金彩象耳付丁字風呂」も1868年に収蔵されている（松村2011）。

以上より、薩摩産の色絵陶器がヨーロッパで好評を博し、輸出品として有力視されるのは1867年以後であり、1858年に没した斉彬の時期に、それらが有力輸出品となることを想定できたかどうかは疑問が残る。むしろ貿易振興を目指した斉彬にとって、天保年間（1830～1843）に再輸出が始まった有田磁器の方が、輸出の「モデル」にしやすかったのではなかろうか。

おわりに

本稿の議論は以下のようにまとめられる。

(1)島津斉彬が輸出を考えていた薩摩焼とは、磯窯跡·苗代川南京皿山窯跡採集資料から、卵殻手のような薄い磁器であった可能性がある(有田からの技術導入の可能性)。

(2)エルギン卿の滞在記に信を置けば、その薄手の磁器は、1858年段階で、実際に長崎から輸出していた可能性がある。

(3)薩摩藩内の磁器窯跡におけるコンプラ瓶の出土例は確認されておらず、生産された可能性は低い。

(4)斉彬が色絵陶器の改良を試みたことは否定できないが、その輸出を計画していたかどうかは、年代的に疑問が残る。

(5)現段階で輸出された薩摩磁器の実物は確認できていないが、今後はその可能性を視野に入れて調査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

言うまでもなく本稿の最大の「弱点」は、上記の(5)、つまり実際に海外輸出された薩摩産の磁器の実物が確認されていない点にある。しかしこれまで斉彬の時期に卵殻手のような薄手の磁器が輸出されていた可能性について触れたものはない。それゆえその可能性を踏まえての調査研究がなされていないのが現状と言える。またエルギン卿の滞在記には触れられていないが、磯窯では洋風皿も生産していたので、卵殻手以外の器種も考慮に入れておく必要があろう。本稿がその契機となれば幸いである。

2012年7月7日

謝辞

本稿は、東洋陶磁学会研究会（2012年6月30日、於　九州国立博物館）において口頭発表した内容を骨子としています。発表の機会を与えていただいた東洋陶磁学会および大橋康二氏（佐賀県立九州陶磁文化館）とともに、研究会の席上、ご意見･ご質問をいただいた方々に厚くお礼申し上げます。また成稿にあたっては、松尾千歳氏（尚古集成館）、深港恭子氏（薩摩伝承館）、野上建紀氏（有田町歴史民俗資料館）から貴重なご教示をいただきました。心より謝意を表します。

■ 注釈

[1] ただし同書の記述には間違いが多いことも指摘されている（芳 2003）。

[2] このほか宋胡録写の土瓶片が採集されているが、使用痕跡があることから混入品の可能性があり（p.140）、図 2 には含まれていない。また白薩摩が 1 点も採集されていない点は、磯窯の製品内容を考える上で、注意すべきことであろう。

[3] コンプラ瓶とは、19 世紀に醤油や酒を輸出するために作られた磁器製容器であり、白磁の肩部に「JAPANSCHZOYA」（日本の醤油）や「JAPANSCHZAKY」（日本の酒）という染付銘が書かれている。瓶本体は長崎県の波佐見焼窯場で大量に生産された。コンプラの語源　conprador　はポルトガル語で「仲買人」を意味する（小島 2002）。なお現在の尚古集成館が所蔵するコンプラ瓶の箱書には、大正 15 年（1926）に外部から寄贈された旨が書かれており、斉彬の時代から伝来したものではない。

[4] なお『研究』では磯窯跡採集として「醤」字を書く染付片を報告しているが（p.141）、コンプラ瓶生産の証拠にはならない。

[5] 引用した訳書では「陶器」としているが、「china」は通常「磁器」を指す。

[6] 同時期に卵殻手磁器を生産した窯として長崎県平戸の三川内焼があるが、同窯については幕末の生産状況の詳細がわかっていないこと、また本文で触れた島津斉彬と鍋島直正との関係を考慮に入れ、ここでは有田からの技術導入を想定しておきたい。

[7] 「錦手焼」には陶器と磁器ともに含まれる。ここではのちに朴正官に技術が受け継がれるという履歴の記述を尊重して、陶器と考えておくが、磁器の可能性も否定できないことを付言しておく。

参考文献

『繭糸織物陶漆器共進会　陶器功労者履歴』1885年（『薩陶製蒐録』鹿児島県立図書館蔵）

有田町史編纂委員会編1987『有田町史　陶芸編』有田町

鹿児島県維新史料編さん所1981『鹿児島県史料　斉彬公史料』第１巻　鹿児島県

市来四郎編1944『島津斉彬言行録』岩波文庫（1884年刊行）

オリファント、ローレンス（岡田章雄訳）1968『エルギン卿遣日使節録』雄松堂出版

芳即正2003「薩摩藩反射炉第二号炉の建設年代－三号炉は存在しなかった－」『旧集成館溶鉱炉･反射炉跡』pp.377-384　島津興業

小島摩文2002「コンプラ瓶」『角川日本陶磁大辞典』p.568　角川書店

坂田長愛編1926『薩摩陶磁伝統誌』公爵島津家臨時編輯所

田沢金吾･小山冨士夫1941『薩摩焼の研究』東洋陶磁研究所（国書刊行会復刻1987年）

野元堅一郎1982「薩摩」『日本やきもの集成』12巻　pp.123-131　平凡社

前田幾千代1934『薩摩焼総鑑』（思文閣復刻1976年『陶器全集』第３巻）

松村真希子2011「明治期サツマの様相－海外美術館収蔵品の調査

から－」『東洋陶磁』40　pp.117-138
村上伸之・野上建紀編1997『枳藪窯·年木谷３号窯』有田町教育委員会
渡辺芳郎2006「磯窯考－集成館事業における在来窯業の役割－」『近代日本黎明期における薩摩藩集成館事業の諸技術とその位置づけ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pp.103-116　薩摩のものづくり研究会
渡辺芳郎2011「鹿児島県日置市美山南京皿山窯跡採集の磁土製匣鉢」『考古学と陶磁史学－佐々木達夫先生退職記念論文集』pp.83-93　金沢大学考古学研究室
渡辺芳郎　金田明大2012『考古学と地下探査の協同による近世薩摩焼研究再構築のための基礎的研究』平成21～23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研究成果報告書　鹿児島大学法文学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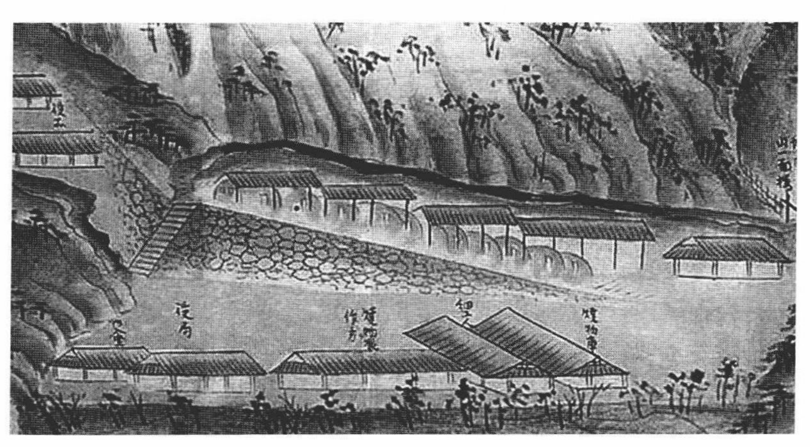


図１　『薩州鹿児島見取絵図』中の磯窯（佐賀県武雄市教育委員会蔵）

種類1	種類2	器種	点数	点数2
磁器	染付	飯碗片	2	60
磁器	染付	汲出茶碗片	6	
磁器	染付	小皿片	2	
磁器	染付	蓋片	1	
磁器	染付	その他	39	
磁器	白磁	残片	10	
焼締	焼締	残片	9	9
陶器	鉄砂釉	土瓶片	10	16
陶器	鉄砂釉	土瓶蓋片	1	
陶器	土灰釉	文字入り茶碗片	1	
陶器	土灰釉	残片	4	
合　計			85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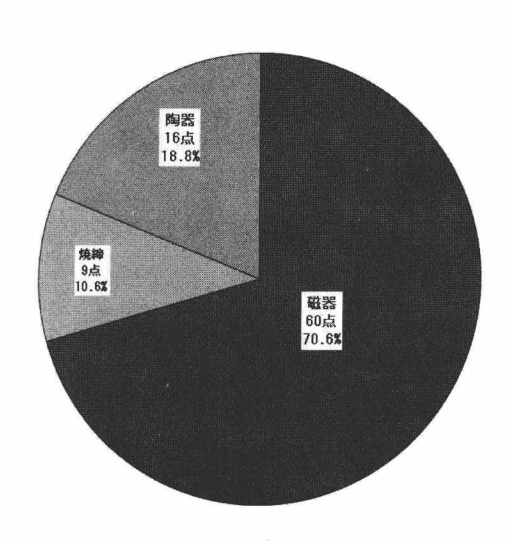


図2　『薩摩焼の研究』における磯窯跡採集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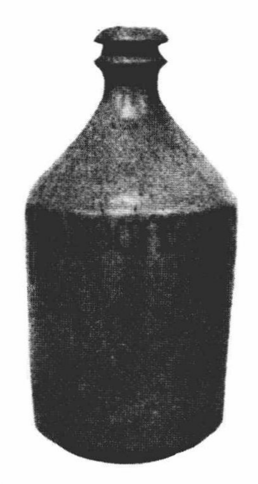


図３　島津家所蔵のコンプラ瓶（『薩摩焼の研究』よ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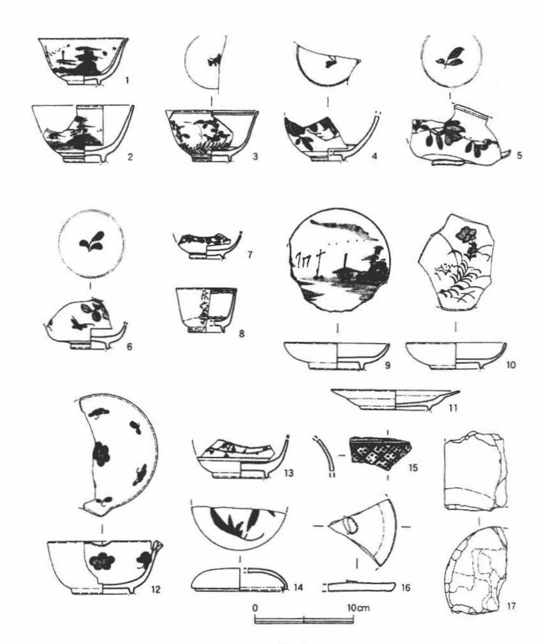


図４　1993年８月６日水害時に採集された
磯窯跡資料（渡辺2006よ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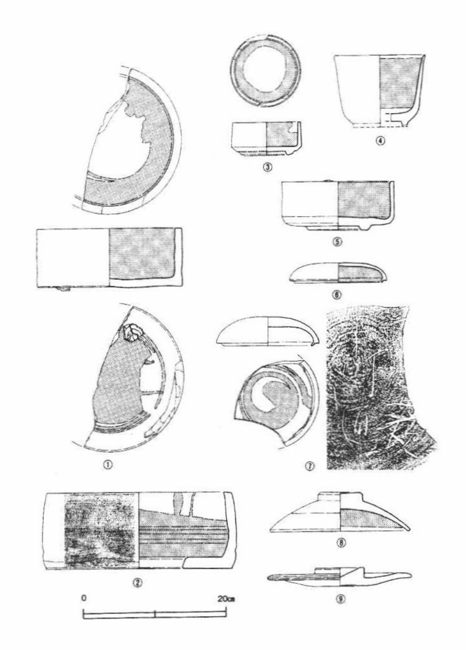


図5　苗代川南京皿山窯跡採集の磁土製匣鉢
（渡辺 2011 よ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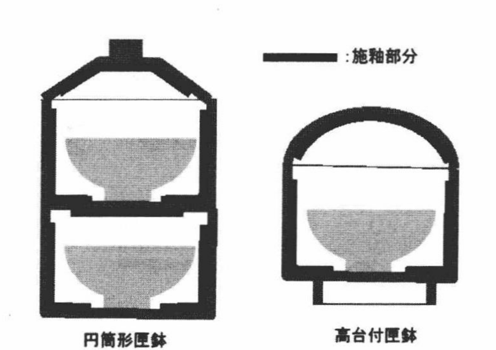


図6　磁土製匣鉢の使用方法模式図
（身と蓋との組み合わせは仮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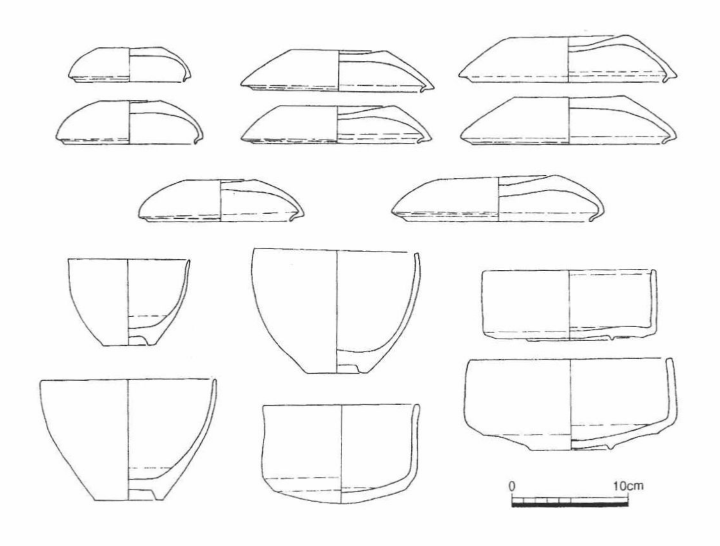


図７　有田年木谷３号窯跡出土の磁土製匣鉢（村上・野上編 1997 よ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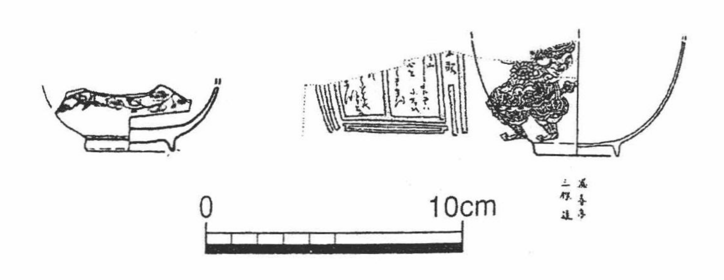


図８　磯窯跡資料（左）と年木谷３号窯跡資料（右）との比較
（渡辺 2006、村上・野上編 1997 より）

編後記

光陰荏苒,《絲瓷之路》第 4 輯已經脫稿了。總的來說，作爲編者，我們對來稿的質量是滿意的。對作者們的支持更是感激不盡。作者們提供自己優秀的文稿，面對我們提出的修改意見，總是顯得那麼虛心、誠懇，使我們感到溫暖。但是，每當將編完的書稿交付出版社時，心中總是隱隱有所遺憾。我們意識到，刊物內容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沒有書評。

書評是一個刊物必要的組分。沒有書評的刊物不是完整的刊物。一位學者說過，書評堪稱刊物的眼睛。

很久以來，學術界流傳着一種觀點：中國人的書評和西方人的不同，後者以批評爲主，前者則以表揚爲主。西式書評有助於學術進步，而中式者則不然。也許正因爲出於這類考慮，我們屢次約稿，無人響應：既不習慣西式的書評，又怕中式的書評導致不必要的誤會。

其實，中式書評一樣能夠起到推動學術進步的作用，關鍵不在

於採用表揚還是批評的形式，不在於表揚爲主，還是批評爲主，到位的表揚一樣會彰顯論著存在的問題，由於委婉，反而容易接受。真正到位的表揚和恰如其分的批評，一樣不容易做到。這不妨稱之爲中國特色。

不用說，阿諛和諂媚不是真正的表揚，不在此例。

隔鞋搔癢贊何益，入木三分罵亦精。對於一針見血、擊中要害的批評我們歡迎，到位的表揚我們同樣歡迎。總而言之，我們希望本刊能夠發表更多優秀的書評。

編者

2012年3月31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丝瓷之路：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Ⅳ=VIAE SERICAE
页数=372
SS号=13500847